

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

BECOMING TURK:
A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OF TURK

陈 浩 著



04400514975388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 / 陈浩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6. — (突厥学研究丛书). — ISBN 978-7-100-26241-5

I. K28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6B0X62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突厥学研究丛书

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

陈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6241-5

2026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2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48.00 元

总 序

突厥的“祛魅”

商务印书馆编辑提议，由我主编一套以突厥语人群为主题的丛书，我欣然应允。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将丛书命名为“突厥学研究丛书”。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突厥”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犹如远山叠影一般，让人看不清本质。我们有必要廓清“突厥”和“突厥语人群”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而对“突厥”的认知误区进行澄清。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学者们一般认为，汉文“突厥”的语源是 *Türküt*，词尾的 -t 是某种（蒙古语或粟特语的）复数形式。在突厥碑铭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分别是 𐰽𐰺𐰍𐰆 和 𐰽𐰺𐰍𐰆 ，换写成拉丁字母则分别是 $t^2\ddot{w}r^2k^w$ 和 $t^2\ddot{w}r^2k^2$ 。根据如尼文的拼写规则，理论上它可以转写成 *türk*、*türük* 和 *türkü* 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更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关于“突厥”一词的含义，最早的一种解释出自汉文史料。《周书·突厥传》：“（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现代突厥学家一般将 *Türk* 释为“强有力的”。

公元 552 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自称“伊利可汗”，正式肇建了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不久，由于内乱，突厥汗国便形成了以西域为中心的西突厥和以漠北为中心的东突厥的

东西分治格局。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被唐朝大将李靖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廷将东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此设立都督府州，以东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显庆三年（658），唐朝派兵消灭了阿史那贺鲁，标志着西突厥的统治彻底终结。调露元年（679），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奉职反唐，未果。永淳元年（682），骨咄禄率众起义，复兴了东突厥汗国，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或“东突厥第二汗国”。天宝四载（745），末任阿史那家族白眉可汗被回鹘击杀，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突厥汗国的统治阶层几乎都迁到了唐朝境内，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草原部落，经过短暂的整顿，形成了新的政治体。

突厥汗国崩溃之后，漠北草原兴起了回鹘汗国。回鹘在南北朝时期是高车或铁勒的一支，汉译“袁纥”，属于原生的漠北草原游牧势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中古时期，回鹘的音译除了“袁纥”之外，还有“韦纥”“回纥”，其中“回纥”较为常用。安史之乱后，回鹘统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从“回纥”改为“回鹘”，取“捷鹘犹鹘”之义。无论是从汉文史料来看，还是从回鹘汗国时期的漠北碑文来看，他们都是把前朝政权称为“突厥”，自称“回鹘”，这一区分是很明确的。

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在汉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几乎被废弃，历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地更新了各自时代内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称谓。“突厥”作为部族名，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最晚的例子是辽代的隗衍突厥和奥衍突厥。由于《辽史》中仅有只言片语，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隗衍突厥与唐朝的突厥有何关系，可能是袭用了唐朝的旧名，因为《辽史·兵卫志》提到辽属国时，不仅列举了突厥，还提到了乌孙、吐谷浑等，这些显然都是历史上的旧称。宋以后史料中提到突厥的，多为

类书从正史中摘录有关北朝、隋唐之际突厥汗国的内容。

虽然“突厥”在汉文史料中成为过时的历史名词，但它在中国以西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被继续使用着。自6世纪以来，拜占庭史料中就有关于突厥(Τούρκοι)的记载，它指代的对象当然是突厥汗国这一政治实体，具体应该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同时，“突厥”在东罗马的历史叙事传统中又被赋予了“异族”“他者”的文化内涵，取代了“斯基泰”成为游牧民族的泛称。因此，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拜占庭史料中“突厥”的指代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9世纪的拜占庭历史编纂中，Τούρκοι一词一般是指哈扎尔人。10世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录》中提到Τούρκοι，并且将其与其他突厥语人群诸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不里阿耳人区分开来。该语境中的“突厥”指的是马札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拜占庭关于“突厥”的看法，还影响到了穆斯林史家，10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概念，也包括马札尔人。

早期穆斯林文献中的ترك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包括马札尔、吐蕃甚或基马克，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总的来说，早期穆斯林文献(例如《世界境域志》)中的“突厥”(ترك)，泛指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人群用以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了让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突厥语人群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特意用阿拉伯语编纂了一部《突厥语大词典》。喀什噶里在“导论”中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名单上，有许多不是讲突厥语的人群。这说明，喀什噶里观念中的“突厥”，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

13世纪的漠北草原，兴起了一个以蒙古语人群为主体的帝国。在穆斯林文献中，蒙古只是“突厥”的一部。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

在《史集》中使用的ترك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落，而“蒙古”只是后起的一个族名，它本属于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西征，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梦魇。西欧人用与“鞑靼”（Tatar）读音相似的Tartar（“地狱”）来称呼蒙古人。随着拔都在东欧建立金帐汗国，以及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亚的统治，西欧语境中的“鞑靼”一词逐渐成为内陆亚洲民族的泛称，包括漠北的蒙古语人群和东欧、中亚的突厥语人群。东欧和中亚的蒙古统治阶层，在语言上经历了一个突厥语化的过程。例如，17世纪希瓦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血统上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说的语言却是突厥语，他撰写的王统世系，也叫《突厥世系》。

近代早期西欧语境中的Turk，特指奥斯曼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人”（Osmanli），所有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人，也都被称为“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反感欧洲人称他们为Turk，在奥斯曼人看来，Turk这一称呼只适用于中亚人以及在呼罗珊荒漠里过着单调生活的人。在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国的尝试，甚至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近代西欧的Turk概念在指涉对象上有一个延展，主要是因为学者发现了奥斯曼语与内陆亚洲所谓的“鞑靼语言”之间存在着联系。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一语言学成果，被19世纪后期的突厥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语言学概念的“泛突厥主义”政治话语。

19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流域发现了后来命名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石碑，用汉文和突厥文两种文字镌刻。这种外形酷

似北欧如尼文的突厥文字被释读之后，迅速在西欧学术界引起轰动。鄂尔浑碑铭之于突厥学的意义，不亚于罗塞塔碑之于埃及学的意义。在鄂尔浑碑铭释读的推动下，湮没于汉文史料中的“突厥汗国”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泛突厥主义”理论的鼓吹者把突厥汗国视为土耳其人历史上的王朝，并从汉文史料中断章取义，试图重构昔日帝国的辉煌。“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企图建立一个囊括欧亚大陆所有操突厥语人群的政治共同体。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虽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欧等语境中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民族”认同。19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理论，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范畴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 people），它是一个语言学范畴。汉文中的“突厥”是一个历史名词，专门指公元6—8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这套“突厥学研究丛书”能够普及有关突厥和突厥语人群的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突厥“祛魅”（Entzauberung，韦伯语），还其本来面目。

陈浩

2019年于上海

导 论.....	1
第一章 全球史视野下的突厥起源叙事分析.....	7
第一节 “狼种说”所见突厥、乌孙关系	8
第二节 《酉阳杂俎》“海神女”“金角白鹿”新解	17
第三节 “突厥与法兰克同宗说”辨析	20
第四节 中世纪阿拉伯史料中的突厥起源叙事	29
小 结	31
第二章 历史语境中的“突厥”概念史.....	33
第一节 汉文史料中的“突厥”	34
第二节 突厥碑铭中的𐰽𐰺𐰍	41
第三节 拜占庭史料中的 Τούρκοι	46
第四节 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 ترك	51
第五节 近代西欧文献中的 Turk	55
小 结	63

第三章 “突厥”“蒙古”与“鞑靼”的纠葛.....	66
第一节 蒙古兴起之前的“鞑靼”.....	67
第二节 蒙古西征与“鞑靼”的污名化.....	70
第三节 “鞑靼”与“蒙古”和“突厥”概念的重叠.....	74
第四节 西欧以“鞑靼”为中心的东亚知识建构.....	77
第五节 “鞑靼”的消退与“突厥”的泛化.....	82
小 结.....	84
第四章 中亚“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辨析.....	86
第一节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生平考述.....	87
第二节 《突厥世系》的流传和阅读史.....	89
第三节 “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异同.....	95
第四节 近代中亚政治语境下的历史书写.....	103
小 结.....	106
第五章 何谓“土耳其”？.....	108
第一节 学界对奥斯曼起源的前期研究.....	109
第二节 帝国早期的认同危机与穆拉德二世的历史编纂.....	114
第三节 “奥斯曼治世”下的多元认同.....	122
第四节 西化改革与帝国晚期的身份纠葛.....	131
小 结.....	136
结论：概念、人群与神话的纠缠.....	138
参考文献.....	147
索 引.....	173
附 录 我为什么要研究突厥学？.....	186
致 谢.....	194

导 论

任何一门学问的知识生产，都不是在权力真空中进行的。

突厥学也不例外。突厥学三百年知识生产中折射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表现为欧洲所提倡的概念及其内涵向其他地区的扩散。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武德（Robin G. Collingwood）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如果说这里的“一切”显得过于惹眼，没有照顾到传统史家对历史真实的执念，那么我们不妨换个稍微冗长的限定词，即“进入历史学家工作流程的”。此处引用科林武德的名言，只是为了佐证历史行为体的观念对于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一部饱受后现代史学影响的书。鉴于此，笔者有必要对书名中的若干关键词略作说明。

如果套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本书处理的其实是“突厥”这个称谓的名与实的问题。突厥，原本是北朝至隋唐时期（公元6—8世纪）活跃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进入汉地史家的视野之初，“突厥”蕴含的主要是族群内涵，它是以统治家族阿史那氏为核心的带有一定血缘色彩的政治共同体。突厥汗国建立以后，它将散落于漠北高原上的其他部落吸收进来，“突厥”一词所具有的政治意味就增强了，甚至稀释了它原先的族群意义。此时的“突厥”名号，已经成为整个帝国的共享资源，每一位成员都有资格享有这个政治名号的使用权。但是，在8世纪中叶帝国瓦解、统治家族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之

后，那些曾经隶属于突厥汗国的次级共同体，例如乌古斯，就会顶着“突厥”的名号继续向西寻找新的政治空间。这些群体与帝国名号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政治性的，而不是血缘和族群意义上的。时过境迁，“突厥”一词的概念变得愈加宽泛，也愈加偏离其本义。为了不至于混淆，我们把突厥汗国以后自称或他称为“突厥”的，统称为“突厥语人群”。

当下的中国舆论场对“突厥”究竟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语言学范畴，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的兴致。如果以一种学术的提问方式，对上述议题作回应，最好不过是“突厥”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语料中的指称是否存在一致性。这样一项对公元6—19世纪长时段欧亚大陆各种语境龕内“突厥”概念的指称及其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突厥语人群在历史上的断裂和延续。

毋庸讳言，本书首先是一部概念史作品。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具有强烈的德意志学术色彩，由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倡导。柯塞勒克在8卷本《现代政治社会概念词典》中收录的122个基本概念，多数的是那些具有政治属性的概念，例如启蒙、民主、自由、保守主义、公共领域、宪法等。“突厥”虽然是一个基于语言范畴的人群共同体名号，但由“突厥”派生出的“泛突厥主义”便是一个政治概念，故我们无疑可以借鉴概念史的方法，对它的指称进行历史语义学的考察。本书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另一重考虑是，德国概念史的传统是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柯塞勒克信奉“一套坚实的历史主义”，强调年代学的重要性。^①

概念史在更广泛的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语境中的对

① 德国学界最新一部全球概念史的书是：Margrit Pernau &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A Reader*, Bloomsbury, 2016。

应物则是观念史，或思想史。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在1936年提出了“单元观念”这一重要概念，认为它是构成各种哲学体系或思想的基本要素。在洛夫乔伊看来，观念是世界上最具迁徙性的事物，“单元观念”是思想史中基本的、持续不变的或重复出现的能动单元，其本质是不变的。该范式自提出以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从业者，追随者蔚然成风。但是，英国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R. Skinner）对洛夫乔伊这种将“单元观念”视为超验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精神实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任何观念都是一定条件和环境的产物，随着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产生新的意义。在斯金纳的这套“语境主义”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冲击下，洛夫乔伊的范式逐渐被摒弃。

近年来，随着中长时段理论和宏大叙事的回归，人们希望从更大的视角和更长的时段去研究概念。当然，这并非向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范式的简单回归。例如，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由于社会史的兴起以及历史学领域内的“文化转向”，观念史的研究视野正在不断萎缩，有一种退化到短期主义的危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话境的过分强调。在本书中，我们将兼顾洛夫乔伊范式中强调概念具有跨越国界的流动性，以及斯金纳“语境主义”中强调概念的含义与周遭环境的互动性。

对于书名中出现的第二个关键词“全球史”，或者有些读者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笔者近年向国内译介了两本德国全球史的著作。康拉德将全球史凝练为一句话：将历史人物、事件和进程放置于全球语境中考察。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宏观的帝国、民族和离散人群，也可以是微观的商品、个体和历史时刻，当然也可以是某个观念或概念。有学者试图把打着全球史旗号的研究进行区分，分别是作为

研究对象的全球史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全球史。实际上，这两者不是对立关系，本书的路径亦是兼而有之。

除了导论和结论之外，本书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揭示了不同语种文献中突厥起源叙事的多元性，对族源的历史起点的定位，从铁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以至于人类始祖亚当的诸种尝试都存在。史料中之所以会出现突厥溯源时间尺度不一的现象，显然是受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影响。对于族群起源叙事的解读，不能用简单的真伪标准来检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它们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含义。

如果说第一章是“突厥”叙事的横向比较研究，那么第二章则是对“突厥”概念的纵向历时性考察。在本章中，我们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梳理了“突厥”及其不同变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指称。“突厥”在汉文正史、突厥碑铭、拜占庭编年史、穆斯林史志和近代西欧文献中的指代对象，具有歧义和异质性。历史上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突厥民族”认同。所谓“突厥民族”，实际上是欧洲启蒙以来东方学家在普遍史观指导下的线性历史书写，以及在对内陆亚洲人群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前提下，分别从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对“突厥”的内涵进行建构的结果。

其余三章则分别从西欧、中亚和西亚三个不同的区域视角，尝试揭橥以下三个命题：（一）以概念重塑为表征的近代西方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二）中亚操突厥语的政治精英如何利用概念来投射现实政治秩序；（三）概念如何影响小亚细亚近代历史的进程。

13 世纪以前西欧对内亚游牧民族的认知，想象的成分居多。拔都的西征，迫使基督教世界首次采用与“鞑靼”谐音的“地狱”一词，来指代这批进入欧洲腹地的蒙古语人群。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

利用一手文献对金、元、清三个王朝的历史定位重新解读，兀然将长城以北的历代民族政权想象成一个连续的政治体，并以此串成一部“千年鞑靼史”。于是，一套全新的“鞑靼利亚”知识体系得以在西方建立，“鞑靼”也就成为囊括欧亚大陆操突厥语和蒙古语人群的泛称。“突厥”“蒙古”和“鞑靼”这三个概念的纠缠，以及借助于地图绘制向外输出的“鞑靼观”，反映了近代欧洲知识生产中“西方”（the West）与“他方”（the Rest）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第四章我们将镜头切入中亚突厥语人群内部，观察17世纪本土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①分别编纂《突厥世系》和《突厥蛮世系》两部史书的动机。他在兼顾了恶劣生存条件下两个族群长期共生的历史事实的同时，又借助于一神教叙事传统中司空见惯的谱系书写，将二者技术性地处理为同宗却不同支的关系。如此处理，既可以舒缓两大竞争性族群之间的军事张力，又能利用概念的差异强化现实政治秩序中“突厥”与“突厥蛮”的主从地位。

对于一部讨论“突厥”概念史的书来说，土耳其是不可或缺的。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早年创业维艰，直到公元15世纪，为了铸牢政权的合法性才开始编纂本朝的起源叙事。这套起源于内亚游牧人群的话语，伴随着疆域的开拓，很快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攻下君士坦丁堡后，穆罕默德二世以罗马皇帝继承人的身份自居，站在特洛伊废墟上怀古讽今。奥斯曼治世下帝国统治者的“凯撒认同”，一直持续到苏莱曼大帝。然而，帝国晚期的政治精英再次陷入认同危机，其

① 希瓦汗国的统治者，原名 *ابوالغازی بهادرخان*，转写成拉丁语是 *Abu al-Ghazi Bahadur Khan*，其中 *al-* 是阿拉伯语冠词，所以也有将其名写作 *Abulgazi Bahadur Khan* 的。中译本《突厥世系》作“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我们遵循行业规范，保留其译名，但对名字内的符号，稍做变通。我们根据 *Abulgazi Bahadur Khan* 的写法，将其译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中起源于克里米亚鞑靼人并借由欧洲东方学家提供学术养分的一种超民族国家的突厥观，得到了迎合。但是，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依据《洛桑条约》所确定的共和国疆域，实际上并未超过近世以来西欧人观念中 *Turchia* 的范畴，即小亚细亚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人群。甚至，1924 年写进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的正式国名 *ترکیه* (*Türkiye*)，也是拉丁语的变体。也就是说，奥斯曼政治精英曾经所鄙夷的用以指代蛮族的他称“突厥”，却在帝国晚期成了自称。小亚突厥语人群与西方话语霸权斗争和妥协的个案告诉我们，从长时段来看，观念对于历史进程施加着持久的影响力。

综上，本书的结构采取的是横向的叙事比较和纵向的历史语义学梳理，辅之以西欧、中亚和西亚三个突厥语人群集中分布区域的个案分析，希冀借此为读者图绘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突厥概念史图景。在中国的官修史书中，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便成为历史名称，历代中原王朝及时更新了西域和漠北民族的同时代称谓。因此，我们把涉及中国语境内“突厥”概念的讨论散落于各个章节之中，而没有另辟一章作专门解读。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突厥语人群是一个历史错综复杂、疆域分布广泛，并牵涉诸多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及其领土诉求的文化范畴，它与那些在历史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跨境迁徙，也不会侵犯其他政治体内政的国族概念，没有可比性。

第一章 全球史视野下的突厥起源叙事分析



本章将要分析的突厥起源叙事，是以突厥汗国统治家族阿史那氏为研究对象。突厥汗国存续的时段是公元6—8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北朝隋唐之际，对应于西欧的中世纪早期。突厥汗国在中亚粟特商人的协助下，扮演着中国与东罗马之间丝绸贸易中间商的角色。^① 丝绸无疑是一种全球商品，它编织了一张将中国、突厥、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等几大政治体联系起来的全球网络。突厥依托此网络实现与外部政体互动的远不止贸易，还有军事、政治和文化。所以，本书采用一种全球史的视角，来分析突厥起源的叙事。^② 一般性全球史的研究，聚焦于19世纪或者近代早期，至少是大航海以来的历史才有资格谈全球性。但是，全球史不单是全球化的历史，更是一种有益的视角，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全球语境中考察。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中世纪也纳入全球维度中探讨，并认为全球性在中世纪有着不同于近现代的独特表述。^③

①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7—88页。

② 韩儒林将突厥和蒙古的起源传说作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原刊于《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4卷，收入氏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50页。陈寅恪先生亦有论及，参见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三分，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8—139页。

③ Peter Frankopan, "Why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Global Middle Ages", in *Journal of Medieval Worlds*, vol. 1, 2019, pp. 5-10; Catherine Holmes & Naomi Standen, "Defining the Global Middle Ages", in *Medieval Worlds*, No. 1, 2015, pp. 106-117.

第一节 “狼种说”所见突厥、乌孙关系

学者们对突厥汗国的名号研究后发现，它们的词源多数都不是突厥语，而是印欧语的（伊朗语、吐火罗语），例如阿史那、设、叶护，等等。^①当然，名号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不能仅凭突厥官号是非突厥语源这一点，就证明突厥人不是讲突厥语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指出，突厥人在计数系统和方位观等方面，迥异于其他漠北草原突厥语部落，并揭示了古代突厥文明的“非突厥”成分。^②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近来撰文，指出阿史那突厥人似乎未必是游牧民族，而是一支“复合型”人群，在族群和语言上具有多元性。^③

突厥人留下的文献主要是碑铭，且几乎都属于第二突厥汗国，用如尼文、突厥语书写，属于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只有《布古特碑》和《小洪纳海石人铭文》，而且是用粟特文、粟特语书写。^④有学者甚

①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2, p. 148; Nicholas Sims-Williams and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Jabğuya: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Encyclopaedia Iranica*, Ehsan Yarshater ed., vol. 14/3, New York, 2007, pp. 314-316; Sergej G. Kljaštornyj, "The Royal Clan of the Turks and the Problem of Early Turkic Iranian Contact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47: 3, 1994, pp. 445-447.

② Denis Sinor, "Some Component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ürks", in *Altaistic Studies*, Gunnar Jarring and Staffan Rosén ed.,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85, pp. 145-159. (美) 丹尼斯·塞诺著，罗新译：《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103页。

③ Peter B. Golden, "The ethnogenic tales of the Turks",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vol. 21:2, 2018, pp. 1-37.

④ 布古特碑正面和左右两侧镌刻的是粟特文，背面是一段婆罗米文字。以前的学者主要关注碑身的粟特文部分，忽视了婆罗米文的内容。近年来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并根据零星的词汇和语言特点将其判定为一种早期蒙古语，甚至很可能是柔然汗国时期的产物。该学术团队还对1975年在漠北发现的另一通镌刻婆罗米文的慧思陶勒盖碑（Inscription of Hüis Tolgoi）重新进行解读，也认定其为一种早期蒙古语，碑文中疑似提到第一突厥汗国的泥利可汗等关键信息，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断代。Alexander Vovin, "A

至推测，突厥汗国的统治核心在语言上完全是非突厥的，第二突厥汗国使用的“突厥语”不是可汗家族的语言或者说官方语言，而是漠北传统游牧人群——九姓的语言。^①我们保守地认为，第一突厥汗国的统治家族可能掌握包括粟特语和突厥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但到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应该主要讲突厥语。

突厥起源的叙事，最早见于两部修于唐初的正史——《周书》和《隋书》。唐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见被采纳，并指派了各史编写人员，但没有成书。贞观三年（629），修史再次提上议程，令狐德棻担任《周书》主编，魏徵担任《隋书》主编。贞观十年，《周书》《隋书》与其他三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②《周书·突厥传》记载：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Linguistics* 2019 (1), pp. 162-197. Dieter Maue, “Khüis Tolgoi: Signs and sounds”, in *Journal Asiatique* 306 (2), 2018, pp. 129-139. Mehmet Ölmez,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On the discovery, the whereabouts, condition of the stones, and our expedition”, in *Journal Asiatique* 306(2), 2018, pp. 125-127. (法) 魏义天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著，敖特根、马纳琴译：《慧思陶勒盖碑铭的历史背景》，载《丝路文明》2020年11月，第147—155页。于子轩：《柔然文小考》，《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2期，第95—121页。

① Marcel Erdal, “Helitbār and some other early Turkic names and titles”, in *Turkic Languages* 20, 2016, pp. 170-178; Christopher P. Atwood,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6, 2013, p. 50. (美) 艾骛德著，陈浩译：《若干早期内亚名号考证》，载《清华元史》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6页。

② 《周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版；《隋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①

《周书》把突厥说成匈奴之别种，是历朝正史书写异域民族时的惯用手法，实质上是一种把陌生人群熟悉化的叙事策略。该叙事的梗概是：突厥国人被邻国杀尽，只剩下一个男童，他被母狼养育成人，并与母狼交合使之怀孕。敌人得知男童还活着，派重兵追杀之，怀孕的母狼则逃到了高昌北山，在一处地势优越的山洞内生下了十个儿子，其中一个阿史那氏，后来居于金山之南，为柔然帝国提供铁匠服务。这一叙事中，没有时间的维度，至于空间维度，也只提到了母狼逃难后来到高昌的北山（天山支脉），但是关于突厥人此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周书》没有交代。同一版本的叙事，也见于《隋书·突厥传》。有趣的是，《隋书》提到了突厥被邻国消灭时，“其先国于西海之上”。^②《隋书》此段有关突厥狼种的叙事，内容与《周书》基本一致，唯独这一条史料不见于《周书》，显得弥足珍贵。

突厥起源于狼种的叙事，还见于《北史》。与《周书》《隋书》不同，《北史》不是唐初官修的五代史之一，而是由李延寿在其父亲的工作基础上修成。李延寿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

① 《周书》卷五〇《异域下》，第907—908页。

② 《隋书》卷八四《北狄传》，第1863页。

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约于高宗显庆四年（659）修毕。^①李延寿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②《北史·突厥传》谓：“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③可见，《北史》比《隋书》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方位信息。

汉文典籍中的“西海”在不同语境中指称不一，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余太山处理得比较灵活，他认为既可指里海，也可指地中海。^④隋朝裴矩《西域图记》的“序”中提到，“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⑤这里提到，突厥汗庭再往西，便可抵达拂菻国和西海——可以与《隋书》和《北史》中突厥祖先居住地的“西海”放在一起讨论。夏德在1899年为《墩欲谷碑》作跋文时，把此“西海”比定为咸海。^⑥沙畹认为，西海大致相当于拂菻国的方位。^⑦余太山则判断此“西海”系指地中海。^⑧考虑到突厥祖先的居处应该有适合游牧民族的地理条件，所以我们认为里海是相对合理的解释。“其先居西海之右”中的“右”，指

① 《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600—2601页；《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延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3985—3986页。

② 《北史》“出版说明”，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③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3285页。

④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页注45，第17页注82等。

⑤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⑥ Friedrich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im 7. und 8. Jahrhunder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in *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W. Radloff ed., St. Petersburg, 1899, p. 88. 汉译本见（德）夏德撰，陈浩译：《跋墩欲谷碑》，载《欧亚译丛》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5页。

⑦ Edouar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in *T’oung Pao*, vol. 6, 1905, p. 535.

⑧ 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19页。

地理上的西方。也就是说，根据《北史》的记载，在迁到高昌北山之前，突厥的祖先居住在里海的西边。里海以西，即所谓的“黑海—里海草原”一带，这里曾是斯基泰人生活的区域，更是原始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①

汉文史料中有母狼传说的民族，最早的是乌孙。^②据张骞出使匈奴的报告，乌孙被他国所灭，国王幼子昆莫被人抱到草泽中，后有母狼哺育他，还有鸟啣肉给他，昆莫成人后，报了仇。^③至于是哪国灭了乌孙，汉文史料记载也不一致，《史记》说是匈奴，《汉书》说是大月氏。^④不难发现，乌孙版母狼故事与突厥狼种叙事，情节大致相同，即便细节并不完全一样。由于乌孙侵占了大月氏的领地，而该疆域本是大月氏从塞人手中夺来的，所以乌孙国内既有大月氏种，也有塞种。^⑤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推测，乌孙和大月氏同属一个语族，都是操印欧语的人群。^⑥

突厥与乌孙的共同点，除了狼种族源之外，还有收继婚俗。汉朝

① David W.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Chapter 5 "Language and place: the location of the Proto-Indo-European home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83-89.

② 匈奴也有狼与人交配生子的传说，不过这一叙事出现的年代比较晚，并被附会成高车的祖先。《魏书·高车传》：“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307页。

③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2692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3年版，第3168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1页。

⑥ Edwin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6, pp. 29 ff.

为了笼络乌孙对抗匈奴，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与乌孙昆莫和亲。昆莫老了以后，要求公主改嫁给他的孙子岑陁。为了国家利益，公主不得不依循乌孙的风俗下嫁岑陁。^①这一风俗也见于突厥。隋代高昌汉人政权国王麴伯雅的祖母本是突厥可汗女，他父亲死后，突厥令依照突厥人的习俗，让他纳祖母为妻，伯雅不得已而从之。^②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和亲突厥他钵可汗，封千金公主。^③隋代周后，隋文帝封她为“大义公主”，她也是按照突厥人的习俗，先后嫁了他钵和沙钵略两代可汗。^④隋朝宗室女义成公主，更是先后嫁给了四任突厥可汗（启民可汗、启民子始毕可汗、始毕弟处罗可汗、处罗弟颉利可汗）、父子两代人。^⑤

考虑到突厥与乌孙在族源叙事和收继婚俗上的共性——不仅乌孙的疆域本是塞地，而且乌孙政治体内有塞种——我们认为，突厥人与塞人在文化甚至族属上有紧密的联系。这一论点可以从希腊文献中得到佐证。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详细记载了突厥室点密可汗与东罗马帝国互派使节的事件，他不仅把突厥人称为“塞人”（Scae），更把突厥可汗给罗马皇帝的国书中的语言称为“斯基泰语”（Scythian）。^⑥有学者指出，弥南德书中的“塞”和“斯基泰”是泛称，并非专指突厥，突厥可汗的国书可能是用粟特语写的。^⑦当然我们不排除突厥可汗国书是用粟特语书写的可能性，但

①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4页。

②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1847页。

③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第912页。

④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第1870页。

⑤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第1876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第5154页。

⑥ Roge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Francis Cairns, 1985, pp. 113, 115, 117.

⑦ Roge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p. 262-263, n. 116, 119.

弥南德把突厥称为“塞”和“斯基泰”，至少反映了希腊人对突厥族属的一种认知。

斯基泰人于公元前 8 世纪前后出现在黑海—里海草原一带，对于他们的风俗和制度，古希腊史料中有不少记载。^① 希罗多德的《历史》提到，波斯人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塞人。^② 公元前 7 世纪末，塞人已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史记》《汉书》提到，塞种人被大月氏驱逐，他们中的部分人留在故地，先后臣服于大月氏、乌孙，部分经悬度进入罽宾，部分散处于帕米尔地区。^③ 斯基泰的语言材料稀少，学者推测它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东伊朗语。^④ 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附近有一处公元前 3—4 世纪的库尔干遗址，其中出土的器皿中有一行铭文，学者们还没有完全破译其内容，但从外形上看，与突厥如尼文字极为相似。^⑤ 在中古时期，中亚一带活跃着不同的塞人，我国新疆古代于阗语就是一种塞语。^⑥ 薛宗正认为，突厥的始祖便是斯基泰人。^⑦ 但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认为突厥在 6 世纪以前是操某种塞语（东伊朗语）的民族，仅是一种推测。

①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第四卷相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4—480 页。

②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第 666 页。中译本将 *Sacae* 译作“萨凯”。

③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1 页。

④ R. Schmitt, “Die Sprache der Skythen”, in *Nartamongae. The Journal of Alano-Ossetic Studies: Epic, Mythology & Language*, vol. 8: 1/2, 2018, p. 77.

⑤ 匈牙利学者 János Harmatta 自称用佉卢文释读了这段铭文，认为是一种塞语，见 János Harmatt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vol. 2, UNESCO, 1999, p. 421。不过，俄国学者 Vladimir Livšic 认为这段铭文不是佉卢文，而是古阿拉美文字的变体。有不少土耳其学者试图用古突厥语来释读，基本都是牵强附会。

⑥ Harold 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Turk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Caravan Books, 1982, pp. 8-9 ff.

⑦ 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论阿史那氏到突厥族的历史演变》，《西域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71—87 页。

除了突厥和乌孙外,母狼哺育幼子的母题,在其他文化中也有,最著名的当属罗马建城的传说。据说,罗马是由一对孪生兄弟创建的,分别叫罗慕鲁斯(Romulus)和雷姆斯(Remus)。他们是战神马尔斯(Mars)的孩子,双胞胎兄弟在出生之后便遭遗弃,被母狼哺育。^①在西方艺术作品中,这一题材很常见,往往是两个男童在一匹母狼乳下吮吸的形象。^②巧合的是,在西突厥统治下的中亚河中地区,也出土了以此为题材的实物。例如,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 Ustrūshan 城址内发现有一幅母狼哺育两名幼童的壁画,年代是公元 7、8 世纪。同一地区的片治肯特遗址,也出土了相同题材的金属箔片。^③中亚地区自 6 世纪起,就处于西突厥汗国的影响之下。^④据米诺尔斯基考证, Ustrūshan 当作 Sutrūshana。^⑤此城即唐代的东曹国,《大唐西域记》作“宰堵利瑟那国”,《隋书》作“苏对杀那”,《新唐书》作“率都沙那”“苏都识匿”和“苏都沙那”,都是同音异译。《大唐西域记》记载,东曹国“自有王,附突厥”。^⑥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乌孙、突厥与罗马在母狼哺育幼子题材上的

-
- ① Titus Livius, *Römische Geschichte*, tr. Hans Jürgen Hillen, Buch I., Artemis & Winkler, 2007, p. 19.
- ② 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卡比托利欧母狼乳婴雕塑(Capitoline Wolf)。长期以来,卡比托利欧母狼雕塑中的母狼被认为是公元前 5 世纪埃特鲁斯坎文化时期的作品,两个幼子是公元 15 世纪加上去的。不过,最新研究表明,母狼的年代在公元 1021—1153 年之间。Maria Aurora von Hase Salto, "Ein Werk des Mittelalters: Neue Erkenntnisse über die Kapitolinische Wölfin", *Antike Welt*, vol. 5, 2012, p. 55.
- ③ B. Brentjes, "Romulus und Remus mit der Wölfin aus Nordtadschikistan: Ein Beitrag zu den byzantinisch-türkischen Beziehungen im 6. Jahrhunder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15, No. 3, 1971, pp. 183-185; Sören Stark, *Die Alttürkenzeit in Mittel- und Zentralasien.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Studien*, Reichert, 2008, pp. 238-239, Abb. 102a.
- ④ 陈浩:《安居耶尼考》,载《欧亚学刊》新 5 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50—151 页。
- ⑤ *H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A.H. – 982 A. D.*, tr. V. Minorsky, E. J. Gibb Memorial Trust, 2nd edition 1970, p. 354.
- ⑥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86 页。

相似性。^①迈克尔·多卢普(Michael Drompp)指出,乌孙和罗马与突厥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宣称母狼是他们的祖先,只是把牠当作精心照料弃儿的女仆。^②塞诺在一篇有关突厥起源的文章中,处理这个问题时十分谨慎,只是提出了问题:乌孙或突厥的狼传说来源于罗马呢?还是罗慕鲁斯的故事与乌孙的狼主题出自同一源头呢?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③我们认为,应该把突厥的历史放置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考察,不能将其孤立化和特殊化,更不能局限于汉文史料来讨论突厥人的起源。关于罗马与突厥的关系,我们在下文还要讨论。

除了狼种说外,《周书》还提供了另一版本的突厥起源叙事。大意是:突厥的祖先来自于匈奴北面的索国,有兄弟十七人,其中一个叫伊质泥都师,是狼所生,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分别娶了夏神和冬神的女儿,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居住在践斯处折施山,他为同胞取火御寒,共度难关,被奉为领袖,号为突厥,又称訥都六设,他生了十个儿子,小妻生的儿子叫阿史那,在跳高竞赛中获胜,被奉为君主,名号是阿贤设。^④《北史》也收录了这一故事,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稍有出入,例如说兄弟是七十人,恐怕是讹误。^⑤关于索国何指,学者们的意见尚未统一。薛宗正等人认为,索国就是指“塞”,即斯基

①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Wu-sun and Sakas and the Yüeh-chih migration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3, 1970, p. 156; Denis Sinor, "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ürks", in Egle Peter Voorheis ed., *Folklorica: Festschrift for Felix J. Oina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pp. 237-240. (美)丹尼斯·塞诺著,吴玉贵译:《突厥的起源传说》,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67—70页。

② Michael Drompp, "The lone wolf in Inner Asia",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31: 4, 2011, p. 518.

③ Denis Sinor, "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ürks", p. 251, n. 18; (美)丹尼斯·塞诺著,吴玉贵译:《突厥的起源传说》,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69页注1。

④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第908页。

⑤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3286页。

泰人，可备一说。^①这里提到的“冬神”“夏神”，令人联想到希腊罗马的神话。但是因为此段叙事过于碎片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匹对。这一叙事情节碎片化的原因，是唐初汉人对突厥人的了解有限。

与《周书》同时修成的《隋书》，还提供了一条不见于《周书·突厥传》的说法。《隋书·突厥传》：“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②《隋书》把突厥迁居金山并为柔然锻奴的历史，放置于北魏灭北凉的背景下，与其说平凉杂胡是突厥人的祖先，还不如说是在突厥汗国兴起之前突厥人曾在河西一带活跃过。薛宗正认为，汉文史料中有关突厥祖先的不同叙事，代表了突厥历史上不同的发展阶段，于是据此重构了一幅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突厥连续历史谱系，以及从西海塞人、漠北索国、平凉杂胡到金山突厥的迁徙路线。^③考虑到唐初官修史书的背景，我们认为，就突厥起源的叙事而言，《周书》《隋书》和《北史》编纂者能够参考的文献是差不多的，只是各自史家在剪裁史料时的手法不一，于是在突厥起源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的信息也就参差不齐。

第二节 《酉阳杂俎》“海神女”“金角白鹿”新解

关于突厥起源的叙事，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首次提出了不同

① 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论阿史那氏到突厥族的历史演变》，《西域研究》1987年第1期，第75页；János Harmatta, “A türkök eredetmondája”, *Magyar Nyelv*, vol. 95: 4, 1999, p. 391;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05, n. 53.

② 《隋书》卷八四《北狄传》，第1863页。

③ 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论阿史那氏到突厥族的历史演变》，《西域研究》1987年第1期，第71—87页。

于《周书》和《隋书》的版本。段成式生活在晚唐，约生于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酉阳杂俎》是他根据搜集来的民间故事而编纂的，所谓“饱食之暇，偶录记忆”。^①《酉阳杂俎》卷四：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咄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咄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蠹，常取呵咄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咄，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②

《酉阳杂俎》这段关于突厥起源的叙事，不见于任何正史。段成式提到的这个以射摩、海神女和白鹿为母题的传说，或许是采自降唐突厥人自己的历史记忆。对“射摩”“舍利”等名号的语源，也有不少学者尝试过寻找。例如，艾骜德认为“射摩”来源于印地语 *zhama*，“舍利”能在契丹史料中找到解释。^③芮传明从“日暮入海”“至明送出”这一神话母题出发，认为《酉阳杂俎》这段有关射摩的传说，是

①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序”。

②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第44—45页。

③ Christopher P. Atwood,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pp. 57-59, 78-81. (美) 艾骜德著，陈浩译：《若干早期内亚名号研究》，载《清华元史》第4辑，第294—297、319—322页。

以希腊神话和巴比伦神话中的太阳神为原型的。他还把“射摩”比定为古巴比伦的太阳神“沙玛什”，把“舍利”比定为希腊神话中月亮神“塞勒涅”，并认为与阿佛洛狄忒的事迹也有关。^①

我们要从另一角度来解读这段史料。该叙事中核心的角色，应该是金角白鹿。在古希腊神话中，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对应于罗马神话中的戴安娜）因阿伽门农（Agamenon）在出征特洛伊之前射杀了她的圣鹿而动怒。愤怒的阿尔忒弥斯控制海风，使得阿伽门农的船只无法起航。最后，阿伽门农不得不答应献祭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ia），阿尔忒弥斯在祭礼的最后一刻用一头鹿代替了伊菲革涅亚。^②阿尔忒弥斯是狩猎女神，她曾擒获五头鹿，将其中四头作为拉载工具，第五头放养于山林。这头鹿非常漂亮，有着金色的鹿角和青铜的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的第三项便是擒获这头金鹿，不过最终擒获后又还给了阿尔忒弥斯。^③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有很多的相似性。当然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在希腊神话中阿尔忒弥斯是海神波塞冬的侄女，《酉阳杂俎》中说的“海神女”——可以理解成“海神的女儿”，也可以理解成“女海神”。《酉阳杂俎》有两处提到鹿，一处是海神女用以迎射摩入海的座驾“白鹿”，另一处是突厥先窟冒出来的动物图腾“金角白鹿”。^④海神女对突厥金角白鹿的态度是“（射摩）若射不中，即绝缘矣”，而金角鹿对于阿尔忒弥斯则是至宝。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

① 芮传明：《古突厥先祖传说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第52—53页。

② （德）施瓦布著，楚图南译：《希腊神话和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页。

③ （德）施瓦布著，楚图南译：《希腊神话和传说》，第121页。

④ 2001年考古学家在毗伽可汗陵墓发现了鎏金银鹿，或可印证突厥的“白鹿”（银鹿）图腾。对该件器物的考古学解读，参见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1期，第68—76页，特别是第71—72页；陈凌：《突厥毗伽可汗宝藏及相关问题》，《欧亚学刊》第7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3—86页。

点是不同年代的口头叙事会叠加、重组，即所谓史料的“层累效应”。所以，学者们对这段文献才会有不同的解读。譬如，芮传明把金角白鹿的母题跟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事迹联系起来。^①但是，我们之所以用阿尔忒弥斯和阿伽门农的故事来解读这一叙事，更重要的原因是特洛伊战争这一历史背景。阿尔忒弥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因为她的胞弟阿波罗是特洛伊城的守护神，所以她是站在特洛伊一方的。^②关于突厥与特洛伊的关系，我们在下文详细讨论。

第三节 “突厥与法兰克同宗说”辨析

到目前为止，讨论突厥起源的学者很少使用同时代拉丁语文献中的一条相关史料。^③该条史料保存在一部公元7世纪有关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中——时间跨度是自创世到公元642年，也有个别历史事件晚至658年。这部编年史本来是匿名，16世纪有学者在书内发现“弗莱德加”（Fredegar）一名，于是就将其冠名为《弗莱德加编年史》。1882年德国历史学家布鲁诺·克鲁什（Bruno Krusch）提出《弗莱德加编年史》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④后来，有人在克鲁什提出的多元作者论的基础上，又提出推测《弗莱德加编年史》有两位作者的说法。^⑤不过，近年来学界又倾向于认为它的作者是单

① 芮传明：《古突厥先祖传说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第56页。

② 〔德〕施瓦布著，楚图南译：《希腊神话和传说》，第384—385页。

③ 德国学者马夸特曾在一个注释中提到《弗莱德加编年史》中记载的Torquoth就是突厥。参见〔德〕约瑟夫·马夸特著，陈浩译：《库蛮民族史证》，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65页。

④ Bruno Krusch, “Die Chronicae des sogenannten Fredegar”, in *Neues Archiv der 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vol. 7, 1882, pp. 249-345, 421-516.

⑤ Siegmund Hellmann, “Das Fredegarproblem”, in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vol. 29, 1934, pp. 36-92; J. M. Wallace-Hadrill, “Fredegar and the history of France”, in *Bulletin of the John*

一的。^①

关于《弗莱德加编年史》一书的结构，编者在“序”中提及，他收入了五部早期的编年史——分别是匿名史家、伊西多礼（Isidore）、哲罗姆（Jerome）、伊达理乌（Hydatius）和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再加上他自己原创的内容作为第六部。他所谓匿名史家的作品，实际上是罗马史家希波里图斯《历代志》（*Liber generationis*）的拉丁语译本。^②《弗莱德加编年史》原本已佚，有30余部抄本存世，现存最早抄本是715年一位名为卢克里（Lucerius）的勃艮第修士抄写的，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Bibl. Nat. Latin 10910。^③在既有的抄本中，六部编年史被人重新编排成四卷。^④克鲁什1888年出版的校注本是权威版本，采用的就是四卷的结构。^⑤前三卷的内容基本是其他史书的摘录，第四卷是勃艮第宫廷的史实，即《弗莱德加编年史》编者原创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重视。^⑥

《弗莱德加编年史》前三卷内容，也并非纯粹地抄录他史，编者会时不时地加入一些插叙，不过对这些插叙的史源并没有交代。我们将要讨论的一条涉及突厥起源的文字，就是属于编者插叙的内容。

Rylands Library, vol. 40, 1958, pp. 529-530; J. M. Wallace-Hadrill ed. and t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and Its Continuations*, London, 1960, xix-xxiv.

- ① Walter Goffart, "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 *Speculum*, vol. 38: 2, 1963, pp. 206 ff.
- ② J. M. Wallace-Hadrill, "Fredegar and the history of France", p. 529.
- ③ J. M. Wallace-Hadrill, "Fredegar and the history of France", pp. 527-528.
- ④ Walter Goffart, "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 pp. 209-210.
- ⑤ Bruno Krusch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Tomus II., *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 Viaticorum*, Hannover, 1888.
- ⑥ 中译本《弗莱德加编年史》也只译了第4卷。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另请参考陈文海：《百年学论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84—91页；陈文海：《百年学论与“弗莱德加”身份问题》，《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25—34页。

这段文字明确提到，马其顿人、罗马人、法兰克人与突厥人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是特洛伊城陷落之后逃出的四支遗民。《弗莱德加编年史》第二卷中，在摘录哲罗姆有关特洛伊城陷落的内容时，编者插入了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的叙事。《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第4—6节：

法兰克人的起源与这些事件有关。特洛伊的第一位国王叫普里阿摩斯（Priam）。史书中记载了他们后来是如何拥立弗里加斯（Frigas）为国王的。此后，特洛伊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前往马其顿，他们被当地接纳他们的人称为“马其顿人”。他们被要求协助马其顿人抵御外敌的入侵。在与当地人联合之后，他们生了许多子嗣，由此马其顿人成为了最强悍的武士。后来，在腓力二世和他儿子亚历山大的时代，文献记载了他们是如何的英勇。

另一部分人从弗里吉亚（Frigia/Phrygia）前行，他们被尤利西斯的诡计迷惑，虽然没有被俘，但是都从特洛伊被赶了出来。他们携妻带子在各处游荡，在自己人当中选了一位名为“法兰西奥”（Francio）的人作为国王。因此，这群人被称为“法兰克人”（Franks）。据说，法兰西奥英勇善战，常年与大量不同的人群交战，在蹂躏了亚洲的部分土地之后，他最终进入了欧洲，在莱茵河或多瑙河与大海之间的区域定居下来。^①

在建立了法兰克人和马其顿人的共同起源之后，弗莱德加又提到特洛伊人的另一支后裔——突厥人：

^① Fredegar, *Chronicle* II, 4-6, cf.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ed., and tr., *From Roman to Merovingian Gaul: A reader*, Toronto, 2008, pp. 591-592.

据记载，同样起源于特洛伊人的另一人群是突厥人（Torci），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来。法兰克人在穿过亚洲、一路征战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在大海和色雷斯之间的多瑙河谷安顿下来。他们从自己人中选了一名国王，叫“突厥奥特斯”（Torquatus），这也是突厥人族称的由来。

在长途跋涉中，法兰克人携妻带子，在战争中所向披靡。但是毕竟常年征战，所以他们在莱茵河安顿下来时，只有一小部分抵达，因为突厥奥特斯的分化，导致他们的势力削弱了。^①

弗莱德加还谈到了特洛伊人的第四支系，也就是罗马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第8、9节：

在同一时期，拉丁人的第一位国王出现了，因为他们也是从特洛伊城逃往出来的，拉丁国王和弗里加斯都是来自特洛伊。但是由于特洛伊城陷落，亚述人遭遇洪水，他们也遭迫害，所以他们离开了特洛伊城，分成了两拨。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和一个弗里加斯王国。在特洛伊城陷落后第三年或者第八年，埃涅阿斯统治了拉丁人——后来被称为“罗马人”。据说，埃涅阿斯和弗里加斯是兄弟。^②

与上述内容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第3卷第2节，也是编者的插叙：

① Fredegar, *Chronicle* II, 4-6, cf.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ed., and tr., *From Roman to Merovingian Gaul: A reader*, p. 592.

② Fredegar, *Chronicle* II, 8-9, cf.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From Roman to Merovingian Gaul: A reader*, p. 593.

关于法兰克人的国王，哲罗姆已经谈过了，在他之前的维吉尔也讲过。特洛伊人的第一位国王是普里阿摩斯。尤利西斯智取特洛伊城后，他们离开了那里。此后，他们拥弗里加斯为王。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前往马其顿。另一部分在弗里加斯的领导下，被称为“弗里吉亚人”。他们在亚洲游荡，后来在多瑙河和海洋之间安顿下来。后来又分成了两拨，在法兰西奥国王领导下的一拨人进入了欧洲。他们在欧洲游荡，后来携妻带子在莱茵河定居。他们打算在莱茵河岸不远处建一座以“特洛伊”命名的城市。这项工程无疾而终。另一拨人留在了多瑙河谷，从他们当中选了一位名为“突厥奥特”（Torcoth，即“突厥奥特斯” Torquotus）的人担任国王，突厥人的族名就是来源于他。进入欧洲的那拨人被称为“法兰克人”，名称来源于“法兰西奥”。^①

以上就是《弗莱德加编年史》关于突厥起源的全部内容。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的叙事，一般不被学者视为信史。我们不是要去验证这一叙事的真实性，而是要追问它产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伊恩·伍德（Ian Wood）推测，这一叙事或许与勃艮第人被称为罗马人的兄弟有关——背景是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曾经寻求勃艮第人的支持，来对付阿拉曼人。法兰克人应该与勃艮第人一样，是在罗马帝国外交政策的语境中获得特洛伊起源叙事的。换句话说，法兰克人与罗马人共同起源的叙事，应该是为了彰显两者之间的外交纽带。^②从法兰克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与罗马人共同起源于特洛伊人的叙事，去掉了压

① Fredegar, *Chronicle* III 2, cf.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From Roman to Merovingian Gaul: A reader*, p. 593.

②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4, pp. 3-35.

在法兰克人身上的蛮族标签，他们便与罗马人一样都有辉煌的历史和高贵的身份。这一叙事是法兰克社会、文化、宗教和族群走向综合与融通的一种反映，更是进一步推动法兰克社会聚合、增强法兰克集体意识的一种途径。^①弗莱德加通过插叙的形式建构法兰克人的谱系，也是为墨洛温王室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②

同样，突厥人和法兰克人共同起源的叙事，也应该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公元568年左右，由于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在丝绸贸易上未谈拢，双方的外交关系闹僵，突厥室点密可汗便遣使到东罗马帝国寻求丝绸销路和军事结盟。^③在东罗马帝国一方，由于面临波斯和哈扎尔人的入侵，也急需外援，西方的法兰克人和东方的突厥人是拜占庭的两个有力盟友。^④所以，《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突厥、罗马和法兰克人共同起源的叙事，应该放置于拜占庭的外交战略中来理解：既然罗马、突厥和法兰克都是起源于特洛伊的遗民，那么拜占庭、突厥和法兰克人的结盟也就顺理成章了。法兰克人可能是通过拜占庭间接了解到突厥汗国的，因为在君士坦丁堡常有法兰克和突厥的使者往来。^⑤

直到15世纪，欧洲国家都普遍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特洛伊

① 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01页。

② 李隆国：《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86—88页。

③ Roge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p. 113-115.

④ Roge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 117.

⑤ Thomas J. MacMaster, "The Origin of Origins: Trojans, Turks and the Birth of the Myth of Trojan Origins in the Medieval World", in *Atlantide*, vol. 2, 2014, pp. 1-12.

城的逃亡者，突厥人与法兰克人共同起源的叙事也未受质疑。^①自13世纪以来的西欧知识谱系中的“突厥”，特指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②巧合的是，特洛伊城就位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内。此外，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外甥名叫 Teucer，维吉尔用它的变体 Teucrian 来指称“特洛伊人”。^③“突厥”在中世纪晚期拉丁语中的形式是 Turcia，它与 Teucra 的形式十分接近。所以，突厥人和法兰克人共同起源于特洛伊人的叙事，在15世纪就显得毫无违和感了。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曾致信教皇尼古拉五世，说奥斯曼人与法兰克人是兄弟，希腊人是两者共同的敌人，他要做的事情是替曾经的特洛伊人复仇，所以同为特洛伊子嗣的西欧人应该帮忙。^④

值得注意的是，穆罕默德二世所凭借的“突厥和法兰克同宗说”，是纯粹从字面上对西欧叙事传统的解读，已经彻底脱离了7世纪《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突厥”和“法兰克”的概念语境。15世纪，奥斯曼把所有西欧人（威尼斯人、英国人、荷兰人等）统称为“法兰克”，西欧人用“突厥”专指奥斯曼境内的穆斯林——那些中亚、东欧和欧亚草原的突厥—蒙古语人群则被称为“鞑靼”。^⑤奥斯曼帝国的历代编年史中，没有一条关于突厥汗国的记载，说明奥斯曼苏丹根本不

① Elizabeth A. R. Brown, "The Trojan origins of the French and the brothers Jean du Tillet", in Alexander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Narrators and Sources of Early Medieval History*, Toronto, 1998, pp. 348-383.

② Daniel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1, n. 4.

③ Virgil, *Aeneid*, tr. Frederick Ah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One, 2007, p. 23.

④ Terence Spencer, "Turks and Trojans in the Renaissance", i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47, 1952, pp. 330-331.

⑤ 参见本书第三章。

知历史上的突厥汗国。奥斯曼苏丹也从未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国的可汗。

奥斯曼苏丹家族的起源及其身份认同,在15世纪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叙事。自穆拉德二世(Murad II,在位时间1421—1444年、1446—1451年)起,奥斯曼宫廷开启了官修史学的传统。雅兹吉奥卢·阿里(Yazıcıoğlu Ali)在《塞尔柱史》(*Tevârih-i Âl-i Selçuk*)中,把奥斯曼人的祖先追溯到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并在乌古斯、塞尔柱和奥斯曼人之间建立某种历史延续性,目的是为了巩固刚刚从内战和政治停摆中恢复过来的奥斯曼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宫廷史学关于奥斯曼人起源的叙事出现了转向。穆罕默德二世更多地是把自己视为一位欧洲统治者,他要争取的是罗马继承人的身份,所以会欣然地接受那套把西欧语境中的“突厥”追溯到特洛伊人的叙事,因为那将意味着西欧语境中的“突厥”——奥斯曼人,与法兰克人是同仇敌忾的兄弟。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学者开始质疑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这一叙事的可信度,到16世纪时,这一叙事逐渐被法兰克人是高卢人(凯尔特人)的后裔说所取代。^①

对于将法兰克人追溯至特洛伊人的族源叙事,不宜简单地以真伪论之,而应将之放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予以审视。^②同样,对于把突厥人追溯至特洛伊人的叙事,也当如此看待。我们暂且把弗莱德加所提供的将突厥人祖先上溯至特洛伊遗民的叙事,与《酉阳杂俎》中海神女神话和援救特洛伊城的女神阿尔忒弥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结

① Krzysztof Pomian, "Franks and Gauls", Pierre Nora ed., Arthur Goldhammer tr., *Realms of Memory*, New York, 1996, pp. 27-76. 转引自李隆国:《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86页。

② 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景》,《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第93页。

合起来，来讨论突厥人“祖先”在青铜时代的语言。关于特洛伊战争时代（公元前 13—前 12 世纪）当地的语言，长期以来只能凭借《伊利亚特》中的只言片语来猜测。1995 年在特洛伊城遗址发现了一枚赫梯帝国晚期的印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3 世纪，这是特洛伊遗址现存的唯一一件有关当地语言的实物资料。该印章用卢维语镌刻，说明卢维语在特洛伊城是流行的——卢维语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的一种印欧语。^①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突厥人起源于特洛伊的叙事，那么他们在青铜时代应该也是操印欧语的人群。

《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突厥人与罗马人共同起源的叙事，我们也要结合突厥人与罗马人在母狼哺育幼子神话上的相似性，来进行解读。意大利博洛尼亚出土的一具公元前 4 世纪晚期的墓室浮雕，刻画了一匹母狼哺育一个男童的形象。埃特鲁斯坎文明中母狼叙事的版本早已佚失，学者们怀疑罗马人可能借鉴了埃特鲁斯坎的这一叙事母题，并有所改造。^②巧合的是，埃特鲁斯坎的文字，与突厥汗国碑铭和北欧如尼石刻文字，在外形上极为相似。北欧如尼文的起源，一般都认为是埃特鲁斯坎文字。^③但是，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就突厥如尼文的起源达成一致意见。大概是出于对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警惕，这个课题始终没有什么进展，任何将其与外部文字（例如埃特鲁斯坎文字和北欧如尼文）联系的主张都不被鼓励。不过，就如同反对将汉

① Frank Starke, "Troia im Kontext des historisch-politischen und sprachlichen Umfeldes Kleinasiens im 2. Jahrtausend", in *Studia Troica*, vol. 7, 1997, pp. 447-487. 转引自 Manfred Korfmann, "Troia, an ancient Anatolia palatial and trading cente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period of Troia VI/VII", in *The Classical World*, vol. 91: 5, p. 373.

② Otto J. Brendel, *Etruscan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75-376.

③ Lars Johanson, "Mutmaßungen über schwedische und türkische Runen", *Zwischen Polis, Provinz und Peripherie. Beiträge zur byzantinischen Geschichte und Kultur*, Lars M. Hoffmann ed., Wiesbaden, 2005, pp. 808-822.

文史料中突厥起源的叙事与其他文献中的叙事割裂开来一样，我们也反对将突厥文字孤立看待的陈旧观点，而是应该将其放置于全球史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正视它与埃特鲁斯坎文字和北欧如尼文的相似性。

第四节 中世纪阿拉伯史料中的突厥起源叙事

事实上，《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者并没有将法兰克人、罗马人和突厥人的世系止步于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而是一直追溯到诺亚的儿子雅弗。^①这套圣经式谱系叙事传统，也被中世纪的穆斯林史家所继承。关于人类历史，传统的伊斯兰教版本整合了两种叙事。一种是圣经中关于大洪水之后人类的故事；一种是英雄祖先叙事——每个族群都有一位男性英雄先祖。这两种叙事的整合，旨在解释人类在族群和语言上的分化，在强调多元的同时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共同的起源。^②马哈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突厥最初有24个部落，起源于诺亚之子雅弗。^③同时，在同一时期的回鹘文《福乐智慧》中，突厥的君主中又有一位英雄人物通哈·阿勒普艾尔(Toŋa Alp)，也就是塔吉克人所称的“阿夫拉西阿卜”(Afrasiyab)。^④根据伊朗的传说，阿夫拉西阿卜是图兰(“图兰”在伊朗语中是对突

① Bruno Krusch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Tomus II., *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 Viaticum sanctorum*, p. 21.

② Yehoshua Frenkel, "The Turk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 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ed., Brill, 2004, p. 224.

③ Mahmūd al-Kāshgārī, *Dīwān Luyāt at-Turk/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Robert Dankoff and James Kelly ed., p. 82.

④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魏萃一译：《福乐智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厥人领地的称谓)的国王，是伊朗的死敌。^①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版本的突厥起源叙事与中世纪早期法兰克人的突厥起源叙事有所不同。伊斯兰教版本的叙事，直接把“突厥”定位成雅弗的长子，而不是特洛伊城陷之后逃出来的“突厥奥特斯”。^②此外，11世纪初的穆斯林史家加尔迪兹(Gardīzī)记录了另一个版本的有关突厥与狼的故事：

诺亚有个祈求，问上帝他是否可以教雅弗一个名，每当他说出这个名时，就会大雨倾盆……雅弗将其写在石头上……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远及中国的歌革与玛各人，都是雅弗的了。他把这片疆域称为“突厥”。

至于突厥人头发稀疏和瘦骨嶙峋的特征，是雅弗子嗣的先天病。突厥人一直没有得到治疗，直到有一位老妇告诉他的母亲：给他一定数量的小蚂蚁蛋和狼奶，能治好他的病。于是，他的母亲就一个月不断地给他这些营养品，直到他的病痊愈。然而，当他长出胡须来时，还是稀疏。他的儿子们也落下了这个毛病。他们的头发稀疏，是因为吃了小蚂蚁蛋，他的脾气坏，是因为喝了狼奶。^③

在定居的穆斯林史家笔下，“突厥人”是游牧的异教徒。他们试图创造出一个“他者”，作为一种自我定义、与外部世界区别开来的

① E. Yarshater, "Afrāsīāb", *Encyclopædia Iranica*, vol. 1/6, Brill, 1984, p. 570.

② Maḥmūd al-Kāshgārī, *Dīwān Luyāt al-Turk/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Robert Dankoff and James Kelly ed., p. 82.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页。

③ Yehoshua Frenkel, "The Turk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 pp. 219, 228.

工具。因此，他们的叙述中充满对突厥人的刻板印象。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突厥人的消极形象，不仅具有种群和社会价值，而且具有合法性建构的目的。^①穆斯林学者把突厥人描述成信仰多神教的群体，他们的国家是异教徒之邦。这一分类的直接影响就是，欧亚草原民族被排除在三大“合法”一神教的信仰体系之外，因此也就没有“受佑”的资格。在这一语境下，对突厥人的人身攻击就显得合理合法了。^②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将突厥祖先一直追溯到诺亚之子雅弗的叙事，带有明显的一神教谱系学说的特点。18世纪以后出现的欧洲东方学家，抛弃了这套学说。学者们开始把突厥的起源追溯到汉文史料中的匈奴，并试图在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女真等中国北方民族之间建立某种历史的连续性。

小 结

综上，本章把不同语种史料中的突厥起源叙事放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中讨论，并结合神话学、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资料，揭示出现有史料对突厥祖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叙述：汉文史料更多反映的是铁器时代的突厥史；希腊、拉丁语史料中的记载则追溯至青铜时代，甚至使用圣经的世系学说，一直追溯到诺亚的儿子雅弗；穆斯林文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具有明显一神教色彩的突厥世系。简言之，希腊语史料中是斯基泰起源说，拉丁语史料中是特洛伊起源说，

① Ulrich W. Haarmann, "Ideology and history, identity and alterity: the Arab image of the Turk from the 'Abbasids to modern Egypt",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1988, pp. 175-196.

② Yehoshua Frenkel, "The Turk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 p. 232.

汉文史料中是狼种起源说，穆斯林文献中是雅弗起源说。这种追溯族源的文献，我们不能以真伪的标准去衡量，而是要把它们放置于史料形成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不过，几乎所有关于突厥起源的叙事，都或明或暗地揭示了突厥人与印欧语人群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具有相关性。需要慎重的是，这些相关性尚不足以让我们去判断公元6世纪出现在阿尔泰山的阿史那氏，及以其为核心的第一突厥汗国统治阶层究竟是讲哪种或哪几种语言的，更遑论探讨其族源了。族源问题的讨论，只有在时间刻度的参照下才具有合理性。公元6世纪和阿尔泰山，当然不是突厥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原点”。但是，当我们追溯突厥族源的时候，时间的刻度究竟是拨在铁器时代的斯基泰，还是青铜时代的特洛伊，抑或是大洪水时代的雅弗，见仁见智。根据最近的基因学和考古学假设，突厥语人群甚至可能来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①

① 学者推测，突厥语人群甚至可能来源于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粟作农业文化——兴隆洼文化。Martine Robbeets, "Austronesian influence and Transeurasian ancestry in Japanese: A case of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in *Language Dynamics and Change* 7 (2017), pp. 216-219. 复旦大学韩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团队成员文少卿教授等人，对北周阿史那皇后的DNA进行研究后得出了类似的结论。Wen Shaoqing et al., "Ancient Genome of Empress Ashina reveals the Northeast Asian origin of Göktürk Khanate",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23 Jan.

第二章 历史语境中的“突厥”概念史

对“突厥”的概念作一番历时性梳理，有助于澄清有关“突厥”的认知误区。只有弄清了具体历史语境中“突厥”的不同内涵，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突厥问题的实质。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突厥”所指涉的对象千差万别。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突厥民族”认同，它是近代人为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历史上某个人群是否被纳入“突厥”的范畴，没有统一的标准，它可能是基于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语言的、政治的考虑，甚至是几重标准的叠加。

在方法上，我们主要借鉴德国概念史和语境分析的理论。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所主张的“单元观念”（unit-ideas）是某种不变的实体单元的理论，早已被学界抛弃。^①英国剑桥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单元观念”的历史，只有某种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行为体所主导下的不同用法的历史。^②换言之，观念是特定条件和环境的产物，当时代和环境改变时，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产生出新的

① Arthur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② Quentin Skinner,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 in *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1999, vol. 3 (1), p. 62;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6.

意义。^①以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学派，也对洛夫乔伊所谓单元观念不变的理论表现出不信任，他们强调恰恰是因为概念发生了变化，这些概念的现代意义才能契合历史性社会。^②

第一节 汉文史料中的“突厥”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资治通鉴》首次提及突厥，系于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西魏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时任西魏丞相的宇文泰派胡人安诺槃陀出使突厥，史文中提到突厥“本西方小国……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当西魏使臣抵达时，突厥民众的欣喜溢于言表，感叹到“大国使者至，吾国其将兴矣”。这表明，此时突厥汗国的国力尚处于起步或上升阶段。《通鉴》的这条史料源于《周书·突厥传》。^③实际上，《周书》涉及突厥的材料，年代最早的一条见于《宇文测传》，时在大统八年（542）。当年十二月突厥入寇，宇文测采取了有效的遏制措施。^④

“突厥”一词在汉文史料中还有“突阙”“突屈”的不同写法。^⑤

① 张旭鹏：《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68页。

② 冯凯（Kai Vogelsang）：《概念史：德国的传统》，《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27页。

③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08页。

④ 《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第454页。

⑤ 《通典》卷二〇〇《边防典十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94页：“駁马、盐漠并无牛羊杂畜。其婚姻嫁娶与突阙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兵部八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37页：“《后周书》曰，突屈之先，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

这说明“突厥”不是汉语本土词汇，而是外来名号的音译。三种同音异译的第一个汉字相同，第二个汉字则各异。据《广韵》，“阙”去月切，入声，月韵；“屈”区勿切，入声，物韵；“厥”居月切，入声，月韵。这三个汉字的读音虽然不同，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以 -t 收尾的入声字。根据蒲立本 (Edwin G. Pulleyblank) 对中古汉语的语音构拟，可以将三种音译的中古音还原为：突阙 (EMC: dwət-khuat)、突屈 (EMC: dwət-khut)、突厥 (EMC: dwət-kuat)。^①

德国东方学家马夸特 (Josef Marquart) 首次将汉文史料中的“突厥”还原成 *Türküt，即突厥人的自称 Türk+ 复数词尾 -t，不过他并没有对 -t 究竟是何种语言中的复数词尾作进一步的解释。^②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对“突厥”的语音还原，与马夸特建议的形式一致，但他推测 *Türküt 词尾的 -t 是蒙古语的复数形式。因为“突厥”名称达于中国之时，恰是柔然人逃往西魏之际，所以伯希和推测：汉人是通过柔然人间接听说到“突厥”这个名号的。在他看来，“柔然人的语言，与其说是突厥式的，勿宁说是蒙古式的。”^③

匈牙利学者哈尔马塔 (János Harmatta) 则将“突厥”还原为 *Tirkit 或 *Turkid，并将词尾解释成粟特语的复数形式。^④ 拉瑞·克拉

①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UBC Press, 1991, pp. 311, 263, 260, 168.

② Josef Marquart,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 II*, Leipzig, 1905, p. 252; J. Marquart,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in *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 Berlin, 1914, p. 72.

③ Paul Pelliot, "L'origine de T'ou-kiue, nom chinois des Turcs", in *T'oung Pao*, vol. 16, 1915, pp. 687-689. 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48—53 页。

④ János Harmatta, "Irano-Turcica",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25, 1972, pp. 263-273.

克 (Larry Clark) 和彼得·高登 (Peter B. Golden) 等人接受了马夸特和伯希和的语源 *Türküt, 但在词尾 -t 的问题上, 却与哈尔马塔一致, 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粟特语的复数形式。^① 在古代突厥语的语料库中是存在 -t 复数词尾的, 但是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则是 -lar 复数词尾。^② 从语言学角度看, 这种数量上的巨大落差, 或许正说明了 -t 复数词尾不是突厥语原生的。旅德日本突厥学者笠井幸代,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再次论证了“突厥”音译自 *Türküt 的观点, 并强调了 -t 作为粟特语复数词尾可能性的存在。^③ 汉文“突厥”一词是粟特语复数形式的观点, 可以在第一突厥汗国的《布古特碑》中得到印证, 碑文中写作 *tr'wkt*。^④

除了将“突厥”还原为 *Türküt 的主流观点之外, 学界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俄裔美籍汉学家卜弼德 (Peter Boodberg) 推测“突厥”一词的语源是 Türküz, 其词尾的 -z 是古老的突厥语复数形式

-
- ① Larry Clark, “Mongol Elements in Old Turkic?” i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vol. 75, 1977, pp. 118-121. Peter B. Golden, “Imperial Ideology and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Unity amongst the pre-Činggisid Nomads of Western Eurasia”, 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2, 1982, p. 40.
- ② 例如“达干” *tarqan* 的复数是 *tarqat*。伯希和也讨论了这些复数形式, 但他倾向于将其归之于蒙古语复数的残存。
- ③ Kasai Yukiyo, “Die alttürkischen Wörter aus Natur und Gesellschaft in chinesischen Quellen (6. und 9. Jh.). Der Ausgangsterminus der chinesischen Transkription tūjué”, in “*Die Wunder der Schöpfung*” *Mensch und Natur in der türksprachigen Welt*, B. Heuer, B. Kellner-Heinkel and C. Schönig ed., Würzburg, 2012, pp. 81-141. 英译本 Kasai Yukiyo,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Old Turkish Word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from the 6th - 9th Century: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Word Transcribed as Tujue”, in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vol. XXIV, 2014, pp. 57-136.
- ④ Sergej Kljaštornyj & V. Livši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26 (1), 1972, p. 85; Moriyasu Takao 森安孝夫 & A. Ochir, *Provisional Report of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Sites and Inscriptions in Mongolia from 1996 to 1998* (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Osaka, 1999, p. 123.

的残存。^①蒲立本则认为“突厥”二字就是突厥人自称 Türk 的音译。他反驳伯希和最有力的证据是，唐朝一般用 -t 收尾的入声字来音译外来语词中的 -l、-r 或空音节，却没有音译 -t 尾音的例子。^②克劳森（Gerard Clauson）与蒲立本的观点相似。他进一步指出，唐朝音译外来语词音节末尾的 -t 时，往往都会另插入一个 t- 辅音起首的字（例如，*kutluğ* 的音译“骨咄禄” EMC: kwat-tawk-lawk），不过与蒲立本稍异，他认为“突厥”的语源是 Türkü。^③此外，还有人认为汉文“突厥”一词与突厥人的自称 Türk 没有关系，例如德国学者施密特（Gerhard Schmitt）认为“突厥”的语源是 *tutgun*，意思是“囚奴”。^④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甚至认为“突厥”可以还原为 *türk-wač，与“拓跋”一词同源。^⑤

除了汉文“突厥”的语源之外，我们还要弄清“突厥”所指称的对象，为此必须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公元 552 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自称“伊利可汗”，正式肇建了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突厥”一词也从最初的部落代号，一举跃升为草原帝国的政权代号。曾经隶属于柔然汗国的众多草原部落，纷纷进入了突厥汗国这个新政体的麾下。罗新教授认为，进入历史学研究范畴的北方民族，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集团，而不是“种族”意义上

① Peter A. Boodberg, "Three Notes on the T'u-Chüeh Turks", in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Berkeley, 1951, pp. 1-11.

②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 vol. 85 (2), 1965, pp. 121-125.

③ Gerard Clauson,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London, 1962, pp. 87-89.

④ Gerhard Schmitt, "Sino-Altaica",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5, 1977, pp. 175-185.

⑤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Chinese Names of the Tibetans, Tabghatch, and Turks", in *Archivum Asiae Medii Aevi*, vol. 14, 2005, pp. 13-18.

彼此区别的“族群”。^①姚大力教授曾经使用“雨伞”的比喻，形象地描述游牧帝国的权力结构。“某个游牧部落脱颖而出夺得蒙古高原的最高统治权后，就会撑开那把标志着本部落的大伞，覆盖住其他的部落。若干世代后，又有另一把大伞撑开，但罩盖在它之下的游牧世界构成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不同。”^②这个雨伞理论，是适合用来解释突厥汗国兴起前后漠北草原上游牧社会组织状况的。

由于在汗位继承问题上发生冲突，统一的突厥汗国不久便形成了以西域为中心的西突厥和以漠北为中心的东突厥的东、西分治格局。^③汉文史料中一般分别称之为“西突厥”和“北突厥”，现代研究者则通常将后者称为“东突厥”。^④东（北）、西突厥是汉人或汉族史家基于地理方位对突厥汗国权力结构的一种认知，实际上它们后来发展成为两个完全独立、彼此竞争的政治单元。譬如，西突厥的统叶护欲与唐廷和亲，但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不悦中国与统叶护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未克婚”^⑤。

西突厥政权有一个独立的名号——“十姓”或“十箭”，源于它的社会结构。这一构造，至迟在沙钵罗啜利失可汗在位期间（634—

①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 姚大力：《中国文明是一个“多数的文明”》，《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6月25日。

③ 西突厥的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室点密可汗起，西突厥就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汗统，但名义上仍然奉东突厥土门可汗及其继承者为大可汗。后来，东突厥内部发生汗位争夺的政治事件，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也参与其中，内战的结局是达头可汗短暂成为了整个突厥汗国的大可汗（号“步迦可汗”），同时导致东突厥阿波系的分裂。阿波系突厥一时占据了西突厥的领地，但不久便被室点密系的射匮可汗赶出西域。汉文史料没有明言西突厥汗国具体何时成立，学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参考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32、43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79页：“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

⑤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第5182页。

639年)就已经成熟了:“分为左右两厢,左厢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①汉文史料表明,西突厥“十姓”的政治架构或许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了。^②但无论如何,“十姓”既是西突厥政权的自称,也是他称——汉文史料和(东)突厥碑铭中都以“十姓”(On Ok)指代“西突厥”。显庆三年(658),唐朝派兵消灭了阿史那贺鲁,标志着西突厥阿史那氏统治的彻底终结。此后,西突厥统领的“乌孙故地”,逐渐进入了突骑施的统治时代。

相较于西突厥,东突厥汗国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更大。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末代君主颉利可汗被唐朝大将李靖俘获,标志着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唐廷将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此设立都督府州,以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永淳元年(682),骨咄禄率众起义,复兴了东突厥汗国,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虽然汉文史料中并没有在前后两个突厥汗国之间作刻意的区分,甚至突厥碑铭中也将两个汗国作为一个连续政治体进行追溯,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两个汗国之间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断裂,他们在语言、文字和身份认同上都有可能发生了变化。

迄今所知的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石刻史料,都是用粟特文、粟特语书写的,而第二突厥汗国的碑铭则是如尼文、突厥语。尽管学者们尚不能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但突厥汗国降唐后的近六十年中,其社会组织一定发生了剧变。除了语言、文字之外,第二突厥汗国精英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第5183—5184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第5188页:“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

阶层的身份认同也有很大的转变。我们以辅佐三任可汗的一代名臣噉欲谷为例。他在自己的碑石上毫不避讳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声称 *bilge toñukuk ben özüüm tabğaç eliñe kılıntım*，可以译成汉语“我本人毗伽噉欲谷是在中国统治时期出生的”或者“我本毗伽噉欲谷为中国（唐朝）而生”。^① 噉欲谷是突厥汗国降唐以后在唐朝边疆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缩影，他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噉欲谷的中国认同，在元代的史料中还可以找到佐证。欧阳玄撰《高昌偃氏家传》载：“偃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噉欲谷，本中国人。”^②

在突厥汗国政治管辖下的有许多族群，其中有不少是与“突厥”历史地位相当的，譬如“回鹘”。天宝四载（745），末任阿史那家族白眉可汗被回鹘击杀，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③ 突厥汗国崩溃之后，漠北草原兴起了回鹘汗国。回鹘在南北朝时期是高车或铁勒的一部，汉译“袁纥”，属于原生的漠北草原游牧势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隋唐之际，“回鹘”的音译除了“袁纥”之外，还有“韦纥”。安史之乱后，回鹘统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从“回纥”改为“回鹘”，取“捷鹘犹鹘”之义。^④ 无论是从汉文史料来看，还是从回

① 对于此句的具体译法，学者们存在异议。拉德洛夫译成“突厥人追随中国的统治”。（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Die Inschrift des Tonjukuk*, St. Petersburg, 1899, p. 2）汤姆森译为“我出生时属于中国”。（V. Thomsen, “Altürk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olei”,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78, 1924, p. 162）马洛夫译成“我在中国人的影响和文化下接受了教育”。（C. E.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сква, 1951）奥尔昆和特肯译成“我出生在中国境内”。（H. N. 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I*, Istanbul, 1936, p. 100;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 283）克劳森译成“我是作为中国的子民而成长起来的”。（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p. 623）

②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文集》卷十一，汤锐点校、整理：《欧阳玄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55页。

④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第6124页。

鹈汗国时期的漠北碑文来看，他们都是把前朝突厥政权称为“突厥”，自称“回鹘”，这一区分是很明确的。

第二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在汉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几乎被废弃，历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更新了各自时代内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称谓。“突厥”作为部族名，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最晚的运用是在辽代，例如《辽史·太祖上》：“（九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①辽代还有所谓的“隗衍突厥”和“奥衍突厥”。^②由于《辽史》中只有片言只语，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隗衍突厥与唐朝的突厥有何关系，可能是袭用了唐朝的旧名来指代当时的某个突厥语部落。《辽史·兵卫志》提到辽属国时，不仅列举了突厥，还提到了乌孙、吐谷浑等，这些显然都是历史上的旧称。^③宋以后史料中提到突厥的，一般是类书从正史中摘录的有关突厥汗国的内容。

第二节 突厥碑铭中的𐰽𐰺𐰍𐰏

突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本族语言和文字来书写历史的北族

-
- ① 《辽史》卷一《太祖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页。此外，还有《辽史·太宗上》：“八月丙子，突厥来贺。”（《辽史》卷三《太宗上》，第29页）《辽史·圣宗一》：“壬戌，西南路招讨请益兵讨西突厥诸部，诏北王府耶律蒲奴宁以敌毕、迭烈二部兵赴之。”（《辽史》卷十《圣宗一》，第110页）《辽史·圣宗四》：“（九年）六月丁亥，突厥来贺。”（《辽史》卷十三《圣宗四》，第141页）《辽史·百官志二》：“突厥国王府。西突厥国王府。”（《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第759页）《宋史·太宗二》：“遂杀其将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等，获吐浑首领一人。”（《宋史》卷五《太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7页）
- ② 《辽史·营卫志下》：“隗衍突厥部。圣宗析四辟沙、四颇备户置，以镇东北女直之境。开泰九年，节度使奏请置石烈。隶北府，属黄龙府都部署司。奥衍突厥部，与隗衍突厥同。”《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第390页。
- ③ 《辽史·兵卫志下》：“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下列有吐谷浑、突厥、乌孙等。《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第429页。

政权。他们利用为统治家族树立纪念碑的机会，向时人和后人叙述了一段突厥的国史。突厥国史的弥足珍贵之处在于，它为我们窥探突厥汗国内部政治认同的细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唐朝“他者”视角的在地史料。学者们经常引用的突厥碑铭，一般是指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留下的如尼文石刻史料，以《噉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三大碑为主。本文中对突厥碑文的引用，除非作特殊说明，皆以耿世民的中译本为准。^① 如尼文字的转写，则采用克劳森《13世纪前突厥词源学字典》中的方法。^②

在突厥碑铭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分别是𐰽𐰺𐰍和𐰽𐰺𐰍，换写成拉丁字母则分别是 $t^2\bar{w}r^2k^{\bar{w}}$ 和 $t^2\bar{w}r^2k^2$ 。^③ 根据如尼文的拼写规则，理论上它可以转写成 *türk*、*türük* 和 *türkü* 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更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是从理论上讲，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证否其他两种转写形式的可能性。例如，*türük* 就可以解释为由 *-rük* 取代了 *-rk*，这种语音替换在南西伯利亚语和北部突厥语中是很常见的。^④ 最后一种形式 *türkü*，正是上文提到的突厥学家克劳森所坚持的写法。

关于“突厥”一词的含义，最早的一种解释出自汉文史料。《周书·突厥传》：“（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⑤ 汉文史料对“突厥”的语义

①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③ 例如， $t^2\bar{w}r^2k^{\bar{w}}$ 的形式见于《噉欲谷碑》第2石南面，总第46行、50行等； $t^2\bar{w}r^2k^2$ 的形式见于《噉欲谷碑》第1石西面，总第1行、2行等。在《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则主要是 $t^2\bar{w}r^2k^{\bar{w}}$ 的形式。

④ 此条语言学知识，由笔者的博士导师 Claus Schönig 教授生前口授。

⑤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第907—908页。

学解释,似乎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的。^①岑仲勉认为,虽然“突厥”的语义与“兜鍪”无关,“但兜鍪确来自北族,则尚有可考”。^②现代突厥学家一般将 Türk 释为“强有力的”。^③不过,克劳森在他编纂的权威突厥语字典中未采此说,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作为族名的“突厥”,其语源是 Türkü 而非 Türk,也就与作为名词的 türk “成熟的、有力的”没有任何语义关联了。^④罗纳-塔什(Andrá Róna-Tas)则推测“突厥”的语源最初可能是塞语的 trükü,后来为了符合突厥语的表述习惯,先是变成了 türkü,最后成了 türk。^⑤

在突厥铭文中我们发现,Türk 一词的指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族群范畴,后者则是政治范畴的概念。具体来说,Türk 从最初的部族名称,后来发展成为游牧政治体的代称,但这两层含义并不是

- ① 罗纳-塔什(A. Róna-Tas)指出,突厥语族诸语言中表示“兜鍪、头盔”的名词,其语音都与 türk 相去甚远。不过,在塞语中有个词 tturakä “盖子”与 türk 倒是有几分相似。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Budapest, 1999, p. 281.
- ② 岑仲勉:《突厥与兜鍪》,原刊《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年11月26日,第27期,收入氏著:《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1版(2004年第2次印刷),第1044页。
- ③ V. Thomsen, “Altürkische Inschrift aus der Mongolei”, p. 122; 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 Wiesbaden, 1965, § 888, pp. 483-495; A. von Gabain, *Al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1974, p. 376.
- ④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p. 542-543.
- ⑤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81. 罗纳-塔什指出,“突厥”的最初形式是 trükü,可以在其他民族语文的音译中找到佐证。例如,于阗塞语文书中写作 ttürkä/ttrükä,藏语文书中写作 dru-gu,都是复辅音 tr/dr 起首。突厥语里是发不出 dr- 或 tr- 这个复辅音的,只能对其进行语音换位,以符合突厥语的表达习惯。罗纳-塔什还推测,突厥的阿史那家族最初是操东伊朗语的(极可能是一种塞语),后来统治了突厥语人群之后,在语言上“突厥化”了。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有详细讨论。于阗语文书中还写作 ttürk/ttürk,参考 H. 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39 (No. 1 Jan.), p. 86, n. 1; H. W. Bailey,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šou”, in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1, 1949, p. 52。关于藏文中“突厥”的记载,参考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载《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 1977年,第1—48页。

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共存关系。在第二突厥汗国统治者的历史叙事中，两层含义是并行不悖的。换句话说，狭义上的“突厥”/Türk，是指以阿史那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广义上则是指突厥汗国（Türk el）这个政治体内的全体子民（Türk bodun），包括漠北的九姓乌古斯和西突厥的十姓等重要的突厥语人群。当然，突厥汗国内的子民也包括其他操突厥语的人群如葛逻禄、黠戛斯等，以及非突厥语的人群如汉人、契丹、奚、三十姓靺鞨等。

前文中提到西突厥阿史那氏在显庆三年被唐朝灭国之后，十姓便成了被统治民族，役属于突骑施可汗。毗伽可汗在碑文中说：“突骑施可汗〔统治下的十姓〕曾是我们突厥人，曾是我们的人民。由于他们无知，由于他们对我们做错了事，可汗死了，梅禄和官员也死了，十姓受到了痛苦。”^①但是在现实中，与第一汗国时期类似，第二突厥汗国也把突骑施可汗统治下的十姓视作敌对政权，与九姓乌古斯、黠戛斯、契丹、奚和唐朝属于同一范畴，都是突厥军队要征讨的对象。在第二突厥汗国的复兴之路上，曾受到唐朝、突骑施统治下的十姓和黠戛斯的三面围攻，危在旦夕。噉欲谷说：“十姓〔突骑施〕可汗是我们的敌人。”^②在十姓突骑施可汗看来，他们与东突厥汗国之间的关系也是水火不容，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攻打他（东突厥可汗），他早晚要把我们消灭。”即便突厥军队最后击败了突骑施可汗，“十姓官员和百姓全部来臣服了”，但这种臣服是表面的和暂时的。^③

①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25—126页。

② 《噉欲谷碑》第19—20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9页。

③ 突骑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在唐朝和突厥的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并没有因为突厥的一次远征而彻底臣服。譬如，突骑施可汗苏禄曾“交通吐蕃、突厥，二国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下》，第6068页。

第二突厥汗国龙兴于漠南的总材山和黑沙，在政权巩固之后，他们要回到象征草原统治正统的漠北于都斤山。^①当时漠北的主体民族是九姓乌古斯，所以在东突厥复国之初，九姓乌古斯是仇敌，后者曾与唐朝、契丹结盟，试图把突厥扼杀于摇篮之中。^②但是，当突厥人占领于都斤山并建立第二突厥汗国的政权之后，九姓乌古斯便成了汗国的子民。^③突厥国家的统治阶层，则是以阿史那家族为核心的突厥人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时，“突厥”又是一个政治名号——第二突厥汗国这个政权叫“突厥国家”（Türk el），政权内的人民统称为“突厥人民”（Türk bodun）。^④“乌古斯人民”与“突厥人民”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纠缠的：它们的指涉既有重叠的部分，又是彼此独立的概念。

除了与“十姓”和“九姓”的概念纠葛之外，我们还需要说明突厥碑铭中“突厥”与“回鹘”的关系。突厥汗国时期的铭文中很少专门提到回鹘，只是把九姓乌古斯作为一个全体进行叙事，而回鹘是九

① 关于总材山的地望，学界长期以来为是在阴山，甚至更北。新近出土的《阳玄基墓志》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永淳元年，加壮武将军、太子左清道率，奉敕于岚州总材山守捉”，据此可知总材山在岚州境内。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李锦绣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和对史文的爬梳，推测总材山应当在陕西榆林一带。参见李锦绣：《总材山考》，载《欧亚学刊》新7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5—59页。笔者认为，岚州属今山西境内，总材山或许是吕梁山的某一段。

② 《噉欲谷碑》第9—16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6—97页。

③ 噉欲谷说：“乌古斯人全都来臣服了，当听到我让突厥可汗、突厥人民来到于都斤山林，我本人谋臣噉欲谷住在于都斤山林之后，南面的人以及西边、北边和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8页。此处译文与耿译略有不同。

④ 根据匈牙利学者泽蒙内（István Zimonyi）的研究，Türk el是“突厥政权”，Türk bodun是“突厥子民”，所以当突厥建立政权以后，开国君主土门的可汗号叫“伊利可汗”（Ellig Kağan），其中Ellig的意思是“有国的”。第二突厥汗国的开国君主骨咄禄的可汗号叫Elteriş Kağan，其中的Elteriş的词干也是el“国家、政权”。István Zimonyi, “Bodun und El im Frühmittelalter”,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6 (1), 2003, pp. 57-79.

姓乌古斯的一部。^①回鹘政权建立以后，沿用了如尼文立碑的传统做法。回鹘汗国时期的铭文中，与汉文史料中的情形类似，也是把“突厥”作为一个前朝政权对待。例如，《铁尔痕碑》北面第22行：“我推翻了突厥〔的统治〕。其可汗没有了。在那里我使突厥人民内属了。”^②“回鹘”犹如被撑起的一把新雨伞，取代了“突厥”成为漠北游牧民族的新政治认同。

第三节 拜占庭史料中的Τούρκοι

突厥汗国在兴起之初，曾在极短的时间内与波斯联手消灭了嚧哒，取代了后者在丝绸贸易中的中间人角色。此后，突厥拟进一步深化与波斯的贸易关系，但是突厥使臣马尼亚赫（Maniakhs）进呈的生丝被波斯国王库萨合当众焚毁。无奈之下，突厥决定直接向丝绸贸易的终端——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臣。^③东罗马帝国与唐朝一样拥有修史的传统，所以在拜占庭的史料中留下了不少关于突厥的珍贵记载。^④据弥南德《希腊史残卷》记载，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565—578年在位）交涉的突厥可汗名为 Σιλζιβουλ，隶定成拉丁语是

① 突厥三大碑中只有一处提到回鹘，即《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7行：“回鹘颉利发同大约一百人向东逃去。”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3页。

② 《铁尔痕碑》，又称《塔里亚特碑》，是回鹘汗国早期之物，为可汗磨延啜（公元745—759年在位）的纪功碑。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06、213页。

③ Roge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Liverpool, 1985, pp. 111-117.

④ 提及突厥的拜占庭史家主要是阿嘎塞阿斯（Agathias）、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Byzantios）和弥南德（Menander），尤其是以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记载最详。参考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p. 281-282；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4页；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29页。

Silzibul, 学者们将此人勘定为西突厥可汗室点密。^①换句话说, 拜占庭史料中涉及的“突厥”, 主要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突厥”在希腊语中的主格单数形式 Τούρκοι, 词尾的 -οι 可能读作 /i/, 加在族称词尾使其更加符合希腊语的表述习惯。^②拜占庭史料中则多是以 Τούρκων, 也就是复数属格的形式出现。^③

拜占庭史料中的 Τούρκοι, 隶定成拉丁语就是 Turkoī, 显然是来自于突厥语的 Türk。虽然东罗马帝国采用了突厥的自称 (self-designation) 作为对该政权的他称 (external designation), 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史家在处理与突厥族属相关的问题时, 仍然受到传统历史书写的影响。譬如, 弥南德在书中提到, “突厥人曾经被称为塞人 (Sacaē)”。 “塞人”, 又称“塞种人”, 即斯基泰人, 见载于希罗多德的《历史》, 是对中亚绿洲以外的游牧民族的泛称。^④弥南德还提到, 突厥可汗派遣粟特使臣马尼亚赫递交给拜占庭皇帝的国书, 是用“斯基泰语”写的。学者指出, 在弥南德的书中, “斯基泰语”并非特指, 而是泛指中亚的语言, 很可能是粟特语。^⑤况且, 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都是用粟特语刻写的。可见, 自希罗多德以来所奠定的一种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 被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史家延续了下来。在突厥汗国灭亡以后, Τούρκοι 这个名称仍然被使

① 弥南德书中还有 Dizabul 的写法。关于此人与室点密的勘定, 参考 (法) 沙畹著, 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 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第 200—201 页。

②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76.

③ 相关记载参见弥南德《希腊史残卷》以及下文要讨论的《帝国行政录》中。

④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 263, n. 124; Richard Frye, *The Heritage of Persia*, London, 1962, pp. 43f.

⑤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 263, n. 119.

用着，甚至一度取代了“斯基泰”，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①

8 世纪下半叶至 9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拜占庭史家——“忏悔者”塞奥发尼斯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在他的《编年史记》中提到，拜占庭皇帝曾与“东部突厥”结盟，而他们自称“哈扎尔”^②。不过，在《编年史记》的其他地方，几乎都是直接用“突厥”来指代哈扎尔人。^③总的来说，在 9 世纪的拜占庭历史编纂中，Τούρκοι 一词一般是指哈扎尔人。^④哈扎尔人是操突厥语的人群，公元 7 世纪至 10 世纪在黑海—里海草原一带建立了政权，其统治阶层于 8 世纪中叶皈依了犹太教。^⑤汉文史料一般称之“可萨”，亦称“突厥可萨部”。^⑥

拜占庭的历史编纂在公元 9 世纪后半叶，似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⑦到了 10 世纪初，皇帝列奥六世 (Leo VI, 886—912 年在位) 撰写了一部如何抵御游牧部落的书，书中抄录了不少公元 6 世纪

① Denis Sinor,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2), 1953, pp. 427-434.

② Harry Turtledove ed.,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ni mundi 6095-6305 (A.D. 602-813),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p. 22. 罗纳·塔什推测，塞奥发尼斯在这里刻意使用“东部突厥”，可能是为了与指代马札尔人的“西部突厥”概念区分开来。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82.

③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p. 98, n. 192, pp. 101, 123-124.

④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Budapest, 1999, p. 282.

⑤ Peter B. Golden, "The Conversion of the Khazars to Judaism",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New Perspectiv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Jerusalem 1999 International Khazar Colloquium hosted by the Ben Zvi Institute*, Peter B. Golden, Haggai Ben-Shammai & Andr   R  na-Tas ed., Brill, 2007, pp. 158-159.

⑥ Peter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 1980, p. 55. 杜环《经行记》载“〔苦国〕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啖人肉。”见于《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九》，第 5280 页。《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第 5311 页载“〔波斯国〕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

⑦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第 31 页。

和 7 世纪拜占庭史料中关于突厥的材料，但也增添了一些涉及当代 Τούρκοι 部落的事迹。^① 我们知道，西突厥汗国和东突厥第二汗国分别于 7 世纪中叶和 8 世纪中叶灭亡，“突厥”作为政治体的代号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列奥六世笔下的当代 Τούρκοι 部落肯定另有所指。研究者发现，列奥六世书中提到的当代 Τούρκοι，主要是指马札尔人，但有些情况下则与“斯基泰”的用法类似，指代的对象包括其他非突厥语的游牧部落。^②

列奥六世的继承者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分别于 913—920 年和 945—959 年在位) 也御制了一部史书，名曰《帝国行政录》(De Administrando Imperio)。在此书中，君士坦丁七世记载了当代的 Τούρκοι 部落，并且将其与其他突厥语人群诸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不里阿耳人区分开来。例如，书中提到“突厥人的部落，同样慑服和惧怕所谓的佩切涅格人，因为他们曾经被后者击败和吞并过。因此，突厥人总是畏惧地仰视佩切涅格人，受后者的掣肘”。^③ 据学者的研究，君士坦丁七世书中的 Τούρκοι 部落，无疑就是指马札尔人，即匈牙利人。^④

“马札尔”(Magyar) 是匈牙利人的自称，汉语“匈牙利”的语源 Hungary 以及相关语言中的类似称谓 [例如德语中的 Ungar，拉

①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p. 276-277.

②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76.

③ Gyula Moravcsik & R. J. H. Jenkins ed. and tr.,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Washington D. C., 1967, p. 51.

④ G.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vol. II, *Sprachreste der Türkvölker in den byzantinischen Quellen*, Brill, 1983, p. 321;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76.

丁语中的 (H)ungari, Ungri], 都是他称。^① 拜占庭人把马札尔人称为 Τούρκοι, 也可以从象征匈牙利王权的圣冠上找到佐证。匈牙利圣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其中下半部分是 1070 年代由拜占庭皇帝馈赠给国王盖佐一世 (Géza I, 1074—1077 年在位) 的, 上面刻有一段希腊语的铭文 ΓΕΩΒΙΤΖΑΣ ΠΙΣΤΟΣ ΚΡΑΛΗΣ ΤΟΥΡΚΙΑΣ, 隶定成拉丁文是 *Geovitsas pistos krales tourkias*, 意思是“盖佐, 忠诚的突厥人的国王”。^② 这是拜占庭人把匈牙利人称为“突厥”的再好不过的证明了。此顶皇冠的复制品, 曾经在上海博物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17—19 世纪的匈牙利贵族生活”特展上展陈过。

至于为何 10 世纪以后的拜占庭史家用 Τούρκοι 来指称马札尔人, 除了“(西)突厥”取代了“斯基泰”成为游牧民族泛称的这个原因之外, 学者们还作了一些更加具体的推测。罗纳-塔什认为, 在列奥六世的时代 Τούρκοι 尚且只是一个指涉对象包括马札尔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泛称, 但是到了君士坦丁七世的时代, 它已经专指马札尔人了。君士坦丁七世的不少情报是直接从马札尔人处获得的, 而 Τούρκοι 又不是马札尔人的自称, 所以很有可能是斯拉夫人在给拜占庭皇帝翻译马札尔人报告的过程中, 有选择性地强化了希腊语中既有的用 Τούρκοι 指代马札尔人的认知。^③

① Ungari 在词首加上 h, 是为了与欧洲历史上的匈人 (Hun) 联系起来。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p. 283-284.

②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77.

③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76.

第四节 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 ترك

拜占庭史家用 Τούρκοι 指代马札尔人的观念，也影响到了周边穆斯林人群对“突厥”的认知，而 10 世纪正是穆斯林历史撰述和地理志编纂的一个黄金时代。^① 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写作 ترك，根据阿拉伯语的拼读规则，加上定冠词 al- 后转写成拉丁字母是 al-Turk 或 at-Turk。^② 穆斯林文献中把马札尔人归类为 ترك 有不少证据，例如 10 世纪的波斯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伊本·鲁斯塔（Ibn Rusta）在介绍马札尔人时提到，“马札尔人是一支突厥人群”^③，11 世纪早期波斯史家加尔迪兹（Gardīzī）说“他们〔马札尔人〕是一群突厥人”。^④ 泽蒙内（István Zimonyi）教授认为，穆斯林史家之所以把马札尔人视作“突厥”，除了来自拜占庭人观念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马札尔政治体内有一支是讲突厥语的巴什基尔人，在 9 世纪下半叶和 10 世纪上半叶住在伏尔加河东部，可能穆斯林人群把对这一支突厥语部落的称谓扩及整个马札尔政治体了。^⑤ 瓦沙里（István Vásáry）教授指出，马札尔

① István Zimonyi, “Why were the Hungarians Referred to as Turks in the Early Muslim Sources?” in L. Károly & É. Kincses-Nagy ed., *Néptörténet - Nyelvtörténet: A 70 éves Róna-Tas András köszöntése*, Szeged, 2001, p. 203; István Vásáry, “Hungarians and Mongols as ‘Turk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ethnic names”, in *Zwischen Byzanz und der Steppe: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Csanád Bálint zum 70. Geburtstag*, Á. Bollók, G. Csiky & T. Vida ed., Budapest, 2016, p. 538.

② 以太阴字母开头的名词加冠词 ال/al 后，冠词中的字母 ل/l 被同化成名词起首字母的读音，但书写时 ل/l 仍保留。ترك/Turk 起首字母 ت/t 是太阴字母，因此，学者们有 at Turk 和 al Turk 两种写法，复数 al-Atrāk。

③ István Zimonyi, *Muslim Sources on the Magy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The Magyar Chapter of the Jayhānī Tradition*, Brill, 2016, pp. 38-39, 83.

④ István Zimonyi, *Muslim Sources on the Magy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The Magyar Chapter of the Jayhānī Tradition*, pp. 40-41, 83.

⑤ 泽蒙内教授把穆斯林史料内用“突厥”指代马札尔的情况分为两个层面。“突厥”作为族群层面上对马札尔的他称，是受到了拜占庭史家的直接影响。“突厥”作为指代马札

人长期与突厥语部落杂居，在社会和军事结构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所以在邻近的穆斯林人群眼中，他们也就被当作“突厥人”了。^①

当然，穆斯林文献中的ترك并非特指马札尔人。马夸特指出，在马苏第、比鲁尼等早期阿拉伯语史家作品中的ترك，不是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用法，因为它除了马札尔人外，还包括吐蕃人。^②实际上，ترك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例如，11世纪的一部署名 Ishāq ibn al-Husayn 的 *Kitāb ākām al-marjān fī dhikr al-madā'in al-mashhūra fī kull makān* 的地理志，提到ترك在地理疆域上位于托古兹古兹以西，这说明它是特指某个具有疆域边界的政治体。^③文中提到ترك与哈扎尔人起冲突，那么它肯定不是指“哈扎尔人”。米诺尔斯基（V. F. Minorsky）根据上下文判断，此语境中的ترك应该是指也儿的石河流域的基马克部落。^④

更多的情况下，早期穆斯林史志中的ترك是指代欧亚草原不信仰伊斯兰教游牧人群的一个泛称。编撰于10世纪末的波斯语《世界境

尔人的统称，就是因为马札尔政体内的一支突厥语部落——巴什基尔人而得名。István Zimonyi, "Why were the Hungarians Referred to as Turks in the Early Muslim Sources?" pp. 208-209; István Zimonyi, *Muslim Sources on the Magy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The Magyar Chapter of the Jayhānī Tradition*, pp. 101-102.

① István Vásáry, "Hungarians and Mongols as 'Turk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ethnic names", pp. 538-539.

② J. Marquart (Markwart), *Wehrot und Arang. Untersuchungen zur mythis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Landeskunde von Ostiran*, Brill, 1938, pp. 102-103. 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汉译本中“马札尔”译成了“马吉盖尔”。

③ Toghuzghuz，即突厥碑铭中Tokuz Oğuz，即唐朝史料中的“九姓”，本文中时或译成“九姓乌古斯”。《世界境域志》中的“托古兹古兹”，比定为西迁以后的高昌回鹘更恰当。参考 V. Minorsky,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 tr. V. Minorsky, 2nd Edition, 1970, Cambridge, pp. 263-270.

④ V. Minorsky, "The Khazars and the Turks in the Ākām al-Marjān",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9(1), 1937, pp. 146, 148.

域志》(*Hudūd al-'Ālam*), 在总结了世界境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划分标准之后, 先叙述中国、印度和吐蕃的地理疆域, 接着开始谈论托古兹古兹、样磨、黠戛斯、葛逻禄、炽俟、突骑施、基马克、古兹、佩切涅格、钦察、马札尔等国的国情^①, 之后作者总结道: “我们上述的所有人群都是世界上不同种类的ترك。现在我们要讲述伊斯兰国家了, 然后再讲位于西方的异教徒的疆域。”^② 这段话说明, 在《世界境域志》作者的观念中, ترك是一个以宗教为标准来划分的范畴, 指的是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人群。

随着突厥语人群在中亚逐渐站稳脚跟, 其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和喀喇汗还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政权, 于是ترك在穆斯林文献中的语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编纂于 11 世纪 70 年代喀喇汗王朝鼎盛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 是一部旨在向阿拉伯人介绍突厥语人群的语言和风俗的百科全书, 书中所体现的突厥观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固然是中世纪伟大的语言学家, 但据此认为他已经具备了 19 世纪发展出来的一套突厥比较语言学理论, 那就是时代错置了。彼得·高登指出, 喀什噶里笔下的ترك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作为突厥语人群的泛称, 一种是特指喀喇汗王朝。^③ 薛内希 (Claus

① 关于上述部族的详细考订, 参考 V.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p. 263-324。其中 Tukhs, 译作“突骑施”, 参考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80—81 页。其中 Chigil 部, 彼得·高登认为对应于汉语的“处月”, 参见 Peter B. Golden, “The Turkic World in Maḥmūd al-Kāshgharī”, in Jan Barmann & Michael Schmauder ed.,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2015, p. 508。按, 此说源自伯希和, 参考伯希和: 《中亚史地丛考》, 收入冯承钧译: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第 128—129 页。将 Chigil 与“炽俟”勘同, 参见王小甫: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94 页注 4。实际上, 伯希和文中也提到 “Çigil 或亦为葛逻禄三部落中炽俟部落之对音”, 见伯希和: 《中亚史地丛考》, 第 1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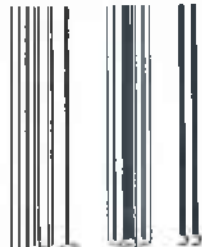
② V.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 101.

③ P. B. Golden, “The Turkic World in Maḥmūd al-Kāshgharī”, p. 4.

Schöning) 则认为، ترك除了泛指突厥语人群和特指喀喇汗王朝之外，还有一层“非乌古斯人群”的含义。^① 喀什噶里在“导论”中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名单上，有许多不是讲突厥语的人群。^② 这说明，喀什噶里观念中的“突厥”，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③ 《突厥语大词典》绝非一部纯粹的词典，更是一份政治性文本，编纂者试图为中亚的突厥政权“新贵”——塞尔柱和喀喇汗，在伊斯兰世界中树立合法性，为他们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人群之间赋予特定的、合法的地位。^④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使得内亚的部落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操蒙古语的人群成为了草原的主体。学者们已达成共识，蒙古时代穆斯林文献中的ترك，是一个泛指内亚游牧人群的称谓。^⑤ 例如，蒙古伊

- ① C. Schöning, "On Some Unclear, Doubtful a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Maḥmūd al-Kāshgharī's 'Dīwān Luyāt at-Turk'", in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vol. 14, 2004, p. 35.
- ② 喀什噶里说突厥部族有二十部，并且在罗列时特意强调“不论其信奉伊斯兰教与否”，分别是“佩切涅格、钦察、乌古斯、耶麦克、巴什基尔、拔悉蜜、喀伊、亚巴库、鞑靼、黠戛斯，还有炽俟、托赫锡、样磨、奥格拉克、恰鲁克、处密、回鹘、党项、契丹（秦）、桃花石（马秦）”。这份名单中的党项、契丹、桃花石显然都不属于突厥语人群。此外，喀什噶里自己也承认，“马秦和秦有自己的语言，不过其中的定居人群也会讲突厥语”，“喀伊、亚巴库、鞑靼、拔悉蜜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也懂突厥语”。（Maḥmūd al-Kāshgh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R. Dankoff, & J. Kelly eds. & trans., vol. 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3;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C. Schöning, "On Some Unclear, Doubtful a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Maḥmūd al-Kāshgharī's 'Dīwān Luyāt at-Turk'", p. 47. 在词典的正文中，喀什噶里还提到了其他的突厥语人群，例如葛逻禄人。（Maḥmūd al-Kāshgh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353）
- ③ C. Schöning, "On Some Unclear, Doubtful a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Maḥmūd al-Kāshgharī's 'Dīwān Luyāt at-Turk'", p. 47.
- ④ C. Schöning, "On Some Unclear, Doubtful a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Maḥmūd al-Kāshgharī's 'Dīwān Luyāt at-Turk'", p. 37.
- ⑤ Joo-Yup Lee,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Term 'Turk'",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9, 2016, pp. 108-113; Joo-Yup Lee, "Turkic Identity in Mongol and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Qipchaq Stepp",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Asi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感谢李宙烨（Joo-Yup Lee）教授惠寄大作。István Vásáry, "Hungarians and



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在《史集》(*Jāmi' al-Tawārīkh*)中使用的ترك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落,而“蒙古”只是后起的一个族名,它本属于突厥部落。^①韩国学者李宙焯更具体地指出,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时期穆斯林史家的观念中,“突厥”是一个与“塔吉克”,也就是定居的伊朗语人群,相对的概念。^②蒙古属于“突厥”的这一认知,亦影响了中亚地区在语言上突厥化了的蒙古人,他们的自我认同始终是“突厥”。譬如,17世纪希瓦汗国的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撰写了一部成吉思汗至昔班家族的蒙古史,但书名却是《突厥世系》(شجره ترك/*Shajare-i Türk*)。^③

第五节 近代西欧文献中的Turk

西欧拉丁语世界早在突厥汗国时期就已经有“突厥”的相关记载了。一部编纂于公元7世纪的法兰克人史——《弗莱德加编年史》提到,马其顿人、罗马人、法兰克人与突厥人具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是特洛伊城陷落之后逃出的四支遗民。突厥人(Torci)从他们自己人当

Mongols as 'Turk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ethnic names", pp. 539-541; N. Elias, "Introduction",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Haidar, Dughlat*, London, 1895, pp. 78-98.

① 例如,拉施特说:“因为那时(古时),蒙古人是属于突厥诸部落的一个部落”。(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9页。

② Joo-Yup Lee,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Term 'Turk'", pp. 103, 121 ff.

③ 法国学者戴美桑(Le Baron Desmaisons)于1871年刊布察合台文本,1874年发表法文翻译。Le Baron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St. Petersburg, Tom I. Texte, 1871;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 II. Traduction, 1874.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

中选出了一位国王，名叫 Torquotus，就是突厥人族称的由来。^① 马夸特推测，这里的 Torquotus 是复数形式的“突厥” *Türküt。^② 当时的法兰克人可能是通过拜占庭间接了解到突厥汗国的，因为在君士坦丁堡常有法兰克和突厥的使者往来。^③ 突厥、罗马和法兰克人共同起源的叙事，应该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上文中提到，突厥汗国在与波斯闹僵之后，便遣使到东罗马帝国寻求丝绸销路和军事结盟。在东罗马帝国一方，由于面临波斯和哈扎尔人的入侵，也急需外援，西方的法兰克人和东方的突厥人正是拜占庭的两个潜在盟友。^④ 如果罗马、突厥和法兰克都是起源于特洛伊的遗民，那么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拜占庭、突厥和法兰克人的结盟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穆斯林文献中的用法不同，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世界把蒙古帝国以后的内亚游牧民族统称为“鞑靼”，而非“突厥”。^⑤ 拉丁语中把表示“突厥语人群生活的地方”称为 Turchia 或 Turcia，特指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⑥ 在近代以来西欧各语言中，表示“突厥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生活的地方”的单词写法稍异，例如英语中分别是 Turk 和 Turkey，意大利语中分别是 Turco（阳性单数）和 Turchia，德语中分别是 der Türke（阳性单数）和 die Türkei，法语中分别是 le Turc（中

① Fredegar, *Chronicle* II, 4-6, cf.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ed., and tr., *From Roman to Merovingian Gaul: A reader*, Toronto, 2008, pp. 591-593.

② J. Marquart,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 II*, p. 252, n. 3.

③ Thomas J. MacMaster, "The Origin of Origins: Trojans, Turks and the Birth of the Myth of Trojan Origins in the Medieval World", in *Atlantide*, vol. 2, 2014, pp. 1-12.

④ Roge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 117.

⑤ 关于此问题，参见本书第三章。

⑥ Turchia 是中世纪拉丁语。Turcia 是现代拉丁语的形式，见 Jens P. Laut, *Was ist Türkologie? Überlegungen zu einem sogenannten Orchideenfach*, Bonn, 2013, pp. 7, 8 ff.

性单数)和 *Turquie*。^① 编纂于 1190 年的一部巴巴罗萨十字军大事记中,首次出现 *Turchia* 指代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人群的用法。^② 到了 13 世纪,这个词已经在西方知识界普及开来了。法国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曾于 1253—1255 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拔都的营地,他在行纪中把塞尔柱鲁姆国称为 *Turchia*,是比较有代表性的。^③

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后,西欧人逐渐把奥斯曼境内所有的穆斯林统称为 *Turk*——无论他们是否讲突厥语。西欧基督教界为 *Turk* 赋予了宗教的含义,作为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穆斯林”的同义词。这在当时的观念和语言中能够反映出来。例如,近代早期以来英语世界中常用的俗语 *turn Turk* 意思是“皈依伊斯兰教”。^④ 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1529 年发表 *Vom kriege wider die Türcken*,名义上是对奥斯曼人的宣战,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宗教语境中谈论伊斯兰教,甚至将 *die Türcken* 与天主教教宗归入同一范畴。^⑤

① 西欧语言中的形式也有一个逐渐固定的过程。例如,德语中 *Türk* 的早期形式是 *Türck*,路德的《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德语标题是 *Vom Kriege wider die Türcken*。*Turkey* 在中古英语的形式是 *Turkye*。

② Claude Cahen, *The Formation of Turkey, The Seljukid Sultanate of Rüm: Eleven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Longman, 2001, p. 76; C. Cahen, “Le Problème ethnique en Anatolie”, in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ol. 2, 1954, p. 360;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 n. 1.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516 页。

③ Peter Jackson & David Morge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London, 1990, p. 61, n. 3.

④ Anders Ingram, *Writing the Ottoman: Turkish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4.

⑤ 根据现代德语的正字法,书名写作 *Vom kriege wider die Türken*。马丁·路德的这篇檄文,中文一般译成《论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在路德所处时代人们的观念中,*die Türcken* 指的是奥斯曼人,是“穆斯林”的代名词。路德写这篇檄文时,正值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展开全面攻势的阶段,于 1526 年占领匈牙利布达,1529 年围攻维也纳。参考 Martin Luther, *Vom Kriege wider die Türken*, Wittenberg, 1529, in Joachim K. F. Knaake et al.,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30. Band, 2. Abteilung, 1909,

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亚美尼亚裔外交家多桑（Ignatius Mouradjea d'Ohsson）指出，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人”（Osmanli），“突厥”指的则是中亚的人以及在呼罗珊荒漠里过着单调生活的粗俗野蛮人，奥斯曼人反感欧洲人称他们为 Turk。由于奥斯曼人给 Turk 这个词赋予了太重的贬义，以至于没有外国人敢在奥斯曼帝国内当着他们的面提起这个词。^①

17世纪以来西欧基督教世界对 Turk 概念的内涵更新，有两条线索可循。首先，派往东方的传教士获得了来自中国和内陆亚洲的一手资料，并将其反馈给欧洲知识界。1779年发表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的遗作《鞑靼史》，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政体都视作“鞑靼”，并建构起一部连续的线性鞑靼史。^②刘应于1737年去世，但他的书稿早在1736年就已经在学术界流传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著名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在1756—1758年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以及其他西部鞑靼通史》一书中便采用了刘应的材料。^③德

pp. 81-148. 路德在一首为教堂和儿童编写的歌曲中甚至说，基督教有两个敌人，分别是“教皇”和“土耳其人”，实际指的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参考 Martin Luther, *Erhalt uns, Herr, bei Deinem Wort*, 1542, in Joachim K. F. Knaake et al., *D. Martina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35. Band, 1923, pp. 235-248.

- ① Ignatius Mouradjea d'Ohsson, *Tableau Général de l'Empire othoman*, vol. IV, Paris, 1791, p. 373; Herbert A.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 29.（老）多桑生于伊斯坦布尔，后在瑞典领事馆服务，在巴黎出版了基于一手资料的奥斯曼帝国通史，名噪一时。全书共七卷，从1788年出版至1824年，最后是由其子（小）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jea d'Ohsson）出版完毕。（小）多桑就是著名的蒙古史家。
- ② Claude de Visdelou, *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Tartarie*, in B. d'Herbelot,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La Haye, 1779, pp. 46-296.
- ③ Joseph de Guign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vols. 1-4, Paris, 1756-1758. 德金把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称为“西部鞑靼”，而把鲜卑、柔然、女真等民族称为“东部鞑靼”。参考 de Guignes 1756, vol. 1, part 1, pp. 179-212, 213-233.

金把汉文史料中的“突厥”与西欧文献中的 Turk 勘同，是对近代西方 Turk 历史语义学的一次纵向延伸。^①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存在。他同时提出的假设还有“匈奴”即西欧文献中的“匈”（Hun）^②、“柔然”即西欧文献中的“阿瓦尔”（Avar）^③，这两个观点至今仍停留在假设的层面。

除了传教士以外，欧洲还有其他身份的人可以获得有关东方的一手资料，譬如战俘和旅行者。瑞典军官菲利普·约翰·冯·史托兰伯（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1676—1747），1709 年作为俘虏，被关押在俄国西伯利亚战俘营 13 年。今天我们之所以记住他，主要是因为他首次确定了乌拉尔山作为欧、亚大陆的分界线。^④回到欧洲后，他于 1730 年出版了《欧洲和亚洲的东部与北部》一书，指出了西伯利亚雅库特等“鞑靼语”与奥斯曼语之间的相似性，于是创造出了“突厥—鞑靼语集”的概念。^⑤换句话说，史托兰伯提炼出的“突厥—鞑靼语集”一词，旨在揭示小亚和内亚两个地理空间内的人群在语言上的联系，更为后续基于语言、种族、民族等指标将上述两个地区纳入同一容器的诸种概念的问世铺平了道路。

不久，欧洲传教士通过实地调查后发现用“鞑靼”指代蒙古语人群是不准确的，于是“鞑靼”一词逐渐淡出学术视野，“突厥”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集合体名称，其内涵不断得到充实。例如，普

① See de Guignes 1756, vol. 1, part 1, pp. 224-225.

② See de Guignes 1756, vol. 1, part 1, p. 215.

③ See de Guignes 1756, vol. 1, part 1, p. 188; part 2, p. 334.

④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C. H. Beck, 1998, p. 45.

⑤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English version: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pp. 31-32.

鲁士东方学家柯恒儒 (Julius Klaproth) 1806 年在西伯利亚旅行期间，遇到了一位来自吐鲁番的维吾尔人，从此人的口中记录了若干词汇和语料。在此基础上，他参考了早期文献中的记载以及法国巴黎藏明朝的《高昌馆译语》等书籍，判断畏吾儿语是突厥语的一种。^①此后，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②1851 年出版的雅库特语语法，被誉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突厥比较语言学著作。^③“突厥语族”概念的形成，是近代西欧“突厥”概念的内涵在横向上的一次延展。

在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种族观念的影响下，与“突厥语族”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突厥种族”和“突厥民族”两个概念。亚瑟·戴维斯 (Arthur L. Davids, 1811—1832) 在 1832 年出版的近代第一部土耳其语语法中，不仅把汉文史料中的匈奴、突厥、回鹘都归为“突厥种族” (Turkish race)，而且在回鹘以后的哥疾宁、塞尔柱和奥斯曼之间建立起历史连续性。^④戴维斯的这部作品是献给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并在不久后推出了法译本——当时奥斯曼多数精英所掌握的外语是法语，所以他的理念对奥斯曼人的影响颇大。^⑤

① Julius Klaproth, *Abhandlung Uigurischen Schrift und Sprache*, Paris, 1820, pp. 2ff.

② Abel-Rémusat, Jean-Pierre,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ou Mémoires sur différents points de la grammair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Mongols, des Ouigurs et des Tibétains*, I., Paris, 1820.

③ Otto Böhtlingk, *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St. Petersburg, 1851.

④ Arthur L. Davids, *A Grammar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with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Turkish nations, a copious vocabulary, dialogues, a collection of extracts in prose and verse, and lithographed specimens of various ancient and modern manuscripts*, London, 1832, xxiv, xii.

⑤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p. 346; (英)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 364 页。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90—92 页。

19世纪后半叶对奥斯曼知识界影响较大的匈牙利东方学家——万伯里（Hermann Vambéry, 1832—1913），充分利用既有的突厥比较语言学成果，从民族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提出了“突厥民族”（Türkenvolk）的概念。万伯里身处奥匈帝国，使用德语写作，但他提出的“突厥民族”Türkenvolk与现代德语里的“突厥语人群”Türkvölker一词相似，但内涵却大不同。万伯里的Türkenvolk由Türk“突厥”和Volk“民族”两个名词构成，前者是复数，后者是单数，意思是由不同突厥语人群构成的一个突厥民族。^①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德语里常用的形式是Türkvölker，也是由Turk和Volk两个词构成，但前者是单数，后者是复数，意思是不同突厥语民族的总称。^②

上述西欧Turk概念的内涵分别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拓展，在1889年蒙古国境内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发现后来命名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之际，得到了合流。^③在威廉·汤姆森（Vilhelm Thomsen, 1842—1927）和威廉·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 1837—1918）的共同努力下，人们终于在1894年破译了突厥文字并通读了碑文内容。^④鄂尔浑碑铭之于突厥学的意义，不亚于

① H. Vambéry, *Das Türkenvolk in seinen ethnologischen und ethnographischen Beziehungen*, Leipzig, 1885. 万伯里在“前言”中称，这是首部对“突厥民族”作整体研究的书。万伯里把所谓“突厥民族”分成西伯利亚突厥语人群、中亚突厥语人群、伏尔加河突厥语人群、黑海突厥语人群和西部突厥语人群共五组。

② Jens Peter Laut, *Was ist Turkologie? Überlegungen zu einem sogenannten Orchideenfach*, Bonn, pp. 6, 9 ff. Hans Ulrich Rudolf & Vadim Oswalt, *Taschen Atlas: Weltgeschichte*, Stuttgart und Gotha: Ernst Klett Verlag, 2010, p. 61.

③ 自17世纪末以来，欧洲知识界陆续记录和刊布了零星发现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一些如尼文碑铭，但苦于没人能够读懂。譬如，上文中提到在西伯利亚当俘虏的史托兰伯，在《欧洲和亚洲的东部与北部》末附了几张如尼文的图版，见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Tab. V, Tab. XII. 关于18世纪以来对叶尼塞碑铭的相关发现，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氏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4—25页。

④ 汤姆森于1893年12月15日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解读突厥文的经过。此

罗塞塔碑之于埃及学的意义。在鄂尔浑河碑铭释读的推动下，湮没于汉文史料中的“突厥”得以重见天日，于是“突厥”= Turk 的观点也从假设变成了“事实”。^①至此，“突厥语族”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的建构得以合拢，于是，从古代突厥到现代土耳其以及中亚各突厥语民族的一部线性历史被建构出来。必须指出，这套学说纯粹建立在字面相似性基础上，所谓“突厥民族”根本没有连续发展的主体族群和相对稳定的地理疆域，更遑论连续统一的文化与历史认同。法国学者莱昂·卡翁（Léon Cahun, 1841—1900）1896年出版的《亚洲历史导论：从起源到1405年的突厥和蒙古人》，杂糅了西欧从近代早期到19世纪末所积累的所有关于突厥语人群的知识。^②此书出版后不久即被译成奥斯曼语，在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③其

报告于次年出版。V. Thomsen, *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enissei. Notice préliminaire*, 1894. 拉德洛夫在1893年12月4日曾致信汤姆森，说他正确翻译了部分铭文。学界对于破解突厥文第一人究竟是谁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氏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6、29页。

- ① 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学者把汉文史料中关于突厥的相关史料译成欧洲语言了。例如，俄国汉学家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在1851年把汉文史料中关于中亚的记载译成了俄语，其中就包括《新唐书·突厥传》（Никита Я. Бичу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очинение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фа. Ч. I, отд. I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51*）；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曾经把清代编纂的《边裔典》中关于突厥的史料译成了法语（Stanislas Julien, “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Tou-kiou [Turcs]. Extraits du Pien-i-tien et traduits du Chinois”, in *Journal Asiatique*, vol. 6[3], 1864, pp. 416-549, [4], pp. 453-530）。但是真正系统性地把《周书》《北史》《隋书》和两《唐书》中所有的《突厥传》译成西方语言的，则是在古突厥碑铭被释读后几年内由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 Parker）完成的，算是应景之作。（E. H. Parker, “The Early Turks (from Chou Shu, Pei Shi, Sui Shu, Old T'ang Shu and New T'ang Shu)”, in *The China Review*, vols. 24-25, 1899-1901.）

- ② Léon Cahu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sie: Turcs et Mongols des origines à 1405*, Paris, 1896. 按：1405年是帖木儿去世的年份。

- ③ 内吉布·阿西姆（Necib Asım）在1899年将莱昂·卡翁《亚洲历史导论》译成奥斯曼语，并以《突厥史》（*تورک تاریحی / Türk Tarihi*, Istanbul, 1899）为名出版。现代土耳其语的版本还原了莱昂·卡翁一书的原名：Léon Cahun, *Asya Tarihine Giriş Türkler ve Moğollar*, Çeviren: Necib Asım, Toplumsal Dönüşüm Yayınları, 2014.

中，有关突厥与蒙古同源的说法让晚期奥斯曼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为拥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样的英雄“祖先”而感到荣耀。^①

小 结

通过上文的梳理和讨论，我们弄清了以下事实：汉文中的“突厥”是一个历史名词，专门指公元6—8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在拜占庭、穆斯林、拉丁语等史料中得以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线性的突厥认同。近代欧洲东方学家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范畴之下。在19世纪西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突厥语族”从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概念，逐渐发展成为“突厥种族”甚至是“突厥民族”的概念，并为“泛突厥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为了不引起混淆，我们把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名 Turkey/Türkiye 译成“土耳其”，它的语言 Turkish 是“土耳其语”，把 Turkic 译成“突厥语族”或“操突厥语的人群”。

或许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一书在评鹭欧洲东方学家的学术成就时存在主观化的嫌疑，但他所揭橥的欧洲人在东方问题上所建立的学术权威和话语霸权，无疑是根深蒂固的。^② 不

①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1981, p. 30. 莱昂·卡翁关于蒙古与突厥同源的说法，源于拉施特的《史集》，见本文第四节的相关讨论。关于莱昂·卡翁作品中的种族主义论述，参考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94—96页。

②（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版，第1—37页。

仅奥斯曼帝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掀起的一股民族主义浪潮的学术养分全部仰赖于欧洲东方学家的学术积累，而且土耳其共和国在 1923 年建国时所采纳的国号 Türkiye，也都是从中世纪拉丁语的 Turchia 借鉴而来。^①由此可见，奥斯曼土耳其人实际上最终接受了西方的“他称”，将之作为“自称”。^②另一个例子是，今天被归为突厥语族的雅库特和楚瓦什人长期以来根本就不识 Turk 一词，是近代才从喀山的欧洲鞑靼人那里听说的。^③

近年来，“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被重新包装再次出现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把土耳其祖先追溯到突厥以及匈奴的这一叙事传统，在土耳其的官方和民间话语生态中更是深入人心。^④中亚地区亦是如此。苏联解体以后，泛突厥主义曾经在中亚地区经历过短暂的复活。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中亚各斯坦国家在现实政治利益面前，对“泛突厥主义”的意识形态充满警惕，但是它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仍然活跃。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成立的“突厥语国家组织”，不

① Gábor Ágoston & Bruce Maste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2009, p. 574. 关于把 Türkiye 写入土耳其宪法中的过程，参考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 221—222 页。

② 详见本书第五章。

③ A. Ró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p. 281.

④ 2015 年 1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接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外交活动中，身后列队站着分别代表了突厥语人群建立的历史政权的 16 名武士，分别是匈奴帝国、西匈奴帝国、欧洲匈奴帝国、白匈奴帝国、突厥汗国、阿瓦尔汗国、哈扎尔汗国、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王朝、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语中称为“16 个伟大的突厥王朝”（16 Büyük Türk Devleti）。当然，其中不少政权并不是操突厥语，例如匈奴。即便是操突厥语的政权，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内也没有连续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想象。土耳其一些组织还给这些历史政权配备了“国旗”。此观点在 1969 年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阿吉伯·裕兹别克（Akib Özbek）发明，并在 1980 年代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任总统期间受到土耳其当局的鼓吹。

仅编纂了一部《突厥通史》作为突厥语国家的中小学教材使用，而且以“突厥语国家议会”的准国家机构在区域事务中扮演某种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它关乎我国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

第三章 “突厥”“蒙古”与“鞑靼”的纠葛

上一章中我们提到，在近代早期的西欧知识谱系中，Turchia 特指小亚细亚，对于广袤的内陆欧亚，则称之为“鞑靼利亚”（拉丁语 Tartaria）。^① 其中的 -ia 是表示“某地”的后缀，所以“鞑靼利亚”的意思就是“鞑靼地方”。不过“鞑靼利亚”并不是一个实体国家，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想象出来的一个政治体。随着现实政治边疆的移动，学者们往往在“鞑靼利亚”前缀加限定词，来体现各自的政治属性，例如有“中国鞑靼利亚”“俄国鞑靼利亚”等。^② 如果不强调政治属性的话，则可分为“大鞑靼利亚”（Tartaria Magna/Great Tartary）和“小鞑靼利亚”（Lesser Tartaria/Little Tartary），前者指中亚和北亚的“鞑靼”，后者指黑海北部东欧草原的“鞑靼”。西欧语境中“鞑靼”一词的指称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先是特指蒙古人，后来则泛指所有内陆亚洲的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等语言的人群。本章我们试图从“鞑

① 在其他欧洲语言里写法大同小异。葡萄牙语 Tartaria，西班牙语 Tartaria，法语 Tartarie，英语 Tartary，德语、荷兰语 Tartarye。

② 1808 年英国地图学家约翰·凯瑞（John Cary）在《新寰宇地图集》中收入一幅《中国和无隶属鞑靼利亚新图》。他把狭义的中亚地区归类为“无隶属鞑靼利亚”（Independent Tartary），这反映了 19 世纪俄国势力进入中亚以前的政治现实。John Cary, *New Universal Atlas, containing distinct maps of all the principal states and kingdoms throughout the world. From the latest and best authorities extant*, London, 1808. “无隶属鞑靼利亚”最早见于 1624 年德国地图学家的地图，见 Philipp Clüver, *Introductio in Universam Geographiam*, London, 1624, pp. 414-415.

鞑”与“蒙古”和“突厥”等概念的纠缠状态中，梳理出若干清晰线索。

第一节 蒙古兴起之前的“鞑靼”

“鞑靼”一词，首先见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古代突厥碑文，写作𐰽𐰺𐰍，转写成拉丁文是 *tatar*。在突厥碑铭中，有 *otuz tatar* 和 *toquz tatar* 之分，直译分别是“三十姓鞑靼”和“九姓鞑靼”。^① 考虑到在突厥碑铭中“三十姓鞑靼”与契丹、奚等部族名称并列，出现在吊唁突厥可汗的名单中，我们推断鞑靼是突厥汗国时期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结合汉文史料可知，当时与契丹和奚同时活跃的政权是“靺鞨”。^② “九姓鞑靼”出现的语境略有不同，他们是突厥征讨漠北九姓时，与后者联合的势力。汉文史料记载，漠北有名为“白靺鞨”的部落，或许与此相关。^③ 从名称上看，将“三十姓鞑靼”和“九姓鞑靼”分别比定为“靺鞨”和“白靺鞨”亦合逻辑。从突厥的视角看，靺鞨强盛时部落繁多，便以“三十姓”称之，散居漠北后实力下降，则以“九姓”称之。^④

① “三十姓鞑靼”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14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5行；“九姓鞑靼”见于《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4行。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4、151、162页。

② Chen Hao,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 682-745)*, p. 49. 也有学者将其比定为室韦，最早由松井等、箭内互和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提出，参考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4页；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8页注3。

③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第5349页。《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第6145页。关于靺鞨与白靺鞨的关系，参见周伟洲：《靺鞨与白靺鞨考》，《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138—145页。

④ Chen Hao,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 682-745)*, p. 89.

“靺鞨”一词在汉文史料中最早出现是唐末会昌二、三年（约842年）之间，见于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写作“达怛”。^①关于唐以后靺鞨的历史，王国维首倡“靺鞨即阻卜”说，谓“唐宋间之靺鞨，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鞑”。^②王国维此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③余大钧对该说法稍作修正，认为“阻卜是靺鞨的一部分，辽金时靺鞨的主要部分是阻卜，但靺鞨是一个在时间、空间以及所包括的种类方面都比阻卜要广泛、复杂得多的部族泛称”。^④关于“阻卜”的语源，学者们众说纷纭。^⑤学界最新的一种看法是，阻卜（又译“朮不姑”）当源于契丹语，后为女真语所因袭，是一种他称。^⑥

9—10世纪之间，靺鞨曾一度称雄漠北。有学者认为，10世纪时期的漠北游牧政权九姓靺鞨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王国”阶段，且与宋朝保持有朝贡关系。^⑦在此时期，有一部分靺鞨人往西迁徙。10世纪末的敦煌于阕语文书中多次提到，在河西地区有靺鞨居住。^⑧10世

①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5，赐回鹘唃廝囉等诏书来云：“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四库唐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靺鞨”一词，在汉文史料中又译作“达旦”“达怛”“达鞑”“塔塔儿”等。

② 王国维：《靺鞨考》，《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1期。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误倒说”，即认为汉文史料中的“阻卜/阻鞑”乃由“靺鞨”误倒而来。不过，该观点已经被学者否定。

③ 王静如：《论阻卜与靺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1年第2本第3分。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靺鞨”》，《国学季刊》1952年第7卷第3号。

④ 余大钧：《论阻卜与靺鞨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3页。

⑤ 余大钧列举了前人对“阻卜”语源的各种推测，并逐一指出其牵强附会之处。通过把“阻卜”的语音构拟为 *djübür*，指出该词本来是蒙古语词“主不儿”，意思是“草原”，参考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36页。

⑥ 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靺鞨》，《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8、41页。

⑦ 白玉冬：《九姓靺鞨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⑧ H. 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Caravan Books, 1981, p. 86.

纪末成书的波斯语《世界境域志》提到,“鞑靼”是九姓乌古斯的一部。^①《宋会要辑稿》记载,11世纪在于阗附近也有鞑靼人的活动。^②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提及,于都斤位于鞑靼沙漠上。^③11世纪初穆斯林史家加尔迪齐(Gardīzī)在《记述的装饰》一书中说,鞑靼人是也儿的石河突厥族乞篋克人的一部分。^④此外,1126年伊斯兰教徒著作《木只马勒·塔瓦里黑》记载了一位名为昔蒙·不亦畏·札牙儿的鞑靼王;1260年代术思札尼《帖别合惕·纳昔里》书中提到,中亚马合谋·伊本·帖怯失算端在1218—1219年攻打鞑靼人玉速甫之子合迪儿汗。^⑤根据上述碎片化的记载,我们只能大致勾勒出9世纪后半叶至12、13世纪西迁鞑靼的迁徙路径和分布范围。

南宋使臣孟珙在《蒙鞑备录》中把“鞑靼”分成三部,即黑鞑靼、白鞑靼和生鞑靼,其中成吉思汗所在蒙古部族为“黑鞑靼”。^⑥宋人把蒙古称为“(黑)鞑靼”,是一种他称,不是蒙古人的自称。王国维认为,“宋人谓蒙古为黑鞑,固自袭辽金人之旧称”。^⑦关于蒙元朝时期真正的鞑靼(写作“塔塔儿”),史料相对丰富一些。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金朝丞相完颜襄奉命率军讨伐塔塔儿,成吉思汗

① V. Minorsky ed.,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982 A. D.*, E. J. Gibb Memorial Trust, 2nd edition, 1970, p. 94.

② “元丰四年十月六日,拂菻国贡方物……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鹘。又东至达靼……。”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723页。

③ Mahmūd al-Kāšg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īwān Luyāt at-Turk)*, Robert Dankoff ed., Part 1,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82, p. 159.

④ (苏联)巴托尔德著,王小甫译:《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第107—108页。

⑤ 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5卷,莫斯科1968年版,第559—560页。转引自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4页。刘迎胜:《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90年第12、13辑合刊,第80—106页。

⑥ 孟珙:《蒙鞑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本1988年版。

⑦ 王国维:《鞑靼考》,《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1期,第659页。

和克烈部王罕得知消息后，积极配合金军夹攻塔塔儿部。^①塔塔儿部不仅是乞颜部的世仇，而且对于成吉思汗本人来说，有杀父之仇。他的父亲也速该，曾在归途中被塔塔儿部人于水中下毒，到家后不久死亡。1202年秋，成吉思汗歼灭、俘虏了塔塔儿人。为了报仇，成吉思汗杀光了所有比车辖高的塔塔儿人。余大钧指出，《蒙古秘史》中提到的塔塔儿是狭义的塔塔儿，专指分布于呼伦、贝尔两湖附近和克鲁伦河下游一带的南部室韦（或称南部鞑靼）。^②白玉冬通过对多语种文献的梳理指出，蒙古在13世纪初曾使用专名“达靼”进行自我认同的看法，应属于后世学者围绕广义蒙古史进行的推演和想象。^③

第二节 蒙古西征与“鞑靼”的污名化

13世纪蒙古的西征，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尚不能确定具体是从何时起，欧洲人开始把蒙古人称为“鞑靼”的。但是，就目前所知，西欧文献中最早出现“鞑靼”的记载，是在蒙古人入侵欧洲前夜。匈牙利多明我会僧侣尤利安（Julian）为了寻找滞留在东方的马札尔人，于1235年抵达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在那里他听说了鞑靼人西征的消息。他在1237年呈给教廷的报告，成为西欧文献中有关“鞑靼”的最早史料。在梵蒂冈有两份相关的文件，一份是署名利卡多（Ricardus）的多明我会僧侣给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信，另

①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133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0页；《金史》卷94《完颜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088—2091页。

②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67、68节，第63—64页；第153节，第209页；第154节，第211—212页；第47页注8。

③ 白玉冬：《“达靼”源流及蒙元对达靼的认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3年第1辑，第166—199页。

一份是尤利安写给佩鲁贾主教的信。前一封信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尤利安的行纪，至于利卡多是否是直接从尤利安那里获得情报，然后撰写此信，还是从匈牙利多明我会的档案中摘录的，学界还没有定论。^①

1241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兵临马札尔（匈牙利）和李烈儿（波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呼吁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以及其他的欧洲君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个新的“上帝之鞭”。^②据中世纪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 Paris）的记载，法王路易九世的母后布兰奇听说拔都入侵欧洲的消息后，突然大哭起来，她给儿子捎话：“我亲爱的儿子，这些谣言有多可怕？这些鞑靼人的入侵会威胁到我们的领地，乃至整个基督教。”法王路易九世从她母亲那里听到蒙古人入侵匈牙利的消息后说：“让我们向天祈求保佑和安慰吧！假如这群我们称为 Tartar 的人来我们这里，要么是我们把他们赶回地狱（Tartarus）去，要么是他们把我们送到天堂去。”^③

从路易九世的说法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因为拉丁语 *tartarus* 的本义是“地狱”，这个字与“鞑靼”谐音，于是就出现了上面引用的那段颇为押韵的话。^④实际上，“鞑靼”本作 Tatar，而非 Tartar，第一个音节没有尾音 -r。不过这种微弱的差异，并没有妨碍

① Mary Dienes, “Eastern Missions of the Hungarian Dominica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Isis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1937, vol. 27:2, pp. 225-241.

② 基督徒把蒙古人的入侵视作天罚，即“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历史上，欧洲基督徒曾经把匈人首领阿提拉称为“上帝之鞭”。

③ 这段话的拉丁文原文是：*Erigat nos mater, coeleste solatium. Quia si superveniant ipsi, vel nos ipsos, quos vocamus Tartaros, ad suas Tartareas sedes unde exierunt, retrudemus, vel ipsi nos omnes ad coelum subvehent.* Matthaei Parisiensi, *Chronica Majora*, Henry R. Luard ed., vol. 4, London, 1872, p. 111.

④ 拉丁语的 *Tartarus*，源自希腊语 *Tartaros*（音译“塔耳塔洛斯”），是希腊神话中“地狱”的代名词。Hesiod, *Theogonie*,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on Otto Schönberger, Stuttgart, 1999, pp. 56-57.

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的污名化。^①甚至，更多的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西方人用“地狱”一词来指代“鞑靼”，根本就不是一个无心的错误，而是刻意为之。^②在马修·帕瑞斯的编年史中，“鞑靼”人的形象被妖魔化，“他们的头硕大无比，与身体不协调，吃生肉，甚至是吃人肉”。^③这种把他者妖魔化的策略，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书写中比较常见，反映了基督教世界对陌生入侵者的恐惧和仇视。

1242年初蒙古人突然从匈牙利撤军，这一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④不仅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戛然而止，而且他们的矛头开始对准伊斯兰教，也就是说蒙古人对于基督教来说，不再是一个威胁了。^⑤此后，欧洲人对蒙古人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发现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十分宽容，境内甚至有不少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教徒，欧洲人甚至把鞑靼人视作共同对付穆斯林的潜在盟友。^⑥从13世纪后半叶开始，欧洲对蒙古人的恐惧在消退，并且双方加强了使者往来，例如普兰·迦儿宾（John of Plano Carpini，1245—1247年旅行）、鲁布鲁

① Peter Jackson and David Morgan ed.,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Routledge, 1990.

② Charles W. Connell, "Western views of the origin of the 'Tartars'", in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III, 1973, pp. 117-118; Charles W. Connell, *Western Views of the Tartars, 1240-1340*, Ph. D. thesis, Rutgers University, 1969.

③ Matthaei Parisiensi, *Chronica Majora*, Henry R. Luard ed., vol. 3, 1872, p. 388; J. A. Giles tr.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vol. 1, London, 1852, p. 131.

④ 1242年初，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率部返回。参考《元史》卷121《速不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78页。

⑤ 元宪宗元年（1251），蒙哥命旭烈兀西征，先后灭了木剌夷（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和叙利亚。参考韩儒林主编：《元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170页。

⑥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流行着一种“长老约翰”的传说，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东方君主，被视为西欧基督教用以对抗异教徒的潜在盟友。曾经有一段时间，“长老约翰”被认为是蒙古乃蛮部的首领，参考 Peter Jackson and 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London, 1990, p. 124.

克(William of Rubruck, 1253—1255年旅行)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60—1295年旅行)等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东方的。^①传教士来到东方后,对内亚民族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西欧文献把蒙古人称为“鞑靼”是不妥的。例如,鲁布鲁克在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中就指出,蒙古人希望摆脱“鞑靼”的称谓,主张用他们的自称——“蒙古”。^②关于蒙古人讳言“鞑靼”的原因,王国维认为蒙古本非鞑靼,汉人与南人以“鞑靼”称之,而辽金史料中的“鞑靼”不是朝贡就是寇叛,会让人误以为蒙古人曾经向辽、金朝贡,有失国体。^③

至于西欧人为何用“鞑靼”来指称蒙古人,除了路易九世提到的“鞑靼”和“地狱”谐音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马修·帕瑞斯的编年史还提到,该词来源于一条名为Tar或Tartar的河。^④鲁布鲁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成吉思汗在王罕的逼迫下,逃往塔塔儿人那里避难,后来成吉思汗联合蒙古和塔塔儿人击溃了王罕,之后成吉思汗便把塔塔尔人派往各地,这才导致了“鞑靼”一名的广泛传播。^⑤余大钧认为,唐末室韦系的一部分鞑靼人开始西迁,经过蒙古高原,逐渐达到西伯利亚、中亚和钦察草原,于是,“鞑靼”之名逐渐为西亚、俄罗斯、西欧的定居民族所熟悉。^⑥

前引路易九世说“那群我们称之为‘鞑靼’的人”,从语气判断,“鞑靼”这一称谓在蒙古入侵之际或许就已经为西欧社会所熟悉了,甚至有可能比三年之前匈牙利多明我会僧侣尤利安的情报还要早。那

① Arthur P. 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26, pp. 128-132.

② Peter Jackson and 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 125.

③ 王国维:《鞑靼考》,《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1期,第656页。

④ Matthaei Parisiensi, *Chronica Majora*, Henry R. Luard ed., vol. 3, p. 488, vol. 4, p. 78; J. A. Giles tr.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vol. 1, pp. 131, 314.

⑤ Peter Jackson and 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 125.

⑥ 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4页。

么，西欧基督教世界是从何种渠道听说这一名称的呢？很难想象，13世纪以前的西欧与内亚的蒙古语族群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往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西欧人或许是通过穆斯林这一媒介，才了解到“鞑靼”这个名称的。当然，我们的猜想与史实并不矛盾，因为尤利安获得鞑靼情报的国家——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在10世纪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了。^①

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蒙古入侵以前，西欧已经组织了六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东、西方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它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能够间接佐证我们这一猜想的是，马修·帕瑞斯的编年史中有一条记载，说蒙古入侵欧洲的前夜，萨拉森人向法王路易九世派遣密使，告诉他有一群野兽般的入侵者正在向欧洲袭来。^②13世纪西欧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应该是多元的，而这种官方之间的情报交换，相对是比较持久和可靠的。“鞑靼”一词之所以在1240年前后才在西欧基督教编年史密集出现，主要是蒙古人要入侵欧洲的缘故。

第三节 “鞑靼”与“蒙古”和“突厥”概念的重叠

上文我们已经梳理了13世纪以前穆斯林文献中有关“鞑靼”的史料。14世纪初波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的《史集》提到，鞑靼人曾经一时地位高贵，因此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冒名“鞑靼”，后来蒙古人崛起了，这些部落又自称是“蒙古”。但由于惯性，“迄今在乞台、印

① István Zimonyi, *The Origins of the Volga Bulgars*, Studia Uralo-Altaica 32, Szeged, 1990, p. 5.

② Matthaei Parisiensi, *Chronica Majora*, Henry R. Luard ed., vol. 3, p. 488; J. A. Giles tr.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vol. 1, p. 131.

度、至那和摩至那、乞儿吉思、客刺儿和巴失乞儿惕，在钦察草原，在其北方的各地区，在阿拉伯诸部中，在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一切突厥部落还被称为塔塔儿”。^①《史集》成书于14世纪初，但这里记载的现象应该是13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即因蒙古的崛起而导致“鞑靼”一词指涉的对象发生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概念混乱。换句话说，“鞑靼”一词在蒙古崛起之前就已经在穆斯林世界广泛传播开来了，西欧人从穆斯林世界听说“鞑靼”这个词的时间，即便不能与穆斯林世界同步，也不会滞后太久。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明朝以后，波斯语也用“蒙古”来对译“鞑靼”了。明朝官修《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中就用مغول来对译“鞑靼”/卯斡勒。^②

拔都从欧洲撤军后，并没有回到哈拉和林，而是在伏尔加河畔扎营，肇建了金帐汗国。既然欧洲人把蒙古称为“鞑靼”，那么拔都的金帐汗国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冠名“鞑靼”了，又称“鞑靼之轭”（Tatar Yoke）。^③在金帐汗国，蒙古人只是统治阶层，其主体民族却是操克普查克突厥语的人群。金帐汗国分裂后，分为阿斯特拉罕的鞑靼、喀山的鞑靼、克里米亚的鞑靼，等等。

近代早期的西欧，威胁不再来自“鞑靼”，而是来自奥斯曼帝国，于是“鞑靼”在西欧文献中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历史名词。金帐汗国与俄国接壤，所以14世纪以后欧洲有关“鞑靼”的史料主要见于俄国的编年史中。与西欧不同的是，俄国编年史中“鞑靼”就是写作

①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66—169页。

② 《回回馆杂字》，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页。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页。

③ Charles J. Halperin,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2009, p. 9.

Tatar/Tatar。^①在14世纪，从地理分布来看，已经有欧洲鞑靼和亚洲鞑靼，并且“鞑靼”所囊括的人群不仅有蒙古语族群，而且包括突厥语族群。

作为大蒙古兀鲁斯的继承者，除了上文讨论过的元朝以及波斯的伊利汗国和东欧的金帐汗国以外，还有察合台汗国。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封地的中亚，也经历了与金帐汗国类似的历史进程，即蒙古语上层人士逐渐被底层的突厥语人群在语言上同化，但指代蒙古的称谓“鞑靼”却成了族群共同体的统称。不管是14世纪后半叶在此兴起的帖木儿帝国，还是15、16世纪之交建立的乌兹别克汗国，都属于“鞑靼”的范畴。近代早期西欧人对“鞑靼”的理解，在当时绘制的地图上能反映出来。^②

上文我们讨论了外部世界对蒙古语和突厥语人群的他称“鞑靼”，现在我们回到内陆亚洲考察元朝以后“鞑靼”的用法。明朝建国后，部分蒙古贵族继续以北元政权存续。北元天元十年（1388），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杀害北元天元帝，废除大元国号，恢复“蒙古”，明朝称之为“鞑靼”。蒙古内部分裂后，主要是三支势力，即鞑靼（蒙古本部）、瓦剌（四卫拉特）和兀良哈。明朝官方以“鞑靼”指代蒙古本部，但用“鞑靼书”统称蒙古文字。明代设立官方机构四夷馆来处理外交公文以及培养语言人才，其中“鞑靼馆”则专门负责教习蒙古语言文字，“来文”反映了蒙古、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向明朝进贡方物和往来公文的内容。^③

① Charles J. Halperin,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p. 25, n. 6.

② Philipp Clüver, *Introductio in Universam Geographiam*, pp. 414-415.

③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章“绪论”，第2页。

清代统治者肇兴于东北，以女真后裔自居。女真在历史上与蒙古语人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清代官方没有沿袭“鞑靼”之称，而是以具体的名号来指称蒙古各部。^①“鞑靼”或“鞑子”在饱受华夷之辨思想浸染的汉地史家笔下，多少带有点贬义。上文提到，在明代官方的制度架构中，女真的往来文书经常是由“鞑靼馆”来负责处理的，所以清朝统治者对自身更是讳言“鞑靼”。有清一代，未见官方将本族称为“鞑靼”或“鞑子”的用例，但在清末民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却抛出“驱除鞑虏”的政治口号。以“鞑虏”贬称满族，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希望利用此名号激起反清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或许也跟入华传教士书写的另一套鞑靼叙事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影响有关。

如果没有外来认知的干扰，从唐宋到元明清，汉文史料中“鞑靼”概念的发展脉络相对清晰。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一套西式的科学知识，他们还结合对中国现状的观察积极从事新的知识生产，尤其是在思想观念方面，其中就涉及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的族群景观。来华传教士群体的“鞑靼观”，不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鞑靼”认知产生纠缠，更是主导了欧洲启蒙知识界对内陆亚洲人群知识的重塑，影响尤为深远。

第四节 西欧以“鞑靼”为中心的内亚知识建构

由于欧亚大陆传统商路的闭塞，西方知识界再次对中国“鞑靼”

① 《清史稿》卷七七《地理志二十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内蒙古”有科尔沁等24部，卷七八《地理志二十五》“外蒙古”有土谢图汗等21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目第”。

有一手信息的更新，则是到明朝晚期的耶稣会士来华之际。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向西欧传输有关东方的资讯，他们成为西方知识界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唯一渠道。彼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所以西欧传教士把满人也纳入“鞑靼”的范畴。^①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5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鞑靼战纪》，写的就是满人入关的历史。^②他把“鞑靼”定义成中原王朝的敌人，长城以北的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都被称为“鞑靼”，将其想象成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政治体，号称“鞑靼与中国为敌四千余年”。^③

卫匡国在书中提到，欧洲人所知的“鞑靼”第一次“入侵中国”，是西部鞑靼人，始于1206年，持续到1278年，也就是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元灭南宋。^④元朝被朱元璋推翻后，鞑靼人被赶出了中国，直到满人入关，是为“鞑靼”第二次“入侵中国”，属于东部鞑靼人。^⑤卫匡国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定为“鞑靼入侵中国”的开端，显然忽视了女真人肇建的金朝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书中他还将亚洲鞑靼与欧洲伏尔加河的鞑靼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在风俗上大同小异，只不过后者更野蛮。^⑥

卫匡国于1655年出版的《新版中国地图》中，只绘制了长城以

① 张先清：《“鞑靼”话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满族的民族志观察》，《学术月刊》2009年第41卷2月号，第118—119页。

② 卫匡国此书更准确的译法应是《东鞑靼人战纪》或《满洲人战纪》。

③ Martino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1654; Martino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London, 1654, pp. 1-2.

④ Martino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pp. 4-5.

⑤ Martino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pp. 5-103.

⑥ Martino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pp. 35, 102.

南的中国内地省份，不包括中国东北、西藏、新疆和蒙古。^①这既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政治版图的阶段性，更反映了17世纪西欧耶稣会士的“鞑靼观念”。在明清耶稣会通信中，狭义的“鞑靼利亚”是指满洲，广义的“鞑靼利亚”则是指长城以北的地区，相当于中国地理中“关外”的概念。

同一时期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在1676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绪论》一书中指出，西欧传教士们对于“鞑靼”的名称意见不一，并认为“许多人推测他们与那些波兰人和莫斯科人等其他部族交战者同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书中还提到，中国人将“鞑子”分为东、西两部，当时统治中国的满人属于东部鞑靼。^②闵明我在书中还收入了一篇针对卫匡国《鞑靼战纪》的评论。他同意卫氏提到的西部鞑靼人先征服了中国这一点，但不同意卫氏对亚洲鞑靼人身材和面部的溢美之词，更强调他们性格中残忍的一面。^③闵明我的这段话表明，17世纪来华传教士通过在华第一手资料的获取，更新甚至更正了西欧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形成的有关“鞑靼”的话语。

耶稣会士严谨的通信机制，保证了知识传播渠道的畅通。在华传教士对“鞑靼”概念的全新认知，传到欧洲后对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经受到康熙皇帝赏识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给西欧同仁写了不少信件。法国耶稣会士皮埃尔·约瑟

① 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

② 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 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London, 1704, p. 9.

③ 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pp. 366-368.

夫·奥尔良（Pierre Joseph D'Orléans）根据南怀仁的通信，于1688年出版了《鞑靼两次征服中国的历史》一书。^①由于该书法文版流传不广，1854年英国哈克路特学会推出了该书的英文版。^②在这本书中，与卫匡国的叙事有所不同，作者把金人灭北宋视作“鞑靼”第一次征服“中国”的起点，直到元朝灭亡为止，而明清鼎革则为第二次征服。^③在这种历史观念下，金、元之间被建立了某种连续性。金和元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前者属于东部鞑靼，后者属于西部鞑靼的范畴。

17世纪入华传教士对“鞑靼”的重新认识，更新了欧洲知识界的“鞑靼”观。例如，17世纪后期欧洲最权威的内亚学者是荷兰政治家兼旅行家尼古拉斯·魏特森（Nicolaas Witsen, 1641—1717），他曾多次出使俄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西伯利亚和内亚其他地区民族的资料。虽然魏特森没有实地考察过西伯利亚以及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陆欧亚，但是他通过参考各种文献，分别于1687年发表了《鞑靼地图》，于1692年出版了《北部和东部鞑靼利亚》一书，成为西欧描述西伯利亚的第一人。魏特森在书中便引用了卫匡国等来华传教士对“鞑靼”概念的重新定义，把“鞑靼”想象成一个始终对抗“中国”的连续共同体。魏特森叙述的不仅是亚洲的鞑靼（从西伯利亚一直到白令海峡），还有欧洲的鞑靼，尤其是克里米亚和喀山的鞑靼。^④

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所形塑的这种把匈奴、柔然、突厥、契丹、

① Pierre Joseph D'Orléans, *Histoire des deux conquérants Tartares qui ont subjugué la Chine*, C. Barbin, 1688.

② Pierre Joseph D'Orléans, Nicolaas Witsen,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st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two journeys into Tartary of Father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suite of the Emperor Kanh-hi*, ed. by Richard Henry Major, London, 1854.

③ Pierre Joseph D'Orléans, Nicolaas Witsen,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sts of China*, pp. 1-15.

④ Nicolaas Witsen, *Noord en Oost Tartarye*, Amsterdam, 1692; second edition 1705, pp. 400, 882-884.

女真等政体都视作“鞑靼”的叙事，直接影响了18世纪西欧有关内亚民族的历史书写。例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刘应遗作《鞑靼史》及德金的《匈奴、突厥、蒙古以及其他西部鞑靼通史》，就是袭用了这一范式。^①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为18世纪欧洲知识界更新亚洲知识的，是瑞典战俘史托兰伯。他于1730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欧洲和亚洲的东部与北部》一书内，附加一张地图。^②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正式对“鞑靼利亚”的范围作了定义。根据史托兰伯的描述，“鞑靼利亚”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六个部分。在东西方向上，“鞑靼利亚”西起德涅斯特河、布格河和第聂伯河的入口，东至中国，即东经50°到东经155°，大约900德国里数（1德国里=7420.54米）。但是，如果把中国的东北也算进去，一直到日本海，那么整个“鞑靼利亚”的长度接近1100德里。在南北方向上，“鞑靼利亚”北至黑海和里海，南抵波斯和印度，不同地方的宽度不一样，从100德里到300德里不等。“鞑靼利亚”的北部与俄国接壤，西部与波多尼亚和乌克兰接壤，南边是黑海、土耳其、波斯以及东印度，东边则是中国和日本海。^③

至此，欧洲已经从中世纪以来的旧“鞑靼”观念中走出，形成了一套相对科学的新“鞑靼”认知。^④

① Claude de Visdelou, *Histoire Abregée de la Tartarie*, in Herbelot,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La Haye, 1779, pp. 46-296. Joseph de Guign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Paris, vols. 1-4, 1756-1758.

②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English version: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③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pp. 31-32.

④ 关于沙俄对“鞑靼利亚”的地理调查和知识生产，参考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5—121页。另请参考黄达远：《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三章。

第五节 “鞑靼”的消退与“突厥”的泛化

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战俘或政府官员，在17、18世纪都没有人质疑过基督教语境中的Tartar一词的写法是否讹误。卫匡国曾经提及过两者间的差异，不过他认为中国的写法Tata少了两个r。^①第一位指出该问题的学者，是德国东方学家柯恒儒（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他于1823年出版的《亚洲众语言》一书中提到，从汉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文献中看，“鞑靼”一词都没有第一个音节的-r，故正确的写法是Tatar，而非自法王路易九世以来的Tartar。^②柯氏的观点，在德语学术界影响较大，但在英语世界中，仍然有人保守地使用着旧称Tartar。^③不过，到19世纪末，属于古代突厥汗国时期的鄂尔浑碑铭被发现和解读以后，学者们意识到“鞑靼”一词在8世纪突厥文中写作Tatar而非Tartar，这一争讼在学术界才算告一段落。^④

到19世纪中叶，“突厥斯坦”和“中亚”这些新名称逐渐普及开来，但仍然有学者继续使用着“鞑靼”这个中世纪的旧名。例如，法国东方学家戴美桑（原名Jean Jacques Pierre Desmaisons，亦称“戴美桑男爵”，1807—1873年）在1871年翻译出版希瓦汗国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的《突厥世系》的时候，仍然以《蒙古与鞑靼史》为标题。^⑤此书正是由瑞典军官史托兰伯在充当战俘时获得，并介绍

① Martino Martin,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p. 2.

②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Asia Polyglotta*, Paris, 1823, pp. 202-204.

③ Sigismund W. Koelle, "On Tartar and Turk",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2, vol. 4: 3, pp. 125-159.

④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Lieferungen 1-3, St. Petersburg, 1894-1895.

⑤ Le Baron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êhâdour Khan*, St. Petersburg, Tom I. Texte, 1871, Tom II. Traduction, 1874.

到欧洲的。^①它是一部关于钦察、河中、花刺子模的历史著作，尤详于16、17世纪的中亚突厥语民族。^②

欧洲学界关于“鞑靼”话语的集大成作品，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 Parker, 1849—1926）在1895年出版的《鞑靼千年史》。或许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庄延龄不仅沿用了Tartar的陈旧写法，而且径直把汉文史料中涉及成吉思汗以前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诸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和契丹的记载，摘录出来译成英文。^③民国时期，中国知名学者向达曾将庄延龄一书汉译出版，将西方的“鞑靼”叙事介绍到国内。^④《鞑靼千年史》的中译本与原著有几十年的时间差，故中国学界了解欧洲的“鞑靼”叙事亦存在一定的延迟。

实际上，欧洲知识界精英早就意识到“鞑靼”是一个过时的概念。“突厥语族”逐渐从史托兰伯提炼的“突厥—鞑靼语集”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范畴。后来在“突厥语族”的前提下又发展出“突厥种族”和“突厥民族”的范畴，反映了“突厥”概念在西方知识谱系中不断泛化的过程。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向中亚和西伯利亚等亚洲腹地派出科考团，攫获了无以计数的珍贵文物、文献和民族志材料。欧洲学者凭借对这批文献的释读和实证研究，催生了诸多重要的突厥学成果。于是，欧洲知识界自启蒙以来的一套鞑靼话语，逐渐被突厥话语所取代。

20世纪以来的欧洲学术语境中，“鞑靼”不再作为欧亚草原民族

①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pp. 127-128.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② 详见本书第四章。

③ Edward H.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artars*, Shanghai, 1895.

④ E. H. Parker 著，向达、黄静渊译：《鞑靼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的泛称使用，而是专指俄国和克里米亚境内自称“鞑靼”的人群。俄国境内的“鞑靼”，可追溯到13世纪后期蒙古人在东欧所建立的金帐汗国。操蒙古语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与本土操突厥语的伏尔加河流域不里阿耳人（Volga Bulgar）和钦察人融合，逐渐形成以喀山为中心的“鞑靼”共同体认同——喀山汗国（1438—1552），自16世纪中叶起便被并入沙俄帝国的政治版图。东欧的鞑靼人长期与操斯拉夫语人群共生，酝酿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来自斯拉夫主义的压迫感，使得“鞑靼”成为最早催生出“泛突厥主义”的突厥语人群。近年，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推出的7卷本英文版《鞑靼通史》，代表了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的历史编纂。^①书中将“鞑靼”的历史，一直上溯到匈奴，体现出典型的线性发展史观。《鞑靼通史》既继承了欧洲东方学的遗产，也是“鞑靼”民族主义的产物，更是一个人口较小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小 结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书写中“鞑靼”的指称相对稳定，但在西方语境中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鞑靼”的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近代以来西欧知识谱系中的“突厥”特指小亚突厥语人群，对于内陆亚洲的突厥语、蒙古语和其他阿尔泰语人群则用“鞑靼”指代。西欧“鞑靼”的概念从中世纪晚期起遭遇污名化的过程，到17、18世纪又在内涵上得到横向和纵向的延伸。随着欧洲学界对内亚认知的祛魅，“鞑靼”一词的使用范围逐渐萎缩，取而代之

^①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Sh. Marjani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Tatars*, vol. 1-7, Kazan, 2017.

的是以“突厥语族”“突厥种族”以及“突厥民族”为表征的一套突厥话语，“突厥语人群”随即成为包括小亚和内亚在内的所有操突厥语共同体的称谓。这一系列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欧知识界对亚洲民族认知的迭代。

第四章 中亚“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辨析

1405年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以欧亚大陆为舞台的“世界征服者”时代的终结，此后的历史则聚焦于以葡萄牙为先锋的欧亚大陆西端的海洋国家。^①与以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为代表的这种对近代中亚历史的传统认知有所不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则呼吁从中亚的地理“中央性”出发，重新评估中亚对于全球史的重要性。^②无论如何，中亚自15世纪起开始与外界隔绝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7世纪欧洲战俘和旅行家踏足中亚（在欧洲地图上被标为“小鞑靼利亚”），它才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中。^③造成近代世界历史书写中“中亚”变成一个“黑洞”的根本原因，实则是原始史料的匮乏。甚至，相关历史著述被认为是由历史的胜利者怀着将其胜利合法化的目的而撰写的。^④17世纪希瓦汗国的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生前撰写了两部对于我们了解近

① [英] 约翰·达尔文著，陆伟芳、高芳英译：《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约翰·达尔文的全球史观并非仅聚焦于海洋，他认为到18世纪中期，以海洋为依托的欧洲帝国与大量其他帝国形成竞争关系。参考[德] S. 康拉德著，陈浩译：《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4页。

② [德]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袁剑译：《中亚的中央性》，《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11辑，第18、69页等。

③ 近代欧洲知识界对中亚的认知，参考本书第三章。

④ 关于“黑洞”的隐喻，参考[德]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袁剑译：《中亚的中央性》，第17页。

代早期中亚历史至关重要的史书，分别是《突厥蛮世系》(*Shajare-i Tarākime*)和《突厥世系》(*Shajare-i Turk*)。^①我们亟须弄清楚的是：为何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编撰了两部从题目到结构都十分相似的史书？书中的“突厥”和“突厥蛮”两个概念分别指代何种人群？这种概念上的区分又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节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生平考述

帖木儿去世之后，中亚地区陷入了其后裔混战的政治乱局。直到16世纪初成吉思汗直系后裔阿布海尔之孙——穆罕默德·昔班尼征服河中地，才彻底终结了帖木儿家族在中亚的统治。昔班家族统治下的乌兹别克人政权以布哈拉为中心，史书上一般称之为“布哈拉汗国”。16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同为昔班汗后裔的雅迪葛尔的孙子——伊勒巴尔汗，在花刺子模建立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布哈拉汗国的乌兹别克人政权，先是以玉龙杰赤为行政中心，后转移至希瓦，故史称“希瓦汗国”。^②

17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希瓦汗国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公元1603—1663年，自1643年起即位，以下简称“阿布尔哈齐”），在黯淡的近代中亚君王谱系中显得格外耀眼，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两部史书。从现代语言译本的数量可以看出来，相较于《突厥蛮世系》，学界对《突厥世系》显然要

① 《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的察合台文原文分别是：شجره ترک和شجره تراکمه。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汉译者序”，第1—4页；（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章、12章和13章。关于雅迪葛尔与阿布海尔的亲缘关系，参考《突厥世系》附录“世系表二：阿布尔哈齐家族”。

更加重视。但实际上，《突厥蛮世系》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与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匹配的。为了深入探讨两部作品的书写策略，有必要首先交代一下作者的生平及其著作的流传情况。

《突厥世系》中提到，阿布尔哈齐的生辰是兔年，伊斯兰教历1014年一月十五日（公元1605年7月）；书末则提到他的卒年是伊斯兰教历1074年（1663年）。^①俄国考古学家尼古拉·维泽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指出，抄本上的这个年份有误，所谓“兔年”对应的伊斯兰教历并非1014年，而是1011—1012年，大致是公元1603—1604年。^②俄国突厥学家安德烈·科诺诺夫（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认为，阿布尔哈齐实际出生于公元1603年8月12日。^③德国蒙古学家施普乐（Bertold Spuler）在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阿布尔哈齐”词条中称，他出生于公元1603年8月24日，与科诺诺夫的推算稍异。^④

阿布尔哈齐受到后人的推崇，并非因为他的政治成就，而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了两部史书。其中，《突厥蛮世系》的撰修在前，大约定稿于公元1660年左右。《突厥蛮世系》书末提到，该书书写定于伊斯兰教历1071年，对应于公元1660—1661年之际。根据科诺诺夫的说法，阿布尔哈齐可能在伊斯兰教历1070—1071年之间才有时间和精力撰修《突厥蛮世系》，因为他于伊斯兰教历1069年和1072年分别有两场征伐。^⑤《伊斯兰百科全书》直接称该书撰修于伊

① 参考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5、317页。

②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Хивинском ханстве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7, p. 129.

③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Москва, 1958, p. 8.

④ B. Spuler,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H. A. R. Gibb et al.,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 I, Brill, 1986, p. 120.

⑤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0.

斯兰教历 1070 年，对应公元 1659 年。^①《突厥世系》迟至公元 1663 年才动笔，阿布尔哈齐本人于同年去世，遗稿由其子阿努沙·穆罕默德·把阿秃儿汗续修，于 1665 年定稿。^②由于近代中亚当地史料奇缺，所以这两本书几乎是我们了解 17 世纪中亚历史唯一可以依赖的原始文献。这两部史书也使得阿布尔哈齐在身为君王的光环以外，又多了一顶历史学家的桂冠。

第二节 《突厥世系》的流传和阅读史

阿布尔哈齐的史书能够进入欧洲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并被广为诵读，是一桩极为偶然的事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提到的那位瑞典战俘史托兰伯。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积极学习当地的语言并搜集文献资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新了近代欧洲知识界对中亚的认知。在此期间，史托兰伯在托博尔斯克偶然从一名布哈拉商人手中购得《突厥世系》的抄本一部。史托兰伯在一位懂俄语的布哈拉阿訇的帮助下，将察合台文的《突厥世系》经由俄语辗转译成了德语，但并未正式发表。^③

1726 年有人在莱顿出版了《突厥世系》的法译本，正式将阿布尔哈齐的作品介绍到欧洲学界。^④该译本扉页没有出现译者姓名，写

① B. Spuler,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p. 121.

② 阿布尔哈齐在《突厥世系》的序言中提到了在伊斯兰教历 1074 年开始撰写这部史书。书末提到此书完成于伊斯兰教历 1076 年（公元 1665 年）。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 3、317 页。

③ Philip J. v. Strahlenberg,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英译本：Philip J. v. Strahlenberg,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pp. 127-128.

④ D***, *Histoire généalogique des Tartars, Traduite Du Manuscrit Tartare D'abulgasi Bayadur Chan*, Leiden, 1726.

作 D***，学者一般认为译注者是本廷克（Bentinck），编辑是瓦赫内·德·蒙代斯（Varenne de Mondasse）。^①封面没有出版年份，学者们根据译者前言的落款日期 1726 年 3 月 26 日推测出版于 1726 年。根据史托兰伯本人的说法，法译本是从他的德译初稿转译而成的。^②这部法译本成为后来不少其他欧洲语种译本的底本。譬如，1730 年，由法文本转译而来的英译本，在伦敦面世。^③施普乐在《伊斯兰百科全书》“阿布尔哈齐”的词条中提到 1780 年有一部英译本，应该是 1730 年之误。

据《俄帝国科学院院史（1725—1743 年）》记载，早在 1734 年 2 月，俄帝国枢密院就决定让瓦西里·特列季科夫斯基（В.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м）从法译本转译《突厥世系》，但是这项工作因为要订正法译本中的错误而耽搁了许多时间。^④在此期间，在俄帝国科学院供职的德国东方学家格奥尔格·凯尔（Georg Jacob Kehr）于 18 世纪 30 年代把《突厥世系》直接从察合台文译成德文。凯尔的译本有不少错误，后经他人润色过一遍，可惜后者在许多地方是根据本廷克的法译本改动的。凯尔的德译本手稿保存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未能出版。^⑤

- ① Ch. M. V. Frähn, *Abulghasi Bahadür Chani Historia Mongolorum et Tatarorum*, Casani, 1825, III;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ъ*, А-АЛ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35, pp. 49-50.
- ② Philip J. v. Strahlenberg,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pp. 127-128.
- ③ Abu'l Ghâzi Bahâder, Khân of Khowârazm,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Moguls and Tatars, vulgarly called Tartars: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ies they inhabit*, London, 1730.
- ④ Герард Фридрих Миллер,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25-1743), 1890, p. 319.
- ⑤ 格奥尔格·凯尔的俄文名字是 Георг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Кер, 关于凯尔的德译本手稿的情况, 参考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德国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在《俄帝国科学院院史（1725—1743 年）》中专门有一段讲述了俄国枢密院拟翻译出版《突厥世系》的原委。Герард Фридрих Миллер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25-1743), T. 6, 1890, pp. 319-320.

科诺诺夫提到，圣彼得堡科学院还有另外一部《突厥世系》的未刊德译本。^①1768 年左右，俄国学者瓦西里·特列季科夫斯基从法译本转译的俄译本《突厥世系》出版。^②原书中没有出版年份，科诺诺夫称此书出版于 1770 年，但笔者查到不少图书馆书目中写作 1768 年。^③

德国东方学家梅塞施密特（Daniel G. Messerschmidt）于 1780 年在哥廷根出版《突厥世系》的德译本，译者名自署。^④施普乐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说，梅塞施密特的德译本就是史托兰伯的最初译本。^⑤这一说法，被科诺诺夫所沿袭。^⑥关于史托兰伯德译本原稿的下落，疑点重重。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博物馆下属的图书馆手抄本藏品中，有一条书目提到，拜耶尔（T. S. Bayer）旧藏的一部《突厥世系》德语译本，据说就是史托兰伯的最初译稿，是由瑞典军官伯恩哈德·穆勒（Bernhard Müller）转赠给拜耶尔的。拜耶尔是德国的著名汉学家，生前曾经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去世后他的私人藏书被遗孀贩卖，几经辗转，最终入藏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博物馆。该校图书馆早年的编目者曾怀疑此译本可能就是梅塞施密特 1780 年在哥廷根出版的德译本。^⑦最新的馆藏目录编纂者则认为，该稿与梅塞施密特

①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② В. Треднаковский, *Родословная история о татарахъ*, С.-Петербург, 1768.

③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科诺诺夫大概是受到 1825 年喀山刊本中拉丁语前言（见下文）中观念的影响。笔者所查书目，见 *Solanus: Bulletin of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Group of 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1978 June, No. 13, p. 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书目编号是 NLR01 010977882，目录提要中也是写作 1768 年。

④ D. G. Messerschmidt, *Abulgasi Bagadur Chan's Geschlechtbuch der mungalisch-mogulischen oder mogorischen Chanen*, Göttingen, 1780.

⑤ B. Spuler,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p. 121.

⑥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⑦ J. Young & H. Aitken, *A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terian Museum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1908, pp. 246-247.

的德译本不同。^①新编目者还提到，拜耶尔藏品中还有一部由他本人借助于《突厥世系》德译本而译成的拉丁语本。^②

由于上述几位译者都没有察合台语文的知识，更何况经过了若干种语言的中转，所以早年的译本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译著。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影响到《突厥世系》在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传播，因为这是唯一一部来自里海以东的所谓“鞑靼”史家的作品，显得弥足珍贵。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对于启蒙晚期欧洲知识分子“鞑靼”认知的形塑和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鞑靼人的自我视角。^③譬如，启蒙时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从1776年开始，至1788年出齐，共6卷）就时常引用该书，而且认为“《突厥世系》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为我们增添了一份关于鞑靼人现状的有趣记录，尽管尚不完备”。^④

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学术界对《突厥世系》的关注度仍在持续，1838年英国学者迈尔斯（William Miles）出版了新的英译本。^⑤弗雷恩（Ch. M. V. Frähn）受到尼古拉·德·罗曼佐夫（Nicolai de Romanzoff）的资助，于1825年在喀山刊行了察合台语原文，并在用拉丁语撰写的前言中总结了《突厥世系》既有欧洲语言译本的不

① David Weston, *The Bayer Collection: A preliminary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and books of Professor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aquired and augmented by the Reverend Dr. Heinrich Walther Gerdes now preserved in the Hunter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18, p. 78.

② David Weston, *The Bayer Collection*, pp. 176-177.

③ Nathaniel Wolloch, *History and N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Praise of the Mastery of N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1, pp. 150-153.

④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David Womersley, 3 vols, Harmondsworth, 1994, “General Observations”, vol. 2, p. 512 note 6.

⑤ W. Miles, *The Shajrat ul Atrak or Genealogical Tree of the Turks and Tatars*, London, 1838.

足之处。^①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既有的《突厥世系》译本错误百出,必须要借助于1825年喀山出版的察合台文本才可。^②学识渊博的法国东方学家戴美桑(P. I. Desmaisons)于1871年和1874年在圣彼得堡分别推出了察合台文本和全新法文译本。^③戴美桑的校勘本是目前学界最为推崇的一部译本,罗贤佑的中译本便是从戴美桑的法译本转译的。^④此外,在喀山、塔什干和巴库还出版了几部现代语言的译本。^⑤

在戴美桑之前,欧洲出版的译本绝大多数都不是从手抄本直接译出,而是从其他现代语言译本转译的,所以学者并不重视各抄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1874年戴美桑的法译本,以圣彼得堡科学院所谓的“答赫勒(Dahl)抄本”为底本,参校了喀山本,以及哥廷根和柏林的抄本。^⑥戴美桑在给弗莱恩的通信——此信公开发表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上——中指出,柏林抄本脱漏严重,哥廷根抄

-
- ① Ch. M. V. Frähn, *Abulghasi Bahadür Chani Historia Mongolorum et Tatarorum*, Casani, 1825. 按: 罗曼佐夫, 俄语名 Николай П. Румянцев, 1754—1826年, 曾担任沙俄帝国的外交大臣和枢密大臣。施普乐在《伊斯兰百科全书》的词条中提到, 弗雷恩于1825年在喀山出版了拉丁语译本, 但实际上只是用拉丁语撰写了前言, 并没有全书的译文。参考 B. Spuler, “Abu'l-Ghâzî Bahâdur Khâ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p. 121.
- 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entral-Asien: Allgemeine geologische Ansichten über Asien*, Berlin, 1844, p. 405.
- ③ Le Baron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St. Petersburg, Tom I. Texte, 1871;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 II. Traduction, 1874.
- ④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 罗贤佑译:《突厥世系》。
- ⑤ Nigora Allaeva, “The *Shajara-ye Turk*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Khiva and Its Neighbours”, in *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 vol. 7, 2014, p. 84.
- ⑥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 罗贤佑译:《突厥世系》, “法译本前言”, 第15页。按: 答赫勒, 全名弗拉基米尔·答赫勒(Wladimir I. Dal, 俄语名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Даль, 又译弗拉基米尔·达尔, 1801—1872), 是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字典编纂家, 出生于一个俄国的德裔家庭。他的姓氏本来写作 Dahl, 故也可译作“答赫勒”。

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①戴美桑在1874年的译本“前言”中提到，在他的校勘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圣彼得堡帝国图书馆彼得·莱尔赫（Peter Lerch）为他提供了一部从希瓦新购的《突厥世系》手抄本。虽然该抄本有脱漏，但仍不失为仅次于答赫勒抄本的善本。^②戴美桑还指出，圣彼得堡另有一部抄本，但是错误百出，没有利用的价值。^③

据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艾哈迈多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圣彼得堡实际共有6部《突厥世系》的抄本，但只有1部是完整的，乌兹别克科学院有5部抄本，2部完整。^④笔者查阅了柏林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数据库，找到了《突厥世系》抄本的电子版。^⑤法国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突厥世系》的抄本，系1824年由某位名为约翰·杰克（John Jack）的人购得，并在扉页上用英文写道“此书是阿布尔哈齐的鞑靼世系史”。^⑥此外，伦敦大英博物馆有几章《突厥世系》的节选抄本，编号是Add. 11,725, Foll. 70b-75b。^⑦

① Desmaisons, “Manuscrit de l’Arbre généalogique des Turks, par Aboul-Ghazi, envoyé à l’Académie par M. Dahl à Orenbourg, et analysé par M. Desmaisons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M. Fraehn (lu le 8 juin 1838)”, in *Bulletin Scientifique publié par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aint-Petersbourg*, Tome 4, 1858, Leipzig, pp. 229-234.

②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e II. Traduction, 1874, “Préface”, III. 汉译本的“贝特尔·戴美桑法译本前言”有两段脱文，这段话未译。

③ 同上。

④ [乌兹别克斯坦]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94页。Б. А. Ахмедов,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XVI-XVIII вв.*, Ташкент, 1985, p. 73.

⑤ William Pertsch, *Verzeichniss der türkischen Handschriften*, (Die Handschriften-Verzeichniss der Königl. Bibliothek zu Berlin, VI), Berlin, 1889, pp. 228-230. 柏林抄本的电子版：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832940321&PHYSID=PHYS_0001&DMDID=。

⑥ E. Bloche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turcs*, Tome I, Paris, 1932, p. 232. 巴黎藏《突厥世系》抄本的地址：<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0823323/f1.image>。

⑦ Charles Rieu, *Catalogue of the Turkish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1888, London, p. 282.

相比之下,阿布尔哈齐的另一部史书——《突厥蛮世系》,无论是在知名度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远不及《突厥世系》。《突厥蛮世系》的手抄本,首先由俄国东方学家图曼斯基(А. Г. Туманский)刊行。^①关于《突厥蛮世系》写稿的版本和译本情况,笔者曾做过研究,不再赘述。^②为保证本章节内容的完整性,这里对《突厥蛮世系》的研究历史再略作申述。截至目前,有两部俄语译本和一部土耳其语译本,西欧语言的译本则全部阙如。^③其中,苏联突厥学家科诺诺夫的俄译本,是最为权威的校勘本。《突厥蛮世系》不仅尚未有中译本,甚至中国学术界对其都鲜有介绍。应当说,中国的西北民族史研究者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部17世纪中亚察合台文珍贵史书的重要性。

第三节 “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异同

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在不同译本中的标题可谓五花八门。譬如,最早的法译本题名作《鞑靼世系史》,1730年英译本题名作《突厥、蒙古和鞑靼通史(及其居地的描述)》,1768年特列季科夫斯基俄译本的名称与法译本同,梅塞施密特1780年德译本的题名作《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汗世系》,1825年喀山版拉丁文标题是《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的蒙古与鞑靼史》,1838年迈尔斯的英译本题为《突厥与鞑靼世系》,1874年戴美桑的法译本题目作《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与鞑靼史》。不难发现,它们都没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Туманский,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Асхабад, 1897.

② 陈浩:《〈乌古斯可汗传〉版本源流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13页。

③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Москва, 1958; Zuhai Kargı Ölmez, *Şecere-i Terākime*, Ankara, 1996, 2020.

有沿用阿布尔哈齐的原书名，反而都包含“鞑靼”，个别还含有“突厥”或“蒙古”的字眼。

把中亚民族统称为“鞑靼”，实际上是欧洲近世以来对中亚地理和民族认知有所局限的表现。^①《突厥世系》这部书标题翻译中的“走样”，反映了译者试图用本土知识分子熟悉的概念来介绍一部陌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西方学者对阿布尔哈齐的隔阂感，但也给西方以外的学者造成了困惑。例如，中译本序里提到，“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原书的书名即为《突厥世系》，戴美桑不知何故将其译本题名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与鞑靼史》”。^②这份困惑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汉文史料中，自上古时代起就存在一种不断更新和补充的北方民族叙事传统，“突厥”“鞑靼”“蒙古”“乌兹别克”等概念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晰的。

从源流上讲，阿布尔哈齐是蒙古人，可追溯至昔班、术赤和成吉思汗。昔班的封地“蓝帐汗国”位于咸海以北、西至乌拉尔河，在名义上隶属于其兄拔都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在乌兹别克汗（《元史》作“月即别”）在位期间（1313—1342年）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于是他的名讳被用作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统称，当然也包括昔班家族的成员。^③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瓦解之后，乌兹别克人纷纷南下河中地区。从昔班汗的六世孙阿布海尔开始，乌兹别克人便在中亚站稳了脚跟。^④阿布尔哈齐虽然不是阿布海尔的直系，但他也是昔班汗的后裔，属于乌兹别克人。在金帐汗国内，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贵族逐渐

① 详见本书第三章。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汉译者序”，第12页。

③ （美）丹尼斯·塞诺撰，邓永红译，陈浩校：《关于乌兹别克汗国的几条拉丁语史料》，《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3页。收入陈浩主编：《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19—332页。

④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汉译者序”，第2—3页。

在语言上突厥化。到了 17 世纪，乌兹别克人已经有一定的民族自觉了，譬如阿布尔哈齐意识到当时的突厥语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至深，所以他要尽量用纯正的察合台语去写作。^①17 世纪统治中亚的蒙古后裔不仅在语言上突厥化了，而且在认同上也自称“突厥”。这一点，从阿布尔哈齐的书名《突厥世系》就可以看出来。

在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中，“突厥”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认同，主要出现在叙述“蒙古”源流的相关章节中，而在叙述当代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时，他常用的是“乌兹别克”。由此可见，在以阿布尔哈齐为代表的 17 世纪中亚政治精英的观念中，“突厥”“蒙古”和“乌兹别克”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甚至是并行不悖的。“蒙古”与“突厥”的概念纠葛，早在阿布尔哈齐所依赖的重要史源之一——14 世纪初拉施特的《史集》中就已显端倪。譬如，拉施特说：“因为那时（古时），蒙古人是属于突厥诸部落的一个部落。”俄译校勘本提醒读者，“拉施特把起源极为不同的中央亚细亚的各种游牧部落，不仅说突厥语的，甚至连说蒙古语的、唐兀惕语和通古斯—满语的，都称为突厥。由此可见，我们这位史学家的突厥一词，并非民族学和语言学上的用语，而是一种社会习惯用语，即‘游牧人’的意思”。^②

阿布尔哈齐的另一部史书《突厥蛮世系》，因为只有俄语和土耳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 34 页。中亚操突厥语的人群面对在文化上更加强势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时的危机感，并非 17 世纪才出现的，早在 15 世纪的纳瓦依身上就已见端倪。他借鉴波斯文学的体裁和格律，结合察合台文作为一种突厥语的特性，丰富了察合台文的表现力。为察合台语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阿布尔哈齐更多地是从史学和现实政治的角度，发出要使用“纯正”突厥语的呼吁。我们说 17 世纪的乌兹别克人有了一定的民族自觉意识，当然不是现代意识上的“民族意识”，而是一种基于语言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149 页。

其语译本，且题名都沿用原名，所以不存在标题在翻译过程中“走样”的情况。假设 19 世纪就已经有此书的西欧语言译本的话，“突厥蛮”自然也会被称为“鞑靼”。然而，在 17 世纪中亚史家的观念中，“突厥蛮”显然是不同于“突厥”（即突厥化的蒙古人，或称“乌兹别克”）的一群人。阿布尔哈齐在他的书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他特意为这两个人群分别撰写了《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两部史书，就是明证。从历史上看，突厥蛮可追溯到乌古斯人，与乌兹别克人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为了更好地理解 17 世纪中亚历史书写中“突厥蛮”的族群内涵和历史渊源，我们有必要阐明其先祖乌古斯人的发展脉络。

关于“突厥蛮”的词源，阿布尔哈齐在《突厥蛮世系》中提供了一种解释。据说，最早在河中地区出没的突厥蛮人，被当地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称为“突厥人”。经过若干世代以后，这群人的下颌变小了，眼睛变大了，面部变小了，鼻子变大了。后来，塔吉克人把后期迁入的另一群突厥蛮人称作“突厥人”，而早期的那批在体质上发生了变化的突厥蛮人则获得了 *Türk-mānand* 的称号，意思是“像突厥的人”。久而久之，由于普通人觉得这个名称太过拗口，就索性把 *Türk-mānand* 简化为 *Türkmen*，亦即“突厥蛮”。^①

阿布尔哈齐在书中提到的“突厥蛮”意为“像突厥的人”的观点，也见于贝鲁尼、喀什噶里等早期穆斯林史家的论著，且被拉施特所沿袭。^② 不过，与 17 世纪的版本强调体质特征有所不同，早期史料

①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57.

② Mahmūd al-Kāshg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īwān Luyāt at-Turk)*, ed. & trans. Robert Dankoff & James Kelly, Part II,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 363;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140 页；贝鲁尼关于突厥蛮的记载，见下文。

中“突厥蛮”的身份更多地是以宗教信仰来界定的。贝鲁尼提到,乌古斯人群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那部分来到穆斯林的城市,被称为“突厥蛮”。^①塞尔柱宫廷物理学家马卫集(Al-Marwazi)在《动物之自然属性》(*Tabi' alhayawan*)中指出,一些乌古斯人与穆斯林国家接触之后就皈依伊斯兰教了,于是被称为“突厥蛮”。^②据此可知,“突厥蛮”早期指代的是乌古斯人中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群。现代突厥学家一般都认为,穆斯林史家对“突厥蛮”的民间词源学解释不足为信。例如,德国学者德福(G. Doerfer)认为,Türkmen的词源没有那么复杂,就是Türk加一个增强语气的后缀men。^③美国突厥史家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也持类似的观点。^④

有学者认为,可能早在公元8—9世纪就已经有“突厥蛮”一词了。例如,夏德推测,唐朝杜佑《通典》中提到的“特拘梦”就是“突厥蛮”的译法。^⑤“突厥蛮”这个词开始出现在穆斯林文献中,是在公元10世纪下半叶。^⑥巴托尔德(W. Barthold)指出,到了蒙古人统治的时代,“突厥蛮”一词才压倒性地取代了“乌古斯”的

① Al-Bīrūnī, *كتاب الجماهر في معرفة الجواهر/Kitāb al-jamāhir fī ma'rifat al-jawāhir*, S. Krenkow ed., Hyderabad, 1936, p. 205. 转引自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Wiesbaden, 1992, p. 212.

② V. Minorsky trans.,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 D. 1120)*, London, 1942, p. 29.

③ 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d. II, Wiesbaden, 1965, § 892, pp. 498-499.

④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pp. 212-213.

⑤ F. Hirth, “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i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n und der 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München*, 1899, Bd. II, Heft II, p. 263.

⑥ (苏联)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页。

称谓。^①“乌古斯”的名称最早见于8世纪的鄂尔浑碑铭，一般写作 tokuz oğuz，直译是“九姓乌古斯”，唐朝史料中译作“九姓”。关于乌古斯的词源，学者们有许多推测，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本义是“氏族”，相对更能让人接受。^②结合突厥文和汉文史料来看，九姓是漠北游牧人口结构中的主体，他们时而依附于、时而又独立于突厥政权。^③换言之，隋唐时期的突厥与九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8世纪中叶第二突厥汗国灭亡以后，一部分乌古斯留在漠北，经过政治重组后进入了回鹘汗国的体制，也有一部分乌古斯人群开始逐步向西迁徙。

“九姓乌古斯”在早期穆斯林文献中写作 تخزغز، 一般译成汉语“托古兹古兹”或“托古兹古思”(Tughuzghuz)。^④据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的勘定，10世纪《世界境域志》等伊斯兰地理志中的“托古兹古兹”指代的是当时天山一带的回鹘。^⑤不过，穆斯林文献中“托古兹古兹”的内涵似乎有一个发展过程，也可指代漠北时期的回鹘。^⑥

① W. Barthold, "Turkoman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st edition, vol. 4, Brill, 1934, p. 897.

② Peter B. Golden, "Oq and Oğuz ~ Oğuz", in *Turkic Languages*, vol. 16, 2012, pp. 183-186.

③ 在东突厥复国之初，九姓乌古斯是仇敌，后者曾与唐朝、契丹结盟，试图把突厥扼杀于摇篮之中。见《噉欲谷碑》第9—16行。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突厥人占领于都斤山并建立第二突厥汗国的政权之后，九姓乌古斯便成了汗国的子民。噉欲谷说：“乌古斯人全都来臣服了，当听到我让突厥可汗、突厥人民来到于都斤山林，我本人谋臣噉欲谷住在于都斤山林之后，南面的人以及西边、北边和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8页。此处译文与耿译略有不同。

④ James Hamilton, "Toquz-oyuz et On-Uyyur", in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L, 1962, pp. 23-63. (法) 哈密顿著，耿昇译：《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期，第130—140页；《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续）》，《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128—143页。

⑤ *Hudūd al-'Ālam/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 2nd edition, Cambridge, 1970, pp. 263-270.

⑥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三章“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第三节“‘托古兹古思’问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23页。

关于回鹘与九姓的关系纠葛，笔者提出过一个假设：回鹘本是九姓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在建立了独立的政治体以后继承并改造了这一政治架构，用回鹘族群内部的九个氏族来取代早期的九姓。^①于是，形成了汉文史料中回鹘有两种版本九姓的局面，也就是史家所谓“内九姓”和“外九姓”之说的缘由。^②

西迁的乌古斯人群，在穆斯林文献中则写作غز，可汉译为“古兹”。马夸特（J. Marquart）指出，乌古斯/古兹人在历史上曾经分裂成不同的氏族，稀稀落落地分布在伊朗—伊斯兰世界边境的草原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陆亚洲民族大迁徙造成的，譬如回鹘汗国的衰亡（840年）、辽朝的建立（916年），以及西辽向七河流域的迁徙。^③乌古斯人群向中亚的渗透，挤走了佩切涅格人，使之向西迁徙。对此，彼得·高登有更加详细的讨论。^④乌克兰裔美籍东方学家普里查克（O. Pritsak）认为，西迁乌古斯人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政治体——叶护国，后来因内外交困——内部有塞尔柱部落的崛起，外部有钦察人

① Chen Hao, “Baz Qaga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quz Oguz”, in *Chronica. Annua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zeged*, 2018, pp. 43-50.

② 《新唐书·回鹘传上》：“子骨力裴罗立〔中略〕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崛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第6114页）《唐会要》：“天宝初，回纥叶护逸标苾裘灭突厥小杀之孙乌苏米施可汗。未几，自立为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号。〔中略〕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即拔野古，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悉。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唐会要》卷九八，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44页）

③ Josef Marquart,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in *Abhandlung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eue Folge*, Band XIII, Nr. 1, 1914, pp. 34-35.

④ Peter B. Golden, “The migrations of the Oguz”, in *Archivum Ottomanicum*, vol. 4, 1972, pp. 45-84.

的压迫——导致了乌古斯叶护国的瓦解。^①

10世纪以后的乌古斯史，因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1037年乌古斯人在伊朗和中亚肇建了塞尔柱帝国，其创建者图赫鲁·伯（Tughril Beg）源自乌古斯的柯尼克（Qiniq）部落，柯尼克系乌古斯可汗幼子腾吉斯汗的儿子。^②1194年塞尔柱帝国被花刺子模帝国所取代，迁徙到小亚细亚的乌古斯人后来又建立了奥斯曼帝国。^③在奥斯曼帝国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纳托利亚还存在不少强劲的突厥蛮地方政权。譬如，白羊王朝源自乌古斯可汗第四子库柯汗的长子——巴音迪尔汗^④；黑羊王朝的汗系也可追溯到乌古斯可汗^⑤。留在中亚的一群突厥蛮人，主要分布在里海东岸、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以游牧为主。这群突厥蛮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处于诸侯林立的分治状态。^⑥到17世纪阿布尔哈齐的时代，政治上分裂但军事上拥有战斗力的突厥蛮人，积极地参与到中亚乌兹别克人的政治进程中。这支突厥蛮人，就是今天中亚土库曼斯坦的族源。一般而言，我们把现代的民族国家称为“土库曼”，而历史上的族称则译为“突厥蛮”。

-
- ① Omeljan Pritsak,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of the Oghuz Yabghu", in *The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S. II.*, New York, 1952, pp. 279-292.
- ② 关于塞尔柱家族起源于乌古斯可汗幼子腾吉斯汗的说法，见于《史集·乌古斯史》。Karl Jahn, *Die Geschichte der Oguzen des Rasid Ad-Din*, Kommissions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Wien, 1969, p. 67.
- ③ 关于奥斯曼家族起源于乌古斯可汗长孙凯伊的说法，见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 ④ John E. Woods, *The Aqquyunlu: Clan, Confederation, Empire*, revisi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p. 25.
- ⑤ V. Minorsky, "The Qara-qoyunlu and the Qutb-shāhs (Turkmenica, 10)",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7, no. 1, 1955, p. 53.
- ⑥ 关于突厥蛮历史的学术成果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托尔德的研究。巴托尔德：《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载《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下册，第607—699页。

第四节 近代中亚政治语境下的历史书写

在梳理了阿布尔哈齐观念中“突厥”和“突厥蛮”的内涵之后，我们还要从史料批判的角度去追问阿布尔哈齐撰写这两部史书的动机。阿布尔哈齐自己在《突厥世系》提到“我本人就拥有 18 部叙述统治过伊朗或土兰等地的成吉思汗后裔历史的著作〔中略〕至今还没有一部记述自从我们的祖先与阿布都剌汗的祖先分离后我们家族诸君主历史的著作。我先是有意委托某人来撰写这部史书，但一直没有找到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因此，我只得亲自动手来撰写这部著作”。^①阿布尔哈齐在《突厥蛮世系》中又提到，由于乌古斯世系的版本众多，莫衷一是，突厥蛮的首领听说他通晓历史，便请他编纂一部信史。^②这些说法或许都是真实的，但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追究。

关于乌古斯人群的历史，除了散见于穆斯林史家书中的零星记载之外，只有一部略带史诗色彩的所谓“乌古斯史”。“乌古斯史”传世最早的版本是回鹘文的《乌古斯可汗传》，在内容上没有任何伊斯兰教的色彩。伯希和认为，现存回鹘文《乌古斯可汗传》可能是 15 世纪的抄本，但应该是以 1300 年左右的一个早期版本为依据。14 世纪拉施特的《史集》中收入了另一种版本的“乌古斯史”，不仅在原故事情节上有所扩充，即补充了乌古斯可汗去世后其子嗣统治时期的政治事件，而且注入了浓重的伊斯兰教色彩，譬如乌古斯可汗以不喝奶来威逼其母亲皈依伊斯兰教。阿布尔哈齐撰写的《突厥蛮世系》，大体取材于拉施特的《史集·乌古斯史》，但在叙事时间轴上更加延长，故事情节却有所节略。剥离了语境的《突厥蛮世系》，使得原著《史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 1—2 页。

②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36.

集·乌古斯史》中的趣味性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凝练和干瘪的宗教说教。

作为史家的阿布尔哈齐，他的关怀是“世系”，实际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倘若比较一下阿布尔哈齐与拉施特在成吉思汗世系问题上的记载，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拉施特在《史集》中只是把成吉思汗家族从铁木真往上七世祖的名讳交代清楚，更远的就不再追究了。^①但在《突厥世系》中，阿布尔哈齐把成吉思汗家族的世系进行了延伸和嫁接，一直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甚至是雅弗和人类的始祖亚当。^②突厥蛮人的祖先也可以追溯到乌古斯可汗，这在《突厥蛮世系》中是言之凿凿的。换句话说，至少在阿布尔哈齐所处的时空语境中，即17世纪的中亚，突厥蛮人与乌兹别克人拥有共同的始祖——乌古斯可汗，而这一叙事在14世纪的伊利汗国并不存在。

将乌兹别克人和突厥蛮人追溯到共同始祖的叙事，既是两个族群在中亚地区长期共存的后果，也是突厥蛮人在17世纪中亚乌兹别克人政治纷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真实写照。换言之，这一同源叙事是有现实需求的。经营中亚的乌兹别克人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即来自卡尔梅克、波斯和沙俄等外部势力的威胁，更有内忧，即希瓦和布哈拉汗两个乌兹别克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各自汗国内部出现的继位之争。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外族的突厥蛮人就成了一支有影响的平衡力量。譬如，阿布尔哈齐之所以在与其兄弟伊思芬迪雅儿汗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并不得不流亡异国他乡，就在于后者得到了突厥蛮人的支持。^③阿布尔哈齐在抵抗的过程中，努力争取的外援也是突厥

①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87页。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78—279页。

③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83—290页。

蛮人。^①

不过，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阿布尔哈齐编纂两部史书的根本目的，还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即强化“突厥人”/“乌兹别克人”与“突厥蛮人”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异。写史终究是一种“他者化”的手段，为的是强调身份认同的边界。这一点，从两个人群的世系建构中也能看出端倪。阿布尔哈齐在《突厥世系》中虽然将成吉思汗的祖先嫁接到乌古斯可汗，但是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成吉思汗究竟出自哪一支，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根据阿布尔哈齐的说法，成吉思汗出自乌古斯可汗的次子——艾汗。^②根据《突厥蛮世系》和《史集·乌古斯史》，突厥蛮人的历史则主要是乌古斯可汗长子昆汗后裔的历史，即一般意义上乌古斯人的历史。乌兹别克人与突厥蛮人同源却不同支这一叙事的出发点，可以从17世纪中亚的政治局势中找到线索。

阿布尔哈齐始终把突厥蛮人视作异族，必要时尽量争取，得不到则摧毁之。从波斯返回希瓦的阿布尔哈齐，因为突厥蛮人当年的背信弃义而对他们怀恨在心。在他的地位稳定之后，突厥蛮人纷纷来降，表示“绝对归顺于他，保证服从于他”，“除了他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主人；他们也没有可去的地方”。阿布尔哈齐口头答应他们“所有逃跑或躲藏起来的突厥蛮人都可以返回他们的家园，他对他们全部予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92—294页。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71、279页。汉译为“爱汗”“阿亦汗”。第279页提到，阿亦汗之后是玉儿笃兹汗继位。注释说：“此处有误，应该说玉儿都兹汗（即玉儿笃兹汗）是阿亦汗之弟、乌古思汗之子。参见本书所载乌古思汗诸子的名字。”这个注释是多余的，因为《突厥世系》前文中解释得很清楚，爱汗的后继者是余勒都思（即玉儿笃兹），但不知道他究竟是爱汗的孙子，还是他的一个近亲。爱汗确实有一个名叫余勒都思的弟弟，但这个余勒都思却不是爱汗之后即位的余勒都思。见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6页。

以宽恕，既往不咎”，暗地里却在策划一场针对突厥蛮人的大屠杀。阿布尔哈齐下令在露天设帐，摆下鸿门宴，邀请突厥蛮的首领来参加。在宴会上，阿布尔哈齐下令血腥剿灭了数千名来降的突厥蛮人。^①此后，阿布尔哈齐还去捷真纳和巴米·布尔玛等地去追杀那里的突厥蛮人。^②

从阿布尔哈齐对待突厥蛮的态度不难看出，他终究将其视为异族。这点也反映在他的历史书写中，他用分别立传的方式来体现“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差异。总之，阿布尔哈齐的《突厥蛮世系》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份政治宣言。它与《突厥世系》一起，对中亚突厥蛮和突厥（乌兹别克人）两个群体在现实中政治地位差异加以强化。

小 结

综上所述，在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处的17世纪中亚的历史语境中，所谓的“突厥”指的是在中亚统治的成吉思汗后裔，即乌兹别克人，而所谓的“突厥蛮”是指乌古斯人。这两支人群长期在同一地区共生，在政治和军事上互相依赖，使得他们共同起源于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的叙事具有了一层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二者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因为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并不平等。乌兹别克人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以希瓦和布哈拉两个城市为政治中心。突厥蛮人则始终处于涣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更好地理解阿布尔哈齐分别编纂《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两部史书的隐性动机：在“求同”之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304—305页。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305页。

外，更多地是为了“存异”。当然，这两点并非他写史的全部目的。譬如，《突厥世系》主要是希瓦汗国的政治史，并不包括布哈拉汗国的汗系，说明他也有意将希瓦与布哈拉两个支系的乌兹别克人区分开来。

第五章 何谓“土耳其”？

——小亚突厥语人群的认同焦虑与调适

近世以来，与同时期以排他性为表征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展现出足够的统治韧性和文化异质性。这个距离西方基督教世界最近的突厥语群体，在六百年的话语竞争中做出了诸多努力、挣扎和妥协。土耳其人在身份认同建构中所遭遇的困厄，反映了权力不平等格局下的西方话语霸权。究其原因，近代欧洲知识和概念的流动，本质上是单向的，即从欧洲向其他地方的传播。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无疑有很大难度。但是，对于一部突厥概念史的作品而言，如果缺了小亚细亚这块区域，肯定是不完整的。哪怕是对其作一个掠影式的研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补齐突厥概念史的拼图。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延续的时间长，从奥斯曼建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共六百余年。我们只能将问题简单化，凝练出几个阶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它涉及三类行为体，一是苏丹本人及其家族，二是围绕在苏丹周围的伊斯坦布尔的政治精英，三是安纳托利亚的底层民众。我们在论述中，尽量理清三条线索各自的发展脉络。但是，作为一篇讨论小亚突厥语人群身份史的文章，还是有必要对上述三个能动主体进行群像式考察。

第一节 学界对奥斯曼起源的前期研究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起源以及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原因，曾一度是欧洲学界讨论的热点。^①从约瑟夫·冯·哈默（Joseph von Hammer）以来的19世纪奥斯曼通史作者，几乎都未加批判地使用了15世纪以后编纂的奥斯曼官方史料来重构早期奥斯曼史，即延续着奥斯曼人源自塞尔柱人的传统叙事。^②首次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美国学者赫尔伯特·吉本斯（Herbert A. Gibbons）。他在1916年出版的《奥斯曼帝国的肇基》一书中，强调拜占庭对奥斯曼的影响，认为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继承和吸收了拜占庭人的制度。吉本斯认为有关奥斯曼早期历史的文献都是后来杜撰的，不足为信。^③虽然吉本斯在处理史料时表现出了批判态度，但他的观点仍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特征。吉本斯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他亲身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目睹了这个帝国腐朽和软弱的一面，他不相信一个“亚洲人种”有能力创建一个世界性帝国，所以在寻找它兴起的根源时，自然不会从它本身出发，而是从其他方面去寻找原因。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之后，官方与

① 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但是近代以来西欧用 Turk 来指称奥斯曼人。这个 Turk 在词源上当然是与汉文古籍中的“突厥”相同的，但是它们所指代的对象完全不同，所以不能译成“突厥”。另，汉文文献中的“土耳其”一般是指1923年成立的共和国，所以直接用“土耳其人”来指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人群，也不合适。于是，本文中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且称之为“奥斯曼土耳其人”。

② Joseph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1. Bande, Budapest, 1827, p. 41. Johann Wilhelm Zinkeise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 in Europa*, 1. Bande, Hamburg, 1840, pp. 58-59.

③ Herbert A.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Oxford, 1916, pp. 276, 302ff.

学界都认为有必要建构一套新的起源叙事，来打造共和国公民的全新身份认同。其中，历史学家柯普律吕（M. Fuad Köprül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反驳吉本斯的观点。^①柯普律吕认为，蒙古势力的扩张，造成了乌古斯人群的西迁，从而给安纳托利亚的政治和军事边疆带来了结构性压力。奥斯曼的早期扈从由他的部落成员构成，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共同的起源。虽然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拜占庭东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并对奥斯曼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但奥斯曼帝国主要还是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政治文化的要素也几乎都是来源于中亚和中东的“土耳其—穆斯林”遗产。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要归功于土耳其人的部落和族群凝聚，以及一套复杂的中亚和中东的制度遗产。^②柯普律吕的观点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因而成为土耳其官方史学的基调，影响深远。

在柯普律吕之后，在奥斯曼起源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是奥地利历史学家保罗·魏特克（Paul Wittek）。他借1937年受邀伦敦大学讲学的机会，连续发表了3篇有关奥斯曼起源的文稿，并于翌年结集出版。^③魏特克没有纠缠于族群性问题，即究竟是土耳其人或穆斯林还是拜占庭人或基督徒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贡献更大。他另辟蹊径地

① M. Fuad Köprülü, "Bizans Müesseselerinin Osmanlı Müesseselerine Te'siri Hakkında Bazı Mülâhazalar", *Türk Hukuk ve İktisat Tarihi Mecmuası* I (1931), pp. 165-313. M. Fuad Köprülü, *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35.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y Leis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② M. Fuad Köprülü,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y Leiser, pp. 111-117.

③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8.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with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by Colin Heywood, Rudi Paul Lindner and Oliver Welsh, ed. by Colin Hey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认为,在伊斯兰教世界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种“圣战”(ghaza)观念,以及以伊斯兰的名义进行圣战的英雄人物“加齐”(ghazi)。正是这一圣战理念促成了早期奥斯曼政体的形成。^① 他的立论依据是15世纪初奥斯曼诗人艾哈迈迪(Ahmedi)的《亚历山大传》(*İskendernâme*)中所蕴含的弥赛亚式的“加齐”观念^②,以及布尔萨清真寺中一处纪年为公元1337年的铭文“苏丹、加齐苏丹之子、加齐、加齐之子、天下之主、世界英雄”(Sultân ibn sultân al-ghuzât, ghâzî ibn al-ghâzî, shujâ' ad-daula wa'd-dîn, marzbân al-âfâk, bahlavân-i jihân, Orkhan ibn 'Othmân)——这正是奥斯曼帝国第二任苏丹奥尔汗的名号。^③

“加齐理论”提出以后,逐渐成为奥斯曼史学界的主流认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公然对其提出挑战。美国历史学家如迪·林德内尔(Rudi P. Lindner)是反对魏特克“加齐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部落主义”(Tribalism)更适合用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动因。他在《中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游牧民与奥斯曼人》一书中指出,早期奥斯曼人是以一种游牧集团的方式生活,维系其族群凝聚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高尚的宗教追求,而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例如为了获得牧场和战利品)。^④ 他认为魏特克提出的“加齐理念”是一

①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pp. 31-69. 关于“加齐起源说”的述评,参见韩志斌、姜欣宇:《“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17—30页。

② Kemal Silay, “Ahmed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 Dynasty”, i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16, 1992, p. 135.

③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p. 44.

④ Rudi P.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Indiana University, 1983, pp. 105-112.

种排他性的意识，不符合奥斯曼帝国多元和包容的特质。他指出，假如奥斯曼人的行为真的受到某种“加齐理念”驱使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吸收拜占庭人进入体制，也不会与同样是穆斯林的突厥蛮人作战，更不会允许伊斯兰教异端和萨满信仰的存在。

林德内尔提出的部落主义学说（亦称“游牧理论”）影响颇深，甚至一度有取代魏特克“加齐理论”的态势。^①不过，有学者质疑，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这一股反“加齐理论”的思潮，或许跟那一代美国历史学家参加过越战的经历有关。换句话说，林德内尔那一辈学者将现实关怀投射到了历史解释之中，他们拒绝接受“为了理想而战”或“弘扬某种‘优越’价值观”的战争动员令。^②“加齐理论”恰好就是穆斯林为了弘扬伊斯兰教的优越性，去征服异域的圣战宣言。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在1995年出版的《两个世界之间：奥斯曼国家的建构》一书中，逐条反驳了林德内尔对魏特克的质疑。他的主要论据是，早期奥斯曼人所信奉的并非一种正统的伊斯兰教，他们没有必要严守各种教条。^③卡法达尔的正面辩护，让魏特克的“加齐理论”再次回到了舆论的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奥斯曼起源的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希斯·罗瑞（Heath Lowry）。他在2003年出版的《早期奥斯曼国家的本质》一书中指出，魏特克对布尔萨清真寺的铭文释读有误。他通过对布尔萨清真寺碑铭的实地勘察，发现奥尔汗的头衔中开头的“苏

① 林德内尔在2007年的《奥斯曼前史探微》一书中，重新梳理了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但并没有提出超出他“游牧理论”的观点。Rudi Paul Lindner, *Exploration in Ottoman Pre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②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49-50.

③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pp. 51-55.

丹”并不见于石碑，是魏特克附会的。^①对奥斯曼人兴起的原因，罗瑞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种新解释。他认为穆斯林男性与拜占庭女性的通婚，在奥斯曼早期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通婚的后裔——“混血蛮人”（*mixobarbaroi*）或自愿、或被强迫地融入了奥斯曼人的政体。我们暂且把这一说法称为“通婚理论”。

我们认为，上述诸家的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奥斯曼家族兴起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土耳其的奥斯曼史权威学者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曾指出，奥斯曼人的兴起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始于突厥蛮游牧人群向拜占庭沿海平原的不断迁徙；二、在“加齐”率领下一些小型掠夺组织让这一进程加速；三、不少有成就的领袖能够聚拢当地的豪帅去征服和建立行省，使这一历史进程得以继续；四、随着“加齐”式贝伊（*ghazi-beyliks*）的加入，为了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他们征服了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②不难发现，伊纳尔哲克实际上是综合了各家的说法。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土耳其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除了用历时性的视角观察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学界在奥斯曼起源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关怀，即家族、种族和民族。奥斯曼人对自己起源叙事的建构，是为奥斯曼统治者苏丹家族的合法性服务的，属于“家族”的层面。西方学者所追问的，作为穆斯林的奥斯曼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建立庞大帝国，抑或是在拜占庭基督教文化的贡献下才完成的，属于“种族”话语的层面。奥斯曼帝国晚期对于土

① Heath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35-37.

② Halil İnalcik, "The question of the em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2, 1980, pp. 74-75.

耳其人起源的重新建构，以及为操突厥语人群塑造集体认同感的努力，则是在现代民族主义语境中发生的，属于“民族”话语的层面。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文学界，还没有对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作一个贯通的梳理。本章的宗旨，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身份认同作一番历时性考察，揭示出奥斯曼帝国身份认同的阶段性。我们将整个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从建国初期到穆拉德二世是第一阶段；从穆罕默德二世到苏莱曼大帝形成了奥斯曼治世的话语，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统称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马哈茂德二世到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①

第二节 帝国早期的认同危机与穆拉德二世的历史编纂

有关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的史料，几乎都是15世纪以后编纂的。有学者认为这些史料过于政治化，为奥斯曼王朝合法性提供依据的意图较为明显，所以它们只能用于确定奥斯曼人希望这个帝国的起源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事实上是什么样子。^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史书的编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5世纪奥斯曼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和身份认同。就目前所知，奥斯曼官修史书的传统，始于穆拉德二世。他的在位时间是1421—1444年和1446—1451年，中途短暂退位，由其子穆罕默德二世执政。穆拉德二世继位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界

① “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是一对互相纠缠的概念，很多时候历史行为体利用起源叙事来界定身份认同，所以此处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

② Colin Imber, “Canon and apocrypha in early Ottoman history”, in Colin Heywood and Colin Imber ed., *Studies in Ottoman History in Honor of Professor V. L. Ménage*, Istanbul, 1994, pp. 117-137.

兴起了一股编书的风气，既有纂修，也有译介，其中大部分属于资政类书籍。^①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唯一的一部奥斯曼官修史书是雅兹吉奥卢·阿里（Yazıcıoğlu Ali，又称 Yazıcızâde Ali）的《塞尔柱史》（*Tevârih-i Âl-i Selçuk*）。^②

关于雅兹吉奥卢·阿里，我们所知甚少。从名字推测，他可能是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的一名宫廷文职人员，因为“雅兹吉奥卢”（*yazıcıoğlu*）的字面意思是“书记员的儿子”。^③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取材于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中的“乌古斯史”；第二部分取材于1226年本达里（al-Bundari）撰写的有关伊拉克和伊朗的“塞尔柱帝国史”；第三部分主要是译自伊本·毗毗（Ibn Bibi）于1280—1281年编纂的“塞尔柱罗姆国史”，还包括部分有关凯库巴德一世（Keyqubad I）和奥斯曼人的历史；最后一部分是蒙古伊利汗国合赞汗（Gazan Khan）去世之后安纳托利亚的概况。^④当然，雅兹吉奥卢不是单纯的翻译，他还增补了许多有利于巩固奥斯曼家族合法性的内容。

现代学者对雅兹吉奥卢·阿里《塞尔柱史》的研究，始于荷兰东方学家侯茨玛（M. Th. Houtsma）。他于1902年出版了保存在雅兹吉奥卢·阿里《塞尔柱史》内的伊本·毗毗的“塞尔柱罗姆国史”，用

① Ali Anooshahr,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Routledge, 2009, p. 142.

② Murat Cem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and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16, p. 68.

③ Paul Wittek, “Yazıcıoğ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1952, p. 646. 按：在奥斯曼土耳其语中，*yazıcı*意思是“书记员”，*oğlu*意思是“儿子”，所以 *Yazıcıoğlu* 的意思就是“书记员的儿子”，而 *zâde* 则是表示“儿子”的波斯语词。

④ Paul Wittek, “Yazıcıoğ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pp. 642-644.

印刷体奥斯曼文排版，没有拉丁文的转写和翻译。^①奥地利东方学家赫伯特·杜达（Herbert W. Duda）于1959年将这部分内容译成了德语。^②雅兹吉奥卢在书中三处颂扬穆拉德二世，说明此书受到了穆拉德二世的资助。根据保罗·魏特克的研究，《塞尔柱史》修成于伊历840年（公元1436—1437年）。^③

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现存9部抄本，其中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藏编号为1391的本子是善本。托普卡帕宫另藏有三部抄本，编号分别是1390、1392和1393。伊斯坦布尔还有两部抄本，分别收藏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稀有文献图书馆（编号T9291）和国立图书馆（编号为332）。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语言、历史与地理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塞尔柱史》，编号为1727。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抄本，编号为Ms. Or. Quart. 1823，已经可以网上浏览。^④巴黎国立图书馆也藏有一部抄本，编号Supp. Turc. 737，也已经数位化。^⑤土耳其学者阿卜杜拉·巴克（Abdullah Bakır）2009年将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校勘出版，用现代土耳其字母转写。^⑥

从雅兹吉奥卢《塞尔柱史》的编排体例可以看出，他试图在乌古斯人、塞尔柱帝国、塞尔柱罗姆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连续性。雅兹吉奥卢把奥斯曼人的世系追溯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

① M. Th. Houtsma, *Histoire des Seldjoucides d'Asie Mineure d'après Ibn Bibi, Texte turc*, Leiden, 1902.

② Herbert W. Duda, *Die Seldschukengeschichte des Ibn Bibi*, Kopenhagen, Munksgaard 1959.

③ Paul Wittek, "Das Datum von Yazıcıoğlu's Oğuznâme", *Türkiyat Mecmuası*, vol. 14, İstanbul, 1965, p. 265.

④ http://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74633155X&PHYSID=PHYS_0001&DMDID. 2019年4月18日访问。

⑤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15013h>. 2019年4月18日访问。

⑥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人，乃至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长子昆汗的长子——凯伊。^①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几任埃米尔几乎没有信史可循，只有一些神话传说，以至于穆拉德二世不得不组织人员编写奥斯曼国史，来构建一套适应时代需要的官方叙事。雅兹吉奥卢的《塞尔柱史》几乎是从不同史料中拼凑和剪裁而来，这恰好印证了奥斯曼自身史料的匮乏。不管奥斯曼人此时是否已经把主要精力从“建设国家”转移到“叙述国家”上来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 15 世纪中叶，奥斯曼人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叙事。^②

我们不禁要问：戎马一生的穆拉德二世，为何突然做出了前辈们都未曾做过的事情——着手编纂奥斯曼家族的历史了呢？这是因为穆拉德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不仅从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擒获及其所引发的政治停摆中恢复了元气，而且奥斯曼与安纳托利亚其他突厥蛮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③ 无论是从对疆域的控制力度，还是从制度建设的程度来看，穆拉德二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体了。^④ 这个时候，奥斯曼人自然也就有必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以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我们要知道，奥斯曼人的出身曾经是蒙古人和突厥蛮人讥讽的对象。帖木儿在给巴耶济德一世的信中说：“世人皆知你的起源是一名突厥蛮的水手，如果你不降下你那鲁莽的帆，并在真诚的港湾抛

①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p. 23.

② Murat Cem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and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pp. 68-69.

③ 内战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和身份。关于 1402—1413 年奥斯曼内战的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见 Dimitris Kastritsis, *The Sons of Bayezid*, Leiden: Brill, 2007.

④ Daniel Goffman,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0.

下忏悔的锚，你一定会遭受沉船之灾的。”^①帖木儿用的这个譬喻（即用帆船抛锚来讽喻政治人物要懂得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是一种常见的修辞，但是用在奥斯曼人身上却显得格外贴切，因为奥斯曼人的祖先正是一名水手。安纳托利亚的乌古斯可汗第五子塔赫汗（Dağ Khan）长子撒鲁尔（Salur）后裔卡迪·布尔汗·阿尔丁（Kadi Burhan al-Dīn）曾经讥讽巴耶济德一世说：“你的起源是一名突厥蛮的水手（*kayıkçı*），这是世人皆知的。”^②奥斯曼人之所以被讥讽为“水手”，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凯伊”*Kayı*和“水手”*kayık*谐音，所以被污名化了。

帖木儿和卡迪·布尔汗·阿尔丁对奥斯曼人的污名化，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奥斯曼人追溯到乌古斯可汗长孙凯伊的认同，在巴耶济德一世在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在穆拉德二世时通过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被正式钦定为官方叙事。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奥斯曼世系，即把奥斯曼人的祖先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第四子——贵克汗（Gök Khan），而不是长子昆汗。这两套叙事几乎是并行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奥斯曼帝国的史家。雅兹吉奥卢·阿里在《塞尔柱史》中选择了前者，也就是把奥斯曼人的世系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长子昆汗、长孙凯伊，可视为他刻意抬高奥斯曼人地位的努力，当然更多的是反映了苏丹穆拉德二世本人的意志。^③

在穆拉德二世修史的同时期，与奥斯曼存在竞争关系的安纳托

① Cherefeddin Ali, *The History of Timur-Bec, Known by the Name of Tamerlain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1723, vol. 2, p. 148

② Halil İnalcık, *Kuruluş Dönemi Osmanlı Sultanları (1302-1481)*, İslam Araştırmaları Merkezi, 2010, p.18.

③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p. 40-41.

利亚和阿塞拜疆的伊斯兰政权，也都开始从类似的突厥语史料中摘录并编纂各自的世系。穆拉德二世钦定奥斯曼源于乌古斯可汗长孙凯伊的叙事，旨在说明奥斯曼苏丹的出身要比邻近的突厥蛮君主更高贵。^①例如，嘲笑过奥斯曼人出身的卡迪·布尔汗·阿尔丁，是乌古斯可汗第五子塔赫汗（Dağ Khan）的后裔。那么，作为长子长孙的奥斯曼，地位当然比阿尔丁要高。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因为此时奥斯曼人与其他突厥蛮政权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435年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Shah-Rukh）给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蛮诸君主赠送了象征着权力的锦缎，要求他们穿戴，以显示对沙哈鲁权威的承认。不过，穆拉德二世拒绝穿戴，而且还铸造了带有凯伊和自己名号的钱币，公然挑衅帖木儿政权的权威。^②雅兹吉奥卢在《塞尔柱史》中特别强调，穆拉德苏丹是苏丹中的苏丹，他的起源比其他乌古斯家族的汗都要更高贵，也比成吉思汗的世系要高贵。^③帖木儿的世系，据说可以追溯到和成吉思汗共同的一位祖先图曼艾汗（Tumanay Khan）。^④17世纪成书的《突厥世系》把图曼艾汗（汉译“屯必乃汗”）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次子艾汗（Ay Khan）。^⑤这样的话，作为乌古斯

①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23.

②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p. 42. 汉译本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48—49页。

③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p. 23. Paul Wittek, "Yazıcıoğ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1952, p. 647, n. 33.

④ Ron Sela, *The Legendary Biographies of Tamerlane: Islam and Heroic Apocrypha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6-27.

⑤ 阿布尔哈齐·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69—71页。

可汗长子后裔的奥斯曼苏丹，确实比作为乌古斯可汗次子后裔的帖木儿的地位要高。联系上文帖木儿和撒鲁尔突厥蛮对奥斯曼人出身的讥讽，即便“凯伊”这个词有被敌对阵营故意曲解的风险，穆拉德二世还是毅然选择了这一叙事。一方面说明，奥斯曼人力图用世系尊卑来重新导向自身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另一方面说明，奥斯曼人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无视言语上的戏谑。

除了雅兹吉奥卢的《塞尔柱史》以外，完成于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巴塔尔传》(*Battalname*)，作者佚名。我们说雅兹吉奥卢的《塞尔柱史》是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部奥斯曼帝国官修史书，更多的是从现代史学的眼光去审视的，但诸如《巴塔尔传》这类具有神启色彩的作品，在穆拉德二世和当时的宫廷史家眼中其实就是“历史”。所以，我们把《巴塔尔传》也纳入广义的穆拉德二世修史背景中讨论。

《巴塔尔传》讲述了“加齐”巴塔尔的英勇事迹，全书用奥斯曼土耳其语书写，现存若干抄本，年代最早的是1436—1437年的本子。巴塔尔故事的原型，最早能在12世纪的阿拉伯语文献中找到，因此不少学者推测土耳其语版本的《巴塔尔传》可能在12或13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最早版本来自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可以视作是他为了塑造理想的“加齐君主”形象而特别授意编纂的。另外，文献内部的多处错漏，表明《巴塔尔传》跟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一样，也不是原创，而是从别处删节、裁剪而来。^①

穆拉德二世继位后之所以启动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小亚细亚史料编译成土耳其语的修史工程，一方面是为了确定奥斯曼人起源的官

① Ali Anooshar,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pp. 143-144.

方叙事，从而构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描绘一幅理想的“加齐”形象，以便自己去模仿，甚至成为加齐苏丹。^①据说穆拉德二世在瓦尔纳战役（Battle of Varna）中眼见匈牙利人占了上风，于是他便模仿传说中的哈里发加齐，下马向真主祈祷，结果奥斯曼军队神奇地取得了优势并赢得了战争。与传说中的哈里发一样，穆拉德二世也在瓦尔纳战役中向士兵们说：“我们当中杀敌的人将变成加齐。我们当中战死的人将变成烈士。”此外，为了打造一种公平、公正的加齐君主入设，他在攻下塞萨洛尼卡之后，让士兵们保持克制，避免大规模的掠夺发生。穆拉德二世在经历众多的战役和胜利之后，也被冠以“苏丹穆拉德加齐”的称号。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他赢得了伊斯兰世界广大穆斯林的支持，例如马穆鲁克人和印度的莫卧儿人。^②在穆拉德二世去世后一年，有一部佚名的《加齐穆拉德苏丹传》（*Gazavat-i Sultan Murad*）问世，正是对他恰如其分的盖棺论定。^③

综上，以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将奥斯曼人的起源追溯至中亚的乌古斯可汗，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人在面对安纳托利亚其他突厥蛮公国乃至中亚帖木儿政权时出现的合法性焦虑。苏丹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兴修史书的另一个动机，则是将自己塑造成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形象——加齐。以上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君主身份认同的早期特点。自穆拉德二世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起，奥斯曼的身份认同和历史书写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① Ali Anooshahr,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 143.

②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2007, pp. 39 ff.

③ Halil İnalcık and Mevlud Oğuz ed., *Gazavât-ı Sultân Murâd b. Mehemmed Hân: İzladî ve Varna Savaşları (1443-1444) Üzerinde Anonim Gazavatname*, Ankara, 1978.

第三节 “奥斯曼治世”下的多元认同

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下半叶，具体而言就是从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1451—1481年在位）攻陷君士坦丁堡到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去世的这段时间，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张，所以被称为奥斯曼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也有学者们称之为“奥斯曼治世”（Pax Ottomanica）。在统治阶层的身份认同方面，亦出现了与前一历史阶段不同的迹象。奥斯曼治世下的君主身份认同，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期间初具雏形，经过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的发展，到苏莱曼一世的时代正式定型。奥斯曼黄金时代所塑造的帝国身份认同，具有包容、普世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奥斯曼苏丹不再纠缠于具有安纳托利亚或中亚渊源的“突厥”或“突厥蛮”之类标签，而是更乐于接受“凯撒”“皇帝”这类普世性的帝王称号。这一点与该时期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且宗教、族群、文化多元的国情有关。

奥斯曼政权虽然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但其早期的领土扩张，却是从位于欧洲的鲁米利亚（即巴尔干半岛）开始。^①在军事行动中，奥斯曼军队往往需要兼顾欧亚两端。巴耶济德一世正是因为常年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两个战场之间奔波，才被冠以“雷霆”的绰号。横亘在两片疆域之间的，是拜占庭的帝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霸业而言，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巴耶济德一世曾用八年时间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在其牢固的城墙面前显得力

^① 甚至有学者主张，奥斯曼帝国是以巴尔干半岛大国的身份成长起来，并非发源于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以安纳托利亚为据点建立起来的帝国。（日）林佳世子著，钟放译：《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不从心。穆拉德二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二世，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征服者”的美誉。穆罕默德二世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并从改造城市景观入手，使其更具伊斯兰文化特征。除了在城内修建清真寺建筑群以外，穆罕默德二世还兴建了托普卡帕宫，并以此作为帝国运行的行政中心。

奥斯曼统治阶层在异教传统深厚的都城定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帝国亦称“东罗马帝国”，故该城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罗马帝国的文脉。换句话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味着他们入主了罗马人的疆域。穆罕默德二世在官方文书中，称他的国家是继罗马（即拜占庭）之后崛起的帝国，并称自己是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合法性的帝王。^① 日本学者林佳世子认为，穆罕默德二世作为安纳托利亚“当地”的君主，他继承了异教徒亚历山大大帝和具有基督教身份的罗马皇帝的帝位。^②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向世人昭示他僭据“凯撒”之位的合法性，竟然宣称奥斯曼苏丹是拜占庭皇室科穆宁家族（Comnenus/ Komnenos）的后裔。^③ 据称，在拜占庭皇帝与苏丹阿拉丁交战之际，得到一名来自西方的英勇骑士的应援。这名西方骑士以一臂之力奋勇作战，于是皇帝便命令他的一个名叫伊萨克（Issac）的侄子下马，把马让给西方骑士。伊萨克自觉受到了羞辱，便负气叛逃到敌对苏丹的阵营内，并改头换面成为一名穆斯林。作为回报，苏丹将女儿许配给伊萨克，并将一些不动产和村落赏赐给他，其中就包括奥

① 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2.

② （日）林佳世子著，钟放译：《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第77页。

③ Herbert A.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p. 265, n. 2.

托曼兹齐 (Ottomanzich)。穆罕默德二世据此声称，后来的奥斯曼人就是来源于科穆宁家族的伊萨克，具有拜占庭皇室血统。^①

穆罕默德二世绍续罗马皇帝合法性的意图，在他围攻君士坦丁堡前期所做的舆论铺垫中便可见一斑。在攻城之际，他曾致信教皇尼古拉五世，说奥斯曼人与法兰克人是兄弟，希腊人则是两者共同的敌人，他要做的事情是替曾经的特洛伊人复仇，所以同为特洛伊子嗣的西欧人应该帮忙。^②据说，穆罕默德二世在参观特洛伊古迹时，特意询问了有关阿基琉斯的事迹。听罢，他摇了摇头说：“是希腊人、马其顿人、帖撒罗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蹂躏了这片土地，由于我的功业，他们的子孙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来偿还我们亚细亚人在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所经常遭受的不公，虽然这种惩罚来得晚了些。”^③穆罕默德二世在这里显然把自己定位成千古一帝，代表整个亚细亚，通过特洛伊和突厥人共源的古老传说进行着政治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穆罕默德二世对西方古典时代英雄人物的兴趣，主要见载于基督教史料，属于“他者”视角的观察。换句话说，这或许是穆罕默德二世对外展现的姿态，或者说反映了基督徒对他的

① Theodore Spandounes, *On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Emperors*, trans. Donald M. Nic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 奥斯曼苏丹起源于科穆宁家族的故事，极可能是后世虚构的。但是，拜占庭皇帝科穆宁家族的阿历克塞一世有一个儿子叫伊萨克·科穆宁 (Isaac Komnenos)，伊萨克的儿子叫约翰·策莱佩斯·科穆宁 (John Tzelepes Komnenos)，约翰后来叛逃到罗姆苏丹国的都城科尼亚，获得了苏丹梅苏德一世的接纳，并得以与苏丹的女儿成婚。K. Varzos, *The Genealogy of the Komnenoi*, Kentron Byzantinon Ereynon, 1984. Konstantinos Moustakas: "The myth of the Byzantine origins of the Osmanlis: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in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015 (39/1): 85-97.

② Terence Spencer, "Turks and Trojans in the Renaissance", i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47, 1952, pp. 330-331.

③ Kritovoulos,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195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81-182.

期待。与基督教史料中穆罕默德二世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语史料则将他塑造成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现代土耳其史家也认为他是一位拥有宗教热情的穆斯林英雄，所谓对罗马的攀附只不过是基督教史家的浪漫化想象。穆罕默德二世虽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但是仍面临着安纳托利亚诸多突厥蛮势力的威胁。因此，他的身份认同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力图将自己定位成罗马凯撒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他需要从观念上与同时代具有竞争性的突厥语政权区别开来，以期巩固自身的合法性。

穆罕默德二世执政后期的主要精力是对付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蛮势力，即白羊王朝和卡拉曼人。白羊王朝在传奇人物乌宗·哈桑（Uzun Hasan）的率领下，于1467年兼并了黑羊王朝的领土。此后，乌宗·哈桑更是把阿塞拜疆、伊拉克、法尔斯和基尔曼，甚至帖木儿帝国的核心地带都纳入了统治范围之内。此举彻底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权力平衡，让他从一个部落首领跃升为一个令奥斯曼政权敬畏的强劲对手。^①声名日隆的乌宗·哈桑于1472年入侵马穆鲁克统治的叙利亚，于是穆罕默德二世瞄准时机，攻其不备。结果奥斯曼人不仅打败了乌宗·哈桑的部队，而且使得穆罕默德二世的声望在穆斯林世界得到了提升。1474年，奥斯曼人趁着大好形势一举吞并了卡拉曼政权。白羊王朝则随着乌宗·哈桑在1478年的去世，逐渐走向了衰落，最终于1502年灭亡，被萨法维王朝所取代。^②在此历史背景下，我们发现15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书写大致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①（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73页。

② 有关白羊王朝和乌宗·哈桑的权威研究，参见 John Woods, *The Aqquyunlu: Clan, Confederation, Empir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第一阶段的历史书写中，史家对奥斯曼的突厥或突厥蛮起源较为谨慎，甚至出现了两种矛盾的态度。一种是以舒克如拉赫（Şükrullah）（1388—1464年）的《历史的愉悦》（*Bahçetü'ttevarih*）为代表，成书于15世纪60年代。在一个突厥语比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地位低下的时代，舒克如拉赫采用波斯语书写，意在强调奥斯曼统治集团的高贵地位，并刻意与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划清界限。另一种是以恩维里（Enveri，生卒年不详）的《法书》（*Düsturname*）为代表，亦成书于15世纪60年代。恩维里采用奥斯曼土耳其语书写，是从安纳托利亚的视角出发，代表了民间的声音。^①他把奥斯曼人理解成“突厥”和“突厥蛮”，认为他们与塞尔柱人的联系是通过母系一支建立起来的。上述两种态度分别代表了当时人对奥斯曼人身份认同的两种不同看法，前者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后者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第二阶段的历史书写，以内什利（Neşri）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撰写的《世界志》（*Cihannüma*）为代表，该书修成于1487—1492年。^②内什利的卡拉曼人出身，注定了他是一个同情突厥传统的人物。他将突厥人的遗产视为奥斯曼身份认同的一个基石，并从语义学的角度对“突厥蛮”一词进行了诠释，为奥斯曼的合法性辩护。内什利将“突厥蛮”分解成两个字，分别是“突厥”（*türk*）和“伊蛮”（*iman*“信

① Murat C.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16, p. 70; Murat C. Mengüç, “Histories of Bayezid I, historians of Bayezid II: Rethinking late fifteenth-century Ottoman historiography”,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13 (76/3), pp. 373-389.

② 内什利《世界志》的德译本：Ğihānnümā: die altosmanische Chronik des Mevlānā Mehmed Neşrī, Franz Taeschner ed., Leipzig: Harrassowitz, 1950；土耳其语本见 *Kitāb-i cihannümā*, F. R. Unat & M. A. Köymen ed., Ankara, 1957。有关内什利及其作品的最早研究，参见 Victor L. Ménage, *Neshr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仰”)，并说“突厥蛮”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最早一批突厥人。根据他的说法，突厥蛮人最早来自于伊斯兰教和突厥遗产的融合。“突厥”是在城市定居的、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他们的起源是“突厥蛮”——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者。游牧是比定居更早的生计方式，所以也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内什利在奥斯曼人镇压并铲除安纳托利亚突厥蛮人的时间节点上，试图厘清“突厥”与“突厥蛮”的关系，就显得颇为意味深长。^①

我们发现，穆罕默德二世执政前期的官方史家在写作中避免使用“突厥”一词，甚至只在具有贬义的语境中才使用“突厥”或“突厥蛮”，尤其是在指代那些与奥斯曼当局对抗的地方势力。那种承认奥斯曼具有突厥或突厥蛮起源的叙事，只是代表了民间的、底层的观点。但到了后期，尤其是巴耶济德二世执政的早期，奥斯曼史家们不再避讳使用“突厥”和“突厥蛮”这两个词，反而试图去消除二者与“奥斯曼”在指称上的差异。因为穆罕默德二世打击了地方突厥蛮势力，结束了中央与地方对抗的局面，所以那套奥斯曼与突厥或突厥蛮截然对立的话语便过时了。奥斯曼政治精英在身份认同上的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穆罕默德二世执政晚期和巴耶济德二世执政（1485—1512年在位）早期。^②

巴耶济德二世在惊骇的手足相残中登上大位，故其一生都在担忧兄弟杰姆王子会返回伊斯坦布尔夺权的阴影下度过。这种焦灼的心理状态，注定了他在开疆拓土方面没有多大作为。他的儿子塞里姆一世

① Murat C.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pp. 66-78, esp. p. 74.

② Murat C. Mengüç, *A Study of 15th Century Ottoma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pp. 110-112.

(1512—1520 年在位) 继位后，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东方的萨法维王朝。鉴于此，塞里姆一世的征讨活动聚焦于伊斯兰世界。值得称道的是，他于 1517 年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以开罗作为行政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拥有象征着伊斯兰世界统治合法性的“哈里发”头衔，因为他们在 1260 年从巴格达将阿巴斯的后裔带到了开罗。马穆鲁克王朝末代哈里发穆塔基勒流亡伊斯坦布尔，从此“哈里发”的称号在理论上转移到了奥斯曼苏丹的头上——即便塞里姆一世并没有宣称他将行使“哈里发”的权力。^①

苏莱曼一世（1520—1566 年在位）继位后，帝国的军事征讨再次转移到西线。他先后征服了贝尔格莱德、罗德岛，并与哈布斯堡王朝角逐匈牙利的领土，甚至兵临维也纳城下，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张。随着征服行动在基督教世界的持续推进，苏莱曼的自我定位也越来越膨胀。1530 年，查理五世被教皇克莱蒙七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举动在苏莱曼的眼中，是一种竞争，甚至是挑衅。我们知道，自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来，奥斯曼苏丹就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于是，奥斯曼的易卜拉欣帕夏委托威尼斯方面为苏丹制作一顶头饰，上面堆叠着四个皇冠，顶部饰有羽毛。这顶皇冠的外形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皇冠神似，但是要比后者多出一两层。这件被赋予特殊含义的皇冠，被苏莱曼大帝在民众和外国使节面前展示，以此来彰显他的抱负。^② 一幅 16 世纪中叶的威尼斯木刻

① 哈里发的权柄在塞里姆一世征服开罗之后就转移给他的说法，是 18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中文版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 124 页。

② Gülru Necipoğlu, “Süleymâ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Ottoman-Habsburg-Papal Rivalry”, in H. İnalcık and C. Kafadar eds., *Süleymâ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pp. 163ff.

画显示，苏莱曼大帝甚至头戴七重冠。^①

苏莱曼的夸耀举动，似乎在哈布斯堡的使团面前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不过，随着奥斯曼从哈布斯堡手中夺走匈牙利的多半疆域，苏莱曼的存在逐渐在神圣罗马帝国被感受到。1547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五年的合约，旨在确认双方在匈牙利的领土归属。对于苏莱曼大帝来说，此份协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合约的文本中不再把查理五世称为“皇帝”，而是“西班牙的国王”，反而苏莱曼的头衔是“罗马的皇帝”或“凯撒”。^②

进入苏莱曼时代的鼎盛时期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苏丹的权威不再遭到挑衅，奥斯曼统治的合法性也不再受到质疑，所以关于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叙事就没有再宣传的必要了。在此议题上，也就不再有更新和发展。^③随着苏莱曼的去世，奥斯曼帝国从16—17世纪之交起陷入了危机。奥斯曼衰弱的主要表现是苏丹黯弱、派系当权和权贵统治，以及常年的战争拖垮帝国经济。奥斯曼帝国政界和知识界的舆论焦点，不再是奥斯曼人的起源，而是帝国政治资源的分配、官僚等级的合理安排，以及帝国政治制度（例如禁卫军制、蒂玛制）的建设和调适。奥斯曼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帝国内部非突厥语人群（例如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如何获得奥斯曼臣民的身份，并参与帝国的日常运作。

当时的学者卡蒂普·切莱比（Kâtip Çelebi, 1609—1657年）称，

①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中文版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326—327页之间的图版。

②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54.

③ 关于苏莱曼时期的历史书写，参见Kaya Şahin, *Empire and Power in the Reign of Süleyman: Narrating the Sixteenth-Century Ottom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帝国已经进入了衰朽之年。此外，在16世纪90年代写作的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Âli）和在17世纪30年代写作的佩切维（Peçevi）等人，也都警示了后苏莱曼时代的腐败滋长、法制衰退和治国无术。^①这种唱衰奥斯曼帝国的论调，在不少现代学者那里得到了共鸣，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死后一路走衰。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反思，奥斯曼帝国是否真的在17世纪进入了衰落期。或许这些根本不是衰落的表现，而只是在经历一系列的危机，结果是其中的多数危机最终都得以化解，并在实际中巩固了帝国的权力。^②当然，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却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了。

例如，当时的奥斯曼知识分子艾弗里亚·切莱比（Evliya Çelebi, 1611—1683年）在西欧旅行时，虽然开始对西方新鲜玩意儿表现出兴趣，但是内心仍然抱着一层优越感。但是到了18世纪赛克孜耶里姆·切莱比（Sekizyirmi Çelebi）^③1720年作为特使前往巴黎，以及他的儿子赛义德·艾芬迪（Said Efendi）1741年出使巴黎时，都表现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倾慕。^④奥斯曼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态度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奥斯曼帝国自17—18世纪以来开始落后于西方。

必须要说明的是，作为奥斯曼精英金字塔顶端的苏丹是一个特殊

① 16世纪苏莱曼大帝时期的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Âli），参见 Cornell H.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Historian Mustafa Âli (1541-16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学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盛衰之理在于制度设计的利弊和制度效用的长短。参见王三义：《帝国之治：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6页。

② Daniel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23-127.

③ 又称“二十八”切莱比，得名于他曾经服役的兵团番号。

④ 任禹行：《17世纪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欧洲观念分析——以艾弗里亚·切莱比〈旅行之书〉相关记载为中心》，上海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3章。

的角色，他们在奥斯曼治世下的自我定位，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一般的奥斯曼统治官僚和文化精英在身份认同上基本还是延续了15世纪后期以来的官方论调。总的来说，在15—18世纪的奥斯曼精英阶层的观念中，在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突厥语人群和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奥斯曼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历史编纂都是由文化精英留下的，反映的是他们的观念和立场。对于他们而言，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是自我身份建构中的“他者”。

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史家都在强调上述两种人群之间的差异。只有在少数必要的政治语境中，才会暗示二者的共同始祖来源。不过，对共同起源的追溯，绝不是以消除现实中的政治差序为前提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与“突厥”或“突厥蛮”之间身份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中政治地位的不平等。^①我们在第二章中引用了18世纪亚美尼亚裔外交家多桑关于奥斯曼人对“突厥”的鄙夷，以及他们忌讳西方人在他们面前提到“突厥”这个词的记载。^②

第四节 西化改革与帝国晚期的身份纠葛

随着与西方的交流不断深入，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影响到奥斯曼的知识分子。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很难在思想史谱系中找到清晰的坐标。例如，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塞里姆三世执政时期（1789—1807年在位），奥斯曼政府就开启了军事和财政

① 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书写中，“突厥”和“突厥蛮”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这一点，与中亚不同。关于中亚“突厥”与“突厥蛮”的关系，参考本书的第四章。

② 参见本书的第二章第五节。

制度的改革。^①但是，学者们一般都把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于1839年颁布《花厅御诏》的事件，也就是所谓“坦齐马特”运动的开始，作为奥斯曼西化改革的起点。不过，就奥斯曼人的身份认同而言，我们还是要选择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作为分期的节点。究其原因，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也提到，是英国学者亚瑟·戴维斯在此期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奥斯曼土耳其语语法。^②戴维斯的这部献给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作品的影响力远超语言学领域，更是深刻地扭转了奥斯曼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因为他在书中首次将奥斯曼人归入“突厥种族”的范畴。^③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过，近代西方突厥学的发展大致有两条线索可循。首先，前往中国的耶稣会士刘应在《鞑靼史》中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政体都视作“鞑靼”，并建构起一部连续的线性鞑靼史。后来，德金把汉文史料中的“突厥”与西欧文献中的 Turk 勘同。这是对近代西方 Turk 历史语义学的一次纵向延伸。其次，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是近代西欧 Turk 概念的内涵在横向上的一次延展。亚瑟·戴维斯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

① 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② Arthur L. Davids, *A Grammar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with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Turkish nations, a copious vocabulary, dialogues, a collection of extracts in prose and verse, and lithographed specimens of various ancient and modern manuscripts*, London, 1832, xxiv, xii.

③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p. 346;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64页。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90—92页。

下撰写的《土耳其语语法》。他在书中不仅把汉文史料中的匈奴、突厥、回鹘都归为“突厥种族”，并且在回鹘以后的哥疾宁、塞尔柱和奥斯曼之间建立起历史连续性。

欧洲 19 世纪突厥学的知识积淀，为泛突厥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养分。泛突厥主义思想能在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得益于匈牙利学者万伯里的积极奔走。此人在逗留土耳其期间，结识了不少当地的知识分子，且在日后与他们保持着联系。^①除了出版大量介绍中亚语言和民俗的普及性读物之外，万伯里还在 1864 年出版的《中亚旅行》和 1868 年出版的《中亚概览》中勾勒了一个想象的大突厥帝国，其疆域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包括安纳托利亚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等等。^②不过，从理论的高度正式将“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提炼出来，则是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开始的。克里米亚的知识分子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y, 1851—1914）于 1883 年创办《译者》（*Tercüman*）杂志，主张俄国的所有突厥语人群要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精神引领下团结起来，甚至提议要使用一种通用的“突厥语”。通过办杂志的方式，加斯普林斯基正式提出“泛突厥主义”理念，以此作为克里米亚操突厥语的鞑靼人反抗斯拉夫语人群压迫的一种理论武器。^③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救亡图存的话语生态中，与泛突厥主义同时存

①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46-347; 中译本见（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 364—365 页。

② Arminius Vámbé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864; Arminius Vámbéry, *Sketch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868.

③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1995, 2nd edition, pp. 2, 9-11.

在的，还有两种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即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的同情者强调，通过一个普世的帝国公民身份，可以将帝国内所有人群凝聚在一起。在坦齐马特改革期间，奥斯曼精英致力于塑造平等的公民身份，来维持帝国的统一。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有效统治境内不同宗教群体的方式是所谓的“米勒制”，即每个宗教团体内部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套以宗教区分人群的标准，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中显得愈来愈过时。^①主张进步和改革的“坦齐马特”运动力图改革米勒制，引入西方世俗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即无论何种宗教背景，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可是，坦齐马特的奥斯曼主义理念亦面临重重阻碍，一方面帝国内的穆斯林不愿意失去优越地位，另一方面非穆斯林（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在1877年“坦齐马特”运动失败以及1878年奥斯曼帝国失去巴尔干半岛的事实面前，奥斯曼主义的方案开始式微。^②

在奥斯曼主义行不通的时候，帝国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主张一种伊斯兰主义的话语，以期寻找一个共同的前提来凝聚帝国内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的理念，是近代以来穆斯林受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催生的一种反帝理论。^③以哲马拉丁·阿富汗尼（Jamal-al-din Al-Afghani）为代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希望从伊斯兰教中寻找良方，来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在坦齐马特改革期间，伊斯兰主义的观念得不到帝国精英的支持，虽然它不利于团结帝国内部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群，

① 咎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新史学》2002年第13卷，第189—224页。王三义：《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

② 奥斯曼在1877—1878年的战争中败给俄国，导致保加利亚独立，波黑被奥匈帝国吞并，黑山和塞尔维亚独立。

③ 1798年埃及被法国殖民，1857年印度被英国殖民。

但是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1876—1909）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哈米德二世利用他所拥有的“哈里发”头衔，企图团结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全体穆斯林。一旦将此作为理论武器延伸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就是“泛伊斯兰主义”。^① 哈米德二世的主张，却得不到帝国内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同情，所以不得不于1909年流亡海外。

在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泛突厥主义”作为最后一种选项正式走向政治舞台。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至深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组建“团结与进步党”来参与国家政治。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两种路线，分别以优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和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为代表。喀山鞑靼人优素福·阿克楚拉于1904年发表《三种政策》，提炼出奥斯曼帝国晚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三种选项分别是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他基本上继承了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观念，主张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与其他地方的突厥语人群（例如俄国境内的）应该联合起来。换句话说，阿克楚拉“泛突厥主义”主张的底色是民族性的。^②

格卡尔普也曾提出过所谓的“三种思潮”，即现代化、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对于他来说，一个国家不是某一种族的、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共同体，而是由一群享有共同语言、宗教、道德和美学的人群组成。在他看来，土耳其民族主义不是基于血缘或民族的纽带，

① Hasan Kösebalaban: "Ottoman Origins of Turkish Identity Discourse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25-46.

② Yusuf Akçura, "Üç Tarz-ı Siyaset", in *TURK*, Nos. 24-34, Cairo, 1904, reprinted in Istanbul, 1911.

甚至都不是基于公民的纽带，而是基于伊斯兰教的纽带。^①由此可见，“泛突厥主义”本质上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世俗版本。于是，“突厥”作为一个世俗化的标签，代替了“伊斯兰教”来发挥凝聚奥斯曼帝国内不同人群的功能。换言之，“突厥”一词几乎成了穆斯林的代名词。所以，格卡尔普路线的底色是宗教性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便退出了政治舞台。一起进入历史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三种不合时宜的帝国意识形态。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人在帝国的废墟上进行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1923年在瑞士签订的《洛桑条约》，划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疆域边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土耳其共和国，无疑是土耳其人与西方列强反复斗争的结果。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如果我们参照近代以来西欧知识谱系中对 Turk 的定义，即居住在小亚细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人群，那么无论是从疆域还是从宗教，抑或是从语言这三个核心指标来看，土耳其共和国都与欧洲人的构想一致。换句话说，不管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精英曾经对“突厥”这个名称有多么的嫌弃，最终还是被动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将其作为身份重塑的出发点。

小 结

本章历时性地探讨了奥斯曼帝国从早期到晚期的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指出了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政治内涵。

① Ziya Gökalp, *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translated from the Turkish and annotated by Robert Devereux, Brill, 1968, pp. 12-16. 曾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第19—25页。

奥斯曼帝国早期没有留下可信的史料，真正开始编纂史料是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此时的奥斯曼政治体经历了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羞辱的事件，以及安纳托利亚其他突厥语人群对奥斯曼人起源的嘲讽和合法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穆拉德二世时期的史家将奥斯曼苏丹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长子、长孙，以此来塑造奥斯曼政权的正统和优越性。到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将奥斯曼人追溯到乌古斯人群的叙事仍然存在，但已不再为官方所认可，只是代表了民间的观点。作为统治阶层金字塔尖的苏丹开始将自身定位成更加具有普世性的“皇帝”。这种定位经由塞里姆一世，延续到苏莱曼大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则构建了一套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奥斯曼认同与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突厥蛮认同之间的二元对立叙事。作为统治阶层的奥斯曼人，在文化上是高级的，推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突厥蛮人，在文化上是落后的，讲的突厥语。奥斯曼帝国晚期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三种可选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究竟选择何种理论武器作为救国的良方，取决于当政者的理念和具体的政治语境。从结果来看，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是以安纳托利亚为主，主要国民是穆斯林，操突厥语。不难发现，土耳其人在身份认同上现代化的结果，与西方自近代以来对“突厥”一词的定义一致。这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塑造历史上，观念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第四章 中亚“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辨析

1405年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以欧亚大陆为舞台的“世界征服者”时代的终结，此后的历史则聚焦于以葡萄牙为先锋的欧亚大陆西端的海洋国家。^①与以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为代表的这种对近代中亚历史的传统认知有所不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则呼吁从中亚的地理“中央性”出发，重新评估中亚对于全球史的重要性。^②无论如何，中亚自15世纪起开始与外界隔绝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7世纪欧洲战俘和旅行家踏足中亚（在欧洲地图上被标为“小鞑靼利亚”），它才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中。^③造成近代世界历史书写中“中亚”变成一个“黑洞”的根本原因，实则是原始史料的匮乏。甚至，相关历史著述被认为是由历史的胜利者怀着将其胜利合法化的目的而撰写的。^④17世纪希瓦汗国的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生前撰写了两部对于我们了解近

① [英] 约翰·达尔文著，陆伟芳、高芳英译：《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约翰·达尔文的全球史观并非仅聚焦于海洋，他认为到18世纪中期，以海洋为依托的欧洲帝国与大量其他帝国形成竞争关系。参考[德] S. 康拉德著，陈浩译：《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4页。

② [德]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袁剑译：《中亚的中央性》，《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11辑，第18、69页等。

③ 近代欧洲知识界对中亚的认知，参考本书第三章。

④ 关于“黑洞”的隐喻，参考[德]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袁剑译：《中亚的中央性》，第17页。

代早期中亚历史至关重要的史书，分别是《突厥蛮世系》(*Shajare-i Tarākime*)和《突厥世系》(*Shajare-i Turk*)。^①我们亟须弄清楚的是：为何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编撰了两部从题目到结构都十分相似的史书？书中的“突厥”和“突厥蛮”两个概念分别指代何种人群？这种概念上的区分又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节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生平考述

帖木儿去世之后，中亚地区陷入了其后裔混战的政治乱局。直到16世纪初成吉思汗直系后裔阿布海尔之孙——穆罕默德·昔班尼征服河中地，才彻底终结了帖木儿家族在中亚的统治。昔班家族统治下的乌兹别克人政权以布哈拉为中心，史书上一般称之为“布哈拉汗国”。16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同为昔班汗后裔的雅迪葛尔的孙子——伊勒巴尔汗，在花刺子模建立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布哈拉汗国的乌兹别克人政权，先是以玉龙杰赤为行政中心，后转移至希瓦，故史称“希瓦汗国”。^②

17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希瓦汗国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公元1603—1663年，自1643年起即位，以下简称“阿布尔哈齐”），在黯淡的近代中亚君王谱系中显得格外耀眼，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两部史书。从现代语言译本的数量可以看出来，相较于《突厥蛮世系》，学界对《突厥世系》显然要

① 《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的察合台文原文分别是：شجره ترک和شجره تراکمه。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汉译者序”，第1—4页；（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章、12章和13章。关于雅迪葛尔与阿布海尔的亲缘关系，参考《突厥世系》附录“世系表二：阿布尔哈齐家族”。

更加重视。但实际上,《突厥蛮世系》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与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匹配的。为了深入探讨两部作品的书写策略,有必要首先交代一下作者的生平及其著作的流传情况。

《突厥世系》中提到,阿布尔哈齐的生辰是兔年,伊斯兰教历1014年一月十五日(公元1605年7月);书末则提到他的卒年是伊斯兰教历1074年(1663年)。^①俄国考古学家尼古拉·维泽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指出,抄本上的这个年份有误,所谓“兔年”对应的伊斯兰教历并非1014年,而是1011—1012年,大致是公元1603—1604年。^②俄国突厥学家安德烈·科诺诺夫(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认为,阿布尔哈齐实际出生于公元1603年8月12日。^③德国蒙古学家施普乐(Bertold Spuler)在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阿布尔哈齐”词条中称,他出生于公元1603年8月24日,与科诺诺夫的推算稍异。^④

阿布尔哈齐受到后人的推崇,并非因为他的政治成就,而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了两部史书。其中,《突厥蛮世系》的撰修在前,大约定稿于公元1660年左右。《突厥蛮世系》书末提到,该书书写定于伊斯兰教历1071年,对应于公元1660—1661年之际。根据科诺诺夫的说法,阿布尔哈齐可能在伊斯兰教历1070—1071年之间才有时间和精力撰修《突厥蛮世系》,因为他于伊斯兰教历1069年和1072年分别有两场征伐。^⑤《伊斯兰百科全书》直接称该书撰修于伊

① 参考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5、317页。

②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Хивинском ханстве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7, p. 129.

③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Москва, 1958, p. 8.

④ B. Spuler,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H. A. R. Gibb et al.,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 I, Brill, 1986, p. 120.

⑤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0.

斯兰教历 1070 年，对应公元 1659 年。^①《突厥世系》迟至公元 1663 年才动笔，阿布尔哈齐本人于同年去世，遗稿由其子阿努沙·穆罕默德·把阿秃儿汗续修，于 1665 年定稿。^②由于近代中亚当地史料奇缺，所以这两本书几乎是我们了解 17 世纪中亚历史唯一可以依赖的原始文献。这两部史书也使得阿布尔哈齐在身为君王的光环以外，又多了一顶历史学家的桂冠。

第二节 《突厥世系》的流传和阅读史

阿布尔哈齐的史书能够进入欧洲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并被广为诵读，是一桩极为偶然的事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提到的那位瑞典战俘史托兰伯。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积极学习当地的语言并搜集文献资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新了近代欧洲知识界对中亚的认知。在此期间，史托兰伯在托博尔斯克偶然从一名布哈拉商人手中购得《突厥世系》的抄本一部。史托兰伯在一位懂俄语的布哈拉阿訇的帮助下，将察合台文的《突厥世系》经由俄语辗转译成了德语，但并未正式发表。^③

1726 年有人在莱顿出版了《突厥世系》的法译本，正式将阿布尔哈齐的作品介绍到欧洲学界。^④该译本扉页没有出现译者姓名，写

① B. Spuler,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p. 121.

② 阿布尔哈齐在《突厥世系》的序言中提到了在伊斯兰教历 1074 年开始撰写这部史书。书末提到此书完成于伊斯兰教历 1076 年（公元 1665 年）。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 3、317 页。

③ Philip J. v. Strahlenberg,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英译本：Philip J. v. Strahlenberg,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pp. 127-128.

④ D***, *Histoire généalogique des Tartars, Traduite Du Manuscrit Tartare D'abulgasi Bayadur Chan*, Leiden, 1726.

作 D***，学者一般认为译注者是本廷克（Bentinck），编辑是瓦赫内·德·蒙代斯（Varenne de Mondasse）。^①封面没有出版年份，学者们根据译者前言的落款日期 1726 年 3 月 26 日推测出版于 1726 年。根据史托兰伯本人的说法，法译本是从他的德译初稿转译而成的。^②这部法译本成为后来不少其他欧洲语种译本的底本。譬如，1730 年，由法文本转译而来的英译本，在伦敦面世。^③施普乐在《伊斯兰百科全书》“阿布尔哈齐”的词条中提到 1780 年有一部英译本，应该是 1730 年之误。

据《俄帝国科学院院史（1725—1743 年）》记载，早在 1734 年 2 月，俄帝国枢密院就决定让瓦西里·特列季科夫斯基（В.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м）从法译本转译《突厥世系》，但是这项工作因为要订正法译本中的错误而耽搁了许多时间。^④在此期间，在俄帝国科学院供职的德国东方学家格奥尔格·凯尔（Georg Jacob Kehr）于 18 世纪 30 年代把《突厥世系》直接从察合台文译成德文。凯尔的译本有不少错误，后经他人润色过一遍，可惜后者在许多地方是根据本廷克的法译本改动的。凯尔的德译本手稿保存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未能出版。^⑤

- ① Ch. M. V. Frähn, *Abulghasi Bahadür Chani Historia Mongolorum et Tatarorum*, Casani, 1825, III;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ъ*, А-АЛ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35, pp. 49-50.
- ② Philip J. v. Strahlenberg,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pp. 127-128.
- ③ Abu'l Ghâzi Bahâder, Khân of Khowârazm,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Moguls and Tatars, vulgarly called Tartars: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ies they inhabit*, London, 1730.
- ④ Герард Фридрих Миллер,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25-1743), 1890, p. 319.
- ⑤ 格奥尔格·凯尔的俄文名字是 Георг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Кер, 关于凯尔的德译本手稿的情况, 参考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德国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在《俄帝国科学院院史（1725—1743 年）》中专门有一段讲述了俄国枢密院拟翻译出版《突厥世系》的原委。Герард Фридрих Миллер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25-1743), T. 6, 1890, pp. 319-320.

科诺诺夫提到，圣彼得堡科学院还有另外一部《突厥世系》的未刊德译本。^①1768 年左右，俄国学者瓦西里·特列季科夫斯基从法译本转译的俄译本《突厥世系》出版。^②原书中没有出版年份，科诺诺夫称此书出版于 1770 年，但笔者查到不少图书馆书目中写作 1768 年。^③

德国东方学家梅塞施密特（Daniel G. Messerschmidt）于 1780 年在哥廷根出版《突厥世系》的德译本，译者名自署。^④施普乐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说，梅塞施密特的德译本就是史托兰伯的最初译本。^⑤这一说法，被科诺诺夫所沿袭。^⑥关于史托兰伯德译本原稿的下落，疑点重重。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博物馆下属的图书馆手抄本藏品中，有一条书目提到，拜耶尔（T. S. Bayer）旧藏的一部《突厥世系》德语译本，据说就是史托兰伯的最初译稿，是由瑞典军官伯恩哈德·穆勒（Bernhard Müller）转赠给拜耶尔的。拜耶尔是德国的著名汉学家，生前曾经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去世后他的私人藏书被遗孀贩卖，几经辗转，最终入藏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博物馆。该校图书馆早年的编目者曾怀疑此译本可能就是梅塞施密特 1780 年在哥廷根出版的德译本。^⑦最新的馆藏目录编纂者则认为，该稿与梅塞施密特

①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② В. Треднаковский, *Родословная история о татарахъ*, С.-Петербург, 1768.

③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科诺诺夫大概是受到 1825 年喀山刊本中拉丁语前言（见下文）中观念的影响。笔者所查书目，见 *Solanus: Bulletin of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Group of 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1978 June, No. 13, p. 9；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书目编号是 NLR01 010977882，目录提要中也是写作 1768 年。

④ D. G. Messerschmidt, *Abulgasi Bagadur Chan's Geschlechtbuch der mungalisch-mogulischen oder mogorischen Chanen*, Göttingen, 1780.

⑤ B. Spuler,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p. 121.

⑥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23.

⑦ J. Young & H. Aitken, *A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terian Museum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1908, pp. 246-247.

的德译本不同。^①新编目者还提到，拜耶尔藏品中还有一部由他本人借助于《突厥世系》德译本而译成的拉丁语本。^②

由于上述几位译者都没有察合台语文的知识，更何况经过了若干种语言的中转，所以早年的译本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译著。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影响到《突厥世系》在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传播，因为这是唯一一部来自里海以东的所谓“鞑靼”史家的作品，显得弥足珍贵。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对于启蒙晚期欧洲知识分子“鞑靼”认知的形塑和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鞑靼人的自我视角。^③譬如，启蒙时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从1776年开始，至1788年出齐，共6卷）就时常引用该书，而且认为“《突厥世系》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为我们增添了一份关于鞑靼人现状的有趣记录，尽管尚不完备”。^④

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学术界对《突厥世系》的关注度仍在持续，1838年英国学者迈尔斯（William Miles）出版了新的英译本。^⑤弗雷恩（Ch. M. V. Frähn）受到尼古拉·德·罗曼佐夫（Nicolai de Romanzoff）的资助，于1825年在喀山刊行了察合台语原文，并在用拉丁语撰写的前言中总结了《突厥世系》既有欧洲语言译本的不

① David Weston, *The Bayer Collection: A preliminary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and books of Professor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acquired and augmented by the Reverend Dr. Heinrich Walther Gerdes now preserved in the Hunter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18, p. 78.

② David Weston, *The Bayer Collection*, pp. 176-177.

③ Nathaniel Wolloch, *History and N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Praise of the Mastery of N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1, pp. 150-153.

④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David Womersley, 3 vols, Harmondsworth, 1994, “General Observations”, vol. 2, p. 512 note 6.

⑤ W. Miles, *The Shajrat ul Atrak or Genealogical Tree of the Turks and Tatars*, London, 1838.

足之处。^①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既有的《突厥世系》译本错误百出,必须要借助于1825年喀山出版的察合台文本才可。^②学识渊博的法国东方学家戴美桑(P. I. Desmaisons)于1871年和1874年在圣彼得堡分别推出了察合台文本和全新法文译本。^③戴美桑的校勘本是目前学界最为推崇的一部译本,罗贤佑的中译本便是从戴美桑的法译本转译的。^④此外,在喀山、塔什干和巴库还出版了几部现代语言的译本。^⑤

在戴美桑之前,欧洲出版的译本绝大多数都不是从手抄本直接译出,而是从其他现代语言译本转译的,所以学者并不重视各抄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1874年戴美桑的法译本,以圣彼得堡科学院所谓的“答赫勒(Dahl)抄本”为底本,参校了喀山本,以及哥廷根和柏林的抄本。^⑥戴美桑在给弗莱恩的通信——此信公开发表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上——中指出,柏林抄本脱漏严重,哥廷根抄

-
- ① Ch. M. V. Frähn, *Abulghasi Bahadür Chani Historia Mongolorum et Tatarorum*, Casani, 1825. 按: 罗曼佐夫, 俄语名 Николай П. Румянцев, 1754—1826 年, 曾担任沙俄帝国的外交大臣和枢密大臣。施普乐在《伊斯兰百科全书》的词条中提到, 弗雷恩于 1825 年在喀山出版了拉丁语译本, 但实际上只是用拉丁语撰写了前言, 并没有全书的译文。参考 B. Spuler, “Abu'l-Ghâzî Bahâdur Khâ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p. 121.
- 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entral-Asien: Allgemeine geologische Ansichten über Asien*, Berlin, 1844, p. 405.
- ③ Le Baron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St. Petersburg, Tom I. Texte, 1871;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 II. Traduction, 1874.
- ④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 罗贤佑译:《突厥世系》。
- ⑤ Nigora Allaeva, “The *Shajara-ye Turk*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Khiva and Its Neighbours”, in *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 vol. 7, 2014, p. 84.
- ⑥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 罗贤佑译:《突厥世系》, “法译本前言”, 第 15 页。按: 答赫勒, 全名弗拉基米尔·答赫勒(Wladimir I. Dal, 俄语名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Даль, 又译弗拉基米尔·达尔, 1801—1872), 是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字典编纂家, 出生于一个俄国的德裔家庭。他的姓氏本来写作 Dahl, 故也可译作“答赫勒”。

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①戴美桑在1874年的译本“前言”中提到，在他的校勘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圣彼得堡帝国图书馆彼得·莱尔赫（Peter Lerch）为他提供了一部从希瓦新购的《突厥世系》手抄本。虽然该抄本有脱漏，但仍不失为仅次于答赫勒抄本的善本。^②戴美桑还指出，圣彼得堡另有一部抄本，但是错误百出，没有利用的价值。^③

据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艾哈迈多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圣彼得堡实际共有6部《突厥世系》的抄本，但只有1部是完整的，乌兹别克科学院有5部抄本，2部完整。^④笔者查阅了柏林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数据库，找到了《突厥世系》抄本的电子版。^⑤法国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突厥世系》的抄本，系1824年由某位名为约翰·杰克（John Jack）的人购得，并在扉页上用英文写道“此书是阿布尔哈齐的鞑靼世系史”。^⑥此外，伦敦大英博物馆有几章《突厥世系》的节选抄本，编号是Add. 11,725, Foll. 70b-75b。^⑦

① Desmaisons, “Manuscrit de l'Arbre généalogique des Turks, par Aboul-Ghazi, envoyé à l'Académie par M. Dahl à Orenbourg, et analysé par M. Desmaisons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M. Fraehn (lu le 8 juin 1838)”, in *Bulletin Scientifique publié par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aint-Petersbourg*, Tome 4, 1858, Leipzig, pp. 229-234.

② Desmaisons,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e II. Traduction, 1874, “Préface”, III. 汉译本的“贝特尔·戴美桑法译本前言”有两段脱文，这段话未译。

③ 同上。

④ [乌兹别克斯坦]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94页。Б. А. Ахмедов,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XVI-XVIII вв.*, Ташкент, 1985, p. 73.

⑤ William Pertsch, *Verzeichniss der türkischen Handschriften*, (Die Handschriften-Verzeichniss der Königl. Bibliothek zu Berlin, VI), Berlin, 1889, pp. 228-230. 柏林抄本的电子版：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832940321&PHYSID=PHYS_0001&DMDID=。

⑥ E. Bloche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turcs*, Tome I, Paris, 1932, p. 232. 巴黎藏《突厥世系》抄本的地址：<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0823323/f1.image>。

⑦ Charles Rieu, *Catalogue of the Turkish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1888, London, p. 282.

相比之下,阿布尔哈齐的另一部史书——《突厥蛮世系》,无论是在知名度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远不及《突厥世系》。《突厥蛮世系》的手抄本,首先由俄国东方学家图曼斯基(А. Г. Туманский)刊行。^①关于《突厥蛮世系》写稿的版本和译本情况,笔者曾做过研究,不再赘述。^②为保证本章节内容的完整性,这里对《突厥蛮世系》的研究历史再略作申述。截至目前,有两部俄语译本和一部土耳其语译本,西欧语言的译本则全部阙如。^③其中,苏联突厥学家科诺诺夫的俄译本,是最为权威的校勘本。《突厥蛮世系》不仅尚未有中译本,甚至中国学术界对其都鲜有介绍。应当说,中国的西北民族史研究者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部17世纪中亚察合台文珍贵史书的重要性。

第三节 “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异同

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在不同译本中的标题可谓五花八门。譬如,最早的法译本题名作《鞑靼世系史》,1730年英译本题名作《突厥、蒙古和鞑靼通史(及其居地的描述)》,1768年特列季科夫斯基俄译本的名称与法译本同,梅塞施密特1780年德译本的题名作《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汗世系》,1825年喀山版拉丁文标题是《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的蒙古与鞑靼史》,1838年迈尔斯的英译本题为《突厥与鞑靼世系》,1874年戴美桑的法译本题目作《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与鞑靼史》。不难发现,它们都没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Туманский,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Асхабад, 1897.

② 陈浩:《〈乌古斯可汗传〉版本源流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13页。

③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Москва, 1958; Zuhai Kargı Ölmez, *Şecere-i Terākime*, Ankara, 1996, 2020.

有沿用阿布尔哈齐的原书名，反而都包含“鞑靼”，个别还含有“突厥”或“蒙古”的字眼。

把中亚民族统称为“鞑靼”，实际上是欧洲近世以来对中亚地理和民族认知有所局限的表现。^①《突厥世系》这部书标题翻译中的“走样”，反映了译者试图用本土知识分子熟悉的概念来介绍一部陌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西方学者对阿布尔哈齐的隔阂感，但也给西方以外的学者造成了困惑。例如，中译本序里提到，“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原书的书名即为《突厥世系》，戴美桑不知何故将其译本题名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与鞑靼史》”。^②这份困惑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汉文史料中，自上古时代起就存在一种不断更新和补充的北方民族叙事传统，“突厥”“鞑靼”“蒙古”“乌兹别克”等概念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晰的。

从源流上讲，阿布尔哈齐是蒙古人，可追溯至昔班、术赤和成吉思汗。昔班的封地“蓝帐汗国”位于咸海以北、西至乌拉尔河，在名义上隶属于其兄拔都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在乌兹别克汗（《元史》作“月即别”）在位期间（1313—1342年）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于是他的名讳被用作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统称，当然也包括昔班家族的成员。^③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瓦解之后，乌兹别克人纷纷南下河中地区。从昔班汗的六世孙阿布海尔开始，乌兹别克人便在中亚站稳了脚跟。^④阿布尔哈齐虽然不是阿布海尔的直系，但他也是昔班汗的后裔，属于乌兹别克人。在金帐汗国内，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贵族逐渐

① 详见本书第三章。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汉译者序”，第12页。

③ （美）丹尼斯·塞诺撰，邓永红译，陈浩校：《关于乌兹别克汗国的几条拉丁语史料》，《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3页。收入陈浩主编：《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19—332页。

④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汉译者序”，第2—3页。

在语言上突厥化。到了 17 世纪，乌兹别克人已经有一定的民族自觉了，譬如阿布尔哈齐意识到当时的突厥语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至深，所以他要尽量用纯正的察合台语去写作。^①17 世纪统治中亚的蒙古后裔不仅在语言上突厥化了，而且在认同上也自称“突厥”。这一点，从阿布尔哈齐的书名《突厥世系》就可以看出来。

在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中，“突厥”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认同，主要出现在叙述“蒙古”源流的相关章节中，而在叙述当代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时，他常用的是“乌兹别克”。由此可见，在以阿布尔哈齐为代表的 17 世纪中亚政治精英的观念中，“突厥”“蒙古”和“乌兹别克”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甚至是并行不悖的。“蒙古”与“突厥”的概念纠葛，早在阿布尔哈齐所依赖的重要史源之一——14 世纪初拉施特的《史集》中就已显端倪。譬如，拉施特说：“因为那时（古时），蒙古人是属于突厥诸部落的一个部落。”俄译校勘本提醒读者，“拉施特把起源极为不同的中央亚细亚的各种游牧部落，不仅说突厥语的，甚至连说蒙古语的、唐兀惕语和通古斯—满语的，都称为突厥。由此可见，我们这位史学家的突厥一词，并非民族学和语言学上的用语，而是一种社会习惯用语，即‘游牧人’的意思”。^②

阿布尔哈齐的另一部史书《突厥蛮世系》，因为只有俄语和土耳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 34 页。中亚操突厥语的人群面对在文化上更加强势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时的危机感，并非 17 世纪才出现的，早在 15 世纪的纳瓦依身上就已见端倪。他借鉴波斯文学的体裁和格律，结合察合台文作为一种突厥语的特性，丰富了察合台文的表现力。为察合台语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阿布尔哈齐更多地是从史学和现实政治的角度，发出要使用“纯正”突厥语的呼吁。我们说 17 世纪的乌兹别克人有了一定的民族自觉意识，当然不是现代意识上的“民族意识”，而是一种基于语言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149 页。

其语译本，且题名都沿用原名，所以不存在标题在翻译过程中“走样”的情况。假设 19 世纪就已经有此书的西欧语言译本的话，“突厥蛮”自然也会被称为“鞑靼”。然而，在 17 世纪中亚史家的观念中，“突厥蛮”显然是不同于“突厥”（即突厥化的蒙古人，或称“乌兹别克”）的一群人。阿布尔哈齐在他的书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他特意为这两个人群分别撰写了《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两部史书，就是明证。从历史上看，突厥蛮可追溯到乌古斯人，与乌兹别克人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为了更好地理解 17 世纪中亚历史书写中“突厥蛮”的族群内涵和历史渊源，我们有必要阐明其先祖乌古斯人的发展脉络。

关于“突厥蛮”的词源，阿布尔哈齐在《突厥蛮世系》中提供了一种解释。据说，最早在河中地区出没的突厥蛮人，被当地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称为“突厥人”。经过若干世代以后，这群人的下颌变小了，眼睛变大了，面部变小了，鼻子变大了。后来，塔吉克人把后期迁入的另一群突厥蛮人称作“突厥人”，而早期的那批在体质上发生了变化的突厥蛮人则获得了 *Türk-mānand* 的称号，意思是“像突厥的人”。久而久之，由于普通人觉得这个名称太过拗口，就索性把 *Türk-mānand* 简化为 *Türkmen*，亦即“突厥蛮”。^①

阿布尔哈齐在书中提到的“突厥蛮”意为“像突厥的人”的观点，也见于贝鲁尼、喀什噶里等早期穆斯林史家的论著，且被拉施特所沿袭。^② 不过，与 17 世纪的版本强调体质特征有所不同，早期史料

①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57.

② Mahmūd al-Kāshg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īwān Luyāt at-Turk)*, ed. & trans. Robert Dankoff & James Kelly, Part II,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 363;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140 页；贝鲁尼关于突厥蛮的记载，见下文。

中“突厥蛮”的身份更多地是以宗教信仰来界定的。贝鲁尼提到，乌古斯人群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那部分来到穆斯林的城市，被称为“突厥蛮”。^① 塞尔柱宫廷物理学家马卫集（Al-Marwazi）在《动物之自然属性》（*Tabi' alhayawan*）中指出，一些乌古斯人与穆斯林国家接触之后就皈依伊斯兰教了，于是被称为“突厥蛮”。^② 据此可知，“突厥蛮”早期指代的是乌古斯人中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群。现代突厥学家一般都认为，穆斯林史家对“突厥蛮”的民间词源学解释不足为信。例如，德国学者德福（G. Doerfer）认为，Türkmen 的词源没有那么复杂，就是 Türk 加一个增强语气的后缀 men。^③ 美国突厥史家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也持类似的观点。^④

有学者认为，可能早在公元 8—9 世纪就已经有“突厥蛮”一词了。例如，夏德推测，唐朝杜佑《通典》中提到的“特拘梦”就是“突厥蛮”的译法。^⑤ “突厥蛮”这个词开始出现在穆斯林文献中，是在公元 10 世纪下半叶。^⑥ 巴托尔德（W. Barthold）指出，到了蒙古人统治的时代，“突厥蛮”一词才压倒性地取代了“乌古斯”的

① Al-Bīrūnī, *كتّاب الجماهر في معرفة الجواهر/Kitāb al-jamāhir fi ma'rifat al-jawāhir*, S. Krenkow ed., Hyderabad, 1936, p. 205. 转引自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Wiesbaden, 1992, p. 212.

② V. Minorsky trans.,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 D. 1120)*, London, 1942, p. 29.

③ 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d. II, Wiesbaden, 1965, § 892, pp. 498-499.

④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pp. 212-213.

⑤ F. Hirth, “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i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n und der 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München*, 1899, Bd. II, Heft II, p. 263.

⑥ （苏联）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 2 卷第 1 册第 1 部分》，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08 页。

称谓。^①“乌古斯”的名称最早见于8世纪的鄂尔浑碑铭，一般写作 tokuz oğuz，直译是“九姓乌古斯”，唐朝史料中译作“九姓”。关于乌古斯的词源，学者们有许多推测，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本义是“氏族”，相对更能让人接受。^②结合突厥文和汉文史料来看，九姓是漠北游牧人口结构中的主体，他们时而依附于、时而又独立于突厥政权。^③换言之，隋唐时期的突厥与九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8世纪中叶第二突厥汗国灭亡以后，一部分乌古斯留在漠北，经过政治重组后进入了回鹘汗国的体制，也有一部分乌古斯人群开始逐步向西迁徙。

“九姓乌古斯”在早期穆斯林文献中写作 تخزغز، 一般译成汉语“托古兹古兹”或“托古兹古思”(Tughuzghuz)。^④据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的勘定，10世纪《世界境域志》等伊斯兰地理志中的“托古兹古兹”指代的是当时天山一带的回鹘。^⑤不过，穆斯林文献中“托古兹古兹”的内涵似乎有一个发展过程，也可指代漠北时期的回鹘。^⑥

① W. Barthold, "Turkoman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st edition, vol. 4, Brill, 1934, p. 897.

② Peter B. Golden, "Oq and Oğuz ~ Oğuz", in *Turkic Languages*, vol. 16, 2012, pp. 183-186.

③ 在东突厥复国之初，九姓乌古斯是仇敌，后者曾与唐朝、契丹结盟，试图把突厥扼杀于摇篮之中。见《噉欲谷碑》第9—16行。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突厥人占领于都斤山并建立第二突厥汗国的政权之后，九姓乌古斯便成了汗国的子民。噉欲谷说：“乌古斯人全都来臣服了，当听到我让突厥可汗、突厥人民来到于都斤山林，我本人谋臣噉欲谷住在于都斤山林之后，南面的人以及西边、北边和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8页。此处译文与耿译略有不同。

④ James Hamilton, "Toquz-oyuz et On-Uyyur", in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L, 1962, pp. 23-63. (法) 哈密顿著，耿昇译：《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期，第130—140页；《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续）》，《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128—143页。

⑤ *Hudūd al-ʿĀlam/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 2nd edition, Cambridge, 1970, pp. 263-270.

⑥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三章“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第三节“‘托古兹古思’问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23页。

关于回鹘与九姓的关系纠葛，笔者提出过一个假设：回鹘本是九姓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在建立了独立的政治体以后继承并改造了这一政治架构，用回鹘族群内部的九个氏族来取代早期的九姓。^①于是，形成了汉文史料中回鹘有两种版本九姓的局面，也就是史家所谓“内九姓”和“外九姓”之说的缘由。^②

西迁的乌古斯人群，在穆斯林文献中则写作غز，可汉译为“古兹”。马夸特（J. Marquart）指出，乌古斯/古兹人在历史上曾经分裂成不同的氏族，稀稀落落地分布在伊朗—伊斯兰世界边境的草原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陆亚洲民族大迁徙造成的，譬如回鹘汗国的衰亡（840年）、辽朝的建立（916年），以及西辽向七河流域的迁徙。^③乌古斯人群向中亚的渗透，挤走了佩切涅格人，使之向西迁徙。对此，彼得·高登有更加详细的讨论。^④乌克兰裔美籍东方学家普里查克（O. Pritsak）认为，西迁乌古斯人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政治体——叶护国，后来因内外交困——内部有塞尔柱部落的崛起，外部有钦察人

① Chen Hao, “Baz Qaga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quz Oguz”, in *Chronica. Annua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zeged*, 2018, pp. 43-50.

② 《新唐书·回鹘传上》：“子骨力裴罗立〔中略〕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崛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嗟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第6114页）《唐会要》：“天宝初，回纥叶护逸标苾袭灭突厥小杀之孙乌苏米施可汗。未几，自立为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号。〔中略〕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即拔野古，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悉。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唐会要》卷九八，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44页）

③ Josef Marquart,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in *Abhandlung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eue Folge*, Band XIII, Nr. 1, 1914, pp. 34-35.

④ Peter B. Golden, “The migrations of the Oguz”, in *Archivum Ottomanicum*, vol. 4, 1972, pp. 45-84.

的压迫——导致了乌古斯叶护国的瓦解。^①

10 世纪以后的乌古斯史，因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1037 年乌古斯人在伊朗和中亚肇建了塞尔柱帝国，其创建者图赫鲁·伯（Tughril Beg）源自乌古斯的柯尼克（Qiniq）部落，柯尼克系乌古斯可汗幼子腾吉斯汗的儿子。^②1194 年塞尔柱帝国被花刺子模帝国所取代，迁徙到小亚细亚的乌古斯人后来又建立了奥斯曼帝国。^③在奥斯曼帝国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纳托利亚还存在不少强劲的突厥蛮地方政权。譬如，白羊王朝源自乌古斯可汗第四子库柯汗的长子——巴音迪尔汗^④；黑羊王朝的汗系也可追溯到乌古斯可汗^⑤。留在中亚的一群突厥蛮人，主要分布在里海东岸、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以游牧为主。这群突厥蛮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处于诸侯林立的分治状态。^⑥到 17 世纪阿布尔哈齐的时代，政治上分裂但军事上拥有战斗力的突厥蛮人，积极地参与到中亚乌兹别克人的政治进程中。这支突厥蛮人，就是今天中亚土库曼斯坦的族源。一般而言，我们把现代的民族国家称为“土库曼”，而历史上的族称则译为“突厥蛮”。

① Omeljan Pritsak,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of the Oghuz Yabghu", in *The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S. II.*, New York, 1952, pp. 279-292.

② 关于塞尔柱家族起源于乌古斯可汗幼子腾吉斯汗的说法，见于《史集·乌古斯史》。Karl Jahn, *Die Geschichte der Oguzen des Rasid Ad-Din*, Kommissions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Wien, 1969, p. 67.

③ 关于奥斯曼家族起源于乌古斯可汗长孙凯伊的说法，见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④ John E. Woods, *The Aqquyunlu: Clan, Confederation, Empire*, revisi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p. 25.

⑤ V. Minorsky, "The Qara-qoyunlu and the Qutb-shāhs (Turkmenica, 10)",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7, no. 1, 1955, p. 53.

⑥ 关于突厥蛮历史的学术成果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托尔德的研究。巴托尔德：《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载《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 2 卷第 1 册第 1 部分》，下册，第 607—699 页。

第四节 近代中亚政治语境下的历史书写

在梳理了阿布尔哈齐观念中“突厥”和“突厥蛮”的内涵之后，我们还要从史料批判的角度去追问阿布尔哈齐撰写这两部史书的动机。阿布尔哈齐自己在《突厥世系》提到“我本人就拥有 18 部叙述统治过伊朗或土兰等地的成吉思汗后裔历史的著作〔中略〕至今还没有一部记述自从我们的祖先与阿布都剌汗的祖先分离后我们家族诸君主历史的著作。我先是有意委托某人来撰写这部史书，但一直没有找到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因此，我只得亲自动手来撰写这部著作”。^①阿布尔哈齐在《突厥蛮世系》中又提到，由于乌古斯世系的版本众多，莫衷一是，突厥蛮的首领听说他通晓历史，便请他编纂一部信史。^②这些说法或许都是真实的，但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追究。

关于乌古斯人群的历史，除了散见于穆斯林史家书中的零星记载之外，只有一部略带史诗色彩的所谓“乌古斯史”。“乌古斯史”传世最早的版本是回鹘文的《乌古斯可汗传》，在内容上没有任何伊斯兰教的色彩。伯希和认为，现存回鹘文《乌古斯可汗传》可能是 15 世纪的抄本，但应该是以 1300 年左右的一个早期版本为依据。14 世纪拉施特的《史集》中收入了另一种版本的“乌古斯史”，不仅在原故事情节上有所扩充，即补充了乌古斯可汗去世后其子嗣统治时期的政治事件，而且注入了浓重的伊斯兰教色彩，譬如乌古斯可汗以不喝奶来威逼其母亲皈依伊斯兰教。阿布尔哈齐撰写的《突厥蛮世系》，大体取材于拉施特的《史集·乌古斯史》，但在叙事时间轴上更加延长，故事情节却有所节略。剥离了语境的《突厥蛮世系》，使得原著《史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 1—2 页。

②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p. 36.

集·乌古斯史》中的趣味性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凝练和干瘪的宗教说教。

作为史家的阿布尔哈齐，他的关怀是“世系”，实际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倘若比较一下阿布尔哈齐与拉施特在成吉思汗世系问题上的记载，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拉施特在《史集》中只是把成吉思汗家族从铁木真往上七世祖的名讳交代清楚，更远的就不再追究了。^①但在《突厥世系》中，阿布尔哈齐把成吉思汗家族的世系进行了延伸和嫁接，一直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甚至是雅弗和人类的始祖亚当。^②突厥蛮人的祖先也可以追溯到乌古斯可汗，这在《突厥蛮世系》中是言之凿凿的。换句话说，至少在阿布尔哈齐所处的时空语境中，即17世纪的中亚，突厥蛮人与乌兹别克人拥有共同的始祖——乌古斯可汗，而这一叙事在14世纪的伊利汗国并不存在。

将乌兹别克人和突厥蛮人追溯到共同始祖的叙事，既是两个族群在中亚地区长期共存的后果，也是突厥蛮人在17世纪中亚乌兹别克人政治纷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真实写照。换言之，这一同源叙事是有现实需求的。经营中亚的乌兹别克人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即来自卡尔梅克、波斯和沙俄等外部势力的威胁，更有内忧，即希瓦和布哈拉汗两个乌兹别克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各自汗国内部出现的继位之争。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外族的突厥蛮人就成了一支有影响的平衡力量。譬如，阿布尔哈齐之所以在与其兄弟伊思芬迪雅儿汗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并不得不流亡异国他乡，就在于后者得到了突厥蛮人的支持。^③阿布尔哈齐在抵抗的过程中，努力争取的外援也是突厥

①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87页。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78—279页。

③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83—290页。

蛮人。^①

不过，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阿布尔哈齐编纂两部史书的根本目的，还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即强化“突厥人”/“乌兹别克人”与“突厥蛮人”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异。写史终究是一种“他者化”的手段，为的是强调身份认同的边界。这一点，从两个人群的世系建构中也能看出端倪。阿布尔哈齐在《突厥世系》中虽然将成吉思汗的祖先嫁接到乌古斯可汗，但是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成吉思汗究竟出自哪一支，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根据阿布尔哈齐的说法，成吉思汗出自乌古斯可汗的次子——艾汗。^②根据《突厥蛮世系》和《史集·乌古斯史》，突厥蛮人的历史则主要是乌古斯可汗长子昆汗后裔的历史，即一般意义上乌古斯人的历史。乌兹别克人与突厥蛮人同源却不同支这一叙事的出发点，可以从17世纪中亚的政治局势中找到线索。

阿布尔哈齐始终把突厥蛮人视作异族，必要时尽量争取，得不到则摧毁之。从波斯返回希瓦的阿布尔哈齐，因为突厥蛮人当年的背信弃义而对他们怀恨在心。在他的地位稳定之后，突厥蛮人纷纷来降，表示“绝对归顺于他，保证服从于他”，“除了他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主人；他们也没有可去的地方”。阿布尔哈齐口头答应他们“所有逃跑或躲藏起来的突厥蛮人都可以返回他们的家园，他对他们全部予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92—294页。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71、279页。汉译为“爱汗”“阿亦汗”。第279页提到，阿亦汗之后是玉儿笃兹汗继位。注释说：“此处有误，应该说玉儿都兹汗（即玉儿笃兹汗）是阿亦汗之弟、乌吉思汗之子。参见本书所载乌吉思汗诸子的名字。”这个注释是多余的，因为《突厥世系》前文中解释得很清楚，爱汗的后继者是余勒都思（即玉儿笃兹），但不知道他究竟是爱汗的孙子，还是他的一个近亲。爱汗确实有一个名叫余勒都思的弟弟，但这个余勒都思却不是爱汗之后即位的余勒都思。见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26页。

以宽恕，既往不咎”，暗地里却在策划一场针对突厥蛮人的大屠杀。阿布尔哈齐下令在露天设帐，摆下鸿门宴，邀请突厥蛮的首领来参加。在宴会上，阿布尔哈齐下令血腥剿灭了数千名来降的突厥蛮人。^①此后，阿布尔哈齐还去捷真纳和巴米·布尔玛等地去追杀那里的突厥蛮人。^②

从阿布尔哈齐对待突厥蛮的态度不难看出，他终究将其视为异族。这点也反映在他的历史书写中，他用分别立传的方式来体现“突厥”与“突厥蛮”的概念差异。总之，阿布尔哈齐的《突厥蛮世系》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份政治宣言。它与《突厥世系》一起，对中亚突厥蛮和突厥（乌兹别克人）两个群体在现实中政治地位差异加以强化。

小 结

综上所述，在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处的17世纪中亚的历史语境中，所谓的“突厥”指的是在中亚统治的成吉思汗后裔，即乌兹别克人，而所谓的“突厥蛮”是指乌古斯人。这两支人群长期在同一地区共生，在政治和军事上互相依赖，使得他们共同起源于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的叙事具有了一层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二者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因为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并不平等。乌兹别克人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以希瓦和布哈拉两个城市为政治中心。突厥蛮人则始终处于涣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更好地理解阿布尔哈齐分别编纂《突厥蛮世系》和《突厥世系》两部史书的隐性动机：在“求同”之

①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304—305页。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305页。

外，更多地是为了“存异”。当然，这两点并非他写史的全部目的。譬如，《突厥世系》主要是希瓦汗国的政治史，并不包括布哈拉汗国的汗系，说明他也有意将希瓦与布哈拉两个支系的乌兹别克人区分开来。

第五章 何谓“土耳其”？

——小亚突厥语人群的认同焦虑与调适

近世以来，与同时期以排他性为表征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展现出足够的统治韧性和文化异质性。这个距离西方基督教世界最近的突厥语群体，在六百年的话语竞争中做出了诸多努力、挣扎和妥协。土耳其人在身份认同建构中所遭遇的困厄，反映了权力不平等格局下的西方话语霸权。究其原因，近代欧洲知识和概念的流动，本质上是单向的，即从欧洲向其他地方的传播。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无疑有很大难度。但是，对于一部突厥概念史的作品而言，如果缺了小亚细亚这块区域，肯定是不完整的。哪怕是对其作一个掠影式的研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补齐突厥概念史的拼图。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延续的时间长，从奥斯曼建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共六百余年。我们只能将问题简单化，凝练出几个阶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它涉及三类行为体，一是苏丹本人及其家族，二是围绕在苏丹周围的伊斯坦布尔的政治精英，三是安纳托利亚的底层民众。我们在论述中，尽量理清三条线索各自的发展脉络。但是，作为一篇讨论小亚突厥语人群身份史的文章，还是有必要对上述三个能动主体进行群像式考察。

第一节 学界对奥斯曼起源的前期研究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起源以及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原因，曾一度是欧洲学界讨论的热点。^①从约瑟夫·冯·哈默（Joseph von Hammer）以来的19世纪奥斯曼通史作者，几乎都未加批判地使用了15世纪以后编纂的奥斯曼官方史料来重构早期奥斯曼史，即延续着奥斯曼人源自塞尔柱人的传统叙事。^②首次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美国学者赫尔伯特·吉本斯（Herbert A. Gibbons）。他在1916年出版的《奥斯曼帝国的肇基》一书中，强调拜占庭对奥斯曼的影响，认为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继承和吸收了拜占庭人的制度。吉本斯认为有关奥斯曼早期历史的文献都是后来杜撰的，不足为信。^③虽然吉本斯在处理史料时表现出了批判态度，但他的观点仍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特征。吉本斯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他亲身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目睹了这个帝国腐朽和软弱的一面，他不相信一个“亚洲人种”有能力创建一个世界性帝国，所以在寻找它兴起的根源时，自然不会从它本身出发，而是从其他方面去寻找原因。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之后，官方与

① 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但是近代以来西欧用 Turk 来指称奥斯曼人。这个 Turk 在词源上当然是与汉文古籍中的“突厥”相同的，但是它们所指代的对象完全不同，所以不能译成“突厥”。另，汉文文献中的“土耳其”一般是指1923年成立的共和国，所以直接用“土耳其人”来指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人群，也不合适。于是，本文中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且称之为“奥斯曼土耳其人”。

② Joseph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1. Bande, Budapest, 1827, p. 41. Johann Wilhelm Zinkeise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 in Europa*, 1. Bande, Hamburg, 1840, pp. 58-59.

③ Herbert A.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Oxford, 1916, pp. 276, 302ff.

学界都认为有必要建构一套新的起源叙事，来打造共和国公民的全新身份认同。其中，历史学家柯普律吕（M. Fuad Köprül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反驳吉本斯的观点。^①柯普律吕认为，蒙古势力的扩张，造成了乌古斯人群的西迁，从而给安纳托利亚的政治和军事边疆带来了结构性压力。奥斯曼的早期扈从由他的部落成员构成，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共同的起源。虽然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拜占庭东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并对奥斯曼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但奥斯曼帝国主要还是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政治文化的要素也几乎都是来源于中亚和中东的“土耳其—穆斯林”遗产。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要归功于土耳其人的部落和族群凝聚，以及一套复杂的中亚和中东的制度遗产。^②柯普律吕的观点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因而成为土耳其官方史学的基调，影响深远。

在柯普律吕之后，在奥斯曼起源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是奥地利历史学家保罗·魏特克（Paul Wittek）。他借1937年受邀伦敦大学讲学的机会，连续发表了3篇有关奥斯曼起源的文稿，并于翌年结集出版。^③魏特克没有纠缠于族群性问题，即究竟是土耳其人或穆斯林还是拜占庭人或基督徒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贡献更大。他另辟蹊径地

① M. Fuad Köprülü, "Bizans Müesseselerinin Osmanlı Müesseselerine Te'siri Hakkında Bazı Mülâhazalar", *Türk Hukuk ve İktisat Tarihi Mecmuası* I (1931), pp. 165-313. M. Fuad Köprülü, *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35.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y Leis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② M. Fuad Köprülü,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y Leiser, pp. 111-117.

③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8.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with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by Colin Heywood, Rudi Paul Lindner and Oliver Welsh, ed. by Colin Hey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认为,在伊斯兰教世界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种“圣战”(ghaza)观念,以及以伊斯兰的名义进行圣战的英雄人物“加齐”(ghazi)。正是这一圣战理念促成了早期奥斯曼政体的形成。^① 他的立论依据是15世纪初奥斯曼诗人艾哈迈迪(Ahmedi)的《亚历山大传》(*İskendernâme*)中所蕴含的弥赛亚式的“加齐”观念^②,以及布尔萨清真寺中一处纪年为公元1337年的铭文“苏丹、加齐苏丹之子、加齐、加齐之子、天下之主、世界英雄”(Sultân ibn sultân al-ghuzât, ghâzî ibn al-ghâzî, shujâ' ad-daula wa'd-dîn, marzbân al-âfâk, bahlavân-i jihân, Orkhan ibn 'Othmân)——这正是奥斯曼帝国第二任苏丹奥尔汗的名号。^③

“加齐理论”提出以后,逐渐成为奥斯曼史学界的主流认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公然对其提出挑战。美国历史学家如迪·林德内尔(Rudi P. Lindner)是反对魏特克“加齐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部落主义”(Tribalism)更适合用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动因。他在《中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游牧民与奥斯曼人》一书中指出,早期奥斯曼人是以一种游牧集团的方式生活,维系其族群凝聚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高尚的宗教追求,而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例如为了获得牧场和战利品)。^④ 他认为魏特克提出的“加齐理念”是一

①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pp. 31-69. 关于“加齐起源说”的述评,参见韩志斌、姜欣宇:《“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17—30页。

② Kemal Silay, “Ahmed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 Dynasty”, i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16, 1992, p. 135.

③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p. 44.

④ Rudi P.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Indiana University, 1983, pp. 105-112.

种排他性的意识，不符合奥斯曼帝国多元和包容的特质。他指出，假如奥斯曼人的行为真的受到某种“加齐理念”驱使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吸收拜占庭人进入体制，也不会与同样是穆斯林的突厥蛮人作战，更不会允许伊斯兰教异端和萨满信仰的存在。

林德内尔提出的部落主义学说（亦称“游牧理论”）影响颇深，甚至一度有取代魏特克“加齐理论”的态势。^①不过，有学者质疑，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这一股反“加齐理论”的思潮，或许跟那一代美国历史学家参加过越战的经历有关。换句话说，林德内尔那一辈学者将现实关怀投射到了历史解释之中，他们拒绝接受“为了理想而战”或“弘扬某种‘优越’价值观”的战争动员令。^②“加齐理论”恰好就是穆斯林为了弘扬伊斯兰教的优越性，去征服异域的圣战宣言。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在1995年出版的《两个世界之间：奥斯曼国家的建构》一书中，逐条反驳了林德内尔对魏特克的质疑。他的主要论据是，早期奥斯曼人所信奉的并非一种正统的伊斯兰教，他们没有必要严守各种教条。^③卡法达尔的正面辩护，让魏特克的“加齐理论”再次回到了舆论的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奥斯曼起源的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希斯·罗瑞（Heath Lowry）。他在2003年出版的《早期奥斯曼国家的本质》一书中指出，魏特克对布尔萨清真寺的铭文释读有误。他通过对布尔萨清真寺碑铭的实地勘察，发现奥尔汗的头衔中开头的“苏

① 林德内尔在2007年的《奥斯曼前史探微》一书中，重新梳理了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但并没有提出超出他“游牧理论”的观点。Rudi Paul Lindner, *Exploration in Ottoman Pre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②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49-50.

③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pp. 51-55.

丹”并不见于石碑，是魏特克附会的。^①对奥斯曼人兴起的原因，罗瑞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种新解释。他认为穆斯林男性与拜占庭女性的通婚，在奥斯曼早期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通婚的后裔——“混血蛮人”（*mixobarbaroi*）或自愿、或被强迫地融入了奥斯曼人的政体。我们暂且把这一说法称为“通婚理论”。

我们认为，上述诸家的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奥斯曼家族兴起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土耳其的奥斯曼史权威学者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曾指出，奥斯曼人的兴起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始于突厥蛮游牧人群向拜占庭沿海平原的不断迁徙；二、在“加齐”率领下一些小型掠夺组织让这一进程加速；三、不少有成就的领袖能够聚拢当地的豪帅去征服和建立行省，使这一历史进程得以继续；四、随着“加齐”式贝伊（*ghazi-beyliks*）的加入，为了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他们征服了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②不难发现，伊纳尔哲克实际上是综合了各家的说法。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土耳其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除了用历时性的视角观察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学界在奥斯曼起源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关怀，即家族、种族和民族。奥斯曼人对自己起源叙事的建构，是为奥斯曼统治者苏丹家族的合法性服务的，属于“家族”的层面。西方学者所追问的，作为穆斯林的奥斯曼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建立庞大帝国，抑或是在拜占庭基督教文化的贡献下才完成的，属于“种族”话语的层面。奥斯曼帝国晚期对于土

① Heath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35-37.

② Halil İnalcik, "The question of the em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2, 1980, pp. 74-75.

耳其人起源的重新建构，以及为操突厥语人群塑造集体认同感的努力，则是在现代民族主义语境中发生的，属于“民族”话语的层面。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文学界，还没有对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作一个贯通的梳理。本章的宗旨，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身份认同作一番历时性考察，揭示出奥斯曼帝国身份认同的阶段性。我们将整个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从建国初期到穆拉德二世是第一阶段；从穆罕默德二世到苏莱曼大帝形成了奥斯曼治世的话语，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统称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马哈茂德二世到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①

第二节 帝国早期的认同危机与穆拉德二世的历史编纂

有关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的史料，几乎都是15世纪以后编纂的。有学者认为这些史料过于政治化，为奥斯曼王朝合法性提供依据的意图较为明显，所以它们只能用于确定奥斯曼人希望这个帝国的起源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事实上是什么样子。^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史书的编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5世纪奥斯曼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和身份认同。就目前所知，奥斯曼官修史书的传统，始于穆拉德二世。他的在位时间是1421—1444年和1446—1451年，中途短暂退位，由其子穆罕默德二世执政。穆拉德二世继位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界

① “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是一对互相纠缠的概念，很多时候历史行为体利用起源叙事来界定身份认同，所以此处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

② Colin Imber, “Canon and apocrypha in early Ottoman history”, in Colin Heywood and Colin Imber ed., *Studies in Ottoman History in Honor of Professor V. L. Ménage*, Istanbul, 1994, pp. 117-137.

兴起了一股编书的风气，既有纂修，也有译介，其中大部分属于资政类书籍。^①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唯一的一部奥斯曼官修史书是雅兹吉奥卢·阿里（Yazıcıoğlu Ali，又称 Yazıcızâde Ali）的《塞尔柱史》（*Tevârih-i Âl-i Selçuk*）。^②

关于雅兹吉奥卢·阿里，我们所知甚少。从名字推测，他可能是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的一名宫廷文职人员，因为“雅兹吉奥卢”（*yazıcıoğlu*）的字面意思是“书记员的儿子”。^③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取材于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中的“乌古斯史”；第二部分取材于1226年本达里（al-Bundari）撰写的有关伊拉克和伊朗的“塞尔柱帝国史”；第三部分主要是译自伊本·毗毗（Ibn Bibi）于1280—1281年编纂的“塞尔柱罗姆国史”，还包括部分有关凯库巴德一世（Keyqubad I）和奥斯曼人的历史；最后一部分是蒙古伊利汗国合赞汗（Gazan Khan）去世之后安纳托利亚的概况。^④当然，雅兹吉奥卢不是单纯的翻译，他还增补了许多有利于巩固奥斯曼家族合法性的内容。

现代学者对雅兹吉奥卢·阿里《塞尔柱史》的研究，始于荷兰东方学家侯茨玛（M. Th. Houtsma）。他于1902年出版了保存在雅兹吉奥卢·阿里《塞尔柱史》内的伊本·毗毗的“塞尔柱罗姆国史”，用

① Ali Anooshahr,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Routledge, 2009, p. 142.

② Murat Cem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and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16, p. 68.

③ Paul Wittek, “Yazıcıoğ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1952, p. 646. 按：在奥斯曼土耳其语中，*yazıcı*意思是“书记员”，*oğlu*意思是“儿子”，所以 *Yazıcıoğlu* 的意思就是“书记员的儿子”，而 *zâde* 则是表示“儿子”的波斯语词。

④ Paul Wittek, “Yazıcıoğ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pp. 642-644.

印刷体奥斯曼文排版，没有拉丁文的转写和翻译。^①奥地利东方学家赫伯特·杜达（Herbert W. Duda）于1959年将这部分内容译成了德语。^②雅兹吉奥卢在书中三处颂扬穆拉德二世，说明此书受到了穆拉德二世的资助。根据保罗·魏特克的研究，《塞尔柱史》修成于伊历840年（公元1436—1437年）。^③

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现存9部抄本，其中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藏编号为1391的本子是善本。托普卡帕宫另藏有三部抄本，编号分别是1390、1392和1393。伊斯坦布尔还有两部抄本，分别收藏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稀有文献图书馆（编号T9291）和国立图书馆（编号为332）。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语言、历史与地理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塞尔柱史》，编号为1727。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抄本，编号为Ms. Or. Quart. 1823，已经可以网上浏览。^④巴黎国立图书馆也藏有一部抄本，编号Supp. Turc. 737，也已经数位化。^⑤土耳其学者阿卜杜拉·巴克（Abdullah Bakır）2009年将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校勘出版，用现代土耳其字母转写。^⑥

从雅兹吉奥卢《塞尔柱史》的编排体例可以看出，他试图在乌古斯人、塞尔柱帝国、塞尔柱罗姆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连续性。雅兹吉奥卢把奥斯曼人的世系追溯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

① M. Th. Houtsma, *Histoire des Seldjoucides d'Asie Mineure d'après Ibn Bibi, Texte turc*, Leiden, 1902.

② Herbert W. Duda, *Die Seldschukengeschichte des Ibn Bibi*, Kopenhagen, Munksgaard 1959.

③ Paul Wittek, "Das Datum von Yazıcıoğlu's Oğuznâme", *Türkiyat Mecmuası*, vol. 14, İstanbul, 1965, p. 265.

④ http://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74633155X&PHYSID=PHYS_0001&DMDID. 2019年4月18日访问。

⑤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15013h>. 2019年4月18日访问。

⑥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人，乃至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长子昆汗的长子——凯伊。^①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几任埃米尔几乎没有信史可循，只有一些神话传说，以至于穆拉德二世不得不组织人员编写奥斯曼国史，来构建一套适应时代需要的官方叙事。雅兹吉奥卢的《塞尔柱史》几乎是从不同史料中拼凑和剪裁而来，这恰好印证了奥斯曼自身史料的匮乏。不管奥斯曼人此时是否已经把主要精力从“建设国家”转移到“叙述国家”上来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 15 世纪中叶，奥斯曼人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叙事。^②

我们不禁要问：戎马一生的穆拉德二世，为何突然做出了前辈们都未曾做过的事情——着手编纂奥斯曼家族的历史了呢？这是因为穆拉德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不仅从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擒获及其所引发的政治停摆中恢复了元气，而且奥斯曼与安纳托利亚其他突厥蛮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③ 无论是从对疆域的控制力度，还是从制度建设的程度来看，穆拉德二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体了。^④ 这个时候，奥斯曼人自然也就有必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以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我们要知道，奥斯曼人的出身曾经是蒙古人和突厥蛮人讥讽的对象。帖木儿在给巴耶济德一世的信中说：“世人皆知你的起源是一名突厥蛮的水手，如果你不降下你那鲁莽的帆，并在真诚的港湾抛

①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p. 23.

② Murat Cem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and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pp. 68-69.

③ 内战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和身份。关于 1402—1413 年奥斯曼内战的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见 Dimitris Kastritsis, *The Sons of Bayezid*, Leiden: Brill, 2007.

④ Daniel Goffman,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0.

下忏悔的锚，你一定会遭受沉船之灾的。”^①帖木儿用的这个譬喻（即用帆船抛锚来讽喻政治人物要懂得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是一种常见的修辞，但是用在奥斯曼人身上却显得格外贴切，因为奥斯曼人的祖先正是一名水手。安纳托利亚的乌古斯可汗第五子塔赫汗（Dağ Khan）长子撒鲁尔（Salur）后裔卡迪·布尔汗·阿尔丁（Kadi Burhan al-Dīn）曾经讥讽巴耶济德一世说：“你的起源是一名突厥蛮的水手（*kayıkçı*），这是世人皆知的。”^②奥斯曼人之所以被讥讽为“水手”，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凯伊”*Kayı*和“水手”*kayık*谐音，所以被污名化了。

帖木儿和卡迪·布尔汗·阿尔丁对奥斯曼人的污名化，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奥斯曼人追溯到乌古斯可汗长孙凯伊的认同，在巴耶济德一世在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在穆拉德二世时通过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被正式钦定为官方叙事。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奥斯曼世系，即把奥斯曼人的祖先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第四子——贵克汗（Gök Khan），而不是长子昆汗。这两套叙事几乎是并行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奥斯曼帝国的史家。雅兹吉奥卢·阿里在《塞尔柱史》中选择了前者，也就是把奥斯曼人的世系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长子昆汗、长孙凯伊，可视为他刻意抬高奥斯曼人地位的努力，当然更多的是反映了苏丹穆拉德二世本人的意志。^③

在穆拉德二世修史的同时期，与奥斯曼存在竞争关系的安纳托

① Cherefeddin Ali, *The History of Timur-Bec, Known by the Name of Tamerlain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1723, vol. 2, p. 148

② Halil İnalcık, *Kuruluş Dönemi Osmanlı Sultanları (1302-1481)*, İslam Araştırmaları Merkezi, 2010, p.18.

③ 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p. 40-41.

利亚和阿塞拜疆的伊斯兰政权，也都开始从类似的突厥语史料中摘录并编纂各自的世系。穆拉德二世钦定奥斯曼源于乌古斯可汗长孙凯伊的叙事，旨在说明奥斯曼苏丹的出身要比邻近的突厥蛮君主更高贵。^①例如，嘲笑过奥斯曼人出身的卡迪·布尔汗·阿尔丁，是乌古斯可汗第五子塔赫汗（Dağ Khan）的后裔。那么，作为长子长孙的奥斯曼，地位当然比阿尔丁要高。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因为此时奥斯曼人与其他突厥蛮政权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435年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Shah-Rukh）给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蛮诸君主赠送了象征着权力的锦缎，要求他们穿戴，以显示对沙哈鲁权威的承认。不过，穆拉德二世拒绝穿戴，而且还铸造了带有凯伊和自己名号的钱币，公然挑衅帖木儿政权的权威。^②雅兹吉奥卢在《塞尔柱史》中特别强调，穆拉德苏丹是苏丹中的苏丹，他的起源比其他乌古斯家族的汗都要更高贵，也比成吉思汗的世系要高贵。^③帖木儿的世系，据说可以追溯到和成吉思汗共同的一位祖先图曼艾汗（Tumanay Khan）。^④17世纪成书的《突厥世系》把图曼艾汗（汉译“屯必乃汗”）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次子艾汗（Ay Khan）。^⑤这样的话，作为乌古斯

①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23.

②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p. 42. 汉译本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48—49页。

③ Yazıcızâde Ali, *Tevârih-i Â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ârihi)*,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p. 23. Paul Wittek, "Yazıcıoğ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1952, p. 647, n. 33.

④ Ron Sela, *The Legendary Biographies of Tamerlane: Islam and Heroic Apocrypha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6-27.

⑤ 阿布尔哈齐·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第69—71页。

可汗长子后裔的奥斯曼苏丹，确实比作为乌古斯可汗次子后裔的帖木儿的地位要高。联系上文帖木儿和撒鲁尔突厥蛮对奥斯曼人出身的讥讽，即便“凯伊”这个词有被敌对阵营故意曲解的风险，穆拉德二世还是毅然选择了这一叙事。一方面说明，奥斯曼人力图用世系尊卑来重新导向自身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另一方面说明，奥斯曼人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无视言语上的戏谑。

除了雅兹吉奥卢的《塞尔柱史》以外，完成于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巴塔尔传》(*Battalname*)，作者佚名。我们说雅兹吉奥卢的《塞尔柱史》是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部奥斯曼帝国官修史书，更多的是从现代史学的眼光去审视的，但诸如《巴塔尔传》这类具有神启色彩的作品，在穆拉德二世和当时的宫廷史家眼中其实就是“历史”。所以，我们把《巴塔尔传》也纳入广义的穆拉德二世修史背景中讨论。

《巴塔尔传》讲述了“加齐”巴塔尔的英勇事迹，全书用奥斯曼土耳其语书写，现存若干抄本，年代最早的是1436—1437年的本子。巴塔尔故事的原型，最早能在12世纪的阿拉伯语文献中找到，因此不少学者推测土耳其语版本的《巴塔尔传》可能在12或13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最早版本来自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可以视作是他为了塑造理想的“加齐君主”形象而特别授意编纂的。另外，文献内部的多处错漏，表明《巴塔尔传》跟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一样，也不是原创，而是从别处删节、裁剪而来。^①

穆拉德二世继位后之所以启动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小亚细亚史料编译成土耳其语的修史工程，一方面是为了确定奥斯曼人起源的官

① Ali Anooshar,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pp. 143-144.

方叙事，从而构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描绘一幅理想的“加齐”形象，以便自己去模仿，甚至成为加齐苏丹。^①据说穆拉德二世在瓦尔纳战役（Battle of Varna）中眼见匈牙利人占了上风，于是他便模仿传说中的哈里发加齐，下马向真主祈祷，结果奥斯曼军队神奇地取得了优势并赢得了战争。与传说中的哈里发一样，穆拉德二世也在瓦尔纳战役中向士兵们说：“我们当中杀敌的人将变成加齐。我们当中战死的人将变成烈士。”此外，为了打造一种公平、公正的加齐君主入设，他在攻下塞萨洛尼卡之后，让士兵们保持克制，避免大规模的掠夺发生。穆拉德二世在经历众多的战役和胜利之后，也被冠以“苏丹穆拉德加齐”的称号。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他赢得了伊斯兰世界广大穆斯林的支持，例如马穆鲁克人和印度的莫卧儿人。^②在穆拉德二世去世后一年，有一部佚名的《加齐穆拉德苏丹传》（*Gazavat-i Sultan Murad*）问世，正是对他恰如其分的盖棺论定。^③

综上，以雅兹吉奥卢·阿里的《塞尔柱史》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将奥斯曼人的起源追溯至中亚的乌古斯可汗，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人在面对安纳托利亚其他突厥蛮公国乃至中亚帖木儿政权时出现的合法性焦虑。苏丹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兴修史书的另一个动机，则是将自己塑造成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形象——加齐。以上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君主身份认同的早期特点。自穆拉德二世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起，奥斯曼的身份认同和历史书写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① Ali Anooshahr,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 143.

②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2007, pp. 39 ff.

③ Halil İnalcık and Mevlud Oğuz ed., *Gazavât-ı Sultân Murâd b. Mehemmed Hân: İzladî ve Varna Savaşları (1443-1444) Üzerinde Anonim Gazavatname*, Ankara, 1978.

第三节 “奥斯曼治世”下的多元认同

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下半叶，具体而言就是从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1451—1481年在位）攻陷君士坦丁堡到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去世的这段时间，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张，所以被称为奥斯曼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也有学者们称之为“奥斯曼治世”（Pax Ottomanica）。在统治阶层的身份认同方面，亦出现了与前一历史阶段不同的迹象。奥斯曼治世下的君主身份认同，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期间初具雏形，经过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的发展，到苏莱曼一世的时代正式定型。奥斯曼黄金时代所塑造的帝国身份认同，具有包容、普世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奥斯曼苏丹不再纠缠于具有安纳托利亚或中亚渊源的“突厥”或“突厥蛮”之类标签，而是更乐于接受“凯撒”“皇帝”这类普世性的帝王称号。这一点与该时期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且宗教、族群、文化多元的国情有关。

奥斯曼政权虽然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但其早期的领土扩张，却是从位于欧洲的鲁米利亚（即巴尔干半岛）开始。^①在军事行动中，奥斯曼军队往往需要兼顾欧亚两端。巴耶济德一世正是因为常年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两个战场之间奔波，才被冠以“雷霆”的绰号。横亘在两片疆域之间的，是拜占庭的帝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霸业而言，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巴耶济德一世曾用八年时间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在其牢固的城墙面前显得力

^① 甚至有学者主张，奥斯曼帝国是以巴尔干半岛大国的身份成长起来，并非发源于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以安纳托利亚为据点建立起来的帝国。（日）林佳世子著，钟放译：《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不从心。穆拉德二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二世，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征服者”的美誉。穆罕默德二世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并从改造城市景观入手，使其更具伊斯兰文化特征。除了在城内修建清真寺建筑群以外，穆罕默德二世还兴建了托普卡帕宫，并以此作为帝国运行的行政中心。

奥斯曼统治阶层在异教传统深厚的都城定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帝国亦称“东罗马帝国”，故该城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罗马帝国的文脉。换句话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味着他们入主了罗马人的疆域。穆罕默德二世在官方文书中，称他的国家是继罗马（即拜占庭）之后崛起的帝国，并称自己是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合法性的帝王。^① 日本学者林佳世子认为，穆罕默德二世作为安纳托利亚“当地”的君主，他继承了异教徒亚历山大大帝和具有基督教身份的罗马皇帝的帝位。^②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向世人昭示他僭据“凯撒”之位的合法性，竟然宣称奥斯曼苏丹是拜占庭皇室科穆宁家族（Comnenus/ Komnenos）的后裔。^③ 据称，在拜占庭皇帝与苏丹阿拉丁交战之际，得到一名来自西方的英勇骑士的应援。这名西方骑士以一臂之力奋勇作战，于是皇帝便命令他的一个名叫伊萨克（Issac）的侄子下马，把马让给西方骑士。伊萨克自觉受到了羞辱，便负气叛逃到敌对苏丹的阵营内，并改头换面成为一名穆斯林。作为回报，苏丹将女儿许配给伊萨克，并将一些不动产和村落赏赐给他，其中就包括奥

① 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2.

② （日）林佳世子著，钟放译：《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第77页。

③ Herbert A.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p. 265, n. 2.

托曼兹齐 (Ottomanzich)。穆罕默德二世据此声称，后来的奥斯曼人就是来源于科穆宁家族的伊萨克，具有拜占庭皇室血统。^①

穆罕默德二世绍续罗马皇帝合法性的意图，在他围攻君士坦丁堡前期所做的舆论铺垫中便可见一斑。在攻城之际，他曾致信教皇尼古拉五世，说奥斯曼人与法兰克人是兄弟，希腊人则是两者共同的敌人，他要做的事情是替曾经的特洛伊人复仇，所以同为特洛伊子嗣的西欧人应该帮忙。^②据说，穆罕默德二世在参观特洛伊古迹时，特意询问了有关阿基琉斯的事迹。听罢，他摇了摇头说：“是希腊人、马其顿人、帖撒罗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蹂躏了这片土地，由于我的功业，他们的子孙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来偿还我们亚细亚人在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所经常遭受的不公，虽然这种惩罚来得晚了些。”^③穆罕默德二世在这里显然把自己定位成千古一帝，代表整个亚细亚，通过特洛伊和突厥人共源的古老传说进行着政治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穆罕默德二世对西方古典时代英雄人物的兴趣，主要见载于基督教史料，属于“他者”视角的观察。换句话说，这或许是穆罕默德二世对外展现的姿态，或者说反映了基督徒对他的

① Theodore Spandounes, *On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Emperors*, trans. Donald M. Nic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 奥斯曼苏丹起源于科穆宁家族的故事，极可能是后世虚构的。但是，拜占庭皇帝科穆宁家族的阿历克塞一世有一个儿子叫伊萨克·科穆宁 (Isaac Komnenos)，伊萨克的儿子叫约翰·策莱佩斯·科穆宁 (John Tzelepes Komnenos)，约翰后来叛逃到罗姆苏丹国的都城科尼亚，获得了苏丹梅苏德一世的接纳，并得以与苏丹的女儿成婚。K. Varzos, *The Genealogy of the Komnenoi*, Kentron Byzantinon Ereynon, 1984. Konstantinos Moustakas: "The myth of the Byzantine origins of the Osmanlis: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in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015 (39/1): 85-97.

② Terence Spencer, "Turks and Trojans in the Renaissance", i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47, 1952, pp. 330-331.

③ Kritovoulos,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195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81-182.

期待。与基督教史料中穆罕默德二世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语史料则将他塑造成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现代土耳其史家也认为他是一位拥有宗教热情的穆斯林英雄，所谓对罗马的攀附只不过是基督教史家的浪漫化想象。穆罕默德二世虽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但是仍面临着安纳托利亚诸多突厥蛮势力的威胁。因此，他的身份认同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力图将自己定位成罗马凯撒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他需要从观念上与同时代具有竞争性的突厥语政权区别开来，以期巩固自身的合法性。

穆罕默德二世执政后期的主要精力是对付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蛮势力，即白羊王朝和卡拉曼人。白羊王朝在传奇人物乌宗·哈桑（Uzun Hasan）的率领下，于1467年兼并了黑羊王朝的领土。此后，乌宗·哈桑更是把阿塞拜疆、伊拉克、法尔斯和基尔曼，甚至帖木儿帝国的核心地带都纳入了统治范围之内。此举彻底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权力平衡，让他从一个部落首领跃升为一个令奥斯曼政权敬畏的强劲对手。^①声名日隆的乌宗·哈桑于1472年入侵马穆鲁克统治的叙利亚，于是穆罕默德二世瞄准时机，攻其不备。结果奥斯曼人不仅打败了乌宗·哈桑的部队，而且使得穆罕默德二世的声望在穆斯林世界得到了提升。1474年，奥斯曼人趁着大好形势一举吞并了卡拉曼政权。白羊王朝则随着乌宗·哈桑在1478年的去世，逐渐走向了衰落，最终于1502年灭亡，被萨法维王朝所取代。^②在此历史背景下，我们发现15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书写大致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①（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73页。

② 有关白羊王朝和乌宗·哈桑的权威研究，参见 John Woods, *The Aqquyunlu: Clan, Confederation, Empir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第一阶段的历史书写中，史家对奥斯曼的突厥或突厥蛮起源较为谨慎，甚至出现了两种矛盾的态度。一种是以舒克如拉赫（Şükrullah）（1388—1464年）的《历史的愉悦》（*Bahçetü'ttevarih*）为代表，成书于15世纪60年代。在一个突厥语比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地位低下的时代，舒克如拉赫采用波斯语书写，意在强调奥斯曼统治集团的高贵地位，并刻意与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划清界限。另一种是以恩维里（Enveri，生卒年不详）的《法书》（*Düsturname*）为代表，亦成书于15世纪60年代。恩维里采用奥斯曼土耳其语书写，是从安纳托利亚的视角出发，代表了民间的声音。^①他把奥斯曼人理解成“突厥”和“突厥蛮”，认为他们与塞尔柱人的联系是通过母系一支建立起来的。上述两种态度分别代表了当时人对奥斯曼人身份认同的两种不同看法，前者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后者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第二阶段的历史书写，以内什利（Neşri）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撰写的《世界志》（*Cihannüma*）为代表，该书修成于1487—1492年。^②内什利的卡拉曼人出身，注定了他是一个同情突厥传统的人物。他将突厥人的遗产视为奥斯曼身份认同的一个基石，并从语义学的角度对“突厥蛮”一词进行了诠释，为奥斯曼的合法性辩护。内什利将“突厥蛮”分解成两个字，分别是“突厥”（*türk*）和“伊蛮”（*iman*“信

① Murat C.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16, p. 70; Murat C. Mengüç, “Histories of Bayezid I, historians of Bayezid II: Rethinking late fifteenth-century Ottoman historiography”,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13 (76/3), pp. 373-389.

② 内什利《世界志》的德译本：Ğihännümā: die altosmanische Chronik des Mevlānā Mehmed Neşrī, Franz Taeschner ed., Leipzig: Harrassowitz, 1950；土耳其语本见 *Kitāb-i cihannümā*, F. R. Unat & M. A. Köymen ed., Ankara, 1957。有关内什利及其作品的最早研究，参见 Victor L. Ménage, *Neshr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仰”)，并说“突厥蛮”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最早一批突厥人。根据他的说法，突厥蛮人最早来自于伊斯兰教和突厥遗产的融合。“突厥”是在城市定居的、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他们的起源是“突厥蛮”——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者。游牧是比定居更早的生计方式，所以也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内什利在奥斯曼人镇压并铲除安纳托利亚突厥蛮人的时间节点上，试图厘清“突厥”与“突厥蛮”的关系，就显得颇为意味深长。^①

我们发现，穆罕默德二世执政前期的官方史家在写作中避免使用“突厥”一词，甚至只在具有贬义的语境中才使用“突厥”或“突厥蛮”，尤其是在指代那些与奥斯曼当局对抗的地方势力。那种承认奥斯曼具有突厥或突厥蛮起源的叙事，只是代表了民间的、底层的观点。但到了后期，尤其是巴耶济德二世执政的早期，奥斯曼史家们不再避讳使用“突厥”和“突厥蛮”这两个词，反而试图去消除二者与“奥斯曼”在指称上的差异。因为穆罕默德二世打击了地方突厥蛮势力，结束了中央与地方对抗的局面，所以那套奥斯曼与突厥或突厥蛮截然对立的话语便过时了。奥斯曼政治精英在身份认同上的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穆罕默德二世执政晚期和巴耶济德二世执政（1485—1512年在位）早期。^②

巴耶济德二世在惊骇的手足相残中登上大位，故其一生都在担忧兄弟杰姆王子会返回伊斯坦布尔夺权的阴影下度过。这种焦灼的心理状态，注定了他在开疆拓土方面没有多大作为。他的儿子塞里姆一世

① Murat C. Mengüç,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pp. 66-78, esp. p. 74.

② Murat C. Mengüç, *A Study of 15th Century Ottoma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pp. 110-112.

(1512—1520 年在位) 继位后，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东方的萨法维王朝。鉴于此，塞里姆一世的征讨活动聚焦于伊斯兰世界。值得称道的是，他于 1517 年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以开罗作为行政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拥有象征着伊斯兰世界统治合法性的“哈里发”头衔，因为他们在 1260 年从巴格达将阿巴斯的后裔带到了开罗。马穆鲁克王朝末代哈里发穆塔基勒流亡伊斯坦布尔，从此“哈里发”的称号在理论上转移到了奥斯曼苏丹的头上——即便塞里姆一世并没有宣称他将行使“哈里发”的权力。^①

苏莱曼一世（1520—1566 年在位）继位后，帝国的军事征讨再次转移到西线。他先后征服了贝尔格莱德、罗德岛，并与哈布斯堡王朝角逐匈牙利的领土，甚至兵临维也纳城下，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张。随着征服行动在基督教世界的持续推进，苏莱曼的自我定位也越来越膨胀。1530 年，查理五世被教皇克莱蒙七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举动在苏莱曼的眼中，是一种竞争，甚至是挑衅。我们知道，自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来，奥斯曼苏丹就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于是，奥斯曼的易卜拉欣帕夏委托威尼斯方面为苏丹制作一顶头饰，上面堆叠着四个皇冠，顶部饰有羽毛。这顶皇冠的外形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皇冠神似，但是要比后者多出一两层。这件被赋予特殊含义的皇冠，被苏莱曼大帝在民众和外国使节面前展示，以此来彰显他的抱负。^② 一幅 16 世纪中叶的威尼斯木刻

① 哈里发的权柄在塞里姆一世征服开罗之后就转移给他的说法，是 18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中文版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 124 页。

② Gülru Necipoğlu, “Süleymâ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Ottoman-Habsburg-Papal Rivalry”, in H. İnalcık and C. Kafadar eds., *Süleymâ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pp. 163ff.

画显示，苏莱曼大帝甚至头戴七重冠。^①

苏莱曼的夸耀举动，似乎在哈布斯堡的使团面前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不过，随着奥斯曼从哈布斯堡手中夺走匈牙利的多半疆域，苏莱曼的存在逐渐在神圣罗马帝国被感受到。1547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五年的合约，旨在确认双方在匈牙利的领土归属。对于苏莱曼大帝来说，此份协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合约的文本中不再把查理五世称为“皇帝”，而是“西班牙的国王”，反而苏莱曼的头衔是“罗马的皇帝”或“凯撒”。^②

进入苏莱曼时代的鼎盛时期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苏丹的权威不再遭到挑衅，奥斯曼统治的合法性也不再受到质疑，所以关于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叙事就没有再宣传的必要了。在此议题上，也就不再有更新和发展。^③ 随着苏莱曼的去世，奥斯曼帝国从16—17世纪之交起陷入了危机。奥斯曼衰弱的主要表现是苏丹黯弱、派系当权和权贵统治，以及常年的战争拖垮帝国经济。奥斯曼帝国政界和知识界的舆论焦点，不再是奥斯曼人的起源，而是帝国政治资源的分配、官僚等级的合理安排，以及帝国政治制度（例如禁卫军制、蒂玛制）的建设和调适。奥斯曼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帝国内部非突厥语人群（例如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如何获得奥斯曼臣民的身份，并参与帝国的日常运作。

当时的学者卡蒂普·切莱比（Kâtip Çelebi, 1609—1657年）称，

①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中文版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326—327页之间的图版。

②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54.

③ 关于苏莱曼时期的历史书写，参见Kaya Şahin, *Empire and Power in the Reign of Süleyman: Narrating the Sixteenth-Century Ottom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帝国已经进入了衰朽之年。此外，在16世纪90年代写作的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Âli）和在17世纪30年代写作的佩切维（Peçevi）等人，也都警示了后苏莱曼时代的腐败滋长、法制衰退和治国无术。^①这种唱衰奥斯曼帝国的论调，在不少现代学者那里得到了共鸣，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死后一路走衰。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反思，奥斯曼帝国是否真的在17世纪进入了衰落期。或许这些根本不是衰落的表现，而只是在经历一系列的危机，结果是其中的多数危机最终都得以化解，并在实际中巩固了帝国的权力。^②当然，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却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了。

例如，当时的奥斯曼知识分子艾弗里亚·切莱比（Evliya Çelebi, 1611—1683年）在西欧旅行时，虽然开始对西方新鲜玩意儿表现出兴趣，但是内心仍然抱着一层优越感。但是到了18世纪赛克孜耶里姆·切莱比（Sekizyirmi Çelebi）^③1720年作为特使前往巴黎，以及他的儿子赛义德·艾芬迪（Said Efendi）1741年出使巴黎时，都表现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倾慕。^④奥斯曼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态度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奥斯曼帝国自17—18世纪以来开始落后于西方。

必须要说明的是，作为奥斯曼精英金字塔顶端的苏丹是一个特殊

① 16世纪苏莱曼大帝时期的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Âli），参见 Cornell H.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Historian Mustafa Âli (1541-16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学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盛衰之理在于制度设计的利弊和制度效用的长短。参见王三义：《帝国之治：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6页。

② Daniel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23-127.

③ 又称“二十八”切莱比，得名于他曾经服役的兵团番号。

④ 任禹行：《17世纪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欧洲观念分析——以艾弗里亚·切莱比〈旅行之书〉相关记载为中心》，上海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3章。

的角色，他们在奥斯曼治世下的自我定位，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一般的奥斯曼统治官僚和文化精英在身份认同上基本还是延续了15世纪后期以来的官方论调。总的来说，在15—18世纪的奥斯曼精英阶层的观念中，在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突厥语人群和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奥斯曼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历史编纂都是由文化精英留下的，反映的是他们的观念和立场。对于他们而言，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是自我身份建构中的“他者”。

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史家都在强调上述两种人群之间的差异。只有在少数必要的政治语境中，才会暗示二者的共同始祖来源。不过，对共同起源的追溯，绝不是以消除现实中的政治差序为前提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与“突厥”或“突厥蛮”之间身份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中政治地位的不平等。^①我们在第二章中引用了18世纪亚美尼亚裔外交家多桑关于奥斯曼人对“突厥”的鄙夷，以及他们忌讳西方人在他们面前提到“突厥”这个词的记载。^②

第四节 西化改革与帝国晚期的身份纠葛

随着与西方的交流不断深入，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影响到奥斯曼的知识分子。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很难在思想史谱系中找到清晰的坐标。例如，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塞里姆三世执政时期（1789—1807年在位），奥斯曼政府就开启了军事和财政

① 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书写中，“突厥”和“突厥蛮”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这一点，与中亚不同。关于中亚“突厥”与“突厥蛮”的关系，参考本书的第四章。

② 参见本书的第二章第五节。

制度的改革。^①但是，学者们一般都把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于1839年颁布《花厅御诏》的事件，也就是所谓“坦齐马特”运动的开始，作为奥斯曼西化改革的起点。不过，就奥斯曼人的身份认同而言，我们还是要选择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作为分期的节点。究其原因，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也提到，是英国学者亚瑟·戴维斯在此期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奥斯曼土耳其语语法。^②戴维斯的这部献给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作品的影响力远超语言学领域，更是深刻地扭转了奥斯曼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因为他在书中首次将奥斯曼人归入“突厥种族”的范畴。^③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过，近代西方突厥学的发展大致有两条线索可循。首先，前往中国的耶稣会士刘应在《鞑靼史》中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政体都视作“鞑靼”，并建构起一部连续的线性鞑靼史。后来，德金把汉文史料中的“突厥”与西欧文献中的 Turk 勘同。这是对近代西方 Turk 历史语义学的一次纵向延伸。其次，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是近代西欧 Turk 概念的内涵在横向上的一次延展。亚瑟·戴维斯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

① 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② Arthur L. Davids, *A Grammar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with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Turkish nations, a copious vocabulary, dialogues, a collection of extracts in prose and verse, and lithographed specimens of various ancient and modern manuscripts*, London, 1832, xxiv, xii.

③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p. 346;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64页。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90—92页。

下撰写的《土耳其语语法》。他在书中不仅把汉文史料中的匈奴、突厥、回鹘都归为“突厥种族”，并且在回鹘以后的哥疾宁、塞尔柱和奥斯曼之间建立起历史连续性。

欧洲 19 世纪突厥学的知识积淀，为泛突厥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养分。泛突厥主义思想能在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得益于匈牙利学者万伯里的积极奔走。此人在逗留土耳其期间，结识了不少当地的知识分子，且在日后与他们保持着联系。^①除了出版大量介绍中亚语言和民俗的普及性读物之外，万伯里还在 1864 年出版的《中亚旅行》和 1868 年出版的《中亚概览》中勾勒了一个想象的大突厥帝国，其疆域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包括安纳托利亚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等等。^②不过，从理论的高度正式将“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提炼出来，则是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开始的。克里米亚的知识分子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y, 1851—1914）于 1883 年创办《译者》（*Tercüman*）杂志，主张俄国的所有突厥语人群要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精神引领下团结起来，甚至提议要使用一种通用的“突厥语”。通过办杂志的方式，加斯普林斯基正式提出“泛突厥主义”理念，以此作为克里米亚操突厥语的鞑靼人反抗斯拉夫语人群压迫的一种理论武器。^③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救亡图存的话语生态中，与泛突厥主义同时存

①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46-347; 中译本见（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 364—365 页。

② Arminius Vámbé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864; Arminius Vámbéry, *Sketch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868.

③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1995, 2nd edition, pp. 2, 9-11.

在的，还有两种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即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的同情者强调，通过一个普世的帝国公民身份，可以将帝国内所有人群凝聚在一起。在坦齐马特改革期间，奥斯曼精英致力于塑造平等的公民身份，来维持帝国的统一。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有效统治境内不同宗教群体的方式是所谓的“米勒制”，即每个宗教团体内部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套以宗教区分人群的标准，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中显得愈来愈过时。^①主张进步和改革的“坦齐马特”运动力图改革米勒制，引入西方世俗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即无论何种宗教背景，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可是，坦齐马特的奥斯曼主义理念亦面临重重阻碍，一方面帝国内的穆斯林不愿意失去优越地位，另一方面非穆斯林（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在1877年“坦齐马特”运动失败以及1878年奥斯曼帝国失去巴尔干半岛的事实面前，奥斯曼主义的方案开始式微。^②

在奥斯曼主义行不通的时候，帝国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主张一种伊斯兰主义的话语，以期寻找一个共同的前提来凝聚帝国内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的理念，是近代以来穆斯林受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催生的一种反帝理论。^③以哲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al-din Al-Afghani）为代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希望从伊斯兰教中寻找良方，来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在坦齐马特改革期间，伊斯兰主义的观念得不到帝国精英的支持，虽然它不利于团结帝国内部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群，

① 咎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新史学》2002年第13卷，第189—224页。王三义：《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

② 奥斯曼在1877—1878年的战争中败给俄国，导致保加利亚独立，波黑被奥匈帝国吞并，黑山和塞尔维亚独立。

③ 1798年埃及被法国殖民，1857年印度被英国殖民。

但是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1876—1909）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哈米德二世利用他所拥有的“哈里发”头衔，企图团结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全体穆斯林。一旦将此作为理论武器延伸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就是“泛伊斯兰主义”。^① 哈米德二世的主张，却得不到帝国内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同情，所以不得不于1909年流亡海外。

在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泛突厥主义”作为最后一种选项正式走向政治舞台。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至深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组建“团结与进步党”来参与国家政治。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两种路线，分别以优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和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为代表。喀山鞑靼人优素福·阿克楚拉于1904年发表《三种政策》，提炼出奥斯曼帝国晚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三种选项分别是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他基本上继承了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观念，主张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与其他地方的突厥语人群（例如俄国境内的）应该联合起来。换句话说，阿克楚拉“泛突厥主义”主张的底色是民族性的。^②

格卡尔普也曾提出过所谓的“三种思潮”，即现代化、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对于他来说，一个国家不是某一种族的、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共同体，而是由一群享有共同语言、宗教、道德和美学的人群组成。在他看来，土耳其民族主义不是基于血缘或民族的纽带，

① Hasan Kösebalaban: "Ottoman Origins of Turkish Identity Discourse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25-46.

② Yusuf Akçura, "Üç Tarz-ı Siyaset", in *TURK*, Nos. 24-34, Cairo, 1904, reprinted in Istanbul, 1911.

甚至都不是基于公民的纽带，而是基于伊斯兰教的纽带。^①由此可见，“泛突厥主义”本质上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世俗版本。于是，“突厥”作为一个世俗化的标签，代替了“伊斯兰教”来发挥凝聚奥斯曼帝国内不同人群的功能。换言之，“突厥”一词几乎成了穆斯林的代名词。所以，格卡尔普路线的底色是宗教性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便退出了政治舞台。一起进入历史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三种不合时宜的帝国意识形态。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人在帝国的废墟上进行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1923年在瑞士签订的《洛桑条约》，划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疆域边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土耳其共和国，无疑是土耳其人与西方列强反复斗争的结果。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如果我们参照近代以来西欧知识谱系中对 Turk 的定义，即居住在小亚细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人群，那么无论是从疆域还是从宗教，抑或是从语言这三个核心指标来看，土耳其共和国都与欧洲人的构想一致。换句话说，不管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精英曾经对“突厥”这个名称有多么的嫌弃，最终还是被动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将其作为身份重塑的出发点。

小 结

本章历时性地探讨了奥斯曼帝国从早期到晚期的起源叙事和身份认同，指出了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政治内涵。

① Ziya Gökalp, *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translated from the Turkish and annotated by Robert Devereux, Brill, 1968, pp. 12-16. 曾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第19—25页。

奥斯曼帝国早期没有留下可信的史料，真正开始编纂史料是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此时的奥斯曼政治体经历了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羞辱的事件，以及安纳托利亚其他突厥语人群对奥斯曼人起源的嘲讽和合法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穆拉德二世时期的史家将奥斯曼苏丹追溯到乌古斯可汗的长子、长孙，以此来塑造奥斯曼政权的正统和优越性。到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将奥斯曼人追溯到乌古斯人群的叙事仍然存在，但已不再为官方所认可，只是代表了民间的观点。作为统治阶层金字塔尖的苏丹开始将自身定位成更加具有普世性的“皇帝”。这种定位经由塞里姆一世，延续到苏莱曼大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则构建了一套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奥斯曼认同与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突厥蛮认同之间的二元对立叙事。作为统治阶层的奥斯曼人，在文化上是高级的，推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突厥蛮人，在文化上是落后的，讲的突厥语。奥斯曼帝国晚期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三种可选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究竟选择何种理论武器作为救国的良方，取决于当政者的理念和具体的政治语境。从结果来看，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是以安纳托利亚为主，主要国民是穆斯林，操突厥语。不难发现，土耳其人在身份认同上现代化的结果，与西方自近代以来对“突厥”一词的定义一致。这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塑造历史上，观念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结论：概念、人群与神话的纠缠

本书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单纯的“概念”，还不如说是概念、人群和神话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我们要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概念、人群和神话三重角色，并弄清楚在具体情境下究竟是概念本身在流动，还是人群在迁徙，抑或是借助神话的介质让两者表现出了某种同步性。

一、概念的流动

不同于诸如“革命”和“民主”之类具有政治属性的抽象概念，本书讨论的对象更多的是用于指代人群集合体的名号，俗称“族名”。也就是说，“突厥”是有具体指代对象的族群概念，且它指代的对象会因语境而变。因此，我们无法从阿瑟·洛夫乔伊“实体单元”的角度去追究“突厥”的实在论超验存在。当然，人们可以借助特定的手段，将诸语境中概念指称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抹平，人为地建构出一套统一和连续的叙事。

本书首先讨论的是“突厥”作为一个族群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动。突厥汗国灭亡后，统治阶层悉数南迁长安，汉文史料中的“突厥”也渐次成为化石名词。但是，在中国以西的非汉语文献中，“突厥”仍以各种变体形式继续存在。公元9—11世纪的拜占庭

编年史中，“突厥”被用来指称哈扎尔人和马札尔人（今匈牙利人的先祖）。在同时期及稍晚的伊斯兰著述中，“突厥”作为一种兼具语言学和政治文化特点的概念，泛指欧亚草原上非穆斯林的游牧人群。近代以来西欧知识界的“突厥”概念，则经历了一个从专指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到“突厥语族”范畴的提出，再到“突厥种族”和“突厥民族”话语建构的曲折过程。

伴随着“突厥”这个概念在不同时空语境中的旅行，它指代的对象亦如滚雪球一般逐渐变得饱和。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将“鞑靼利亚”的普世知识推己及人的热忱，以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多维度建构“突厥”话语之后，又有了返璞归真的趋势，表现为更多地采用突厥语人群自身的视角和称谓。于是，一套更加理性，也更符合民族国家时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名称，取代了具有宗教影射功能的“突厥”和内嵌西方话语霸权的“鞑靼”。学者们也刻意区分出“突厥”和“突厥语人群”两个概念，以更加科学和规范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和现实议题。

二、人群的迁徙

族名之所以会流动，往往是因为族群本身的历史发生了中断甚至终结。对于学者来说，人群的迁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是否有历史文献作为支撑，将突厥语人群的迁徙大致区分为真实的和想象的两种类型。当突厥汗国的政治精英在可敦的率领下进入唐朝都城的同时，草原上的底层牧民面对草原霸权易主的局面，多数会选择进入新的回鹘政权继续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但是，帝国内部的小型族群共同体，例如九姓乌古斯，则继续西迁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可兹佐证的是，伊斯兰文献中9世纪起开始出现“乌古斯”的记载。所以，我们只能保守地说：历史上没有突厥的西迁，只有乌古斯的西迁。

乌古斯人群的迁徙虽然有史料的支撑，但这些证据毕竟是散落于不同语种中的，必须要人为拼凑出一幅连贯的迁徙图景来，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也有想象和重构的成分。与乌古斯人这种时空跨度较大的迁徙不同，回鹘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信度更高的迁徙版本。从新旧《唐书》的“回鹘传”，到元代的家传和碑刻，我们基本能够在汉文史料中勾勒出回鹘从漠北到高昌的迁徙历史。刚到高昌后不久的回鹘统治者，返回漠北的雄心溢于言表：“举国将相遗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坟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尝胆思报，大雪冤耻，告谢幽魂。”甚至，直到元代畏兀儿的祖先叙事中，仍然残存着漠北草原时代的记忆，所谓“僊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噉欲谷，本中国人”。尽管该说法将原本属于突厥汗国的权臣噉欲谷误作回鹘先祖，但其中流露出来的元代畏兀儿人在身份认同上所做的积极努力，却是不容忽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与本书讨论内容相关的迁徙，但学者们对其关注的焦点不在族源和身份认同上，而是在正朔和僭伪上。例如，非汉语人群在今天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迁徙，其代表是南北朝时期的慕容鲜卑西迁青海建立吐谷浑政权，以及12世纪的契丹耶律大石西迁新疆建立西辽政权。再例如，汉语人群在汉文化圈内的迁徙，以永嘉南渡和建炎南渡为代表。

上文讨论的人群迁徙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史家对它们的认知或许会因时代而异。在突厥学的知识生产中还有一种常见的人群迁徙，系学者依据不同文献中个别族名的语音对勘，凭空勾勒出来的一套长时段的远程迁徙神话。就“突厥”而言，不乏有人图绘了一幅

从漠北的突厥汗国（甚至更加古老的匈奴），一路向西迁徙直到博思普鲁斯海峡的幻象。再例如，德国东方学家马夸特（Josef Marquart, 1864—1930）将中世纪欧洲的库蛮与奥斯曼人的祖先凯伊联系起来，并将其族源追溯到我国东北的靺鞨和奚。这套以揭示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联系”为核心的知识生产逻辑，或是把史料中两个不同名称的人物比定为同一个人，或是把不同时空内的民族或人群通过迁徙和起源叙事搭建起共同的纽带，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学术理路。

依据零散的语音之间的疑似关联，凭空建构出历史事实的做法，会让人对这门学科的严肃性产生疑虑。19世纪后期伟大的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曾与尼采师出同门。就在后者以一部《论悲剧的起源》表达出对传统语文学的离经叛道之际，夏德却提炼了一套更加务实的“审音勘同”方法，成为中外关系史学者的利器。他强调，必须在有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才能使用审音勘同作为辅助手段，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诡辩思维，去纠结历史事实和语音关联之间谁先谁后的问题。但是，在对音手段愈加娴熟的今天，或许更有必要反思这套方法的基本逻辑。

三、神话的流传

在政治学意义上，“神话”被定义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叙事，它为过去、当下和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出一种可靠的说法，

并且被特定社会群体视为在本质上是值得信赖的。^①

按照上述定义，“神话”是一套承载着政治功能的叙事。那么，在突厥语人群中经久传唱的英雄史诗《乌古斯》，理当纳入其范畴。除了在中亚和西亚的民间吟唱之外，乌古斯可汗及其后裔的“神话”，还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群写成回鹘文、波斯语、奥斯曼语和察合台语等文本。由于口头文学的传承者会根据特定情境加入自己的主观理解，故早期的文本中残存了不同突厥语支的痕迹，以至于很难用现代的语言学分类标准对它确定坐标。在早期的回鹘文本中，主人公被塑造成斩妖降魔的英雄，缓解了西迁乌古斯人在面对同时期蒙古语人群拥有成吉思汗这位伟大世界征服者时内心的卑怯。后期具有伊斯兰化特征的版本，无论是人物语言的设计，还是故事情节的改动，处处体现了宗教劝勉晓谕的功能。

在兰克为现代史学奠定科学标准以前，史学与史诗的界限其实是模糊不清的，这一点在伊斯兰学者的著述中尤甚。17世纪中亚希瓦汗国君主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亲自编纂的两部“世系体”史书，延续了乌古斯可汗及其后裔的“神话”叙事，但更多地是出于铸牢统治合法性的考虑。《突厥世系》和《突厥蛮世系》要为现实政治秩序提供一种权威解释，于是，社会上原来流传的、彼此存在竞争关系的多元叙事，一律都被斥为“错误百出、互相抵牾、各说各话”。这套突厥“神话”世系，甚至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西欧，为启蒙知识分子带来了本土视角下的新鲜知识，并影响到欧洲学者对内陆亚洲的认知。

乌古斯的“神话”叙事，早在15世纪便进入了尚处于兴起阶段的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视野，并成为其巩固政权的理论依据。彼时

^① Christopher Flood, *Political Myth*, Routledge, 2001, p. 44.

脆弱的奥斯曼政权，不仅要与其他突厥语邦国在安纳托利亚争夺生存空间，还要承受来自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压迫。于是，刚从政治停摆中缓过神来的穆拉德二世便积极主导修史工程，钦定将苏丹家族追溯到乌古斯可汗长子昆汗和长孙凯伊的叙事为官方版本。即便这套叙事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凯伊”与突厥语中的“水手”谐音，但当时的奥斯曼苏丹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漠视这种对于曾经的他们来说极具羞辱性的嘲讽了。选择这套叙事的政治考虑一目了然：曾经用“水手”譬喻揶揄过奥斯曼苏丹的帖木儿汗和突厥蛮卡迪·布尔汗·阿尔丁的先祖分别追溯至乌古斯可汗的次子艾汗和第五子塔克汗。于是，穆拉德二世借由乌古斯“神话”来重新定位奥斯曼与突厥蛮邦国以及帖木儿帝国之间尊卑关系的努力，呼之欲出。

在文体学上，叙事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甚至也能借助图像的手段来呈现。近代以来，欧洲知识界依托严格的耶稣会通信机制，更新了中世纪以来对“鞑靼”的认知，并形成一套新的“神话”：将长城以北历代政权想象成与“中国”为敌四千余年的连续政治体。欧洲的新鞑靼叙事，以绘制地图的直观方式得到强化，并流传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卫匡国在《新版中国地图》中只绘制了内地省份，不包括中国东北、西藏、新疆和蒙古。即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实际政治版图的阶段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欧洲知识界以新鞑靼叙事为前提的世界观，通过新式地图的“神话”载体向其他地区传播。

本书的研究表明，以口头、书面和图像为载体的各种类型的叙事“神话”，通过不同渠道实现了跨文化和跨族际的流传。“神话”的出现，一般情况下都不是与概念和人群的迁徙同步的，其功能更多地是为后两者营造出一种“同步”的表象。

四、概念、人群与神话的纠缠

在突厥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进程中，概念的流动与人群的迁徙具有同步性的情况较为少见，或者即便有，存续的时间也很短。例如，漠北回鹘西迁高昌后，总体上沿用了游牧汗国时期的国族概念，并在不同时代汉文史料中留下了“回纥”、“回鹘”、“畏兀儿”“维吾尔”等音译。当然，绝不是说从古代“回鹘”到现代“维吾尔”之间没有任何波折，只是说此概念的内涵相对具有连续性。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回鹘在西迁前后所面对的主要文化对象没有改变，始终都是中原。

换句话说，如果概念和人群在同一个文化圈内迁徙，那么它们二者同步的可能性要高于那些跨文化、跨族际的远程迁徙。例如，乌古斯人群的西迁，早期也是伴随着“乌古斯”概念的西迁。但是，乌古斯人在中亚落地生根后，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宗教信仰开始改变，于是率先皈依伊斯兰教的那批乌古斯人被邻近穆斯林民族冠以“突厥蛮”的称谓，以便区别于尚未脱离宗教蒙昧状态的同胞。大约到蒙古人统治的13世纪，“突厥蛮”便全面取代“乌古斯”，成为压倒性的族群概念。此后的史料中，“乌古斯”更多地是作为“神话”叙事中虚构人物“乌古斯可汗”的名号，而不再作为现实中人群集合体的概念使用。

相反，不同步性，才是概念流动与人群迁徙二者之间的常态。西征到布达佩斯的蒙古人，并没有将他们引以为傲的“蒙古”名号及其所依附的一套苍狼白鹿神话同步携至多瑙河畔。以法王路易九世为代表的西欧宗教精英，使用带有歧视意味的谐音词“地狱”，来指代他们心中的“上帝之鞭”。拔都在伏尔加河流域肇建的金帐汗国所面对的斯拉夫语人群，更是以“鞑靼之鞭”的譬喻来为他们所遭受的异族压迫泄愤。明末清初入华的耶稣会士，依据一手史料扩充了“鞑靼”

概念的指称，使其远远超过蒙古人的范畴，成为长城以北历代游牧政权的泛称。从当时欧洲人绘制的地图可知，近代以来的内陆亚洲终于有了一个总称——“鞑靼利亚”。

“突厥”的概念，有着类似的轨迹。公元745年漠北草原易主之际，突厥汗国的统治精英南下长安，底层的“突厥”子民选择迎接回鹘建立的新政权，但“突厥”的名号却在中国以西的空间流传开来。当然，一方面，西方——包括中亚、拜占庭帝国，甚至更远的拉丁语世界——本来就有基于西突厥汗国对西方施加影响而形成的突厥认知前提。到中世纪后期，西欧人观念中的“突厥”是宗教范畴的概念，主要指小亚细亚的穆斯林人群。但另一方面，随着乌古斯人群来到中亚并与本地人互动，逐渐混淆了“突厥”的原初概念。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突厥”是政治文化范畴的概念，是指称内陆亚洲游牧民的最大公约数。伴随着现代突厥学的知识生产，“突厥”又成为人群集合体的范畴。于是，“突厥语族”取代了早期的“突厥—鞑靼语集”，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影响至今。

既然对于概念和迁徙来说，“断裂”是常态，“连续”是变态，那么如果要呈现出一套连续且统一的样貌，就要用一种介质来抹平历史进程中的峡谷断崖。换句话说，“神话”的作用，就是要在概念的流动和人群的迁徙之间建构出某种同步性。概念、迁徙和神话这三者之所以发生纠缠关系，背后的根本动因都是作为历史行为体的人，尤其是政治、宗教和文化精英，以及沉潜于历史洪流中的人民大众。从“突厥”概念史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神话”与“概念”和“人群”的纠缠中，历史行为体的能动性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以不平等权力关系为前提的概念输出。近代以来的欧洲知识界针对内陆亚洲的广泛人群，大致形成两股知识潮流，分别围绕

“鞑靼”和“突厥”进行概念建构和知识生产。不管是“鞑靼利亚”还是“泛突厥主义”，本质上都是向欧洲以外地区输出的非对称概念。

（二）主动利用概念异同和历史资源以迎合现实中的政治预期。譬如：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二世主导的修史事件，目的是为统治家族的世系钦定官方版本；中亚的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纂修史书，以映射现实中“突厥”与“突厥蛮”的主从政治秩序。

（三）非自觉地接受内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概念。17 世纪以后的奥斯曼帝国，始终是在参照西方镜子中的“自我”不断调适身份认同。帝国晚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泛突厥主义”思潮，甚至共和国建立后的国名和疆域，都可以从中看到西方的“突厥”概念对其所施加的长时段影响。

参考文献

(一) 史料

-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63年。
-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
-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
-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四库唐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
- (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
- (唐)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 (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 (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
-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二) 中文研究文献

- 《回回馆杂字》,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年。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袁剑译：《中亚的中央性》，《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11辑，第16—76页。

〔德〕冯凯：《概念史：德国的传统》，载《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

〔德〕施瓦布著，楚图南译：《希腊神话和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俄〕巴托尔德：《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王小甫译，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第104—115页。

〔俄〕巴托尔德：《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下册，张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

〔法〕魏义天著，敖特根、马纳琴译，《慧思陶勒盖碑铭的历史背景》，《丝路文明》2020年11月，第147—155页。

〔古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版。

〔美〕丹尼斯·塞诺撰，邓永红译，陈浩校：《关于乌兹别克汗国的几条拉丁语史料》，《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3页。收入陈浩主编：《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19—332页。

〔日〕箭内互著，陈捷、陈清泉译：《兀良哈及鞑靼》，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2年。

〔日〕林佳世子著，钟放译：《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

〔乌兹别克斯坦〕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英〕加文·汉布里主编，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

〔法〕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1956年，第110—159页。

- (英) 约翰·达尔文著, 陆伟芳、高芳英译:《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大象出版社, 2011年。
-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 罗贤佑译:《突厥世系》, 中华书局, 2005年。
- 白玉冬:《“达靼”源流及蒙元对达靼的认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3年第1辑(总第7辑), 第166—199页。
- 白玉冬:《九姓鞑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 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国学季刊》1952年第7卷第3号。
- 岑仲勉:《突厥与兜鍪》, 原刊于《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年11月26日, 第27期, 收入氏著:《突厥集史》, 中华书局, 1958年第1版(2004年第2次印刷)。
- 陈浩:《〈乌古斯可汗传〉版本源流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第5—13页。
- 陈浩:《安居耶尼考》, 载《欧亚学刊》新5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150—151页。
- 陈凌:《突厥毗伽可汗宝藏及相关问题》, 载《欧亚学刊》第7辑,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73—86页。
- 陈文海:《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身份问题》,《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 第25—34页。
- 陈文海:《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第84—91页。
- 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 第93—102页。
-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 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 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三分, 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年, 第128—139页。
-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 方壮猷:《鞑靼起源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期, 第1—16页。
-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年。

- 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原刊于《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4卷，收入氏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5—350页。
- 韩儒林主编：《元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韩志斌、姜欣宇：《“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17—30页。
-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5—121页。
- 黄达远：《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 李锦绣：《总材山考》，载《欧亚学刊》新7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5—59页。
- 李隆国：《〈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83—92页。
- 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1期，第68—76页。
- 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8—41页。
- 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刘迎胜：《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90年第12、13辑合刊，第80—106页。
-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 孟珙：《蒙鞑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本，1988年。
-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文集》卷十一，汤锐点校、整理：《欧阳玄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 任禹行：《17世纪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欧洲观念分析——以艾弗里亚·切莱比〈旅行之书〉相关记载为中心》，上海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
- 芮传明：《古突厥先祖传说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第51—58页。
- 王国维：《鞑靼考》，《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1期，第651—678页。
- 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1年第二

- 本第三分。收入氏著：《王静如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1—45页。
- 王三义：《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 王三义：《帝国之治：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 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于1992年。
-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
-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于1998年。
- 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论阿史那氏到突厥族的历史演变》，《西域研究》1987年第1期，第71—87页。
- 姚大力：《中国文明是一个“多数的文明”》，《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6月25日。
-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魏萃一译：《福乐智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
- 于子轩：《柔然文小考》，《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2期，第95—121页。
- 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27—36页。
- 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3—51页。
-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
- 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16—24页。
-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替涛：《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替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 替涛：《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尔卡普“托古改制”式

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第19—25页。

咎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新史学》2020年第13卷，第189—224页。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张先清：《“鞑靼”话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满族的民族志观察》，《学术月刊》2009年第41卷2月号，第118—127页。

张旭鹏：《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1卷第2期，第65—72页。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7—88页。

周伟洲：《番与白番考》，《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138—145页。

（三）外文研究文献

Abel-Rémusat, Jean Pierre: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ou Mémoire sur différens points de la grammair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Mongols, des Ouigours et des Tibetains*, Tome Ier, Paris, 1820.

Abu'l Ghâzi Bahâder, Khân of Khowârazm: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Moguls and Tatars, vulgarly called Tartars: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ies they inhabit*, London, 1730.

Ágoston, Gábor & Bruce Maste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2009.

Akçura, Yusuf: “Üç Tarz-ı Siyaset”, in *TURK*, Nos. 24-34, Cairo, 1904, reprinted in Istanbul, 1911.

Al-Bīrūnī, كتاب الجماهر في معرفة الجواهر / *Kitāb al-jamāhir fī ma'rifāt al-jawāhir*, S. Krenkow ed., Hyderabad, 1936.

Al-Kāšgarī, Maḥmūd: *Dīwān Luyāt at-Turk/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Robert Dankoff & James Kelly ed.,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汉译本参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

Allaeva, Nigora: “The *Shajara-je Turk*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Khiva and Its Neighbours”, in *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 vol. 7, 2014, pp. 55-87.

Anooshahr, Ali: *The Ghazi Sultans and the Frontiers of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Routledge, 2009.

Anthony, W. David: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Atwood, P. Christopher: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6, 2013, pp. 49-86.

汉译本参见〔美〕艾骜德著，陈浩译：《若干早期内亚名号考证》，载《清华元史》（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85—334页。

Axmedov B. A. (Б. А. Ахмедов):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XVI-XVIII вв.*, Ташкент, 1985.

Babinger, Franz: *Die Geschichtsschreiber der Osmanen und Ihre Werke*, Leipzig, 1927.

Bailey, H. W.: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şou", in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1, 1949, pp. 28-52.

Bailey, H. W.: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39 (No. 1 Jan.), pp. 85-91.

Bailey, H. W.: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Caravan Books, 1981.

Bailey, H. W.: *The Culture of the Turk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Caravan Books, 1982.

Barthold, W.: "Turkoman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st edition, vol. 4, Brill, 1934, p. 897.

Beckwith, Christopher I.: "The Chinese Names of the Tibetans, Tabghatch, and Turks", in *Archivum Asiae Medii Aevi*, vol. 14, 2005, pp. 5-20.

Beckwith, Christopher I.: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Berman, Nina: *German Literature on the Middle East: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1000-198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1.

Bichurin, N. (Бичурин, Никита Я.):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очинение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ѳа. Ч. I, отд. II.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51.*
- Bisaha, Nancy: *Creating East and West: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Bloch, Edgard: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turcs*, Tome I, Paris, 1932.
- Blockley, Roger C.: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Francis Cairns, 1985.
- Böhtlingk, Otto: *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St. Petersburg, 1851.
- Boodberg, Peter A.: "Three Notes on the T'u-Chüeh Turks", in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Berkeley, 1951, pp. 1-11.
- Brendel, Otto J.: *Etruscan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rentjes, Burchard: "Romulus und Remus mit der Wölfin aus Nordtadschikistan: Ein Beitrag zu den byzantinisch-türkischen Beziehungen im 6. Jahrhunder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15, No. 3, 1971, pp. 183-185.
- Brown, Elizabeth A. R.: "The Trojan origins of the French and the brothers Jean du Tillet", in Alexander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Narrators and Sources of Early Medieval History*, Toronto, 1998, pp. 348-383.
- Cahen, Claude: "Le Problème ethnique en Anatolie", in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ol. 2, 1954, pp. 347-362.
- Cahen, Claude: *The Formation of Turkey, The Seljukid Sultanate of Rûm: Eleven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Longman, 2001.
- Cahun, Léo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sie, Turcs et Mongols des Origines à 1405*, Paris, 1896. 奥斯曼土耳其语译本见 *تورك تاريخي/Türk Tarihi*, Istanbul, 1899.
- Cary, John: *New Universal Atlas, containing distinct maps of all the principal states and kingdoms throughout the world. From the latest and best authorities extant*, London, 1808.
- Chavannes, Edouard: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in *T'oung Pao*, vol. 6, 1905, pp. 519-571.
- Chen Hao: "Baz Qaga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quz Oguz", in *Chronica*.

- Annua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zeged*, 2018, pp. 43-50.
- Cherefeddin, Ali: *The History of Timur-Bec, Known by the Name of Tamerlain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vol. 2, 1723.
- Çirakman, Aslı: *European Images of Ottoman Empire and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2.
- Clark, Larry: "Mongol Elements in Old Turkic?" i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vol. 75, 1977, pp. 110-168.
- Clauson, Gerard: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 Clauson, Gerard: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London, 1962.
- Clüver, Philipp: *Introductio in Universam Geographiam*, London, 1624.
- Connell, Charles W.: "Western views of the origin of the 'Tartars'", in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III, 1973, pp. 115-136.
- Connell, Charles W.: *Western Views of the Tartars, 1240-1340*, Ph. D. thesis, Rutgers University, 1969.
- D***, *Histoire genealogique des Tartars, Traduite Du Manuscrit Tartare D'abulgasi Bayadur Chan*, Leiden, 1726.
- D'Oshson, Ignatius Mouradjea: *Tableau Général de l'Empire othoman*, vol. IV, Paris, 1791.
- D'Orléans, Pierre Joseph & Nicholas Witsen: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st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two journeys into Tartary of Father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suite of the Emperor Kan-hi*, ed. by Richard Henry Major, London, 1854.
- D'Orléans, Pierre Joseph: *Histoire des deux conquérants Tartares qui ont subjugué la Chine*, C. Barbin, 1688.
- Davids, Arthur L.: *A Grammar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with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Turkish nations, a copious vocabulary, dialogues, a collection of extracts in prose and verse, and lithographed specimens of various ancient and modern manuscripts*, London, 1832.
- Desmaisons, Le Baron: "Manuscrit de l'Arbre généalogique des Turks, par Aboul-

- Ghazi, envoyé à l'Académie par M. Dahl à Orenbourg, et analysé par M. Desmaisons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M. Fraehn (lu le 8 juin 1838)", in *Bulletin Scientifique publié par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aint-Petersbourg*, Tome 4, 1858, Leipzig, pp. 229-234.
- Desmaisons, Le Baron: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 I. Texte, St. Petersburg, 1871.
- Desmaisons, Le Baron: *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âzi Behâdour Khan*, Tom II. Traduction, St. Petersburg, 1874. 汉译本见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5年。
- Dienes, Mary: "Eastern Missions of the Hungarian Dominica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Isis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vol. 27: 2, 1937, pp. 225-241.
- Doerfer, Gerhard: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 Wiesbaden, 1965.
- Drompp, Michael: "The lone wolf in Inner Asia",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31: 4, 2011, pp. 515-526.
- Duda, Herbert W.: *Die Seltschukengeschichte des Ibn Bibi*, Kopenhagen, Munksgaard, 1959.
- Erdal, Marcel: "Helitbar and some other early Turkic names and titles", in *Turkic Languages* 20, 2016, pp. 170-178.
- Ergul, F. A.: "The Ottoman Identity: Muslim, Turkish or Rum?",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8(4), 2012, pp. 629-645.
-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London: John Murray, 2005. 汉译本见（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奥斯曼帝国（1299—1923）》，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 Fleischer, Cornell H.: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Historian Mustafa Âli (1541-16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Frähn, Ch. M. V.: *Abulghasi Bahadür Chani Historia Mongolorum et Tatarorum*, Casani, 1825.
- Frähn, Ch. M. V.: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ъ*, А-АЛ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35.

Frankopan, Peter: "Why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Global Middle Ages", *Journal of Medieval Worlds*, vol. 1, 2019, pp. 5-10.

Frenkel, Yehoshua: "The Turk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Reuven Amitai & Michal Biran ed., Brill, 2004, pp. 201-234.

Gabain, Annemaria von et al.: *Turkologie*, Brill, 1963, 1982.

Gabain, Annemaria vo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1941, 1974.

Georg, Stefan: Haupt und Glieder der Altaischen Hypothese: die Körperteilbezeichnungen im Türkischen, Mongolischen und Tungusischen,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eue Folge 16, 1999/2000, pp. 143-182.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David Womersley, 3 vols, Harmondsworth, 1994.

Gibbons, Herbert A.: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I (1300-140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es J. A. tr.: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vol. 1, London, 1852.

Goffart, Walter: "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 *Speculum*, vol. 38: 2, 1963, pp. 206-241.

Goffman, 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Gökalp, Ziya: *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translated from the Turkish and annotated by Robert Devereux, Brill, 1968.

Golden, Peter B.: "Imperial Ideology and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Unity amongst the pre-Çinggisid Nomads of Western Eurasia", 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2, 1982, pp. 37-77.

Golden, Peter B.: "Oq and Oğur ~ Oğuz", in *Turkic Languages*, vol. 16, 2012, pp. 155-199.

Golden, Peter B.: "The Conversion of the Khazars to Judaism",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New Perspectiv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Jerusalem 1999 International Khazar Colloquium hosted by the Ben Zvi Institute*, Peter B. Golden, Haggai

- Ben-Shammai & Andr   R  na-Tas ed., Brill, 2007, pp. 123-162.
- Golden, Peter B.: "The ethnogenic tales of the Turks", in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vol. 21: 2, 2018, pp. 1-37.
- Golden, Peter B.: "The migrations of the O  uz", in *Archivum Ottomanicum*, vol. 4, 1972, pp. 45-84.
- Golden, Peter B.: "The Turkic World in Ma  m  d al-K  shghar  ", in Jan Bemm  nn & Michael Schmauder ed.,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2015, pp. 503-556.
- Golden, Peter 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Otto Harrassowitz, 1992.
- Golden, Peter B.: *Khazar Studies: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 1980.
- Guignes, Joseph de: *Histoire G  n  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Paris, 1757.
- Guthm  ller, Bodo & Wilhelm K  hlmann: *Europa und die T  rken in der Renaissance*, Max Niemeyer Verlag, 2002.
- Haarmann, Ulrich W.: "Ideology and history, identity and alterity: the Arab image of the Turk from the 'Abbasids to modern Egypt",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1988, pp. 175-196.
- Halperin, Charles J.: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9.
- Hamilton, James: "Toquz-oyuz et On-Uyyur", in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L, 1962, pp. 23-63. 汉译本见〔法〕哈密顿著，耿昇译：《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期，第130—140页；《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续）》，《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128—143页。
- Hammer, Joseph vo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1. Bande, Budapest, 1827.
- Harmatta, J  nos: "A t  rk  k eredetmond  ja", *Magyar Nyelv*, vol. 95: 4, 1999, pp. 385-397.
- Harmatta, J  nos: "Irano-Turcica",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 Hungaricae*, vol. 25, 1972, pp. 263-273.
- Harmatta, János: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vol. 2, UNESCO, 1999, pp. 417-440.
- Hase Salto, Maria Aurora von: "Ein Werk des Mittelalters: Neue Erkenntnisse über die Kapitولينische Wölfin", in *Antike Welt*, vol. 5, 2012, pp. 53-56.
- Hellmann, Siegmund: "Das Fredegarpromblem", in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vol. 29, 1934, pp. 36-92.
- Hesiod, *Theogonie*,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on Otto Schönberger, Stuttgart, 1999.
- Hirth, Friedric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im 7. und 8. Jahrhunder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in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W. Radloff ed., St. Petersburg, 1899, pp. 1-128. 汉译本见 (德) 夏德撰, 陈浩译: 《跋噉欲谷碑》, 载《欧亚译丛》第3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第98—214页。
- Hirth, Friedrich: "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i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n und der 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München*, Bd. II, Heft II., 1899.
- Holmes, Catherine & Naomi Standen: "Defining the Global Middle Ages", in *Medieval Worlds*, No.1, 2015, pp. 106-117.
- Houtsma, M. Th.: *Histoire des Seldjoucides d'Asie Mineure d'apres Ibn Bibi, Texte turc*, Leiden, 1902.
- H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A.H. – 982 A.D.*, tr. V. Minorsky, E. J. Gibb Memorial Trust, 2nd edition 1970. 汉译本见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Central-Asien: Allgemeine geologische Ansichten über Asien*, Berlin, 1844.
- Imber, Colin: "Canon and apocrypha in early Ottoman history", in Colin Heywood and Colin Imber ed., *Studies in Ottoman History in Honor of Professor V. L. Ménage*, Istanbul, 1994, pp. 117-137.
-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İnalcık, Halil & Mevlud Oğuz ed.: *Gazavât-ı Sultân Murâd b. Mehmed Hân: İzladî ve Varna Savaşları (1443-1444) Üzerinde Anonim Gazavatname*, Ankara, 1978.
- İnalcık, Halil: "The question of the em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2, 1980, pp. 74-75.
- İnalcık, Halil: *Kuruluş Dönemi Osmanlı Sultanları (1302-1481)*, İslam Araştırmaları Merkezi, 2010.
- Ingram, Anders: *English Literature on the Ottoman Turk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Durham Theses, 2009.
- Ingram, Anders: *Writing the Ottoman: Turkish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Jackson, Peter & David Morge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London, 1990.
- Jahn, Karl: *Die Geschichte der Oguzen des Rasîd Ad-Dîn*, Kommisions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Wien, 1969.
- Johanson, Lars: "Mutmaßungen über schwedische und türkische Runen", *Zwischen Polis, Provinz und Peripherie. Beiträge zur byzantinischen Geschichte und Kultur*, Lars M. Hoffmann ed., Wiesbaden, 2005, pp. 808-822.
- Jones, David: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Turks from their origin in the year 755 to the year 1718*, Gale ECCO, 2010.
- Jones, Norman: "The adaptation of tradition: The image of the Turk in Protestant England", in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2: 12, 1978, pp. 161-175.
- Julien, Stanislas: "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Tou-kiou (Turcs). Extraits du Pien-i-tien et traduits du Chinois", in *Journal Asiatique*, vol. 6 (3), pp. 416-549, (4), 1864, pp. 453-530.
- Kasai, Yukiyo: "Die alttürkischen Wörter aus Natur und Gesellschaft in chinesischen Quellen (6. und 9. Jh.). Der Ausgangsterminus der chinesischen Transkription tūjue", in *"Die Wunder der Schöpfung" Mensch und Natur in der türksprachigen Welt*, B. Heuer, B. Kellner-Heinkele and C. Schöning ed., Würzburg, 2012, pp. 81-141. 英译本见 Kasai Yukiyo,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Old Turkish Word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from the 6th - 9th

- Century: Focused on the Original Word Transcribed as Tujue”, in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vol. XXIV, 2014, pp. 57-136.
- Kastritsis, Dimitris: *The Sons of Bayezid*, Leiden: Brill, 2007.
- Klaproth, H. Julius: *Abhandlung Uigurischen Schrift und Sprache*, Paris, 1820.
- Klaproth, H. Julius: *Asia Polyglotta*, Paris, 1823.
- Kljaštornyj Sergej G. & V. Livši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26 (1), 1972, pp. 69-102.
- Kljaštornyj, Sergej G.: “The Royal Clan of the Turks and the Problem of Early Turkic Iranian Contact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47: 3, 1994, pp. 445-447.
- Koelle, Sigismund W.: “On Tartar and Turk”,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4: 3, 1882, pp. 125-159.
- Копонов, А. Н. (Андрей Н. Кононов): *Родословная Туркмен*, Москва, 1958.
- Köprülü, M. Fuad: “Bizans Müesseselerinin Osmanlı Müesseselerine Te’siri Hakkında Bazı Mülâhazalar”, in *Türk Hukuk ve İktisat Tarihi Mecmuası* 1, 1931, pp. 165-313.
- Köprülü, M. Fuad: *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35.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y Leis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Korfmann, Manfred: “Troia, an ancient Anatolia palatial and trading cente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period of Troia VI/VII”, in *The Classical World*, vol. 91: 5, 1998, pp. 369-385.
- Kösebalaban, Hasan: “Ottoman Origins of Turkish Identity Discourse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25-46.
- Kritovoulos: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Krusch, Bruno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Tomus II., *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 Viata sanctorum*, Hannover, 1888.

- Krusch, Bruno: "Die Chronicae des sogenannten Fredegar", in *Neues Archiv der 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vol. 7, 1882, pp. 249-345, 421-516.
- Kumar, Krishan: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Landau, Jacob M.: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1981.
- Laut, Jens P.: *Was ist Türkologie? Überlegungen zu einem sogenannten Orchideenfach*, Bonn, 2013.
- Lee Joo-Yup: "Some Remarks on the Turkicization of the Mongols in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Qipchaq Steppe",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71, no. 2, 2018, pp. 121-144.
- Lee Joo-Yup: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Term Turk and the Nature of the Turkic Identity of the Chinggisid and Timurid Elites in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9: 1/2, 2016, pp. 101-132.
- Lee Joo-Yup: "Turkic Identity in Mongol and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Qipchaq Steppe", *Th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David Ludde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Lewis, Bernar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汉译本见〔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
- Lindner, Rudi P.: *Exploration in Ottoman Pre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 Lindner, Rudi P.: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Indiana University, 1983.
- Livius, Titus: *Römische Geschichte*, tr. Hans Jürgen Hillen, Buch I., Artemis & Winkler, 2007.
- Lovejoy, Arthur: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Lowry, Heath: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 Luther, Martin: *Erhalt uns, Herr, bei Deinem Wort*, 1542, in Joachim K. F. Knaake

- et al.,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35. Band, 1923, pp. 235-248.
- Luther, Martin: *Vom Kriege wider die Türken*, Wittenberg, 1529, in Joachim K. F. Knaake et al.,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30. Band, 2. Abteilung, 1909, pp. 81-148.
- MacLean, Gerald: *The Rise of Oriental Travel: English Visitors to the Ottoman Empire, 1580-172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MacMaster, Thomas J.: "The Origin of Origins: Trojans, Turks and the Birth of the Myth of Trojan Origins in the Medieval World", in *Atlantide*, vol. 2, 2014, pp. 1-12.
- Malov, Sergey (Малов, С. 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сква, 1951.
- Marquart (Markwart), Josef: *Wehrot und Arang. Untersuchungen zur mythis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Landeskunde von Ostiran*, Brill, 1938.
- Marquart, Josef: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in *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 in *Abhandlung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eue Folge, Band XIII, Nr. 1, Berlin, 1914.
汉译本见〔德〕马夸特著，陈浩译：《库蛮民族史证》，商务印书馆，2025年。
- Marquart, Josef: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 II*, Leipzig, 1905.
- Martini, Martino: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London, 1654.
- Martini, Martino: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1654.
- Martini, Martino: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
- Maue, Dieter: "Khüis Tolgoi: Signs and sounds", in *Journal Asiatique* 306 (2), 2018, pp. 129-139.
- Ménage, Victor L.: *Neshr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Mengüç, Murat Cem: "Histories of Bayezid I, historians of Bayezid II: Rethinking late fifteenth-century Ottoman historiography",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2013, pp. 373-389.

- Mengüç, Murat Cem: "Interpreting Ottoman identity with the historian Neşri", in Christine Isom-Verhaaren and Kent F. Schull ed., *Living in the Ottoman Realm: Empire and identity, 13th to 20th Centur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16.
- Mengüç, Murat Cem: *A Study of 15th Century Ottoma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 Messerschmidt, Daniel G.: *Abulgasi Bagadur Chan's Geschlechtbuch der mungalisch-mogulischen oder mogorischen Chanen*, Göttingen, 1780.
- Miles, William: *The Shajrat ul Atrak or Genealogical Tree of the Turks and Tatars*, London, 1838.
- Miller, G. F. (Герард Фридрих Миллер):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725-174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0.
- Minorsky, Vladimir trans.: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 D. 1120)*, London, 1942.
- Minorsky, Vladimir: "The Khazars and the Turks in the Ākām al-Marjān",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9 (1), 1937, pp. 141-150.
- Minorsky, Vladimir: "The Qara-qoyunlu and the Qutb-shāhs (Turkmenica, 10)",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7, no. 1, 1955, pp. 50-73.
- Moravcsik Gyula & R. J. H. Jenkins ed. and tr.: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Washington D. C., 1967.
- Moravcsik, Gyula: *Byzantinoturcica*, vol. II, *Sprachreste der Türkvölker in den byzantinischen Quellen*, Brill, 1983.
- Moriyasu Takao 森安孝夫 & A. Ochir: *Provisional Report of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Sites and Inscriptions in Mongolia from 1996 to 1998 (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Osaka, 1999.
- Moriyasu Takao 森安孝夫: 《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 載《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 1977年, 第1—48頁。
- Moustakas, Konstantinos: "The myth of the Byzantine origins of the Osmanlis: an

-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in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39/1), 2015, pp. 85-97.
- Murray, Alexander Callander ed. and tr.: *From Roman to Merovingian Gaul: A reader*, Toronto, 2008.
- Navarrete, Domingo Fernandez d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London, 1704.
- Navarrete, Domingo Fernandez d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
- Necipoğlu, Gülru: "Süleymâ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Ottoman-Habsburg-Papal Rivalry", in H. İnalcık and C. Kafadar eds., *Süleymâ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 Neşri: *Ğihānnümā: die altosmanische Chronik des Mevlānā Mehemmed Neschrī*, Franz Taeschner ed., Leipzig: Harrassowitz, 1950. 土耳其语本见 *Kitāb-i chihan-nümā*, F. R. Unat & M. A. Köymen ed., Ankara, 1957.
- Newton, Arthur P.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26.
- Ögel, Bahaaddin: "Doğu Göktürkleri Hakkında Vesikalar ve Notlar", in *Belleten*, Cilt: 21, Sayı: 81, Türk Tarih Kurumu, 1957.
- Ölmez, Mehmet: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On the discovery, the whereabouts, condition of the stones, and our expedition", in *Journal Asiatique* 306 (2), 2018, pp. 125-127.
- Ölmez, Zuhâl Kargı: *Şecere-i Terākime*, Ankara, 1996, 2020.
- Orkun, Hüseyin 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I*, Istanbul, 1936.
- Osterhammel, Jürgen: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C. H. Beck, 1998.
- Parisiensi, Matthaei: *Chronica Majora*, Henry R. Luard ed., vols. 3-4, London, 1872.
- Parker Edward H.: "The Origin of the Turks", 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 No. 43, 1896, pp. 431-445.
- Parker Edward H.: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Shanghai, 1895.
- Parker, Edward H.: "The Early Turks (from Chou Shu, Pei Shi, Sui Shu, Old T'ang Shu and New T'ang Shu)", in *The China Review*, vols. 24-25, 1899-1901.

- Pelliot, Paul: "L'origine de T'ou-kiue, nom chinois des Turcs", in *T'oung Pao*, vol. 16, 1915, pp. 687-689. 汉译本见（法）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8—53页。
- Pertsch, William: *Verzeichniss der türkischen Handschriften*, Die Handschriften-Verzeichniss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VI, Berlin, 1889.
- Pomian, Krzysztof: "Franks and Gauls", Pierre Nora ed., Arthur Goldhammer tr., *Realms of Memory*, New York, 1996, pp. 27-76.
- Poppe, Nicholas: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Harrassowitz, 1965.
- Pow, Stephen: "Nationes que se Tartaros appellant: An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the Usage of the Ethnonyms Tatar and Mongol in Medieval Sources", in *Golden Horde Review* 2019, vol. 7, no. 3, pp. 545-567.
- Pritsak, Omeljan: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of the Oghuz Yabghu", in *The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S.* II., New York, 1952, pp. 279-292.
- Pulleyblank, Edwin G.: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1(1/2), 1966, pp. 9-39.
-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 vol. 85 (2), 1965, pp. 121-125.
-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Wu-sun and Sakas and the Yüeh-chih migration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3, 1970, pp. 154-160.
- Pulleyblank, Edwin G.: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UBC Press, 1991.
- Quataert, Donald: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adloff, Wilhelm: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Lieferungen 1-3, St. Petersburg, 1894-1895.
- Ramer, Alexis M. & Paul Sidwell: "The truth about Strahlenberg's classification of the languages of Northeastern Eurasia", i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87, 1997, pp. 139-160.

- Rieu, Charles: *Catalogue of the Turkish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888.
- Róna-Tas, Andrá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Budapest, 1999.
- Rouillard, Clarence Dana: *The Turk in French History,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520-1660)*, Paris, 1938.
- Rudolf, Hans Ulrich & Vadim Oswalt: *Taschen Atlas: Weltgeschichte*, Stuttgart und Gotha: Ernst Klett Verlag, 2010.
- Sabatos, Charles D.: *Frontier Orientalism and the Turkish Image in Central European Literature*, Lexington Books, 2020.
- Şahin, Kaya: *Empire and Power in the Reign of Süleyman: Narrating the Sixteenth-Century Ottom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chmitt, Gerhard: "Sino-Altaica",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5, 1977, pp. 175-185.
- Schmitt, Rüdiger: "Die Sprache der Skythen", in *Nartamongae. The Journal of Alano-Ossetic Studies: Epic, Mythology & Language*, vol. 8: 1/2, 2018, pp. 77-86.
- Schönig, Claus: "On Some Unclear, Doubtful a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Mahmūd al-Kāşyarī's 'Dīwān Luyāt at-Turk'", in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vol. 14, 2004, pp. 35-56.
- Schott, Wilhelm: "Zur Uigurenfrage", Erste Abteilung, i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73*, Phil.-hist. Kl., 1874, pp. 101-121.
- Schott, Wilhelm: "Zur Uigurenfrage", Zweite Abteilung, i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75*, Phil.-hist. Kl., 1876, pp. 27-57.
- Schott, Wilhelm: *Versuch über die Tatarischen Sprachen*, Berlin, 1836.
- Sela, Ron: *The Legendary Biographies of Tamerlane: Islam and Heroic Apocrypha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haw, Stanford &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 1808-19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haw, 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280-18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ilay, Kemal: "Ahmedî's history of the Ottoman Dynasty", i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16, 1992, pp. 129-193.
- Sims-Williams, Nicholas &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Jabğuya: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Encyclopaedia Iranica*, Ehsan Yarshater ed., vol. 14/3, New York, 2007, pp. 314-316.
- Sinor, Denis: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2), 1953, pp. 427-434.
- Sinor, Denis: "Some Component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ürks", in *Altaistic Studies*, Gunnar Jarring and Staffan Rosen ed.,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85, pp. 145-159. 汉译本见〔美〕丹尼斯·塞诺著，罗新译：《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第83—103页。
- Sinor, Denis: "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ürks", in Egle Peter Voorheis ed., *Folklorica: Festschrift for Felix J. Oina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pp. 237-240. 汉译本见〔美〕丹尼斯·塞诺著，吴玉贵译：《突厥的起源传说》，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第67—70页。
- Skinner, Quentin: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 in *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3 (1), 1999, pp. 60-73.
- Skinner, Quent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mith, Charlotte C.: *Images of Islam, 1453-1600: Turks in Germany and Central Europe*, Routledge, 2014.
- Solanus: *Bulletin of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Group of 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1978 June, No. 13.
- Soykut, Mustafa: *Image of the "Turk" in Italy: A History of the "Ot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453-1683*, Berlin: K. Schwartz, 2001.

Spandounes, Theodore: *On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Emperors*, trans. Donald M.

Nic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pencer, Terence: "Turks and Trojans in the Renaissance", i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47, 1952, pp. 330-333.

Spuler, Bertold: "Abu'l-Ghāzī Bahādur Khān", H. A. R. Gibb et al.,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 1, Brill, 1986, p. 120.

Stachowski, Marek: "Uralistik und Turkologie – Geschieden und doch Verliebt", in *Vede Mucum, A Huszonötödik Ora*, J. Pusztay ed., 2001, pp. 209-225.

Stark, Sören: *Die Altürkenzeit in Mittel- und Zentralasien.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Studien*, Reichert, 2008.

Starke, Frank: "Troia im Kontext des historisch-politischen und sprachlichen Umfeldes Kleinasiens im 2. Jahrtausend", in *Studia Troica*, vol. 7, 1997, pp.

447-487.

- Strahlenberg, Philip Johan von: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English version: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57.
- Tekin, Tala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 Thomsen, Vilhelm: "Altürk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olei",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78, 1924, pp. 121-175.
- Toledano, Ehud R.: "What Ottoman History and Ottomanist Historiography Are-Or, Rather, Are Not",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3), 2002, pp. 195-207.
- Trediakovskiy, Vasily (В. Тредяковский): *Родословная история о татарахъ*, С.-Петербург, 1768.
- Turtledove, Harry ed.: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ni mundi 6095-6305 (A.D. 602-813),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 Vámbéry Arminius: *Sketch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868.
- Vámbéry Arminius: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864.
- Vámbéry, Hermann (Arminius): *Das Türkenvolk in seinen ethnologischen und ethnographischen Beziehungen*, Leipzig, 1885.
- Varzos, Konstantinos: *The Genealogy of the Komnenoi*, Kenton Byzantinon

- Ereynon, 1984.
- Vásáry, István: "Hungarians and Mongols as 'Turk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ethnic names", *Zwischen Byzanz und der Steppe: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Csanád Bálint zum 70. Geburtstag*, Á. Bollók, G. Csiky & T. Vida ed., Budapest, 2016, pp. 537-543.
- Veselovskovo, Nikolay I.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Хивинском ханстве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7.
- Virgil, *Aeneid*, tr. Frederick Ah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One, 2007.
- Visdelou, Claude de: *Histoire Abregée de la Tartarie*, in Herbelot,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La Haye, 1779, pp. 46-296.
- Vitkus, Daniel J.: *Turning Turk: English Theater and the Multicultural Mediterranean, 1570-163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Vovin, Alexander: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Linguistics* 2019 (1), pp. 162-197.
- Wallace-Hadrill, John M. ed. and t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and Its Continuations*, London, 1960.
- Wallace-Hadrill, John M.: "Fredegar and the history of France", in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40, 1958, pp. 529-531.
- Wen Shaoqing (文少卿) et al.: "Ancient Genome of Empress Ashina reveals the Northeast Asian origin of Göktürk Khanate", in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23 Jan.
- Weston, David: *The Bayer Collection: A preliminary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and books of Professor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acquired and augmented by the Reverend Dr. Heinrich Walther Gerdes now preserved in the Hunter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18.
- Witsen, Nicolaas: *Noord en Oost Tartarye*, Amsterdam, 1692, second edition in 1705.
- Wittek, Paul: "Das Datum von Yazıcıoğlu's Oğuznāme", *Türkiyat Mecmuası*, vol. 14, İstanbul, 1965, pp. 263-275.

- Witek, Paul: "Yazıyoghlu 'Ali on the Christian Turks of the Dobruj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1952, pp. 639-668.
- Witek, Paul: *The Rise of Ottoman Empi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with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by Colin Heywood, Rudi Paul Lindner and Oliver Welsh, ed. by Colin Hey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Witek, Paul: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8.
- Wolloch, Nathaniel: *History and N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Praise of the Mastery of N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1.
- Wood, Ian: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4.
- Woods, John E.: *The Agquynulu: Clan, Confederation, Empire*, revisi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 Varshater, Ehsan: "Afrasiab",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1/6, Brill, 1984, pp. 570-576.
- Yazıcızade, Ali: *Tevârih-i al-i Selçuk (Oğuznâme-Selçuklu Tarihî)*, Hazırlayan Abdullah Bakır, İstanbul: Çamlıca, 2017.
- Young, John & H. Aitken: *A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terian Museum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1908.
- Zimonyi, István: "Bodun und El im Frühmittelalter",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6, 2003, pp. 57-79.
- Zimonyi, István: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ürk identity among the medieval nomads of Central Eurasia", in *Studia Orientalia Electronica*, vol. 6, 2018, pp. 79-89.
- Zimonyi, István: "Why were the Hungarians referred to as Turks in the early Muslim sources", in L. Károly & E. Kincses-Nagy ed., *Néptörténeti Nyelvtörténet: A 70 éves Róna-Tas Andras köszöntése*, Szeged, 2001, pp. 201-212.
- Zimonyi, István: *Muslim Sources on the Magy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The Magyar Chapter of the Jayhānī Tradition*, Brill, 2016.

Zimonyi, István: *The Origins of the Volga Bulghars*, Studia Uralo-Altaica 32, Szeged, 1990.

Zinkeisen, Johann Wilhelm: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 in Europa*, 1. Bande, Hamburg, 1840.

索引

A

阿巴斯 128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 132

阿布尔哈齐 (参见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5, 55, 82, 86-90, 92, 94-98, 102-105, 142, 146

阿布海尔 87, 96

阿尔泰山 32

阿尔忒弥斯 19, 20, 27

阿夫拉西阿卜 29

阿佛罗狄忒 19

阿富汗尼 134

阿伽门农 19, 20

阿基琉斯 124

阿克楚拉 135

阿拉伯 29, 51-53, 75, 97, 120, 126, 137

阿姆河 102

阿努沙·穆罕默德·把阿秃儿汗 89

阿塞拜疆 119, 125, 133

阿瑟·洛夫乔伊 3, 33, 34, 138

阿史那 1, 7-10, 16, 17, 32, 37, 39, 40,

44, 45

阿史那贺鲁 39

阿斯特拉罕 75

阿瓦尔 59

阿贤设 16

埃及 62, 75

埃涅阿斯 23

埃特鲁斯坎 28, 29

艾弗里亚·切莱比 130

艾哈迈迪 111

艾汗 105, 119, 143

艾登德 18

爱琴海 113

安纳托利亚 28, 56, 57, 60, 102, 108, 110, 111, 115-119, 121-123, 125-127, 131-133, 137, 139, 143

安诺槃陀 34

安史之乱 40

安特卫普 78

盎格鲁-撒克逊 2

奥尔格·凯尔 90

奥斯曼 5, 6, 26, 27, 57-64, 75, 102, 108-137, 141-143, 146

B

巴巴罗萨 57
 巴比伦 19
 巴尔干 113, 122, 134
 巴库 93
 巴黎 21, 60, 116, 130
 巴米·布尔玛 106
 巴什基尔 51
 巴失乞儿惕 75
 《巴塔尔传》 120
 巴托尔德 99
 巴耶济德一世 117, 118, 122, 137
 巴音迪尔汗 102
 拔都 4, 57, 71, 75, 96, 144
 霸权 6, 63, 108, 139
 白鞑靼 69
 白令海峡 80
 白眉可汗 40
 白羊王朝 102, 125
 拜占庭 4, 7, 13, 25, 46-51, 56, 63, 109-113, 122-124, 138, 145
 保守主义 2
 碑铭 4, 8, 28, 39, 41, 42, 45, 47, 61, 62, 67, 82, 100, 112
 北凉 17
 北欧 28, 29
 北宋 80
 北突厥 38
 北魏 17
 贝尔格莱德 128
 贝鲁尼 98, 99

本达里 115
 本廷克 90
 比较语言学 53, 60, 61, 63, 132
 比利时 79
 比鲁尼 52
 彼得·高登 8, 36, 53, 99, 101
 波多利亚 81
 波兰 71, 79
 波塞冬 19
 波斯 7, 14, 25, 46, 51, 52, 56, 69, 74-76, 81, 82, 97, 104, 105, 115, 120, 126, 137, 142
 伯罗奔尼撒 124
 伯希和 35-37, 103
 勃艮第 21, 24
 博洛尼亚 28
 博思普鲁斯海峡 141
 卜弼德 36
 不里阿耳 49, 70, 74, 84
 布达佩斯 144
 布尔萨 111, 112
 布格河 81
 布古特碑 8, 36
 布哈拉 87, 89, 104, 106, 107
 布兰奇 71
 部落 1, 8, 9, 11, 18, 29, 37-39, 41, 48, 49, 51, 52, 54, 55, 67, 74, 75, 97, 101, 102, 110-112, 125

C

苍狼白鹿 144

草原 8, 12, 14, 26, 31, 37, 38, 40, 45,
48, 52-54, 63, 66, 73-75, 83, 101,
139, 140, 145
查士丁二世 46
长安 138, 145
长城 5, 78, 79, 143, 145
长时段 2, 3, 6, 140, 146
成吉思汗 55, 63, 69, 70, 73, 76, 78, 83,
87, 96, 103-106, 119, 142
炽俟 53
楚河 14
楚瓦什 64
处罗 13
噉 39

D

答赫勒 93, 94
鞑靼 4-6, 26, 44, 56, 58-60, 64, 66-84,
92, 94-96, 98, 132, 133, 135, 139,
143, 144-146
鞑靼利亚 5, 66, 79-81, 86, 139, 145,
146
鞑靼之轭 75, 144
大航海 7
《大唐西域记》 15
大卫·阿米蒂奇 3
大义公主 13
大英博物馆 94
大月氏 12, 14
戴安娜 19
戴美桑 82, 93-96

丹尼斯·塞诺 8, 16
单元观念 3, 33, 34
党项 41
德金 58, 81, 132
德涅斯特河 81
德宗 18
地理志 51, 52, 100
地中海 11
第二突厥汗国 8, 9, 39, 41, 42, 44, 45,
100
第聂伯河 81
第一次世界大战 139
第一突厥汗国 8, 9, 32, 36, 39, 47
蒂玛制 129
东北 32, 77, 79, 81, 141, 143
东曹国 15
东方学 4, 6, 31, 35, 58, 60, 61, 63, 64,
82, 84, 90, 93, 95, 101, 115, 116,
132, 141
东罗马 7, 13, 25, 46, 47, 56, 123
东欧 26, 60, 66, 76, 84, 132
东突厥第二汗国 (见“第二突厥汗
国”) 8, 40, 49
冬神 16, 17
都督府 39
兜鍪 10, 42, 43
杜佑 99
短期主义 3
段成式 17, 18
敦煌 68
多明我会 70, 71, 73

多瑙河 22-24, 144

多桑 58, 131

多神教 31

E

俄国（参见“俄罗斯”） 59, 60, 66,
75, 80, 81, 84, 88, 91, 95, 132, 133,
135

俄罗斯 73

鄂尔浑 61, 62, 82, 100

恩维里 126

F

法尔斯 125

法国大革命 60, 131

法兰克人 20, 22-27, 29, 30, 55, 56,
124

法兰西奥 22, 24

泛突厥主义 2, 63, 64, 84, 133, 135-
137, 146

梵蒂冈 70

方位观 8

腓力二世 22

腓特烈二世 71

弗莱德加 20-29, 55

弗兰克 86

弗里吉亚 22, 24

弗里加斯 22-24

伏尔加河 51, 70, 74, 75, 78, 84, 144

《福乐智慧》 29

拂菻 11

G

盖佐一世 50

高昌 10, 12, 13, 40, 60, 140, 144

高车 40

高卢 27

哥疾宁 60, 133

哥廷根 91, 93

歌革 30

革命 77, 138

格卡尔普 135, 136

格拉斯哥 91

格雷戈里 21

格里高利九世 70

葛逻禄 44, 53

耿世民 42

公共领域 2

古兹 53, 101

骨咄禄 37, 39

关外 79

贵克汗 118

国族 6, 144

H

哈布斯堡 128, 129

哈克路特学会 80

哈拉和林 75

哈里发 121, 128, 135

哈米德二世 135

哈默 109

哈萨克斯坦 14

哈扎尔 25, 48, 49, 52, 56, 139

海神 17-19, 27

汉朝 12

合迪儿汗 69

合法性 5, 25, 27, 31, 54, 104, 113-115,
117, 121, 123-126, 128, 129, 137,
142

合赞汗 115

和硕柴达木 61

河套 39

河西 17, 68

河中 15, 83, 87, 96, 98

荷兰 26, 80, 115

赫伯特·杜达 116

赫拉克勒斯 19

赫梯 28

黑鞑靼 69

黑海-里海草原 12, 14, 48

黑沙 45

黑羊王朝 102, 125

亨利三世 71

亨特博物馆 91

洪堡 93

侯茨玛 115

后现代史学 1

呼罗珊 58

花刺子模 83, 87, 102

花厅御诏 132

回鹘 29, 31, 40, 41, 45, 46, 60, 83, 100,
101, 103, 132, 133, 139, 140, 142,
144, 145

J

基尔曼 125

基马克 52, 53

吉本 92

吉本斯 109, 110

闾宾 14

加尔迪兹 30, 51

加齐 111-113, 120, 121

加斯普林斯基 133, 135

建炎南渡 140

践斯处折施 16

僭伪 140

降户 39

教皇 26, 70, 124, 128

捷真纳 106

颌利 13, 38, 39

金朝 69, 73, 78

金角白鹿 17-20

金山 10, 17, 42

金章宗 69

金帐汗国 75, 76, 84, 96, 144

近代早期 7, 57, 62, 66, 75, 76, 84

禁卫军 129

九姓 9, 40, 44, 45, 67-69, 100, 101,
139

九姓鞑靼 67, 68

沮渠氏 17

君士坦丁堡 5, 25, 26, 56, 57, 122-125,
128, 137

君士坦丁七世 49, 50

K

喀喇汗 53, 54
 喀山 64, 75, 80, 84, 92, 93, 95, 135
 喀什噶里 29, 53, 54, 98
 卡迪·布尔汗·阿尔丁 118, 119, 143
 卡蒂普·切莱比 129
 卡法达尔 112
 卡拉曼 125, 126
 开罗 128
 凯尔特 27
 凯库巴德一世 115
 凯末尔 6, 136
 凯撒 5, 122, 123, 125, 129
 凯伊 117-120, 141, 143
 康拉德 3
 康熙 79
 柯恒儒 60, 82
 柯尼克 102
 柯普律吕 110
 科林武德 1
 科穆宁 123, 124
 可萨 48
 克莱蒙七世 128
 克劳森 37, 42, 43
 克里米亚 6, 75, 80, 84, 133
 克鲁伦河 70
 克普查克 75
 客刺儿 75
 库尔干 14
 库柯汗 102
 库蛮 141

库萨合 46,

昆汗 105, 117, 118, 143

昆莫 12, 13

L

拉德洛夫 61
 拉施特 55, 74, 97, 98, 104, 104, 115
 莱昂·卡翁 62
 莱顿 89
 莱因哈特·柯塞勒克 2, 34
 莱茵河 22-24
 兰克 142
 蓝帐汗国 96
 狼种 8, 10, 12, 16, 32
 雷姆斯 15
 李德裕 68
 李靖 39
 李延寿 10, 111
 李渊 9
 里海 11, 12, 81, 92, 102
 历史语义学 2, 4, 6, 59, 132
 历史主义 2
 利卡多 70, 71
 梁武帝 34
 辽代 41
 列奥六世 48-50
 林德内尔 111, 112
 令狐德棻 9
 刘建 13
 刘细君 13
 刘应 58, 81, 132

卢克里 21,
 卢维语 28
 鲁布鲁克 57, 73
 鲁米利亚 122
 路易九世 71, 73, 74, 82, 114
 罗德岛 128
 罗马 5, 7, 13, 15-17, 19, 21-25, 27-29,
 46, 47, 55, 56, 71, 92, 123-125, 128,
 129
 罗慕鲁斯 15, 16
 罗塞塔碑 62
 《洛桑条约》6, 136
 绿洲 47

M

马丁·路德 57
 马尔斯 15
 马哈茂德二世 60, 114, 132
 马合谋·伊本·帖怯失算端 69
 马可·波罗 73
 马穆鲁克 121, 125, 128
 马尼亚赫 46, 47
 马其顿 22, 24, 55, 124
 马苏第 52
 马卫集 99
 马修·帕瑞斯 71-74
 玛各 30
 蛮族 6, 25
 满洲 79
 卯斡勒 75
 梅禄 44
 梅塞施密特 91, 95
 蒙古 4, 5, 26, 31, 35, 38, 54-56, 58, 59,
 61-63, 66, 67, 69-82, 84, 88, 95-99,
 110, 115, 117, 142-145
 孟珙 69
 弥南德 13, 14, 46, 47
 弥赛亚 111
 米勒制 134
 米诺尔斯基 15, 52, 100
 民主 2, 138, 139
 民族国家 6, 102, 108, 134, 136, 139
 民族主义 28, 60, 63, 64, 77, 84, 110,
 114, 135, 139
 闵明我 79
 明朝 60, 75, 76, 78
 明清鼎革 77, 78, 80, 143
 摩洛哥 75
 莫斯科 79
 漠北 1, 6, 8, 9, 17, 38, 40, 41, 44-46,
 67, 68, 100, 140, 141, 144, 145
 漠南 45
 鞑鞑 141
 墨洛温 25
 母狼 10, 12, 15, 16, 28
 母题 15, 18, 20, 28
 慕容鲜卑 140
 穆罕默德二世 5, 26, 27, 114, 121-125,
 127, 128, 137
 穆拉德二世 27, 114-121, 123, 137,
 143, 146
 穆斯林 4, 6, 26, 29-32, 51-57, 64, 69,

72, 74, 75, 98-101, 103, 110, 112,
113, 121, 123, 125, 127, 134-137,
139, 144, 145

穆斯塔法·阿里 130

穆塔基勒 128

N

南北朝 140

南怀仁 79, 80

南宋 69, 78

讷都六设 16

内陆亚洲（参见“内亚”）4, 58, 66,
76, 77, 84, 101, 142, 145

内什利 126, 127

内亚 4, 5, 8, 54, 56, 59, 73, 74, 77, 80,
81, 84, 85

内战 27

尼采 141

尼古拉五世 26, 124

聂斯托利派 72

弩失毕 39

诺亚 29, 30, 31

女真 31, 58, 68, 76-78, 81, 132

O

欧亚草原 2, 5, 77, 86

欧阳玄 40

欧洲 1, 4-6, 22, 24, 25, 27, 31, 58-60,
63, 64, 70-72, 74-79, 80, 81, 83, 84,
86, 89, 90, 92, 93, 96, 108, 109, 122,
132, 133, 136, 139, 141-143, 145, 146

P

帕米尔 14

裴矩 11

佩切涅格 49, 53, 101

佩切维 130

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 80

毗伽可汗碑 42, 61

片治肯特 15

平凉 17

葡萄牙 86

蒲类海 11

蒲立本 12, 35, 37

普兰·迦儿宾 72

普里阿摩斯 22, 24, 26, 29

普里查克 101

普鲁士 60

普世 122, 134, 137, 139

Q

七河 101 俟斤 39

乞儿吉思 75

乞蔑克 69

启民 13

起源 4-7, 9, 10, 12, 16-18, 20-32, 56,
62, 97, 106, 109, 110, 112-114, 117-
122, 126, 127, 129, 131, 136, 137,
141

契丹 18, 31, 44, 45, 58, 67, 68, 80, 83,
132, 140

千金公主 13

迁徙 3, 6, 17, 68, 69, 100-102, 113,

138-141, 143-145
 茜茜公主 50
 钦察 53, 73, 75, 83, 84, 101
 青海 140
 青年土耳其党 135, 136
 青铜时代 4, 28, 31, 32
 鞠伯雅 13
 权力 1, 4, 5, 38, 108, 119, 125, 128,
 130, 145, 146
 全球史 3, 4, 7, 29, 31, 86
 阙特勤碑 42, 61

R

日本 36, 81, 123
 柔然 10, 17, 31, 35, 37, 58, 59, 80, 83,
 132
 如尼文 8, 14, 28, 29, 39, 42, 46
 茹茹 10, 17, 42
 入声字 35, 37

S

撒鲁尔 118, 120
 萨法维 125, 128
 萨拉森 74
 萨满 112
 萨珊波斯 7, 25
 萨义德 63
 塞奥发尼斯 48
 塞尔柱 27, 53, 54, 57, 60, 99, 101, 102,
 109, 115-121, 126, 133
 塞勒涅 19

塞里姆三世 131
 塞里姆一世 122, 127, 128, 137
 塞人 12-14, 17, 47
 塞萨洛尼卡 121
 赛克孜耶里姆·切莱比 130
 赛义德·艾芬迪 130
 沙钵罗唎利 38
 沙钵略 13
 沙哈鲁 119
 沙玛什 19
 沙陀 41
 沙晚 11
 舍利 18, 19
 设 8
 射摩 18, 19
 神话 17-20, 27, 28, 31, 106, 117, 138,
 140-145
 神圣罗马帝国 71, 128, 129
 审音勘同 141
 生鞑靼 69
 圣方济各会 57
 圣经 29, 31
 十箭 38, 39
 十姓 38, 39, 44, 45
 史托兰伯 59, 81-83, 89-91
 始毕 13
 室点密 13, 25, 47
 室韦 70, 73
 收继婚 12, 13
 舒克如拉赫 126
 术思札尼 69

率都沙那 15

丝绸 7, 25, 46, 56

斯德哥尔摩 81

斯基泰 12-14, 31, 32, 47-50

斯金纳 3, 33

斯拉夫 30, 50, 84, 133, 144

宋朝 68

苏都沙那 15

苏都识匿 15

苏莱曼 5, 114, 122, 128-130, 137

粟特商人 7

粟特文 8, 39

粟特语 8, 9, 13, 35, 36, 39, 47

隋文帝 13

索国 16, 17

T

他钵 13

他称 2, 6, 39, 47, 50, 64, 68, 69, 76

塔吉克 15, 29, 55, 98

塔克汗 143

塔什干 93

塔塔儿 73

拓跋 37

太阳神 19

坦齐马特 132, 134

汤姆森 61

唐兀惕 97

特列季科夫斯基 90, 91, 95

特洛伊 5, 19, 20, 22-32, 55, 56, 124

腾吉斯汗 102

天山 10, 100

帖木儿 55, 63, 76, 86, 87, 117-121,

125, 137, 143

帖撒罗尼迦 124

铁尔痕碑 46

铁勒 11, 40

铁木真 104

铁器时代 4, 31, 32

通哈·阿勒普艾尔 29

突厥 1, 2, 4, -69, 74, 75, 80-88, 95-

100, 103, 105, 106, 108, 119, 122,

124-127, 131-133, 135-146

突厥奥特斯 23, 24, 30

突厥蛮 5, 86-88, 95, 97-99, 102-106,

112, 113, 117-122, 125-127, 131,

137, 142-144, 146

突厥民族 4, 33, 60-63, 83, 85, 139

突厥世系 5, 31, 55, 82, 87-98, 103-

107, 119, 142

突厥学 1, 36, 42, 43, 61, 83, 88, 95, 99,

132, 133, 140, 145

《突厥语大词典》29, 53, 54, 69

突厥语人群 2, 5, 6, 32, 44, 49, 53, 56,

57, 60-63, 76, 84, 85, 108, 114, 126,

129, 131-133, 135-137, 139, 142,

144

突厥种族 60, 63, 83, 85, 132, 133, 139

突骑施 39, 44, 53

图赫鲁·伯 102

图兰 29

图曼艾汗 119

土耳其 5, 6, 60, 62-64, 81, 95, 108-110, 113, 114, 115, 120, 125, 126, 132, 133, 135-137

土库曼 102, 133

土门 34, 37

吐蕃 52, 53

吐浑 41

吐火罗语 8

吐鲁番 60

吐谷浑 41, 140

噉欲谷 40, 44, 140

噉欲谷碑 11, 42

屯必乃汗 119

托古兹古兹 52, 53, 100

托普卡帕 116, 123

W

瓦尔纳战役 121

完颜襄 69

万伯里 61, 133

王国维 68, 69, 73

网络 7

威尼斯 26, 128

韦纥 40

维吉尔 24, 26

维也纳 128

卫匡国 78-80, 82, 143

畏兀儿 140, 144

魏特克 110-113, 116

魏特森 80

魏徵 9

乌古斯 2, 27, 44-46, 54, 69, 98-106, 110, 115, 116-121, 137, 139, 140, 142-145

乌古斯叶护国 102

乌克兰 81, 101

乌孙 8, 12-16, 39, 41

乌兹别克 76, 87, 94, 96-98, 102, 104-107, 133

乌宗·哈桑 125

污名化 70, 72, 84, 118

X

西班牙 79, 129

西伯利亚 42, 59, 60, 73, 80, 83, 89, 132

西藏 79, 143

西海 10, 11, 17

西辽 101, 140

西欧 4, 6, 7, 26, 27, 55-62, 66, 70, 73-81, 84, 85, 95, 98, 108, 124, 130, 132, 136, 139, 142, 144, 145

西突厥汗国 15, 49, 145

西魏 34, 35

西域 6, 38, 41

《西域图记》 11

希波里图斯 21

希腊人 14, 26, 124

希腊文 13

希斯·罗瑞 112, 113

希瓦汗国 55, 82, 86, 87, 107, 142

昔班 55, 87, 96

- 昔班尼 87
 昔蒙·不亦畏·札牙儿 69
 奚 44, 67, 141
 锡尔河 102
 黠戛斯 44, 53
 夏德 11, 99, 141
 夏神 16, 17
 咸海 11, 96
 宪法 2, 6
 想象共同体 33
 楔氏 40, 140
 新疆 14, 60, 79, 132, 140, 143
 匈奴 9, 10, 12, 13, 16, 31, 58-60, 64,
 80, 81, 83, 84, 132, 133, 141
 匈牙利 35, 49, 50, 61, 70-73, 121, 128,
 129, 133, 139
 叙利亚 75, 125
 叙事 3-7, 9, 10, 12, 13, 16-20, 22, 24-
 32, 44, 45, 47, 56, 64, 77, 80, 81,
 83, 96, 103-106, 109, 110, 113, 114,
 117-121, 127, 129, 136-138, 140-
 144
 薛内希 53
- Y
- 雅迪葛尔 87
 雅弗 29-32, 104
 雅库特 59, 60, 64
 雅兹吉奥卢·阿里 27, 115-121
 亚得里亚海 133
 亚历山大 22, 111, 123
 亚瑟·戴维斯 60, 132
 亚述 23
 亚洲 4, 22-24, 58, 59, 62, 66, 76-85,
 101, 109, 142, 145
 样磨 53
 耶律大石 140
 耶稣会 4, 58, 78-80, 132, 143, 144
 也速该 70
 叶护 8, 38, 101, 102
 噶哒 46
 一神教 5, 31
 一战（参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136
 伊本·鲁斯塔 51
 伊本·毗毗 115
 伊达理乌 21
 伊菲革涅亚 19
 伊拉克 115, 125
 伊朗语 8, 14, 29, 55, 98
 伊勒巴尔汗 87
 伊犁河 14
 伊利汗国 74, 76, 104, 115
 伊利可汗 37
 伊利亚特 28
 伊纳尔哲克 113
 伊萨克 123, 124
 伊塞克 14
 伊思芬迪雅儿汗 104
 伊吾 11
 伊西多礼 21
 伊质泥师都 16
 义成公主 13

易卜拉欣 128

意大利 28, 56, 78

懿宗 18 印度 53, 81, 121

印欧语 8, 12, 14, 28, 32

英格兰 71

永嘉南渡 140

尤利安 70, 71, 73, 74

尤利西斯 22, 24

犹太教 48

游牧民族 4, 8, 11, 46, 47, 50, 56, 83

于都斤 45, 69

于阗语 14, 68

宇文测 34

宇文泰 34

宇文招 13

语境龛 2

语境主义 3

语文学 97, 141

语音对勘 140

玉龙杰赤 87

元朝 69, 76, 78, 80

袁纥 40

原始印欧语 12

约翰·达尔文 86

月即别 96

越战 112

Z

张骞 12

哲罗姆 21, 22, 24

正史 4, 9, 10, 18, 41

正朔 140

知识生产 1, 4, 5, 77, 140, 141, 145,
146

殖民主义 139

中古汉语 35

中世纪 7, 26, 29-31, 51, 53, 56, 64, 71,
79, 81, 82, 84, 111, 141, 143, 145 中
亚 4-7, 14, 15, 26, 47, 53-55, 58, 60,
62, 64, 66, 69, 73, 76, 82, 83, 86, 87,
89, 95-98, 101-106, 110, 121, 122,
132, 133, 142-146

中原 6, 39, 41, 78, 144

朱元璋 78

庄延龄 83

自称 2, 6, 35, 37, 39, 41, 47-50, 58, 64,
69, 73, 74, 84, 97

总材山 45

阻卜 68

附录 我为什么要研究突厥学？^{*}

尊敬的杨立华院长、黄克武教授、周雪光教授，在座的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

我不知道以往的驻访学者有没有人想过或者提过，文研院为什么要给出“我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命题作文。我个人觉得，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能想到的场景只有两个。一个是学问做不下去想放弃的时候，另一个是退休后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做总结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质上是一个学者为自己的学术生命体塑造合法性的行为。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我们会遭遇不同的处境，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往往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如同新冠疫苗一样，在不同阶段需要研发出针对不同变体的疫苗，否则很难产生抗体，支撑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学术丛林中存活下来。

一、我为什么要研究突厥学？

我将分三个阶段来回答这个问题。（1）在北京读大学和研究生阶段。（2）在德国读博士期间。（3）在上海工作期间。

2005 年的这个季节，我从一个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仅限于一碗青

^{*} 按：此处收录的文字是笔者 2023 年秋季学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简称“文研院”）驻访期间所做的一次报告，时间是 2023 年 9 月 28 日，文字略有改动。

海牛肉面的苏北乡下，来到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中央民族大学（简称“民大”）。美美与共的多民族校园环境，给我带来的文化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懵懂的我一口气选修了藏语、蒙语、满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几乎所有北方民族语言的课程，之后我将目标锁定在了与我国西北边疆有关的突厥语族。于是，我主动联系任教于民大的享誉海内外的突厥学大家耿世民教授，听他所有的课，读他所有的书。非正式地追随耿先生学习三年，我收获的不仅是初得突厥学之要领，更是惊叹于老一辈学者对待学术的那份执着和坚守。当时萌生的想法是：我也要成为耿先生那样的学者。后来，我有幸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投罗新教授门下，学习北方民族史。罗老师不仅积极引介西方阿尔泰学的前沿学术成果，而且为我们提供到西北实地考察的机会，使得我能在朗润园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现在回想起来，在北京读书期间我选择突厥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原因，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浪漫的，说句“为往圣继绝学”并不过分。

在民大四年的语言习得，加上北大三年的史学训练，使得我初步具备了继续深造突厥学的条件。于是，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了国际突厥学的中心——柏林，攻读突厥学博士学位。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导师 Claus Schoenig 教授，当时已经身染沉疴，但是仍然坚持每周接待我一次，教会了我重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德国突厥学传统路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位请益对象，她就是土耳其科学院院士，也是文研院2018年春季邀访学者 Isenbike Togan 教授。从她身上，我学习到了宏阔的史学视野和关照多元文明的世界观。当然，在全德学术中心的柏林，我还有机会向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同事们学习。在得知我的论文即将完成之际，他们邀请我去科学院演讲。我用流利的德语讲述了博士论文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现场听众的反应来看，我知道这

篇论文成功了。后来的博士论文答辩环节没有任何波澜，导师组给了我“优秀”（Magna Cum Laude）的成绩。答辩主席，也是哥廷根大学教授、院士的劳特（Jens Peter Laut）教授友善地为我和导师留下了一张合影，戏称我们是“柏林学派”。（值得一提的是，在劳特教授的提名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将2023年的全德人文学学术奖颁给了我，以表彰我在博士论文中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并邀请我在11月16日去哥廷根院士年会上发表演讲。我拟的题目是，“东方学将走向何方？”[Wohin geht die Orientwissenschaft?].）在德国，时常碰到有人问我，为何要学习突厥学？我会耐心地解释，今天的突厥语人群遍布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但突厥最早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突厥学是针对所有突厥语人群的学问，中国也有几千万的突厥语人口，所以这门学问对我们国家很重要。然而，我内心却有一个更为实际的理由：我要学成归国，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2016年8月，上海最热的季节，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来到了魔都北郊的上海大学。一切从零开始，我渐渐学会了上课、发文章、申课题、报账等在国内高校所必备的生存技能。除了历史系的世界史团队之外，我服务的另一个单位是土耳其研究中心，这是一个研究当代土耳其政治的学术机构，与我所学的古代突厥学实际上只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于是，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学术规划，尽我最大的努力符合单位的要求和期望。我特别感谢这所位于中国211头部的上海大学，在这里工作的四年我得以快速成长，完成了从“学生”到“学者”身份的蝶变，甚至还被任命为历史系的副主任。2019年的岁末，恐怕是很多中国人生命史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长期在家的日子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我决定卸下繁重的行政任务，换个纯粹的学术环境。当时在上海，只有一所学校的历史系长年招聘，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

位——以理工科见长的上海交通大学（后文简称“交大”）。进入交大后，我除了要快速融入交大历史系的学科体系，即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还必须在学院期望和个人诉求之间寻求平衡，这份努力亦体现在网站个人简介里既填了规定动作“边疆史地”，也加了自选动作“中外关系史”——因为这是中国教育部学科名录内唯一能够囊括突厥学和中亚史两个面向的学科。工作后的我，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突厥学？”有了更具使命感的答案，也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

今年，在北大历史系咎涛教授和文研院的邀请下，我得以在这美好的季节再次重返燕园，回到我当年求学的“记忆之场”，仿佛一切都没变。我想借此机会，谨向那些在我求学过程中给予我学术养分的老师们，郑重地说一声感谢！

二、我如何研究突厥学？

一般而言，公众对一个学者的兴趣，应该不仅在于他是如何进入这个领域的，因为这是一个多少带有私人色彩而非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它的讨论空间其实很窄。如果真正想了解这位学者的特质，更应该向他提问的是：他是如何做这门学问的，或者说他对这门学问的理解与其他学者有何不同？所以，请允许我用第二个10分钟来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做突厥学？

第一，我主张突厥研究要祛魅。大家都知道“祛魅”或“去魔化”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倡的术语。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有一个“谈突色变”的怪现象，弄得学者们投鼠忌器，这样无形之中给“突厥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现在，我们要把这层面纱揭开，道理很简单：只有把历史问题研究透了，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对

现实问题的处理才会游刃有余。我国有藏学、蒙古学等专业，也有各级相关的研究机构，唯独没有设立突厥学专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突厥学人才寥寥无几，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的耿世民等极个别学者。年轻人想要继承突厥学的绝学传统，只能到欧美，甚至土耳其去学习。我们不培养人才，就相当于把突厥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别人。我国现有的涉及突厥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心，几乎都是从事区域国别的研究，专注于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我们在突厥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这些基础学问的传承、发扬上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学科机制，亟须布局。

第二，我专注于经典文本的研究。过去国外的突厥学有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传统，那是时代的因素造成的，因为欧洲探险家在中国西北攫取了大量文书，各自国家的学者依赖这批文献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随着这批文献逐渐数字化、目录化以后，它们对学者的吸引力或者说学者可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当然我们绝不能说属于19世纪末探险时代并收藏于欧美学术机构的这批出土文献的重要性降低了。我个人更关注的是经典文献，比如突厥汗国时期的三块大碑，在丝绸之路上传诵千年的突厥语人群史诗《乌古斯》，还有近代早期中亚河中地区的史学典籍《突厥世系》和《突厥蛮世系》。一部文献，之所以能够传世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定有它特殊的原因。学术的传承，需要经典文本来承载，新一代突厥学者的培养要依靠完整的而非碎片化的文献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我积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例如德国的概念史、全球史等。德国传统的突厥学家奉行一套所谓的“语文学”（Philologie）方法，常年自绝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日新月异创新。这套基于文本释读和语句分析的方法，在年轻一代中逐渐失去竞争力。

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欧美不同，我们在语文学上并没有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所以补上这一课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方法论上有所坚守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提出和回答当下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放弃语文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发扬光大的同时，要做到源于文本，却不止于文本。我们终究要仰望星空，去探寻那些对于人类历史进程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研究突厥学的意义何在？

对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而言，以每位学者花销 10 万元来估算，它每年要有 500 万以上的预算，我想它的目的绝对不会是单纯请一帮学者来静园神仙会。文研院的成立，背后肯定有一个宏大的学术关怀，即通过当代不同领域的学者群像，试图窥见中国学术的未来，或者未来的某种可能性。所以，最后 10 分钟，我要谈谈突厥学或者东方学对于当下学术生态的价值。我有三个论点。

1. 东方学是中国学者能够为国际学界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少数人文领域之一。任何一门学问的知识生产都不是在权力真空中运作的，欧洲东方学三百年的学术积累固然有殖民和帝国的底色。但是，21 世纪的中国学者，与其全盘接受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体无完肤的批判，还不如像戴维·兰德斯所呼吁的那样，要分清楚“欧洲中心论”中哪些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哪些是事实层面的问题。后殖民时代的欧美知识界，饱受殖民历史的道义枷锁之困厄，再加上国际政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更多地专注于欧洲内部事务，不再像 18—19 世纪那样以猎奇的心态去研究东方。实际上，在学术资源高度数位化、研究方法日趋同质化的当下，只要我们掌握了德语和法语这两门欧洲

“殖民语言”，那么我们的学者跟欧洲年轻一代面临的则是同一份“东方学”学术遗产。与在欧美学术机构从事汉学的华裔学者一样，与欧美同行比起来，中国的突厥学者甚至还有自己的汉语优势，因为毕竟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涉及突厥语人群的汉文史料。

2. 东方学的尽头是全球史。传统东方学饱受诟病的，是它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近年来在学界兴起的“全球史”，则是试图破除“西方中心论”，将历史人物、事件和进程放置于全球语境中考察，摆脱了传统国别研究的狭隘视角。全球史以其一套包容的方法，避开了历次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所必须经历的路线斗争，成功地在学界站稳了脚跟。全球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能够书写一部没有欧洲参演或者欧洲只是配角的历史剧。实际上，全球史家中有不少都是从事非西方区域研究的专家，例如在大陆畅销多年的《全球通史》一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专长是研究巴尔干和俄罗斯，甚至还写过中国的历史；《全球史导论》的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是日本史专家；《全球史讲稿》的作者，也是被誉为“研究19世纪的布罗代尔”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是研究汉学起家的；中国学界熟悉的德国汉学家夏德明，现在则是炙手可热的全球史领军人物。这些学者都是从欧洲的东方学传统上吸收学术养分，然后走上史学前台，在国际史学界挥斥方遒。

3. 中国学术要反思路径依赖。从晚清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来，我们的学术生产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在面对西方学术同行时，我们习惯于把自我想象成“受者”的角色，总是想从外国学点什么，而不是想贡献点什么，更多的是不敢想。长期以来我们跟国外学界的交流，实际上主要是跟国外的汉学家打交道。我们了解这些外国汉学家是如何看中国的，他们

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对自我身份的想象和重塑。这种路径依赖会让我们变得很敏感，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新清史”就是一个案例。或许跟个体一样，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也要足够强大、足够自信，才会对那些与我们不相干的人群和社会产生兴趣。我们才会去思考：能为非汉语的人群共同体研究点什么？在绝大多数国家，突厥学都只是一门很冷僻的学问。但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注“他者”的可能性，即中亚、西亚乃至东欧的突厥语人群，让我们能够暂时从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挣脱出来。

致 谢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出版之后的第一部专著，可视为开拓学术空间的一种尝试。本书的缘起，是2018年笔者在上海大学成功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突厥”的概念史研究（编号：18CSS001）。特别感谢郭长刚教授，与他的交流使得本项研究有了更明确的问题意识。在项目的进行期间，笔者调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衷心感谢学校和学院领导的鼎力支持，以及学校提供的科研启动费（编号：WF220409009），保证了书稿的顺利出版。项目结题之后，笔者又申请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2023年秋季的驻访机会，有四个月的时间集中修订文稿。感谢北大文研院提供的适宜的治学条件，以及同期邀访学者的砥砺。在过去几年内，笔者曾先后受到以下学者和机构的邀请，就本书的内容做过公开学术讲座。她（他）们是：北京大学晁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许勤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本书的第一章曾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的《史林》刊物（2022年第5期）。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历史评论》刊物（2025年第1期）。在处理书稿的后期，笔者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2025&ZD002）的支持。笔者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一贯支持，保证了书稿的质量。文中出现的错误，概由作者本

人负责。儿子陈培德正巧生于2018年，他与本书共同成长，书稿中承载了他童年的欢声笑语。最后，感谢妻子 Martina 的支持和对家庭的付出。